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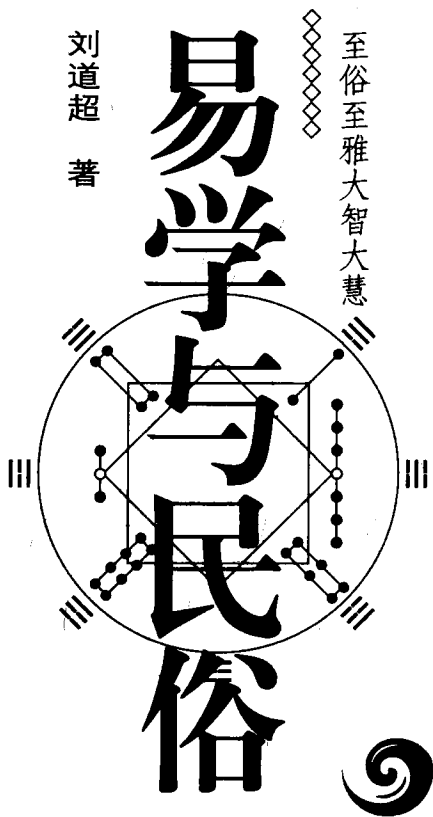
易学文化丛书

张其成 主编

至俗至雅大智大慧

易学与民俗

刘道超 著



010014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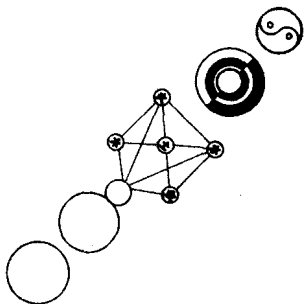


中国书店



总 序

张其成



在人类枢轴时代，只有一本书是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只有一本书是为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进程中，只有一本书对人文和科学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那就是《周易》。

《周易》是华夏文明的总源头，是中华文化的聚焦点！

《周易》、《易传》、“易学”不仅是“易文化”形成的三阶段，也是中华文化进程的三部曲，它标志着中华文化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易学史就是一部中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史。

作为“易文化”本质的“易道”，是宇宙生命的本体理念与生成结构，是开物成务、彰往而明、弥纶三才的大规律、大法则，是天人同构、时空合一、中正和合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易道”构成了中华文化最稳定、最本质的内核，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特征和总体走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风俗习惯。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易道”正是通贯儒家、道家的中华大道，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易道”对中华文化各形态、各学科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无论是以易理为指导思想规范各学科的学术走向，还是以易符、易图为框架建构各学科的理论体系，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往往或援易为说，或援以人易，从而都或多或少地与“易”建立了一种亲缘的关系。

因而从“易学”入手，从“易道”入手，探讨中国文化的本质，探讨中国文化各形态、各学科的思想来源、理论特征，就成为必要而且可能。

为此，我们组织了这套丛书。

本丛书旨在全方位展现易学文化的博深内涵和人文价值，系统阐述《周易》和易学的基本原理、哲学智慧，深入发掘易学与中华文化各形态、各学科的内在关系，企图从一个特定的层面揭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和发展规律。

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

整个人类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准备步入下一个百年循环。历史毕竟逃脱不了《周易》所昭示的周期运动的大规律。

下个世纪，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是大冲突还是大融合？这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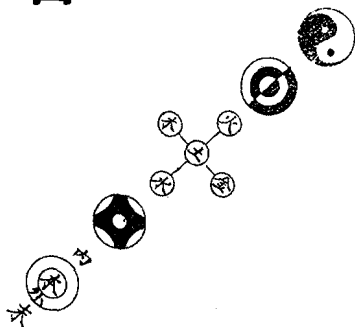
“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期盼。

如何消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如何消解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这是“和平”与“发展”所要首先解决的课题。“易学”以它保合太和、含弘光大的个性为解决这一课题提供了重要借鉴。面临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重新确认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承续以“易道”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理念精神，发挥“易文化”弥纶天人、贯通时空的品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与人文的互通、中西文化的融合……

这是历史交付给我们炎黄子孙的光荣使命！更是“当代新易家”所不可推卸的职责！

1997年夏于北京大学

前言



民俗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绵长。

任何人都生活于一定的民俗环境之中。无论“上智”，还是“下愚”，一举一动，无不受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制约。可谓“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黄遵宪语），民俗之固人可谓大矣。

可能是沾了一个“俗”字吧，民俗一直被认为是“低俗”、“低层次”、“低品位”甚至是庸俗的“下位文化”。“俗！”“俗气！”“太俗气了！”等口语，体现了世人的一般心态。苏东坡曾有一首打油诗曰：“无竹使人俗，无肉使人瘦。若想不俗又不瘦，最好餐餐笋炒肉。”谁都想少一些“俗气”，多一些“雅气”。至少也要附庸一下，以显示自己的高雅。因此之故，封建士大夫们往往是在研修那些思辨、理智、严肃、高雅的文化现象如孔孟、老庄、佛禅、道学等之余，才将其中佚闻趣事作为“谈资”，聊以记之，汇而集之，谓之“如是我闻”、“茶余客话”。

是的，数千年延绵不辍的中华文化，确实博大精深。尤其是以《周易》为代表的易学文化，开物成务，彰往而察来，弥纶三才，更是“形上学”的代表。然而，人们可曾想过，正如《周易》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一旦缺乏“形而下”的民俗，如何能构成完整的中国文化！实际上，以易学为代表，包括儒学、道学、道教、佛教等在内的“形而上”的理论性文化，与以民俗为代

表的“形而下”的实践性文化，恰如太极之两仪，一阴一阳，一虚一实，互抱互缠，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巍峨大厦。如果没有民俗的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无从付诸实施，无法获得支撑其永续发展的动力，也无从展现其灿烂的光芒，更遑论数千年延绵不辍，至今依然生机勃勃。

民俗是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赖以滋生的沃土。

学者们常爱吟诵：“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并一致认同，《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殊不知，广袤无垠的民俗，正是孕育这一“源头活水”的巍巍雪山、茫茫森林。《周易》所倡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至《周易》本身，都源自古老华夏土地上的民俗生产和民俗生活。

民俗还是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忠实实践者、体现者与传播者。你看：

那“与时俱变”的五时衣与分阴分阳的服饰习俗，那讲究以综合为美的色、味、香、形、器和谐匹配的饮食习俗，择吉而居、以曲为美、虽由人作而宛若天成的民居习俗，以顺天为吉、逆天为凶的出行习俗，以及生于天道的度量衡器，以“和气生财”的经营民俗，无时无处不在传诵着《周易》“保合太和”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品质。

各种物质生产民俗，是给世人的生存提供生活资料；红火热闹的经营民俗，是便于世人交换物资与积累财富，更好地生活；各种社会组织与规章制度、法律制度，是给世人的生存提供社会秩序和安全的保障；各种各样节日活动与文化娱乐活动，娱悦和调节世人的身心，使之张弛有度，生生不息。而各种人生礼仪习俗，更是《周易》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精神的生动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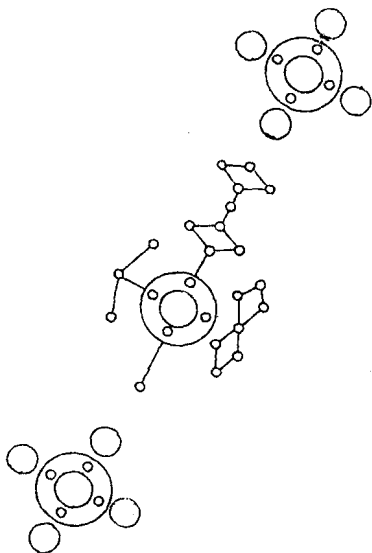
从内蒙古阴山岩画对男女性器及交媾的描述，到重庆綦江由六千枚男性生殖器构成的“男根圣地”；从妇女怀孕期的种种禁忌，到新生儿周岁“抓周”的阵阵笑语；从对伏羲、女娲众多婚姻之神的崇拜，到繁琐的婚娶六礼，以及象征平安幸福多生多育的马鞍、苹果、火盆、花生、枣子、栗子、半生不熟的饺子；从麻姑献寿、东方朔偷桃等众多寿仙故事，到做一不做十、做九不做十的庆寿习俗；从生前择润年润月做寿衣寿棺的讲究，到死后口中含饭，以及阴宅风水的精心考求，无一不体现出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

从“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等民间谚语，到“家和万事兴”等持家格言；从北京四合院尊卑有序的居住安排，到门大户小、室大人少等种种居住忌讳；从对北斗七星之礼敬崇拜，到饮食坐次尊卑之安排与严格依从，在在体现出贵和尚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

凡此种种，使我们看到，民俗是“俗”的，同时又是“雅”的。是俗中有雅，雅寓于俗。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至俗”之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至雅”。在“下位层次”的民俗文化里，实现了雅与俗的交融。原本孕育于民俗土壤的“上位层次”的高雅文化，因得到民俗持续不断的滋润和实践而获得了不断发展的无限动力，使之如同滔滔黄河、滚滚长江，永远奔腾向前！

不仅如此，《周易》一书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最深邃的生存智慧，也同样是孕育于远古民俗，并由民俗一往情深地实践着、检验着、发展着……

让我们把循着易学易道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脉搏，对至俗至雅、雅俗交融的中国民俗作一番巡礼吧！



目 录

总序 /

前言 /

第一章 总 论 /1

一、《易经》根源于民俗 /1

(一)《易经》源于上古占卜习俗 /1

(二)《易传》是先秦民俗精神的概括与升华 /2

二、民俗实践易道 /13

(一)“天人合一”与中国民俗之敬天顺时 /13

(二)“生生不息”与中国民俗之魂 /15

(三)阴阳交感循环变易与中国民俗之生存智慧 /19

第二章 积极进取,以驾驭自然为目的的巫术民俗 /23

一、《易》源于巫而高于巫 /24

二、自信心的激励机制:占卜习俗 /28

三、“同声相应”与交感巫术 /30

四、气运动的轨迹:神秘的符箓 /34

五、“夜哭郎”与咒语巫术 /43

六、五行生克制化与反抗巫术 /47

七、建筑民俗中的制化巫术 /51

第三章 协乎五纪辨乎五方的择吉民俗 /54

一、顺天行事,择吉由生 /55

(一)择吉之定义与特征 /55

(二)易学与择吉,形同兄弟实为母子 /57

二、理论驳杂,易学为宗 /63

(一)援易入术,作为择吉理论基础 /63

(二)依据易理,完善原有择吉理论 /68

(三)根据易理,新创择吉理论体系 /82

三、神煞怪异,不违易理 /86

(一)直接源自易卦易理的择吉神煞 /86

(二)根据阴阳易理而创造的择吉神煞 /87

(三)源非阴阳易理而实相通的择吉神煞 /90

(四)纷纷神煞,归于易理 /90

四、择吉方法众多,无出阴阳 /91

(一)总纲:天星、地理与年命三全齐美 /92

(二)制煞、化煞要法 /93

五、择吉之旨,协纪辨方 /94

第四章 依时而作的生产民俗 /98

一、动静不失其时的农耕民俗 /99

二、合乎天时、不妨农事的田狩古俗 /102

三、顺乎天时、尽乎物理的伐木民俗 /105

四、善用事物生克特性的种植习俗 /106

五、巧用事物生克特性的渔猎习俗 /107

六、以母仓为吉的种植择日习俗 /109

七、忌九焦九坎的种蒔禁忌习俗 /111

八、生产经营中忌讳女性的习俗 /113

第五章 取之有道的百工商贾理财民俗 /115

一、三百六十行财源似水 /115

二、度量衡器生于天道 /119

三、开市经营求合“天愿” /120

四、庸俗之中有易道的求财理财习俗 /123

五、利市仙官 /126

第六章 人天和谐的风水民俗 /128

- 一、神秘的太极星象村 /128
- 二、择吉处而居,力求人天和谐 /130
- 三、以直为凶,以曲为吉 /136
- 四、因地制宜形成不同民居建筑风格 /140
- 五、居中为尊,适中为美 /141
- 六、补救不良宅地以求人宅相安 /145
- 七、既要好住场,又要好肚肠 /149
- 八、追求时间与空间完美统一的修造择日习俗 /150

第七章 生生不息的婚姻民俗 /153

- 一、《周易》的家庭婚姻观念 /154
- 二、赐民良缘的婚姻之神 /158
- 三、应时以会男女的择偶民俗 /164
- 四、谋求“人谋”与“鬼谋”合一的婚娶六礼 /166
- 五、“合八字”以定婚姻之习俗 /170
- 六、寓祝吉祥多子、平安富贵的婚礼用物与仪式 /174
- 七、以顺天优生为宗旨的房事禁忌 /180
- 八、纳妾典妻以求多子之种种婚俗 /183
- 九、延续生命乐章的冥婚习俗 /186

第八章 张弛有度的岁时民俗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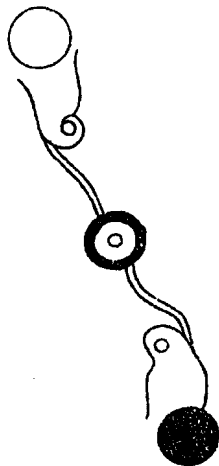
- 一、三阳交泰与正旦习俗 /189
- 二、北辰崇拜与上元灯节 /196
- 三、“见龙在田”与二月中和节俗 /198
- 四、三月“出火”与寒食禁火习俗 /200

- 五、“飞龙在天”与端午节俗 /201
- 六、以火纪历与祀灶习俗 /204
- 七、“五阴剥阳”与九九重阳 /208
- 八、“冬至一阳生”与冬至节俗 /212
- 九、“亢龙有悔”与“阳月”诸节俗 /213

第九章 尊重自然、珍惜生命的禁忌民俗 /217

- 一、晦日与癸亥日禁忌 /217
- 二、两分两至禁忌 /220
- 三、方位禁忌习俗 /222
- 四、太岁禁忌习俗 /224
- 五、黑道凶日禁忌习俗 /229
- 六、杨公忌与月忌日 /232
- 七、百忌日禁忌及其文化意蕴 /235

后 记 /241



第一章 总论

一、《易经》根源于民俗

(一) 《易经》源于上古占卜习俗

几乎每一个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总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比她多一个小鸡鸡？天为什么会打雷？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会有彩虹？天上的星星到底有多少？为什么老是眨巴着眼睛……

探究宇宙奥秘，把握未知，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因为自从人类从自然界进化出来，为着生存下去，发展下去，就必须揭开周围世界的秘密，必须掌握宇宙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知道如何趋吉避凶。先民们努力思考，认真观察，从自身到周围物体，从植物到动物，从地表直到天体宇宙。正常的与不正常的，静止的与运动的，活着的与死去的，石头、草木、飞鸟、潜鱼、青蛙、龟甲、蓍草、鸡肝鸡骨、耳鸣眼跳、梦境，几乎所有一切，都成为原始先民推测未知、预卜吉凶的参照对象。为了测知未来的吉或凶，求得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原始先民不知尝试了多少种占卜的方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即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①（《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

《周礼·春官》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认为《周易》与《连山》、《归藏》一样，也是一种占卜之术。

时至今日，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仍然见仁见智，争议未决。有说是卜筮书者，有说是哲学书者，有说是历史书者，也有说是科学书者，还有

称之为百科全书者。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张其成先生指出,《周易》的“经”和“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产生时间不同,性质也不相同。具体而言,“《易经》是一部占筮书,以占筮成分为主;《易传》是一部哲学书,以哲学成分为主。”^①两者的地位也不相同。即《易经》为体,《易传》为用;《易经》是基础性的本体构成,《易传》是对《易经》所含义理的哲学阐发。因此,归根到底,《周易》是一部筮书。

关于这一点,前人说得很明白。如朱熹就说:“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八·易四)近人李镜池也说:“《周易》是卜筮之书:其起源是在于卜筮,其施用亦在于卜筮。”^②

也就是说,《周礼》所说的“三易”,《连山》、《归藏》虽不可得见,但近年来安徽阜阳、湖北江陵以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易简与帛书,无论卦序或卦爻辞,都与今本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说明以卜筮占测吉凶的方式,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和规范化,《易经》一书就是历代卜筮者(主要是夏商周三代)在长期积累起来的非常丰富的卜筮记录的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的一部预测吉凶的法典。同时也是我国先民长期以来对自己观察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总结,是中华民族自有文明史以来文化活动的思维成果,是中华先民在自己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对天地万物的因果联系的最高抽象。

《周易》的符号是极其神秘的。对于构成八卦的最基本的符号“爻”,即阴爻(--)、阳爻(—),以及八卦符号本身,其因何而来?也有诸多解说。前者有结绳图画说、男女生殖器说、龟兆说、竹节蓍草说、日月星象说、数字说和算筹说等多种;后者有取象说、据数说、大衍之数说、乾坤生六子说、太极两仪说、河图洛书说、文字说、日月星象说、数卜说、筮数奇字说,以及其它种种说法。也有人坚持《系辞传》的传统观点,认为二者都是先民通过对天地、鸟兽、人物即宇宙万物的综合观测,然后概括、抽象、简化而来的。其实,就其本质而言,不论“爻”或“卦”由何而得,都是先民用以占测和记录一定占测结果的符号。

当先民将竹或蓍草作为占筮工具,根据一定的方法起占,如《系辞传上》所言,“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就能获得一定的卦象。然后根据一定的法则,推测其所象征的“天道”以及所蕴含的吉、凶、悔、吝等信息,就能得到所需要的决定趋避从违的“人道”启示。千百年间,先民们对气候、收

① 张其成《易道主干》,第14页,中国书店1999年。

② 李镜池《周易探源》,第20页,中华书局1978年。

成、战争、朝聘、婚姻、财富、疾病、建邑、逃亡等各种事务不断占问，不断探讨，不断归纳总结，日积月累，最后凝成《易经》一书。

因此，由卦爻象的符号系统与卦爻辞的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易经》，源自占筮习俗，是卜筮之书，是上古先民对宇宙生命占问的记录与思维结晶，当是确定无疑的。

（二）《易传》是先秦民俗精神的概括与升华

1. 易道精微

不论后人对中华先民赖以获取宇宙生命构成与发展之奥秘的方法如何评价，欣赏也好，不屑一顾、有意回避也罢，《周易》的作者们毕竟通过这种原始的卜筮方法，直观地、经验地提炼出了宇宙生命的本原、本质以及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总体观念。明确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传》）的宇宙生命的本体论、生成论和结构说。这种认识与现代科学的宇宙起源学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无怪乎后来我国古代几乎所有思想家都无法超越《周易》的基本观念，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关于宇宙生命构成与发展观念的总代表。

《周易》一书的创作者们将宇宙万物的本原归结为“道”。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阴一阳”，既是宇宙的本原，又是宇宙发展的规律。这个“道”，即易道，包括天道、人道、地道，广大悉备，无所不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同时，“道”又是不断变化的。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传下》）。变化的根本动因，在于事物内部的阴阳相推、相摩相荡和相互消长。

《易传》将阴阳提升为“范围天地”、“曲成万物”的最高范畴，把阴阳看成是“易道”、“天地之道”。认为阴与阳互相依存，各自以对方为存在条件。二者的盛衰、消长与转化，即构成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和衰亡演变的总体规律。同时指出，天地万物永远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传上》），永无止境，“生生不息”。

事物的变化又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物极必反，循环往来。事物发展循环往来的规律，既有周期节律之特性，如《周易·复》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这是阴阳来复的七日周期。此外还有一卦六爻周期节律、八卦周期节律、十二卦周期节律，和六十四卦大循环周期节律；又具有闭合与开放

的特性。《周易》所揭示的事物发展的循环往来，是一种圆形运动，首尾相衔，互为终始，但它又不是机械的、完全闭合的循环运动，在其圆形循环的过程中，随处都可能出现开放点。就是说，在《易经》六十四卦这一个大的循环系统中，包含有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次循环系统，每组两卦的小循环系统，以及更小的以卦为单位的微循环系统。每一个循环圆都可以出现开放点，从而跨入另一个循环，切入另一圆。由此产生量变与质变，实现上升或下降。前者进入更高一级次的循环，表现为螺旋式上升；后者则退入次一级循环。《周易》所提出的周而复始但又绝非回归于原出发点的周期性循环律，是一种宇宙普适规律，在本质上与“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等概念是相同的。^①

此外，《周易》一书还将“太和”作为“易道”的最高价值观念，尚“和”崇“中”。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彖传》）。“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生”又是“阴阳合德”的结果。这是阴阳两种对立的属性相摩相荡并达到“和”的时位才形成的。过犹不及，一定要居中、得中、应中。如果居中（空间）又得时（时间），必定大吉大利。因为在《周易》看来，人类生命是“天地氤氲”、“男女构精”而化生的结果，因此人类必须应天地而动，顺时而行，适时而变，做到“应乎天而时行”，“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周易·艮·彖传》）。最好是能够达到“四合”的境界，即“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传》）。实现“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并且不只是人类中的少数杰出者应该如此，所有人都要如此。

这便是《周易》一书所包含的“易道”三层面。即宇宙生命本原、本质以及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本体理念层面，人们对外界信息进行反映和处理的方式方法的思维方式层面，以及中华民族对文化的终极追求和理想境界的价值理念层面。这三大层面，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不仅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和走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而且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意识，乃至风俗习惯。正如清代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②唯

① 参见张其成《易道主干》，第128~130页，中国书店1999年。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一易类一，中华书局1983年。

其如此，才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大和谐。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易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而易学、易道的源头又在哪里呢？我们沿着这条延绵不断的文化长河一步一步往上追溯，最后发现，易学的源头，根植于古老洪荒而生机勃勃的民俗之中。根深叶茂的中华民俗，是孕育、滋生《周易》和以《周易》为代表的易学文化的巍巍雪山、莽莽森林。

2. “与时偕行”的易道源自农耕生产民俗

根据近年来丰富的考古发现，我国确立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至少已有近一万年的时间。

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特别突出。不仅阳光和雨水，季节的适时或早晚也是收成好坏的关键，在原始农业时期，尤其如此。所以，我国先民很早就开始认真观察天象，以确定季节，安排农事。在尚未掌握天时变化规律的时候，原始的农耕生产，难免混乱无序，备受尴尬。大约写成于战国中晚期的楚帛书，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情况。

此书内层乙篇说，从远古到包戏氏之时，一直“未有日月”，靠包戏氏的四个儿子即“四神”分守四方，用步行来推算时间，以表示四时。此后又经过“千有百岁”，日月才终于产生，逐渐有了由日月运行表示的“四时”。

太阳系诞生至今已有五十至一百亿年的时间，地球带着它的卫星始终围绕太阳旋转。包戏氏之时不可能没有日月。所谓当时“未有日月”，其后经过“千有百岁”，才“日月允生”之说，只能是当时不知寒暑及四时更迭之规律，致使耕稼失时，生产生活无序，灾难迭出，备受尴尬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它充分表现出中华先民为了把握天地日月运行的四时更替规律，经过了多么漫长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多少艰辛。正因为曾经饱尝有日月而“未有日月”的长期苦涩，才会得出“知岁顺时，天则降福；不知岁违时，天则降祸”的深刻认识。春秋战国时期所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篇》）“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荀子·王制篇》）等说法，都是对农耕生产根本规律的经验总结。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也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可以说，中国漫长的原始农耕生产民俗，以及通过这一生产民俗而得出的农耕必须依循天时的经验总结，正是《周易》“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等基本观念产生的基础。当然，由于《周易》的作者们将这一基本观念进一步提升到宇宙结构与运动节律的高度来认识之后，“应乎天而时行”，“与时偕行”，最后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

其明”，“保合太和”的境界，就不再局限于农耕生产，而成为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思想文化等所有人事活动都必须遵循的最高价值原则了。

3. 阴阳交感万物化生的易学思想，是对中国民俗生存智慧的提炼与升华

世界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研究表明，不论哪一个民族，无论其有多么古老、原始，都有一种几乎相同的观念，认为世界万物之间存在一种极其神秘的普遍联系，不管是同类还是异类，经过接触，都能发生神秘的感应现象，进而对接触过的物体发生影响。事物不同，所具有的特性也不相同。不同特性的事物相接触之后，会发生更为复杂、更为奇妙关系，致使事物产生各种变化。并且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人的主观操作来控制，达到所需目的。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民俗观念。

这种民俗观念，在我国远古民俗中有十分丰富的表现。它们是《周易》阴阳交感、万物化生观念滋生和形成的沃土。

我国民俗中天人交感的观念，十分突出地表现于各种“感生”传说之中。如：

伏羲之母华胥，履“雷泽”而生伏羲。《太平御览》七八引《诗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戏。”

握登感“大虹”而生虞舜。《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张守节《正义》说：（舜之父名瞽叟）瞽叟姓妫，妻子叫握登，看见彩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因以姚为姓；舜生而灵异，双目有两个瞳孔，取名叫重华。

修己感流星而孕生大禹。《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纪》说：大禹的父亲为鲧，母曰修己，见流星贯昴宿，梦接意感，又吞食神珠薏苡，怀上大禹；十月孕成，从胸肋间诞生，十分神奇。

殷契之母因吞食玄鸟之卵而孕子。《史记·殷本纪》：殷契的母亲简狄，与两个同伴到河边洗浴，见燕子在河旁产卵，简狄取而吞之，即怀孕生下契。

周之始祖后稷，传说其母姜源在野外踩踏一巨人足迹而怀孕，十二个月才出生，以为不祥而丢弃之。但牛马都回避不踩踏；想把他丢到山林中，又遇人多而不敢（《孟子·梁惠王上》）；最后将他放在水渠的冰面上，而飞鸟竟以巨羽保护他。姜源大感神异，于是抱回收养。由于当初一心想抛弃，所以取名叫“弃”。（《史记·周本纪》）

以上这些传说，学者多以原始时期人们不知人类生育之奥秘而托于神灵解释。其实，这正是远古民俗中关于天人之间可以感而相应（即天人感应）的观念的反映。女娲补天的传说，反映了同类事物可以比亲化生，异类事物则会相生相克的观念。《淮南子·览冥篇》：“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熋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



图 1-1 女娲补天 (采自《中国神话传说》)

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这里提到两件十分重要的事实。一是“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二是“积芦灰以止淫水”。

女娲为什么要用“五色石”来补天？是因为“五色”之“石”与“天”具有同类比亲的性质，二者可以比亲而化生，促使缺漏之天生长完备。

先说“天”。在我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宇宙观是“浑天说”，认为“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张衡《浑天仪注》，《晋书·志第一》卷十一引）《晋书》、《宋书》、《隋书》（天文志）则谓：“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朱熹曾对浑天说作如此解释：“《离骚》有九天之说，诸家妄解，云有九天。据某观之，只是九重。盖天运行有许多重数，……里面重数较软，在外则渐硬，想到第九重成硬壳相似，那里转得愈紧矣。”^②（《朱子语类·理气下》卷二）就是说，这个环抱地球的天体，里软外硬，并且是越到外层越硬，犹如蛋壳，而坚硬如石。

这个包裹地球、保护地球的外层天体之壳，由创造天地万物的所有物质之精华所凝就，这便是“太极之气”或“混沌之气”，其中蕴含阴阳与五行各种物质。太极分而为阴阳，阴阳运动变异而化生五行，五行各有其色，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黄。所以，当天体之壳不幸而有缺损，就应当用具有五行之色的东西来补合。

具有五行之色的物品甚多，何以独取于石？杨泉《物理论》：“土精为石。石，气之核也。气之生石，犹人筋络之生爪牙也。”（《太平御览》卷五十二引）《春秋说题词》：“石，阴中之辅，阳中之阴，阴精补阳，故山合石。”（《太平御览》卷五十一引）就是说，石为天地阴阳之气所凝造，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不偏于某一气。

本来，一石即含五行之精气，五色之石则各有侧重，将它们汇集熔炼，效果自然更佳。

总之，因为五色石与天之气相同，气同则易于交感，交感则可化生，因而是补天的最好材料。

女娲以芦灰止淫水，属于巫术行为（前者也属于巫术，即交感巫术）。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是基于事物间相克的特性，即人们在日常生活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的“水火相克”、“水火不相容”的现象。

关于同类事物比亲而化生的观念，有一个广泛流传于我国西南地区苗、瑶等族中的传说，十分生动有趣。

说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勇敢男子，在一个雷雨交加的下午，将不可一世的

雷公叉入铁笼子之中，紧紧关着。次日该男子到集上购买香料，准备把雷公做成腌菜吃，出门前对两个孩子千叮万嘱：“千万不要给他水喝！”不料男子走后，两个孩子禁不住笼中雷公的苦苦哀求，用刷锅的刷把蘸了几滴水，洒在雷公的口中。这雷公即因此获得雷霆万钧之力，冲破铁笼，回归天庭。不久就报复性地给人类制造了一场灭顶之灾……

故事充满了神话色彩，但其深层，却是关于同类事物比亲而化生的观念。雷公为司雨之神，性属水，故得同类之水即可化生出无穷的巨大力量。

体现事物相克特性的远古民俗事象就更多了。譬如：精卫填海。《山海经·北次三经》载：精卫之名源自其鸣叫之声，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水而死，化为精卫。不停地将西山木石衔往东海，试图填平之。这是以木石克水。



图 1-2 精卫（采自《山海经》）

大傩逐疫。这是一项历史极其悠久的古俗。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了大傩的仪式：腊前一日称“大傩”，又叫“逐疫”。举行大傩之仪，选择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一百二十人为傩子，一律穿赤帻皂制服，手执大鼗；方相氏以黄金四目为饰，身披熊皮，服饰上黑下红，双手执戈扬盾；又有十二人扮作十二兽模样，以角为饰；冗从仆射尾随其后，从中黄门开始出行，在宫禁之中驱逐恶鬼。

汉代驱傩俗制当由先秦傩俗传承而来。按我国传统观念，人属阳，鬼魅属阴，民俗逐疫除邪，主要就是以阳克阴。在傩俗之仪中，方相氏的“黄金四目”，是太阳的象征；十至十二岁的少年童子，是东方生长之气的象征；服装以赤色为主，以角为饰，亦为强阳；戈盾等武器，更是祛邪逐鬼之利器。凡此种种，共同造成一种强大的阳性力量，以驱逐和克制阴邪，达到人畜平安的目的。

此外，古人悬挂桃枝、苇索、菖蒲、艾草等以辟邪的习俗，缠五色线辟邪的习俗，以及《山海经》中关于某种食物可以祛邪防病的大量记载，都是利用事物之间相互克制特性的民俗事象。表明古人不但能够明确区分各种事物所具有的阴阳以及相生相克之特性，并且在民俗中有十分广泛的应用。

《周易》中关于阴阳交感化生万物的观念，如《系辞传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关于事物性质相克的观念，如革卦的水火相息；以“化”与“裁”的手段推动事物发展的观念，如《系辞传下》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这里所说的“化”，就是利用同类比亲的特性而化生；“裁”就是利用异类相克的特性“制”而用之。这些观念，无疑是源自《周易》作者们对天地万物及人类自身的观察。《易传》说伏羲氏创八卦，“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近取诸身”，指的就是人类本身和自远古洪荒以来的民俗实践。

4. “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易道精神，是中国民俗精神的概括和反映

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周易》则对这一思想作了最为经典的表述，成为影响最大的源头。《周易·乾·彖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系辞传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息，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做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周易》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为全社会所接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其实，《周易》所言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正是中国民俗根本精神的反映。你看：

面对四极废、九州裂、水火猛兽肆意虐的险恶生存环境，女娲氏没有灰心气馁，而是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重整天地山河；

身被溺死，化而为神鸟，虽说身小力微，一石一木，也要将东海填平！

夸父身高力大，耳挂两条黄蛇，手执两条黄蛇，誓与太阳赛跑，追赶光明。最后力竭口渴而死，死后的手杖化作一片枝叶茂密、果实累累的桃林，给后来的人们解渴，让他们继续赶路！（《山海经·大荒北经》）

还有：

率领全家老小移山不止的北山愚公；

前仆后继、哪怕是化身为熊也要将淫水治服的大禹；



图 1-3 夸父追日（采自《山海经·海外北经》）

为了拯救民众而勇射十日的羿……

——这是在神话与传说中体现出来的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精神的曲曲颂歌。

内蒙古绵亘数千里的阴山山脉，保留有创作于新石器时代的五万余幅岩画。岩画中众多人物手持弓箭射向动物的图像，动物交媾的图像，数对正在交媾的男女图像，以及广泛流传于汉族地区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像，表现了原始人类对生殖的热烈崇拜；

西王母曾亲见苍海三度桑田（显其寿命之久永），以及她的不死药和蟠桃盛会的传说，麻姑享寿数千年的神话，彭祖寿至八百的传言，以及秦始皇派徐福带三千童男女远渡重洋寻求长生不死之药的努力等等，体现出中华先民对生命永存的热切渴盼；

山顶洞人尸骨周围圈撒的赤铁矿粉，四川广汉三星堆古文化遗址出土的通天大铁树，西安半坡遗址墓葬中专门供死者灵魂出入的陶瓮孔洞，直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升天图，表现出中华先民对死后永生的不懈追求……

未生之前，渴求多生；既生之后，期盼健康，渴求长生；一旦死亡，则祈求永生——这是在远古人生礼仪习俗中体现出来的对人类个体生命生生不息的追求。

不论条件如何艰难，中华先民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各种物质生产，从不放弃对“生”的追求；对于神秘莫测的鬼神乃至天地，先民们或祭或祈，或敬或辱，当顺则顺，当强则强，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屈不挠，始终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繁衍和永恒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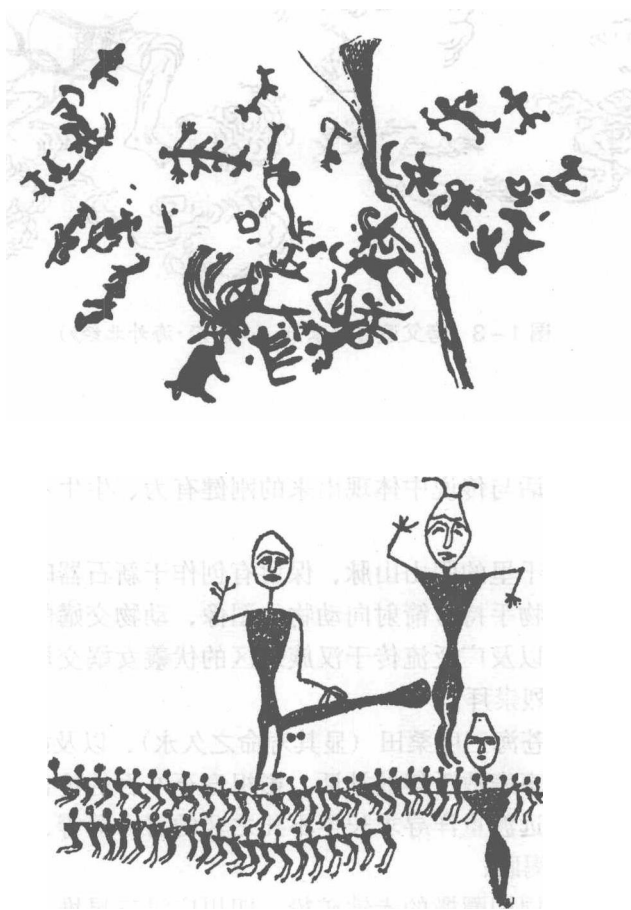


图 1-4 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交媾图（摘自《中国古代性文化》）

深深根植于中国民俗海洋之中的《周易》作者们，不能不被这种精神所感染，并且本身就是这一精神的实践者、崇拜者和倡导者。他们通过对天体永无止息的运行的观察，反观自身所处的各种民俗事象，或是由后者而反观前者，总之，是对这两者本质的精心观察和提炼、升华，使“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精神成为永远鼓舞中华民众奋勇前行的洪钟大吕。

二、民俗实践易道

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同理，《周易》源于民俗亦高于民俗，它将中国远古民俗中蕴含的精神与文化品格高度提炼之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同时也被日后的民俗行为引为圭臬。

易学文化属于理论系统，它与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墨家、小说家、杂家、诗词歌赋戏曲绘画，以及道教、佛教等等，一起构成中国“形而上”的文化体系；民俗则属于行为方式，它们构成“形而下”的实践系统，与前者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巍峨体系。近年来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或品质、特质等等，实际上都是通过民俗这一“形而下”的实践系统而得以付诸实施的。离开了民俗，传统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因为无所附丽而难以具有如此持久如此生机勃勃的生命力。以《周易》为代表的“形而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俗为代表的“形而下”的中国民间文化，如同太极的“两仪”，一阴一阳，一虚一实，互抱互缠，莫可或离，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太极”。广袤无垠的民俗生活、民俗行为，是孕育以《周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土壤，同时又不断地将《周易》所揭示的文化精神付诸实践，使之发扬光大，始终生机勃勃，光辉灿烂。

（一）“天人合一”与中国民俗之敬天顺时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基本精神之一，同时也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就是《周易》。《周易·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系辞传上》也说，圣人行事的准则，是“与天地相似”，做到“不违”、“不过”。

《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源出于我国自远古以来农耕生产民俗的

长期实践。当这一思想被《周易》明确提炼出来之后，不仅成为“大人”、“圣人”的行事准则，同时也成为所有下层百姓和所有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罢了。它的典型表现，就是涉及社会生活最深最广的择日办事的民俗。

在中国，上至天子，中则百官士大夫，下则纭纭黎民百姓，乃至流氓乞丐，办事而全不讲究日时方位者，几乎没有。正如汉王充《论衡·讥日篇》所说：“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因此，必先选择吉日吉时而后施行，即成为中国人办事最重要、最典型的行为模式。

中国人选择吉日吉时办事的范围，几乎无事不包。大则征伐登基经邦治国诸大事，中则婚丧嫁娶开业入宅诸人事，小则修造鸡窝牛栏鸡毛蒜皮之小事，概莫能外。

不仅如此，中国人选择吉日吉时办事的习俗，历史还十分悠久。在洪荒远古之时，即已有择日办事之习，当时是以占卜选择吉日。直至商代，依然如此。西周时期，办事用日的基本原则是“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同时“不违龟筮”。《易经》一书产生之后，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完善，到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与后代基本相似的择日术。甘肃放马滩和湖北睡虎地出土的大量秦简《日书》，即为证明。汉代以后，择吉习俗的发展，更是如火如荼，最终导致择吉《日书》与历书相结合，形成后世所习见的通书。可以说，择吉办事是旧时中国人最重要、最典型的行为特征。

那么，这一源远流长并且遍及所有事务的择吉习俗，是否真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是一堆不值一提的陈腐不堪的迷信糟粕，还是蕴含着尚不为常人所知的文化精华？

我们认为，我国择吉民俗的实质在于敬天顺时，目的是求得“天人合一”。因为据以选择吉日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而以易学为其圭臬；择吉术的神煞虽然名称怪异，但其本质，均不违阴阳易理，是阴阳五行运动之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各种表现；择吉术的方法，尽管纷纭复杂，却无出阴阳五行之生克制化。因此，择吉术不过是易学之支派，其实质，亦在于“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参阅本书第三章）《协纪辨方书》尝道其旨：

“举事无细大，必择其日辰，义欤曰敬天也；”“凡以血气心知之性，必合诸虚灵不昧之天，而后天下之理得使足已。而不问，则未事而先失也。选择之义亦犹夫是。天地神祇之所向则顺之，所忌则避之。既奉若于宫廷以彰昭事之忱，又申布于闾左以协休嘉之气。凡以敬天云尔。如曰若是则福，

不若是则祸，则术士之曲说而非其本原也。”（《协纪辨方书》卷三。本书引用皆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意思是说，择吉术反映的是一种阴阳之道、天地之道和自然之序。择吉的本质在于顺天、敬天，在于把握时空机遇。按照择吉的原则办事，由于顺应了天道自然，容易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若违背天道自然，事情的进展就不会那么顺利，甚至会出现挫折乃至殃祸。但这仅仅是一种逻辑结果，择吉术并无绝对的吉凶。如果说一定要如此则吉，不如此则祸，那就是庸俗术士的谬说而非择吉之本义了。

中国人择吉办事，其实质在于尊崇天道自然，敬天顺时，因而并无绝对的吉凶。它的立义，“无非慎微谨始，以昭钦若之忱。”（《协纪辨方书》卷六）因此，择吉办事与《周易》“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民众对《周易》“天人合一”思想最具体、最普遍、最经常的实践和应用。

对这一十分普遍而重要的民俗事象，我们应该抛弃成见，解放思想，进行认真细致的深入研究。

如果承认择吉办事是中国社会最普遍、最广泛的行为模式，那么，择吉的本质也就可以视作中国民俗的本质。由此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民俗的本质亦在于敬天顺时、追求天人合一。

（二）“生生不息”与中国民俗之魂

《周易》一书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思想，既是对天体运行本质的概括，也是对中华民族民俗精神的概括，更是对后世华夏子民的殷殷期望和强力鞭策。在饱读孔孟诗书的封建士大夫们普遍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奉为处世准则的数千年间，勤劳质朴的广大民众，他们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一件件坚实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华美乐章。你看：

重庆綦江中峰镇清溪河谷中数不清的男性生殖器石刻和石柱（据载有六千多根），是从秦朝到清朝两千余年间，当地民众为了祈求获取强悍生殖能力、人丁兴旺而不断创作的杰作，被誉为“男根圣地”——这是一曲多么坚韧不拔、多么感人的生命颂歌！

在育儿民俗中，我们从女娲与伏羲始祖神、送子观音、碧霞元君，到抓髻娃娃等众多生育神；从食瓜求子、食菜求子、麒麟求子、架桥求子、以灯求子、向灵石神树求子、向神灵求子拴娃娃，以及积德求子等众多的祈子习

俗；从修产室宜开日等众多的孕育禁忌；以及洗三、满月、抓周等祝愿新生命健康成长的贺生习俗、抚养习俗，以后天补先天的命名习俗，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对生命的热切渴望与深情礼赞。

图 1-5 抓髻娃娃。采自《中国诞生礼》。

为什么民间奉抓髻娃娃为生育之神？因为其通身体都是生育符号：头上梳的抓髻、脚下踩的抓髻、肚皮上的“十”形以及下身的男性生殖器，这些都是阳性的符号；而两手、两脚上的圆形、椭圆形，以及膝盖上的花朵和下身的莲花，都是女性的象征。



在婚娶民俗中，我们从鱼纹、蛙纹、花纹和鸟纹等象征多子多育的古老的性符号；从高媒、牛郎织女、月光娘娘、月下老人与氤氲大使等众多保佑多生多育的婚姻之神；从谋求“人谋”与“鬼谋”合一的婚娶六礼；从婚娶仪式中象征吉祥多子、平安富贵的婚礼用物；从洞房中那一碗半生不熟的饺子要求新娘说出的一个“生”字；从那一根扎着红绸带的甘蔗所透出的“甜”；以及“同姓不婚，其生不蕃”等众多的嫁娶禁忌、房事禁忌，乃至给已故亡人举行的冥婚习俗，真可谓不胜枚举，千姿百态。尽管其中不乏愚昧之举，



图 1-6 送瓜祝子（采自《中国诞生礼》）

但我们仍然会对中国民众对生命和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而深深震撼！因为不论哪一项仪式、哪一种象征物品，纯朴的中国民众都是极其认真地履行，极其虔诚地对待，绝无半点的虚假与儿戏，因为那就是生活，就是人们对人生的真诚期盼！在寿庆民俗中，我们从西王母、麻姑、八仙、彭祖等寿运长久的寿仙与寿星的传说故事；从随处可见的鹤、松、龟、菊等象征长寿的各种艺术作品；从那位前额高耸、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寿星形象；从“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等一幅幅祝寿对联；从“做一不做十”或“做九不做十”的庆寿习俗；从寿筵中一碗碗长长的寿面和一个个精制的寿桃、寿糕，还有选择闰年闰月做寿衣寿棺的种种习俗，无不让人充分感受到中国民众对生命之树常青的向往与执着追求。在丧葬民俗中，我们从中国民间以死为归、虽死犹生的生死观；从为死者精选葬地建造阴宅、精心准备阴间生活的各种用品、为亡灵辟邪以获得永生的种种习俗；从长期盛行的殉葬习俗和厚葬习俗；从墓室中为了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欣赏的精美墓室艺术，以及既期盼亡灵赐福，又害怕亡灵化为厉鬼害人的种种葬俗，为着祈求亡灵荫佑而积心处虑寻求阴宅风水，不惜多次迁葬父祖遗骨的葬俗，凡此种种，使人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民众不仅相信死后永存（灵魂），更渴求现世生活的幸福与永恒。

在节庆民俗中，我们从除夕之夜除旧迎新惊天动地的驱邪鞭炮；从正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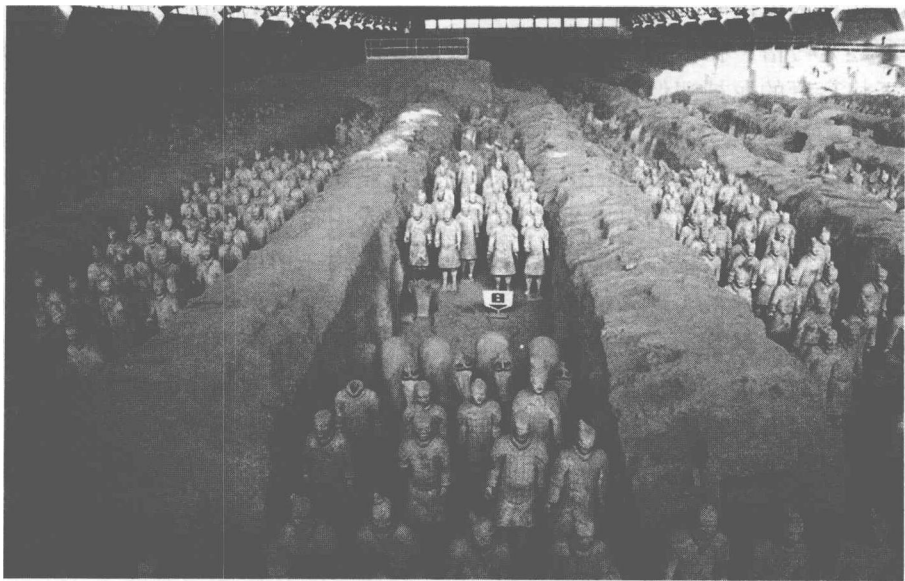


图 1-7 秦兵马俑全景图（采自《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

之晨恭迎财神的虔诚祈祷，辟邪的桃符、门神、压岁（祟）钱，吃年糕，饮屠苏酒从幼小起等习俗；清明节扫墓踏青、插柳枝之习俗；端午节家家户户门前悬挂菖蒲、艾叶，孩子们手臂上缠系着五色丝线，额上点雄黄酒，参与者与观赏者同样激情洋溢的赛龙舟等习俗；重阳节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诸习俗；还有节喜庆贺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舞龙舞狮，更是刚强威猛，有张有弛，刚柔相济，那一往无前的气势与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制作，将中国民众对生活的热爱与无穷创造力，以及中国文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图 1-8 魂瓶

采自《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元代明器，据说可以把人的“魂”收藏在其中，到特定的时间便能复生。

在巫术民俗中，有气势恢宏、誓将妖魔鬼怪赶尽杀绝的大摊习俗和其它驱邪逐鬼习俗；在求雨巫术中，人们虔诚地以礼祈求，若求而未果，人们就敢于将高贵的龙神塑像抬到烈日之下暴晒，甚至烈火烧烤，哪怕它容颜顿变泥胎龟裂！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对于神威广大的天地神祇各种神秘力量，人们虔诚礼敬，以顺事之。但当敬与顺均不能让人达到其所期盼的目的的时候，就不惜采用刚性的巫术手段以实现之。或用符，或用咒，或用镇物、秽物，直至兵器，总之，是竭尽智力之所能，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胁迫或强制天地诸神祇实现人类的要求。学术界大都承认巫术民俗的态度是积极的、进取的。尽管迄今为止对巫术中许多神秘现象仍然不能解释，但其中体现出来的对宇宙万物及其奥秘积极探索的精神、敢于制天命而用之的高度自信与孔武强悍，不正是易学或中国文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生动而传神的写照吗！

此外，物质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体育游艺民俗，乃至祭祀、禁忌等民俗，无一不洋溢着浓烈的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精神。《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我以为，中国民俗之大德亦在于生。哪一项民俗活动不是为了“生”？不是为了生之物质、生之健康、生之平安、生之和谐、生之幸福、

生之快乐、生之永恒？

中国民俗孕育了《周易》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又始终不渝地实践着这一精神。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这是可以肯定的。

（三）阴阳交感循环变易与中国民俗之生存智慧

《周易》认为，宇宙万物始终处在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系辞传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所蕴含的阴、阳两种力的互动、消长，事物之间的交感与相互影响也有一定作用。运用事物之间性质相同的“化”的手段，以及利用事物之间性质相反的“制”的手段，都可以影响事物的发展变化。

《周易》这一重要观点，也是源自对宇宙万物及人类自身民俗实践的观察与总结。尤其是后者，不仅在《周易》产生之前，给它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各种思想和智慧的原始胚胎，更在它产生之后，一如既往地运用这些思想原则，成为易学思想的坚定不移的实践者。

人类要想获得生存以及持续不断的健康发展，必须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或他族）、人与自身这三种关系。尤其是前者，在科学技术欠发达生产能力低下的古代社会里，更为重要。中国民众为了求取生存与发展，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民俗实践中，表现出极其丰富的生存智慧与技巧。

就天地万物而言，它们根据自身内部的阴阳之力而运动，依四时而变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人类既不存在敌意，也没有什么好感，只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存在物。但就人类而言，因为有利于生存和不利于生存两个方面，因而就会产生“友好”或“敌对”两种不同的感受。凡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现象和结果，就是“友好”的、生我的，反之就是“敌对”的、克我的、害我的。在人类的力量十分弱小，自然的力量无比强大，难以抗拒，两者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时候，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最能体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色。

中国民俗主要是运用“亲和”的方法，与自然界建立一种友好的、统一的关系。

《周易·系辞传上》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文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事物之间具有一种“感而遂通”的特性。

古人对待天地万物等自然界，是通过崇敬与祭祀的方式，即选取一定的物品，采用一定的方法和礼仪程序，敬之祭之，与之“亲和”，建立“亲缘关系”，使天地与我同宗，万物与我一体，使得原来有可能与我“友好”，亦有可能与我“敌对”的关系，变成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护我、佑我、生我的“友好”关系。因为在古人看来，万物皆有灵性，并且是能够“感而遂通”的。既然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送礼、说好话、盟誓等方式建立或改善关系，人与自然物（包括神灵）之间也可以依此办理。因此，人们根据不同对象选取相应的祭物（与对象性质相同，同时又是最为贵重和洁净的），采用相应的祭祀方法（如祭日月星辰诸天神用焚燎，祭山林土地用埋，祭河川用沉等），和最为动人的礼仪程序（如虔诚的斋戒和祷词，美妙的音乐和歌舞等），对天地诸神祇举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活动。以为如此一来，天地诸神祇一定会为之感动，答应和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至少不会再加害于人类。因为它们毕竟“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嘛。

不论天地万物是否真的有灵，是否真的能够感受到世人对它们的一片真心诚意，就祭祀者而言，在他们真实地相信人与自然（包括神灵）可以“感而遂通”的时候，经过了虔诚的祭祀礼仪，便会确定不移地相信：他们已经与天地诸神灵建立了“亲缘关系”，变成“父子”、“兄弟”或“姐妹”等关系了。这就像一个位卑力微、穷困艰难的普通百姓，一下子有了个贵为宰相甚至皇帝的亲戚，那份喜悦与自豪，简直无法形容。何况天地诸神祇，其神威与力量绝非人间帝王可比。因此，祭祀给古人带来的心理安慰以及精神力量，都是十分巨大的。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这种心理安慰与精神力量，对于古代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正因此故，古人一直十分重视祭祀礼仪，甚至国家产生之后很久，统治者仍把祭祀看作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这便是所谓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

根据事物同类相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特性而使之“感而遂通”的民俗应用是十分广泛的。除了祭祀习俗，在生产、生活、婚丧嫁娶人生礼仪、信仰习俗等方面，都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巫术民俗，由此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类别，那便是“交感巫术”。（参见第九章）比如在生产习俗上，民间就有夫妻一同点种芝麻的习俗。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六：“种芝麻，必夫妇同下其种，收时倍多；否则结稀而不实也。故俗云：‘长老种芝麻，未见得者’，以僧无妇耳。”^①

^① 郎瑛《七修类稿·未见得吃茶》卷四十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

天地万物可以区分为阴与阳两大类，又各具五行不同特性，因而在各物种间会发生生克制化等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对事物的发展具有促进或抑制等不同作用。《系辞传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即阴阳的变化可以通过人的后天裁节而加以改变，促使事物向有利于人的方向转化。“化”是化生，是将原属相克的关系转化为相生的关系；“裁”是裁制，即用克或制的方法达至目的。二者在民俗方面（尤其是建筑民俗）的应用也是十分普遍的。

“化”或“裁”的方法，在民俗应用中，一般是分别使用其中一种方法，也有两种方法综合应用的。

《太平御览》卷五十一引《淮南万毕术》：“埋石四隅家无鬼。取苍石四枚，及桃七枚，以桃弧射之。乃取并埋弓矢四隅，故无鬼殃。”“四”、“七”为金火之数，金象兵器，火象太阳，均有驱鬼之功；桃为神木，为百鬼所畏；弓及矢可远距离射杀，尤为鬼邪所惧。因此，这是以镇克之法致吉。

敦煌文书伯四五二二背面《宅经》中，记有一条坐寅卯向申酉住宅遇街巷相冲的化解方法：用纸剪女人七个，各长七寸；白石七两；虎头一具。以上诸物埋入寅卯之间，深七尺。先看“凶煞”之性质：坐寅卯向申酉之宅遇冲，是“煞”来自正西方，五行属金。再看所用之物：女人属阴性（金属阴性）；虎为西方之兽，五行属金；白石（颜色）亦属金；七之数（纸人的个数、长度、石头的重量、填埋的深度，均为七数）属火，为太阳之象。因此，这是利用与“凶煞”性质相同及相克的物品、数字和颜色，构成一种综合的力，来魔镇、化解凶煞。其中运用了“制”与“化”两种手段，故为“制化”之法。

在中国民俗大观园中，利用物性相通之特性使之相交感，利用物性相生之关系以“化生”，以及利用物性相克之关系以“制裁”的民俗事象，是十分常见，十分普遍的。

《周易》认为，事物以类相聚，同声者相应，同气者相求，事物之间存在“感而遂通”的关系。古人早已发现，磁石可以引铁，蟹黄可以解漆毒，萝卜捣碎可以去衣服上血渍；灯草渍水可以洗去绢纸上墨汁；荸荠汁淹铜，过夜即烂；以艾叶投燕巢，燕不复来；驼粪烟可以杀蚊虫；擂鼓可以落槐树之虫……

现代科学也发现，美妙的音乐能使奶牛多产奶，鲜花多开放；和谐的家庭花卉开得特别艳丽；植物也有血型，也有不同的五行特性，它们发出的不同气味，会在相互间发生积极的或抑制性的影响；甚至于水，对不同的音乐和声音，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自然界各种事物之间确实存在着相感、相生、相成、相克、相制等种种奇妙现象。那么，民间利用事物之间神奇联系而发生的大量民俗事象，是否包含着某些尚不为今人所知的生存智慧乃至科学智慧呢？在我国，很多老百姓就是这样看的，并且一直将它们付诸实践，传承不止。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们既不能简单肯定，也不能轻易加以否认。比如，古人关于胎教的种种讲究（很多内容可归入交感影响一类），其中很多被现代科学证明是正确的。从这一点看，我们确实不能对这类民俗事象轻易否认，而应当解放思想，认真地加以研究。

第二章

积极进取，以驾驭自然为目的的巫术民俗

人类首要的任务是生存，然后才是发展。

人类永远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未知领域，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越低，就越是如此。但人类却不能因此而停下前进的脚步。

未知会使人迷茫；迷茫会使人产生焦虑和恐怖，进而动摇人的希望与自信，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为了摆脱这种迷茫与焦虑的压迫，人类发现了巫术的力量，并如获至宝地加以运用。此即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当人类遇到难关，一旦知识与实际控制的力量都告无效，而同时又必须继续向前追求的时候，我们通常便会发现巫术的存在。须知人类一旦为知识所摒弃、经验所不能援助、一切有效的专门技术都不能应用之时，便会体认自己的无能，但是，这时他的欲望只是更紧迫着他，他的恐怖、希望、焦虑，在他的躯体中产生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而使他不得不追寻一种替代的行为。”^①

这种“替代的行为”，就是巫术。

于是，巫术成为人类社会早期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人类用进攻态势积极主动地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为模式。时至今日，其流风余韵，仍然未绝于世。

让我们从易学角度对这一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作一番审视。

^①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第7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一、《易》源于巫而高于巫

巫术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的文化现象，但它却不是从来就有的。当人类刚从地平线上站起，文明的曙光刚刚降临大地，那时还没有巫术，也没有什么成熟的宗教。

当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搏击中吃足了苦头，饱尝了艰辛与尴尬，遭遇了无数的失败甚至毁灭之后，慢慢发现了宇宙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然后才在“万物有灵”观念的催化下，发明了巫术这种行为方式，并充满自信地用以对付来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种种难题。

原始的巫术观念认为，自然界具有自身的规律，它不受人的干扰，按照自己不变的秩序演进，一个事件总是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紧随着另外一个事件而出现；只要掌握了事物嬗变、衍生和交感的奥秘，就能够加以利用，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在认识世界的概念这一点上，巫术与科学二者是相近的，即二者都认为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且由于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所以它们是可以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不仅如此，在巫术观念中，人总是以为自己已经深知一切事物的起因和后果，料事如神，能够接触与把握那部庞大的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机器”运转的全部奥秘，于是，巫术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鼓舞人们战胜失望与恐惧，将人的精神“带到极高的山峰之巅，在那里，越过他脚下的漫漫浓雾和层层乌云，可以看到天国之都的美景。它虽然遥远，却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放射着超凡的灿烂光华。”^①

然而，巫术观念中自然法则的基础性原则的虚妄与谬误，却使大多数巫术行为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可笑。这些原则可以归结为：一、同样的“因”可以产生同样的“果”，或者说彼此相似的事物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弗雷泽称此为“相似律”；二、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切断实际接触后，仍继续远距离地互相作用，弗雷泽称此为“接触律”或“触染律”。但是，由于认为宇宙万物存在内在规律，并且只要把握了这种规律，就能达到控制宇宙事物这一坚定信念，使原始人类始终孜孜不倦地探索宇宙世界的种种奥秘，致使巫术成为孕育产生后来各种科学技术的温床。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支撑现代社会

^①弗雷泽《金枝精要》第41页，刘魁立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的天文学、地理学、中医学、史学、数学，以及音乐、绘画、舞蹈乃至文字，它们的产生与发展，都与巫术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即有亲缘关系。

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至深至巨的易学体系，它的产生与发展，也是源于巫术，尽管有些人在感情上觉得不太舒服。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指出：“《易经》是一部占筮书，以占筮成分为主；《易传》是一部哲学书，以哲学成分为主。”^①两者的地位也不相同，即《易经》为体，《易传》为用；《易经》是基础性的本体构成，《易传》是对《易经》所含义理的哲学阐发。因此，归根到底，《周易》是一部筮书。高亨先生从文字学角度证明，“易”为掌管卜筮的官，“筮官曰易，因而筮官之书亦曰易，犹史官曰史，因而史官之书亦曰史也。”因此，《易》为筮书之通名，《周易》为一书之专名，因其为周代筮书，故曰《周易》。而卜筮原本就是巫术，所以推测“易”字当作巫覡之“覡”。^②清人朱骏声也持此见。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巫术在古代要解决预知未来吉凶、驱鬼治病等种种难题，是一种综合的“学问”，一种文化的集成，没有广博的知识即难以从事巫术活动。因而巫在社会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在夏商周三代，朝廷都设有卜筮之官，仅《周礼》一书，卜筮之官就有大卜、卜师、占人、筮人等。“这时的巫不仅是卜的职业家，而且还担任继承、传播与促进文化的责任，其中有不少人具有极为广博的知识。自今天看来，他们都是宗教家，同时也是哲学家，又是文学艺术家、自然科学家，而且还活动于政治舞台，实际他们是拥有没有分化的全部科学知识。”^③《易经》一书，就是他们长期按卦爻体系进行占筮的记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说“易源于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易经》六十四卦，举凡王事、战争、御寇、建侯、见大人、朝聘、婚姻、疾病、田猎、诉讼、收成、祭祀、风雨、商旅、涉大川、失物等，莫不占筮，遍及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的“蛊”卦即与巫蛊有关。《序卦传》说：“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即以喜说随人是好事，好生长久下去必生出坏事，所以随卦之后次以蛊卦。《说文》：“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臬桀死之，鬼亦为蛊。从虫，从皿。”将蛊释为“腹中虫”、“皿虫为蛊”、“鬼亦为蛊”，显然是指以器皿蓄养毒虫，通过施放蛊毒以害人的巫蛊之俗。所以《易经》作者以“蛊”作此卦之象与名，表示事情经过长久积弊而至于坏。

①张其成《易道主干》，第14页，中国书店1999年。

②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卷首，中华书局1984年。

③金景芳《学易四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

在起源方面，易卦与巫术也有相同之处。《系辞传》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这是说，《易经》卦爻的制作，是通过对天地、鸟兽、人类自身即宇宙万物的综合观察，然后将之概括、抽象、简化而来的。

关于巫术的起源，瞿兑之《释巫》说：“巫之兴也，其在草昧之初乎？人之于神祇灵异，始而疑，继而畏，继而思所容悦之，思所以和协之，思以人之道通于神明而求其安然无事。”然后产生了巫术与专师巫事的巫师。^①但这只是巫术的产生过程，而不是巫术的真正起源。巫术的核心是巫法、巫技，巫师是全面而熟练地掌握了巫法、巫技并加以施行的人，是后起的。从巫法、巫技的来源看，也是源自对宇宙万物的观察与效仿。这里择举两例。

《说郛》卷三十一引陈芬《芸窗私志》说：

神农时有一个叫白尼的人进贡了一头药兽，人有疾病则按白尼所传语言，告诉这头药兽（常人不知所云）。说罢，药兽则到野外衔回一草，捣汁服之即愈。后来黄帝令风后记其草名，及所对应的疾病，日后应用，一一灵验。古代传说黄帝尝百草，是不正确的。所以虞卿说：“黄帝师药兽而知医。”

这一段记载颇富神话色彩，剔除其神话成分，古人“师药兽而知医”的观点，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清楚知道，很多动物都有自己寻药治病的神奇能力，在其受伤或生病后，会自己去寻食某些草药来疗伤。譬如为了摆脱叮咬吸血的寄生虫，有的动物潜入水中，有的在泥浆里打滚，有的用柑橘类的果皮或者蜈蚣（它能够分泌具有清洁功能的苯醌）在身上揉搓。麻雀会在烟囱上方进行“烟熏疗法”。松鸦则喜欢“洗蚁澡”（蚂蚁能分泌甲酸）。一些禽鸟甚至知道寻食某种植物以治疗受伤的肢体。英国大学教师辛迪恩格尔《野生动物的健康》一书对此描写甚多。古人通过观察这些鸟兽的行为，发现了某些植物的治疗作用 and 治疗方法。同时受其启发，主动地去探寻各种植物的治疗功能。如此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中药学。

又巫师作法，踏罡布斗，必作禹步。这个至神至秘的禹步，是源自古人对禽鸟行为的观察摹仿。宋代周去非在岭南作官，曾对巫师禹步的来源作过一番考察。

《岭外代答》卷十“南法”条载：我听说巫师以禹步咒诀，鞭笞鬼神，破庙损灶。后来经过考察，南方果然有此源流。……广西邕州溪洞，有一种叫灵鹩的鸟，善走禹步以去室塞。

^①转引自张紫晨《中国巫术》，第254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7月。

还有巨毒鸩鸟，也善走禹步，可以使山石破裂。

卷九“鸩”条说鸩鸟：

黑身红目，音如羯鼓，最喜欢吃毒蛇。鸩遇到毒蛇，即走踏禹步，脚步声邦邦作响；蛇若钻入石穴躲藏，鸩即于穴外走禹步，不一会，石头就会碎裂，鸩即捉蛇吞食。禹步的神威，超乎常人的想象。

据其所言，巫术中应用极广的神秘禹步，极可能是来自对灵鹫和鸩鸟捕蛇步伐的摹仿。可能是大禹最早观察发现了这一秘密并加以摹仿应用，所以后人称之为“禹步”。

《洞神八帝元度经·禹步致灵》另有一说：大禹为了治疗足疾，见鸟“常作是步，禹遂横写其行，令之入术。”由此创造了“其跳其跳”的禹步。

不论禹步是否真为大禹首创，还是出于后人假托，其缘自对自然的观察和摹仿而创，则是可以肯定的。

茫茫天地，奥秘无穷，无所不有。各种神秘莫测的巫法巫技，或是直接来自对自然界的摹仿，或是因自然界的启发而创造。总之，都是源出自然。

易源于巫，同时又高于巫。原生态的巫术，是一个混沌未分的大杂烩。其中掺杂着大量伪的科学、不成熟的艺术。但古人为了预测事物的吉凶、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对宇宙发展规律的不断探索和积累，却使之逐渐发现了宇宙结构的奥秘和事物发展的规律。古代巫师探索宇宙奥秘的恒心，是值得后人钦佩的。孔子就曾说过：“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巫师们在长期探索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智慧结晶，最后凝成《易经》这一思维成果。“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从巫术中脱胎的《易经》，已经远远超越了它赖以产生的母体，经后代先哲的阐发而成为一个哲学体系，成为一个可以囊括宇宙万物的智慧模型。举凡作为计算机基础的二进制、量子力学互补性原理、并协原理、人类的六十四种遗传密码、化学元素周期率，以及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等等，都能在《易经》中得到合理的解说。《易经》的深刻内涵与巨大奥秘，已经激起并且还将继续激起世人的研究兴趣，推动世人去发现更多的宇宙奥秘，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自信心的激励机制：占卜习俗

趋吉避凶，是人类的本能或天性。人类先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理区域，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种趋吉避凶的天性促使他们不断发明各种探索天地奥秘、获取平安吉祥的方法。于是，随着探索和认识的发展，各民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占卜技法。中华先民所从事的种种占卜活动，历史之悠久、水平之高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实属罕见。

我国历史上有关预测吉凶的方法种类极为繁多，人们在习惯上常常将之统称为“占卜”。纵观中国占卜民俗史，占卜的方法很多。就汉族而言，主要有骨卜、龟卜、蓍筮等。这三种是夏、商、周三代最为推崇的占卜方法。就我国少数民族而言，占卜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如：苦聪人有草卜、鸡蛋卜；佤族有牛肝卜、鸡骨卜；黎族有鸡卜、石卜、泥包卜；景颇族有竹卜；傈僳族有刀卜、贝壳卜；彝族有羊肩胛卜、木卜、鸡卜、竹卜、鸡蛋卜；羌族有鸡蛋卜、羊毛绒卜；瑶族有竹卦卜；壮族有鸡卜……

对于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占卜习俗，有人称之为“神秘文化”，也有人谓之“迷信文化”。占卜习俗为何“神秘”、是否“迷信”，不是本书的研究任务，这里仅探讨两个问题：古人为什么要占卜？占卜具有什么社会功能？

英国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人类巫术与宗教的研究上颇有成就。他在经过详尽的比较研究后指出，在初民的知识中，有一部分领域是没有巫术地位的。如引火、编篮、制造石器、烧水、烹饪、织席，以及日常生活中许多普通活动，不论它们如何重要，都没有夹杂巫术成分。以食品生产为例。在海岛的社会中，人们依靠海产生活，在捡拾贝蛤，或用毒药及设堰捉鱼时，只要这些方法是一定可靠的，其中就没有任何巫术。可是在任何危险的、不稳定的捕鱼方法中就免不了巫术。在狩猎中，简单而可靠的设陷阱或射击都只靠知识和技术，若是在那有危险的及拿不稳的围猎中，巫术便立刻出现了。航海亦然。靠岸的活动，平安无事的，没有巫术；外出远征，没有不带着种种仪式的。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人们只是在知识不能完全控制处境及机会的时候才有巫术。”^①

这番议论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巫术产生的基本原因。巫术所担负的都是人的现实能力所不能及的事，都是用人们一般生产和生活技能所不能控制的事。越是力所不及，越是不能直接控制，就越是产生出控制的欲求，于是便借助

^①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第5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巫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占卜是巫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所承担的任务，就是判断人们现实智能所不能把握的事情的吉凶，解除人们的焦虑。这便是《礼记·曲礼上》所说的“疑而筮之”，使人“决嫌疑，定犹与（豫）”，增强成功信念。如果是高层次的占卜，还能告知人们如何处事的具体方法。《易经》就是这样一种占筮艺术。

《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都以“元亨、利贞”或“吉”、“吝”、“厉”、“悔”、“咎”、“凶”告知占筮的结果，表示吉凶的不同程度。并且提示人们所宜所忌。如“利御寇”、“利涉大川”、“毋用取女”、“取女吉”、“利见大人”、“利建侯行师”，等等。

其它占卜形式尽管远不能达到《易经》那样的程度，但它们都能够按照占卜者设计的占卜程式，给人们一个或吉或凶的肯定判断。就一般情形而言，这已经足够了。因为无论哪一种占卜形式，在它们被人们发现并加以运用之后，都被人们虔诚地信奉着。人们真诚地相信，它们就是神灵意志的真实体现。它们所显示的吉或凶，在当时人看来，是真切的，值得信赖的，也是有力量的。因为它们（神）已经明确告诉人们，某事“凶”，不能干，干了就会有灾祸；某事“吉”，可以大胆去干，干了就能成功，获得好结果。因此，当人们在从事没有把握或存在较大风险的事情的时候，占卜（得吉）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提高了人们获取胜利的勇气，因为人们相信，神灵在冥冥中保护和支撑着他们，从而大大提高事情成功的概率。

人类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高级思维能力，最大的悲哀是失去自信心，是恐怖，是绝望。现代成功学的创始人拿破仑·希尔博士有一句名言：“意念创造财富。”他最具代表性著作是《心理创富法》。自拿破仑·希尔之后，所有成功学著作无不以培养自信心、激发心灵力量作为获取成功之第一要诀。很多成功学和职业培训，都以战胜自我、增强自信心为主要目的。“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富，都始于一个意念。”这是顾修全博士《自我创富学》一书写在扉页的一句话。现在的人大概都能明白，成功的奥秘在于坚强的自信心与坚忍不拔的毅力。两者相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一旦没有了自信心，毅力也就无从谈起了。

古时候的民众不知道成功学的道理，相反却由于对鬼神等神秘力量的信仰而有过多的恐怖与焦虑。而对神灵和巫术的信赖，使占卜（得吉）对人们心理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先前的犹豫与焦虑一变而为自信、热烈、坚定，人们信心百倍地投入所需进行的事件之中，最后取得成功。事件的成功又进一步加深了古人对占卜巫术的信赖，更深的信赖产生更大的激励作用，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于是，在今人看来是简单肤浅的占卜巫术，就一代一代地传

承了下来。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占卜巫术是否具有现代科学所认可的“科学内涵”，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研究占卜巫术是否具有现代科学所认可的“科学内涵”，探索它们之中存在的“生存智慧”与“合理内核”，弄清它们长期传承的奥秘，是现代研究者的任务。

“生生之谓易”，反过来，也可以说：《易》之用于“生生”。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占卜巫术实际上起着“成功激励机制”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三、“同声相应”与交感巫术

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承认世界上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内部都不是绝对单一的，外部也不是绝对孤立的。整个世界是由万事万物相互联系构成的统一体。正因如此，“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①

承认世界上万事万物间存在普遍联系，并且十分注重这种联系，是《周易》一书的重要观点之一。

《周易·咸·彖传》：“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是说，“咸”就是“感”、“感应”、“交感”；咸卦上卦为兑，兑为泽，为少女，为阴柔；下卦为艮，艮为山，为少男，为阳刚；山泽通气，内外相应，阴阳二气笃诚相交感，象征夫妻和美，所以利于婚姻，娶女吉；天地相交感而化生万物，圣人与天下人之心相交感则能达至天下和平安宁。把“交感”看作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根本。这可视为异性事物间的相感、交感。

《系辞传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是说，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同类相聚，相聚的同类事物又以其共同具有的特点与它类事物区分开来。这是同性事物间的相感、相聚。

《周易·乾·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这几句话进一步说明同类事物相感相应的道理。“本乎天”的动物无不头向上而足在下，“本乎地”的植物无不本在下而末在上。圣人与万人是同类，圣人出乎其类而兴起，则万人必亲而从之。都是“各从其类”。

巫术是一个极其广阔的范畴。它相信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着人们不可见的种种联系和影响；相信外界（包括人死后的冥界）有种种可能对人们发生影响，同时也相信人可以对外界发生影响。人们在这一观念基础上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包括巫师从事的所有活动，也包括在没有巫师施术情况下人们自己进行的巫术活动，乃至崇信巫鬼、禁忌、占卜、招致平安的护身符、避邪物，以及祈禳咒语等等，都是巫术。总之，凡是企图影响鬼神、影响他人、影响自然、影响生活生产所使用的种种方法和手段，都属于巫术的范畴。

巫术的范围尽管十分广泛，但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其中之一便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首先提出的接触巫术和交感巫术的原理。他在《金枝精要》中指出：“如果我们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便会发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巫师根据第一原则，即相似律引申出，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从第二个原则出发，他断定，他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之一部分。基于相似律的法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或触染律的法术叫做接触巫术。”两者都属于“交感巫术”。^①

在我国各民族中，采取这种相似联想及接触联想而发生的巫术习俗极为丰富。我们先看交感巫术的第一大分支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

在东北地区，有埋泥人的咒人巫术：作一小泥人埋入地中，或进行捶打，意味着被咒的对方死掉或身染重病。更多的是作木偶人，以钢针刺木偶人的眼睛或心脏，以使仇方失明或心痛而死。一些狠心的婆婆或黑心的后母，为了置媳妇或前生子于死地，也常用此法。

在求子习俗中，模拟巫术也广泛运用。较为原始的生殖崇拜，必以与男性生殖器相像的木祖或石祖为象征，有的还专门制作陶祖或雕制近似物。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如女阴石、女阴穴等，也必取其相像之物。后世流行的“拴娃娃”习俗，也属于模拟巫术。人们制作许多泥娃娃献在各种娘娘庙中，欲求子者，在娘娘诞日的庙会中，以红线拴在某娃娃的脖颈上，意味着将娃娃拴回家中，以为得子之兆。

^①弗雷泽《金枝精要》，第16页，刘魁立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最典型的例子，是人们祭灶、送灶时对灶马所采取的手段。我国旧时大部分地区有祭灶习俗。一般是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灶神的神马，在汉族地区几乎家家供奉。从一年的开始，便将代表灶王的灶马裱贴于灶头，到年底祭灶时，必送其回天宫。它被视作上天派到各家各户监察监视的神祇，到时要在一定时间回天宫休整，禀报人间事。每到此时，人们要扎制鸡、狗、马等，为其回天宫作准备，并用鸡、黄羊等祭祀；另一方面，又必备麦芽饴（关东糖一类，称为灶糖），目的是粘上他的嘴，不让他到天上胡说八道。灶马上的对联总是写有“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字样。这种用灶糖粘灶马的嘴的举动，称为“粘灶”。另有一法是向灶马喷酒，把他喷醉，称为“醉灶”。无论“粘灶”还是“醉灶”，都是巫术中对同类型偶像施加影响的作法，都属于模拟巫术。

再如，人们祈雨中对龙王偶像的惩治作法，或将龙王偶像抬到烈日下曝晒，或将之用火燎烤，也都是在于相信偶像与龙王之间的联系，相信通过对偶像施加压力，便可迫使龙王在受不了早燎之苦的情况下，答应为人间降下甘霖。

再看交感巫术的另一分支接触巫术习俗。这种巫术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事物一旦经过接触，它们之间即一直保留着某种联系，即使它们已相互远离。无论对其中一方做什么事，都必然会对另一方产生同样的后果。

在育儿习俗方面。古人为了婴儿平安生长，仔细储藏他的胞衣及脐带，以免被有坏心的人拿走或是被狗等动物吃掉；为使儿童换牙顺利而将脱掉的乳牙抛于房上或是扔于床下，或埋于地下；若是儿童不慎“丢了魂”，便要用他（她）的贴身衣物披在草把上到野外去呼魂。如果久病不愈，则认为是魂为阴鬼所拘，也要以病人内衣裹在扫帚上，一路拖着到城隍庙等地方，把这裹衣扫帚围绕庙内阴司绕三圈，然后再沿原路拖回。以为这样做了，其人失去之魂便会随此衣物回还其身。

在婚姻习俗上，我国民间有个习惯用语：“结发夫妻”。所谓结发夫妻，是将新郎、新娘的头发结在一起。它的象征方式是将男方的头发剪下一缕，梳在女方的发髻里，女方也将其头发之一缕，放在男方的发辫中，因而称为“结发”。意思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旧时，男女之间以身相许时，也往往向对方赠上一缕青发，表示永远属于对方。

我国旧时以发、须、爪替代人的生命的习俗极其普遍，江绍原曾著有《发、须、爪》一书。《尸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等古籍都记载有这样一个著名事件，即商汤祷雨。说是商汤灭夏以后，大旱七年，川竭石焦，人民倍受其苦。卜说：当以人祷。汤即曰：我为民请雨，若必以人祷，吾请当之。乃斋戒沐浴，剪发断爪，以身祷于桑林之野。

即以发、爪代替自己生命祈祷神灵。三国时，曹操有一个“断发代首”的著名故事。曹操曾下过一道军令，不许战马践踏百姓庄稼，违令者斩。没料到他自己的战马有一次受惊，践踏了百姓的庄稼。自己首先违令，不罚何以号令三军！于是曹操举刀欲自刎，众将领赶紧拦住。三军岂能无主！经众将领苦苦哀求，曹操才“断发代首”，象征已受斩首之罚。

《孝经》有一句名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话说的虽然是子女“孝”的道理，但其深层，却明显可以看出原始交感巫术的影响。

类似上面的习俗，还可举出大量例证，它们都可以用弗雷泽的交感巫术的原理来加以解释，并且都是取其与实际存在物之间的相似而具有巫术意义的。

在我国民间的巫术习俗中，又由实体存在物间的相似扩大到取其内涵和引申意义的相似。如以葫芦象征母体的多子，以石榴象征多子多孕，以芝麻之节节开花象征高升，以经过发酵的馒头象征兴隆发达，等等。再进一步，又由实体存在物的相似发展为想象虚体物的相似。如鬼头、鬼脸的制作，神偶的塑造，神马的刻印，等等，都与想象中与实体存在物一样，为人们所相信。在此之外，又由实体存在物与虚体想象物的类比中跨出，运用事物名称的谐音寻求其间的相通。如以“鱼”与富余的“余”同音而相联系；以“瓶”与平安的“平”同音而相联系；以栗子与“立子”相联系；以花生与男女“花插着生”相联系；以及“莲子”与“连着生子”、“蝠”与“福”、“猴”与“侯”，等等，都是巫术意识在习俗中的表现，这可称为“巫术性的语言”。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交感巫术都是极其普遍和大量的。但就总体而言，交感巫术是在错误思想逻辑下产生的错误实践。即如弗雷泽所说：“顺势巫术所犯的错误，是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接触巫术所犯的错误，是把互相接触过的东西看成为总是保持接触的。”^①它与《周易》所揭示的“二气感应以相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即天地间异性事物相交感而化生万物，以及同性事物相感相应的普遍规律，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

真理夸大一步即为谬误，谬误中可能存在部分真理。《周易》对宇宙万物间普遍联系规律的揭示，当是对交感巫术夸大的普遍联系观念的科学扬弃或升华。

^①弗雷泽《金枝精要》，第17页，刘魁立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四、气运动的轨迹：神秘的符箓

巫术是神秘的，巫术中的符箓，更加神秘。

有人说，中国古代巫术的符，是地道的土产品，是最富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

关于符箓的来源。一说系黄帝得自西王母神授。《事物纪原》引《龙鱼河图》说：“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即黄帝与蚩尤决战之时，得西王母梦授神符，于是设坛祷请，遂有神龟衔符从水中出，置于坛上。此后即有符箓传世。

一说系黄帝“仰观天文，俯究人理”而得。《轩辕碑记医学祝由科·叙》说：“昔神农尝百草以治病，岐伯因病以刺方。”然而中草药和针灸虽可治病，却难治沉痾顽疾，于是，“黄帝深究五行，详察五脏，内因外因之感，人邪己邪之触”，考虑到患者一时不得其方药，医生或未能察详其手脉，以及因疾病于过深重、药品不齐，或是因患者过于贫穷不能备办贵重药物，于是“仰观天文，俯究人理，立为此法”，即创造了以符箓治病的简易方法。

从事物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看，符箓的产生，当属后者。其始于黄帝云云，则属假托。

不论后人如何评价，符箓自产生之后，在民间上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自汉以后，由于历代道士的推崇，符箓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十分神奇。《水浒传》中的神行太保戴宗，往脚上贴一张神行符，即可日行八百里。湘西与粤西师公有“赶尸”奇技，他们在死尸的额上贴一张符，一行若干个尸体（可以多达六七个）就能在他们的指挥下依序蹦跳着向前走。师公们在表演“上刀山”绝技时，只要往那锋利的刀刃上贴上一张符，不仅他们师徒可以上下自如，未经训练的普通人，要是胆子足够大，小心攀爬也能不受伤害……

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岭南异术”讲了他亲眼所见的一件奇事：

一直听说粤俗尚鬼，其地师巫邪术甚多，总以为不过谈资，亲眼见过之后，方知其确实如此。乾隆丙子（公元1756年），我客居桂林太守商公所，住在衙署东面恒余园中。楼房三层，我住下层，楼上虽未破坏，而木头均已蠹朽。当时请了一个仆名叫崔升，是本城人，一天他在楼上凭栏倚望，不料栏木外实中虚，从三楼倒坠于石阶上，头碎胸裂，一息尚存。我以为必死无疑，遂给予药资，让其父背回。谁知不到十天，崔升仍进署执役。我见状大惊，问其所以速愈之故，答曰：“就是请巫师化水。方法是将符画在五色纸

上，然后念咒，助手在旁鸣钲鼓相助。如此演法一段时间，将符焚于水碗，让病者饮下，流血当即止住，第二天就结痂痊愈了。”我观察其头上破损处，仅如红线一缕，胸前伤痕如铜钱大，饮食行动和平常一样，看不出有任何疾苦。

——简直神了！

清朝道光年间，在川滇黔沿边地区的流民中，辗转传习一种神秘法术，不复杂，却很神奇：“用清水一碗，焚烧檀香，口中念咒，以手指在水碗上画符三道，头二道符水吃下，可以治病治疮，第三道符水吃下，即有神附体，能自舞弄拳棍。”这种神奇的法术，相传是1828年（道光八年）由四川省南川县两个农民从云南省开化县一个流民学习来的。（《南川县志·前事志》）

道士们将他们画的各种符，称为“符法”，亦即符命之法。《道法会元》概括为九种：“紫微真人曰：符命有九。一、三光符，二、真武符，三、天罡大圣符，四、三官搜鬼符，五、铁扇符，六、九岳符，七、安胎符，八、催生符，九、斩邪符。各有其符行用之法，罡咒不谬者，其灵极验。”但这九种符命的划分方法却不统一，因此并不能概括符篆的全部内容。

我们根据符施用的对象，将符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针对房宅等自然物施用的符，第二类是针对人自身而施用的符。

以房宅等自然物为对象施用的符，即镇宅符，在我国民间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早在汉代，建筑用瓦的前端，一般都烧刻有吉祥文字和图案，其中很多就是符，用以驱邪镇宅。这是“瓦当符”。如：

1. 永受嘉福瓦当符。

“永受嘉福”四字全以S曲线组成。一眼望去，宛如小虫布满，故又称“虫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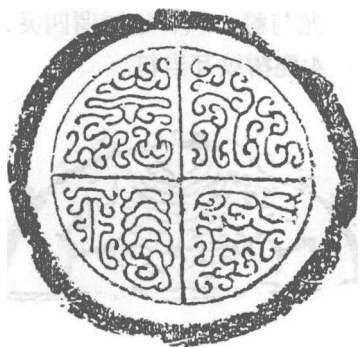


图 2-1 永受嘉福瓦当符

2. 双凤与四凤瓦当符。



图 2-2 双凤与四凤瓦当符

凤凰为传说中的瑞鸟，为四灵之一。

3. 双龙瓦当符。



图 2-3 双龙瓦当符

龙与麟、凤、龟同谓四灵，尤为灵物之大者。

4. 鹿树纹瓦当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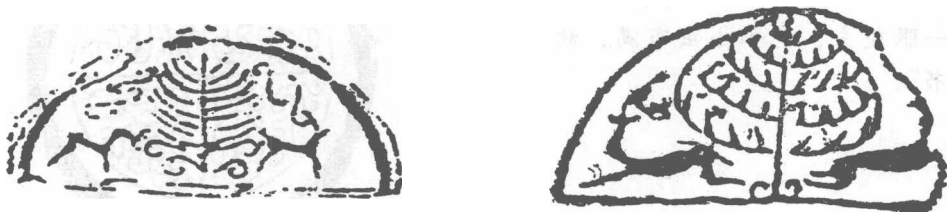


图 2-4 鹿树纹瓦当符

《抱朴子·玉策篇》：“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色白。”鹿为长寿之象征；树为东方神树，亦主长生。镇宅符，包括安放在屋内四角、房内、地窖中、门口，以及床上的神符。敦煌遗文中载有如下数种：

1. 镇宅四角符。

将符安在屋内四角以驱邪。符内有“病患，此神箭镇四角，除去百鬼，万恶消除”等字样。符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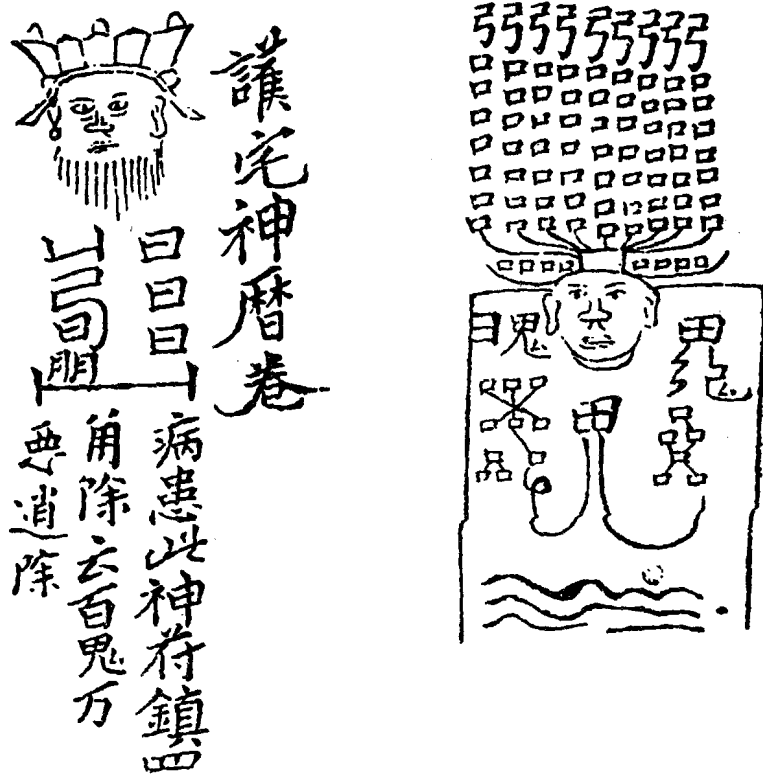


图 2-5 镇宅符（采自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

2. 房内符与地窖符。

将符贴在房内或地窖内，祈求平安吉利。符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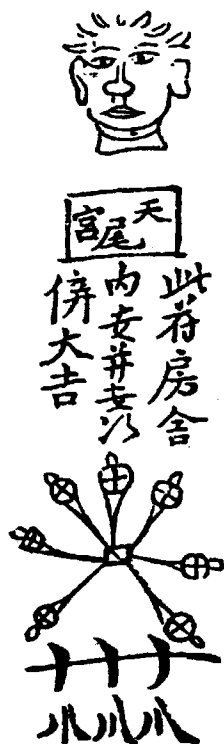


图 2-6 房内符，
符见伯三三五八



图 2-7 地窖符，
符见伯三三五八

3. 门符。

贴在门头上。可使夫妻相爱。（图 2-8 甲）

4. 床符。

有安于床脚之符，有助妇人生产之功（图 2-8 乙）；有安于床上之符，可免作恶梦（图 2-8 丙）；有安于床垫之符，可使家宅大吉。（图 2-8 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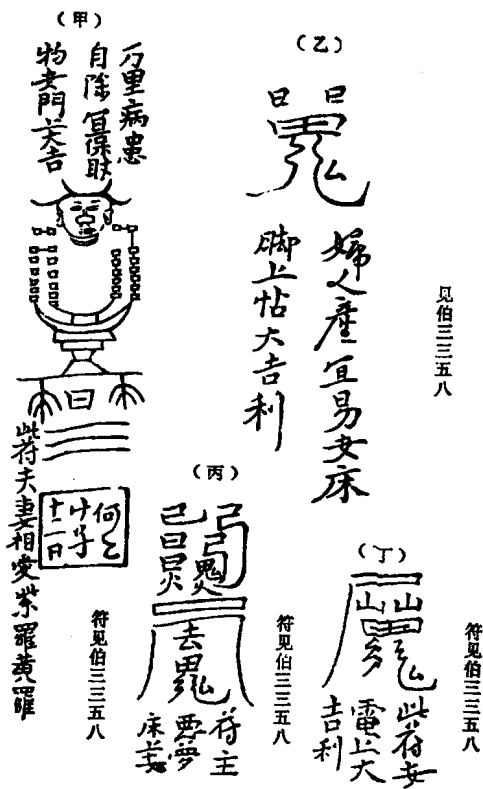


图 2-8 门符与床符，均见伯三三五八

以人为对象施用的符，即治病与护身之符，与第一类相比，要丰富得多。限于篇幅，仅择举几例。

1. 张天师祛病符与百解消灾符。

此为佩符。书符者需叩齿三通，含净水一口，向东南喷之，咒诀后朱书之。



图 2-9 张天师符与百解消灾符（采自香港《聚宝楼通书》）

2.三十日得病用符，共有三十符。

一月三十日，每日得病，所用之符均不相同。用法有吞、贴、佩诸种。如初二日得病用符，吞服一道，同时在门上贴一道。（见图 2-10）

3.六十甲子日得病用符，共有六十符。

从甲子至癸亥，逐日得病，所用之符各不相同。如乙丑日得病用符（见图 2-11）：

4.十二月生人得病用符，共一十二符。

各月所生人得病，所用之符各不相同。如十一月生人得病用符（见图 2-12）：

5.护身符。

种类繁多，有与各种出生年月及所患疾病相对应的各种符。也有一般意义的护身符。如



图 2-10 初二日得病用符



图 2-11 乙丑日得病用符



图 2-12 十一月生人得病用符

敦煌遗文仿伯三八一一所载一护身符，即为总符式的一种。其符（见图 2-13）：

其余调治各种具体疾病、疑难杂症、诸般关煞，家人不和、婚丧嫁娶诸种不宜，以及各种邪魔怪异，都有相应的神符。可说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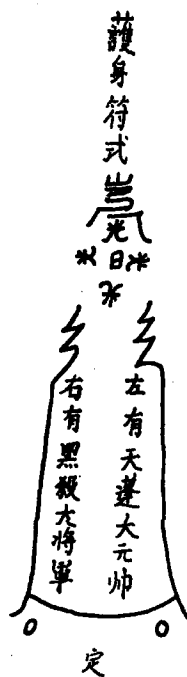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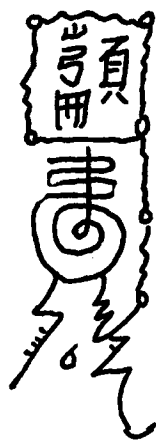


图 2-13 护身符，仿伯三八一一

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对于这些神秘而又神奇的符，百姓视之为天书，喜而受之；学者则多谓之迷信，“鬼画符”，斥而弗道。如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云：“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元好问集》卷十一）清赵翼《王申下第》诗亦云：“举场我叹鱼缘木，败卷人嗤鬼画符。”（见《瓠北诗抄》）近年我国有的学者说：“那是道士故意将汉字的古体（甲骨体、金文体、籀篆体、草体）变化来写，使之神秘化。符是对汉字极度之崇拜而使之神化，用以镇鬼神之表现。”^①

其实，符是与我们今天一般的认识大有区别的另一种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近年来学术界由于思想解放，学者们大胆研究，得出了全新的见解。张惠民先生《中国风水应用学》一书即为代表。此书对符咒的认识极为新颖，可归纳为以下数点：

1. 构成宇宙本体的基本物质是我国古人所概括的“气”，中医称之为“精微物质”，道家谓之“极微而能动之物质”。气为物质的两种存在形态，一是“有形之物”，看得见，摸得着；二是“无形之气”，看不见，摸不着。二者可以互相转化，“聚则成形，散则化气”。

2. 气的本质是超微粒子及其场，现代科学与之近似对应的是量子场论。现代物理学研究认为，物质存在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实体，一种是感官不能觉察的场态。这两种形态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与我国古人所归纳的气及其特点相一致。

3. 气按照螺旋形态或正或反进行旋转，称为“宇宙螺旋气场”。气旋转运动的形态是由宇宙天体的运动形态决定的。自宇宙大爆炸后，天体按逆时针旋转（这种来自天上的逆时针旋转的力场，对于地球上的人和万物来说，则是顺时针旋转的力场），地球自西向东逆时针旋转。地球上攀援性植物如牵牛花、鹦鹉螺、蜿蜒起伏的山、曲曲弯弯的河流、蚕茧、蜘蛛网，以及人类的大脑沟回、九曲回肠、弯曲折叠的氨基酸链、遗传密码双螺旋，等等，都是宇宙螺旋气场的反映。

4. 我国古代易学系统中的河图，揭示了顺时针的左旋阳性气场；洛书揭示了逆时针的右旋阴性气场，同时还包括了顺时针左旋阳性气场和阴阳交会的既有顺时针左旋又有逆时针右旋的“8”形气场；先天八卦所反映的，也是顺逆旋转的“S”形或“8”字形气场。

5. 我国社会常见之符，为“人造之符”，源于天地自然，体现于河图洛书的正反气旋，“是先哲们根据天人相应的全息原理，通过练功，采集宇宙之

^①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第62页，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

气和自身之气混合后，再以纸、笔、墨（或朱砂、雄黄等中药）为中间媒介发放体外”而创作的。“这种符的形状恰与天地自然之符相符合，与天地自然气场相符合，”因而可以“用于治疗、调场。”

6.符的构成，千姿百态，其实不外乎两类线条。一是由正反螺旋、8字形、S形构成的柔性线条；二是由横、竖、斜以及口字形构成的刚性线条。前者是柔缓之气的载体，具有滋养、补益、兴奋等柔性的调节性功能，多用于治疗调养；后者是刚烈之气的载体，具有杀灭、抑制、破除等杀伤性功能，多用于辟邪除恶。^①

这是一种极具启发意义、有价值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并对这种神秘的符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五、“夜哭郎”与咒语巫术

我国巫术中的咒，与符一样，产生也十分久远。《广韵》：“咒，诅也。”古时通作祝。《诗·大雅》：“侯作侯祝。”《周礼·春官》有“诅祝”之官，“掌盟、诅、类、造、攻、说、禁之祝号。”郑注曰：以上八者都是祭告神明；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诅。

在我国的巫术实践中，咒每与“符”相连称为“符咒”。咒既可与符配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既可施之于鬼神，俗称“对天赌咒”；亦可施之于人。

咒语的神威不亚于符，甚至可以咒人死。清袁枚《子不语》卷二十一载海南“禁魔婆”：“黎女有禁魔婆，能禁咒人致死。其术，取所咒之人，或须发，或吐余槟榔，纳竹筒中。夜间赤身仰卧山顶，对星月施符诵咒。至七日，其人必死，遍体无伤，而其软如绵。”其咒语极其深秘，宁死也不肯告人。但却只能魔黎人，不能害汉人。而且这些禁魔婆的特征与汉族地区的蛊妇有几分相似：其术传女不传男；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禁魔人，则己身必死。据说古代埃及金字塔门前石碑上即刻有咒语，意思是进入墓穴者，在几日内便要死亡。有报道称，有一批探险者入墓后不久果然相继死去。当然，死因各有其解，但迄今为止，未有定论。

^①参见张惠民《中国风水应用学》第一、第二章，引文见第81页，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

湘西苗族流行一种“画水巫术”，这是一种利用水和咒语来治病的巫术，施行其术者都经过师傅传授，由专门的巫师进行。画水的咒语分为两部分，一为请师父的口诀，二为水的咒诀。请师的口诀大同小异，水的咒诀则因所治之症而不同。今据《湘西苗族调查报告》^①介绍两例。

1.鹭鹭水咒：治饮食不慎，骨哽在喉。饮了此水，骨即能吐出或咽下。请师诀是：

“奉请肉口传度师父某某。抬头望青天，师父在中间，一叫自到，一喊就来。在我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跟前拥后，跟左拥右，藏我身，变我身，不见我身在哪里，左讲正水，话（右）讲正水，画起铜刀铁刀。铜刀杀鬼，铁刀杀鬼。”

念完了请师诀，接着念水诀：

“月出四柱起，切尽肮脏鬼，愿吾变猴生，正正变吃水。叫变就变，若有不变，弟子画起六月太阳晒变；叫融就融，若有不融，弟子画起六月太阳晒融。若再不融，弟子画起五百蛮雷打融。抬头望四方，九龙下天堂，龙来龙脱爪，虎来虎脱皮，山中百鸟脱毛衣，步步成钢，动手成划。”

反复念三次即成。

2.担血水咒：治人受伤，出血不止。先令其人捏住伤口，念咒语，喷水一口即可止血。

请师诀同上。水的咒诀：“动一脚，喊一声，喊得师父吴化星，隔山喊三星，隔水喊水叉，大军刀担到大洪沙，小军刀担到小洪沙，担了长江水，海的流，脚踩龙头，担血不流；脚踩龙腰，担血不飘。子儿子儿，化在乱泥之田，儿童而相连。总师教我四处勾，弟子交我指四方。”

咒语巫术在民俗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其中最普通、最常见者莫过于“夜哭郎咒语”习俗。还不会说话的小孩，当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夜晚往往会哭闹不止，俗称“夜啼”。小儿夜啼，往往使全家老小不得安宁。旧时民间治疗小孩夜啼，常用一道红纸符，上书“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把它贴到过往行人容易看到的地方，让过往行人念诵，使小孩恢复健康。

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普通、最常见的巫咒习俗，全国各地均有，只是咒语版本稍有不同。如有的作：“天红红，地红红，我家有个夜哭虫，过往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日头红。”有的作：“天黄地绿，小儿夜哭。君子念过，睡到日出。”若为女孩，则作：“天黄地绿，小女夜哭。君子念过，睡到日

^①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145-147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

出。”小时我在家乡，经常看到这样的夜哭郎符咒。现在各地农村、乡镇仍不时可见。

在巫术分类上，符与咒均属于交感巫术。在我国大多数学人的眼里，这两者都是荒诞无稽的迷信糟粕。如一位专门研究敦煌民俗学的著名学者就说：（符咒）“它对古代人民之心理，有一种震慑的作用，可以说是对鬼魂恐惧症的一种镇静剂兼带麻醉剂。但是并不具备对人民有益的实用性。因为，凡属符咒，均为愚昧与无知的结晶品。”^①对于“夜哭郎”止啼之类的咒语习俗，如果按照这种思想观念，最多具有一些心理安慰作用，不会有实质性效果。

我们认为，在思想观念上，“夜哭郎”止啼等咒语习俗，属于交感巫术，与穿百家衣、吃百家饭习俗相类似，目的在于借众人之阳气以祛邪。民间认为，一切疾病及死亡均由于阴邪之气侵袭所致，人属阳，众人之阳，其力量当然无比巨大。在路边贴上“夜哭郎”咒语，经由众口念诵，就会汇聚成一股强大的阳气，通过巫术的交感作用而使病孩康复。这当是“夜哭郎”习俗长期广泛流行的意识基础。

至于“夜哭郎”止啼等咒语巫术有无科学道理及实际效果，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其一，《周易》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天人之间是存在感应，并且是“感而遂通”的。（《系辞传上》）

其二，在古代社会中，符与咒主要用于治病，称为“祝由科”。隋唐时期中医学分为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在太医署下有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等。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咒禁科有咒禁博士二人，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一人，掌教咒禁，并以咒禁“除邪魅之为厉者”。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在他的不朽名著《千金翼方》中，用两卷二十二篇讲述“禁经”，均为咒语治病的方法。他说：“赞成其业者不可胜记，按法施行，功效出于意表。”并总结道：“是以医方千卷，未尽其性，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急救之术也。”元明之时，宫中太医院都设有“祝由科”。对于一个在社会上已经流行了数千年，并以为救死扶伤为要务的一代名医所肯定与推崇，咒语巫术（包括符）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实际功效的。我们不应在未进行深入研究之前即简单否认。

其三，从符号学或信息学角度看，咒语属于声符，它所发出的语音信息，具有一定场力。

^①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第88页，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

《海外星云》2002年12月中旬号载有一篇小文章，题曰《水能感受喜怒哀乐》，说是日本一研究中心发现，日常饮用的水能够感受人类的喜怒哀乐，会随着人们说话的语气或音乐的旋律起伏，而改变水分子结构。该中心研究员江本为进一步实验音乐疗法的效果，将一杯蒸馏水放在两座喇叭之间，让水“听音乐”直至其结冰。然后他又将多杯同质的水轮流放在喇叭间，连续几个小时播放不同的音乐，待水冻结成冰状后，再一一拍摄成照片放大研究。

江本发现，聆听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蒸馏水的冰状结晶，呈现出柔和美丽的图案，但聆听重金属音乐的蒸馏水则呈现出不规则的破碎图案。江本还使用不同的语气和用词，例如谈情说爱的口吻或愤怒骂人的粗话，对多杯清水说话，结果也发现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冰状结晶图案。

这说明，语音确实能对其它物体发生影响。近年来有不少科学家将音乐用于奶牛饲养与花卉植物种植实验，发现音乐能提高奶牛的产奶量及促进植物生长。这是有声语音与其它物体的感应或影响。

咒语对动物也能产生影响。《文摘周报》2006年9月15日摘引《今晚报》韩少功《蛇贩子黑皮》：

南方山洞里多蛇，贩蛇是一种不错的行业，一位颇负盛名的蛇贩子额角有一大块黑皮，人们叫他“黑皮”。

黑皮开始时是骑自行车，后来改开摩托车，到邻近山村收蛇。先将收来的蛇存入家里的竹笼子，积到百条左右以后，再集中运到山外，转卖给广东来的蛇老板；其中比较稀奇特异的蛇，他就拿到省城卖给大学，做实验用。

一般而言，毒蛇并不乱开口，开口则必定伤人。黑皮不怕蛇，数以千计的蛇经手，从未被咬伤，全靠从他师傅那里学来的一套技术，以及一套防身的密传咒语。他说，贩蛇人也有行内规矩，一是一生不得吃狗肉，二是不得医治任何蛇伤，哪怕是至爱亲朋；一旦破戒，就会彻底断送自己的财路。说是贩蛇的不能治蛇，治蛇的不能贩蛇，天下人各有生路，你不能赚“夹份钱”。这是基本原则。

但是有一天，黑皮的亲嫂子在菜园里被一条竹叶青蛇咬伤，呼叫救命。黑皮情急之下，忘了守戒之训。跑到村边摘了两枝七叶莲，为嫂子吮毒、敷药，救了嫂子一命。但黑皮也因此坏了自己的功法。

后来，黑皮仍同往常一样开摩托车到附近山村收蛇。才走到坡上，就被群蛇围攻。黑皮赶忙念动防身咒语，却全无作用，而且脚软弱如泥，怎么也跑不动，最后被群蛇撕咬，一命呜呼。人们后来发现，他身上留有几十种不同齿痕的蛇伤，全身黑紫，脸肿如盆，七孔流血，手里掐着断蛇，口里咬着两个蛇头，脚下踩着死蛇，耳朵和鼻孔里还悬出半截小蛇尾……可见当时经历了一场惨烈的人蛇大

战。甚至摩托车里的电线、坐垫等软质部件，也被蛇咬得千疮百孔。

在这个惨烈故事的后面，似乎蕴含着咒语及其存废之神奇与奥秘。

那么，过往行人在念诵“夜哭郎咒语”时，是否也会发出信息（如果会的话，我想应当是积极的信息），而对夜哭小孩产生影响而发生实质性效果？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密苏里大学研究人员在研究词语和脑电波、脑磁场的关系方面，有一个惊人的成果。他们发现，当人在默想一个词语时，可以从不接触被试者的超导磁强计上，测到一个相对应的脑磁图。一共测了27个词语，就发现了27个词语的脑磁图。只要分辨一下脑磁图的特征，就能判断试者头脑里所默想的词语，即可知道人的意念活动。

这就说明，不仅有声的语音，连无声的意念，都能对外界发生影响。则我国社会上迄今流传未绝的咒语巫术，其作用当不仅仅限于人的心理方面，还具有物理学方面的依据。尤其是当人们对其充分相信之时，其所发挥的治疗与调理作用，不可等闲视之。

因此，对于咒语巫术，以及符篆巫术等“神秘”民俗事象，我们不仅应该调整以往的习惯性思维，对它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还应该与物理学、信息学、人体生命科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一起，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破译这一神秘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六、五行生克制化与反抗巫术

五行的实质或本义为阴阳。五行为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五行观念是《周易》阴阳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易学易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五行包含相生及相克各种关系，分别与河图顺行之序及洛书逆行之序相合。

《周易》中已有相生相克的思想。如《易传》“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所反映的就是“相合”、“相生”的观念。咸卦，艮土在下，兑金在上，《彖传》曰：“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也蕴含着相生的观念。革卦，离火在下，兑水在上，《彖传》曰：“革，水火相息。”水与火“相息”、“相灭”，就是“相克”的思想。

《周易》还揭示了自然界中存在的平衡机制并加以利用，这便是关于五行制化的规律。《系辞传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

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明确提到了“化”和“裁”。《序卦传》说：“震者动也，物不可终动，止之故受以艮。”震是动的，动到必须止的时候为止，这就是“化”；“止之”就是“裁”，也可以称为“制”。化与裁（或制）就是人为推动事物向人们所期望的目标变化的一种方法。

从本质上说，巫术也是一种“人为推动事物向人们所期望的目标变化的观念和行方式”。

迄今为止，学术界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科特点，对巫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类方法。计有：

- 1.将巫术分为顺势巫术（模仿巫术）与接触巫术两大类，两者又同属交感巫术，弗雷泽提出的经典性分类法，影响甚大。

- 2.以施术之目的，将巫术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善意巫术，又称白巫术、吉巫术；一种是恶意巫术，又称黑巫术。

- 3.根据巫术所得结果的不同，划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积极巫术，如求雨巫术、驱鬼巫术、诅咒巫术等，其特点是施巫者采取一种主动的、进攻性的巫术，以便实现自己的愿望；一种是消极巫术，即禁忌；再一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避邪巫术。

- 4.根据施巫者行为方式之不同，区分为口头巫术和行为巫术两种，前者如祷告、誓言、诅咒，后者如招魂、驱鬼、放蛊等。

- 5.根据巫术的对象和领域，分为生产巫术、生育巫术、饮食巫术、出行巫术、战争巫术、居住巫术、丧葬巫术，等等。

- 6.在弗雷泽分类法的基础上，将巫术区分为交感巫术、模仿巫术、反抗巫术和蛊道巫术四大类。这是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一书所采用的分类法。

我以为，巫术施术的对象，虽说林林总总，却不外乎人与物（其中又可分为有形之物与无形之鬼神两部分）两大类；巫术施术的手段，尽管奇技淫巧千差万别，却不出乎“制”与“化”两大方面。因此，根据巫术施术的手段即巫术行为艺术，可将巫术区分为“胜克巫术”与“化生巫术”两大类。所谓“胜克巫术”，即采用相胜、相克、镇魔、压制等刚性手段来对付其它人或物（包括无形的鬼神）以达到施术目标的巫术行为。辟邪巫术、驱鬼巫术、魔胜巫术等属于这一类。相当于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一书所说的“反抗巫术”。所谓“化生巫术”，即采用相生、比亲、化泄等柔性手段来对付其它人或物（包括无形的鬼神）以达到施术目标的巫术行为。祈求巫术、模仿巫术、接触巫术，以及其它所有非刚性巫术，都属于这一类。如果在同一种巫术行为中，刚柔两种手段兼而有之，则可谓之“制

化巫术”。这种分类方法，更便于考查人类在巫术行为中所体现的反科学的迷信、愚昧以及生存智慧和生活艺术，如果有的话。

我们略举几例以说明之。

胜克巫术，包括辟邪、驱鬼、魔镇等巫术行为。这类巫术主要是通过借助各种对妖邪鬼魅具有克制和魔镇作用的物品来实现施术目的。如各种工具、武器（包括铜铁器）、灵石、镜子、钱币、太极八卦、动物及其血液（如鸡狗等），以及其它种种对妖邪鬼魅具有魔镇作用的物品，如桃枝、苇索、朱砂、菖蒲、雄黄，能够代表五行的颜色及其数字，等等，都在古人的应用之列。

佤族有一种集体赶鬼活动，称为“遣村”、“遣洞”，也叫“游村”和“游洞”。每一二年要进行一次。特别是在虫灾发作、庄稼受害严重的时候，必定要举行集体赶鬼活动。

驱鬼仪式进行时，要有巫师数人在村前设坛作法。巫师作法之后，全寨村民参加列队赶鬼。走在驱鬼队伍前面的是两个青壮年农民，他们作为驱鬼先锋，脸上、手心上都盖有鬼师的法印，头上扎着画有符篆的红纸巾。其中一人持剑，一人持铁链。其后是四个“抬火炬”和“收灾船”的人。“火炬”是在一只铁锅内点上清油，火焰升腾；“收灾船”用竹子编成，内装鸭子一只。接着是巫师，身着法衣、法帽，手挥法剑，口中念咒，面目冷酷。再后面十人，手持符篆、桃枝、五色纸旗、击鼓奏乐。村中青年、小孩尾随其后，呼打喊杀。

这个驱鬼队伍由队头引路挨家挨户进行“遣村”。每到一家，队头先锋挥剑舞链，巫师以法剑指画劈刺，作种种驱鬼动作。在这向鬼邪劈刺的过程中，家人在屋内收撮垃圾放入“收灾船”中，意味着灾祸消除。最后将桃枝插在门上，贴上符篆，将鬼邪封在大门之外。

各户依次进行完毕，驱鬼队又向田峒进发，进行“遣峒”。所到之处均表演一番，并摘折草茎树叶，放入“收灾船”内，每隔二三百步即插一面五色纸旗。待种有庄稼的田峒都走完，然后将“收灾船”用火烧掉。

“遣村”、“遣峒”都作完后，还要实行“禁村”，即在村前路口，立拱门一座，上贴对联、符篆，插五色纸旗，作为“禁村”的标志。三天之内严禁生人进村，如有违犯，即受处罚。罚的方法是出钱再做一次“遣村、”遣峒“的驱鬼仪式。”^①

这种驱鬼仪式，就属于典型的胜克巫术。其中运用了法印、利剑、铁链、

^①张有隽、顾有识《民主改革前佤族的宗教》，载宋常恩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桃枝、符篆、咒语、五色旗帜，以及熊熊燃烧的清油锅，这些都是对鬼魅妖邪具有镇克作用而为其所惧怕的用物。“收灾船”用“鸭子”，当是取“压”之谐音，以“镇压”邪魅。

化生巫术，包括祈求巫术、模拟巫术、交感巫术、符咒巫术，以及其它各种运用柔性手段化解不祥的巫术行为。这种巫术行为，同样要借助一定的物品来实现施术目的，不过是利用物品的柔性的一面。譬如，祈求巫术是通过献祭，对施术对象表示尊崇、亲比以达至目的；模拟巫术是利用物品之间的相似；交感巫术是利用事物之间真实的或虚假的交感联系；符咒巫术是通过线条及语音符号而发生交感作用。总之，化生巫术是以情感化，以同类交感，以柔化生，以柔克刚。与胜克巫术相比，化生巫术显得更富于生活智慧。

譬如，敦煌遗文伯四五二二背面《宅经》，载有一条石头镇宅法，其法曰：“宅舍寅卯地，有直街巷及开门冲吉。厌之法：钺（剪）女七人，各长七寸，白石七两，虎头一具，用埴（砖）盛之，用厌（熬）埋于寅卯间，入土七尺，大吉。”

对这个巫术行为，论者多认为是魇镇，属于反抗巫术。实际上，认真分析这个巫术行为的具体做法，却是典型的化煞巫术。你看：

“宅舍寅卯地，有直街巷及开门冲吉”，是说房屋坐寅卯朝申酉，受到来自申酉方向的街巷的直冲，所以不吉。申酉于方位属西，五行属金，为阴性。用数术术语来说，即煞属西方阴金。

再看破解之法：

所用之物：有纸剪女人，女属阴性；白石，白为金之色；虎头，虎为西方之兽，俗称“西方白虎”，五行属金。

所用之色：白色。白色属金。所用之数：纸人数七，长度七寸，“白石七两”，“埋于寅卯间，入土七尺”，均为七数。七为火之数。

就是说，这一镇宅法所利用的物品、颜色，与煞的性质相同。煞属金，即以属金之物，以及金之颜色，比亲而化解之。数字（七属火）与煞之性质相克，是以火克金煞。但据我们了解，“七”之数实为宇宙天地运动之节律与事物结构律之反映（参见第五章“七七葬俗”），很可能与“西方金煞”相通。若此，古人以“七数”对西方金煞，还是以“比亲”“化”之。因此，属于化煞之法。即便将“克制”因素考虑进去，“制”仍处于从属地位。

符咒巫术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就符的构成而言，包含刚性的直线条与柔性的曲线条两大类，有的符偏于刚直，有的符偏于柔曲，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就符发生作用的机制看，是通过汇聚宇宙气场，即借助宇宙自然气场之力而发生或制或化的作用。是制化之功兼而有之。就咒语而言，也有刚柔之

分。刚以制人及鬼魅，柔以祈鬼通神。就咒语发生作用的机制看，是通过声符的信息场在物体间发生感应作用。其功能也包含“制”与“化”两个方面。因此，从总体即根本性质上看，符咒巫术应该属于化生巫术。

七、建筑民俗中的制化巫术

人以宅为家，宅为民之本。建一座房子，要几代人居住下去，尽管难以做到永远屹立不倒，但却必须能使居住者安居乐业、子孙安康、人丁兴旺。因此，房子的建造就十分讲究。从选址到择时兴工，从选料到具体操作，动土开基、竖柱上梁、进火入宅，无一不精心处置，生怕万一有所闪失，导致日后灾殃。但世上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建房也是如此。尤其是宅基地的选择，所受局限更大。总难得十全十美，而存在种种不足。即如《黄帝宅经》所说：“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大者大说，小者小论，犯者有灾，镇而祸止，犹药病之效也。”就是说，即使曲尽人力，也还会存在某种缺陷，但可以后天调理，就像治病的道理一样。

我国建筑民俗中对屋宅先天失调、后天不当的调整方法很多，可以总归为“制”与“化”两个方面。“制”是以强制的力量去镇克、“压迫”，使凶煞不能为祸，或是不敢为祸；“化”则是巧妙利用事物之间同类或“生化”的转化关系，使凶煞化为吉祥，转凶为吉。若是用“制”之法，万一“制”而不当，或是力不能胜，“制”而不服，相反还会大张其焰，惹起更大的祸害。化煞犹如以德服人，使凶顽格心，浪子回头，不但不敢为祸，相反还可以致福。所以，在制与化两种方法中，民间多以化煞为主，或是制、化兼而用之。

古时民间镇宅，或是家居发生种种不适，常用埋石法进行调节，变凶为吉。北周庾信《小园赋》：“镇宅神以埋石，厌山精而照镜。”（严可均辑《全后周文》卷八）所说就是以埋石镇宅法。

据记载，埋石镇宅之俗汉时已有。《太平御览》卷五十一“石上”引《淮南万毕术》：“埋石四隅家无鬼。取苍石四枚，及桃枝七枚，以桃弧射之。乃取并埋弓矢四隅，故无鬼殃。”卷三十三注曰：“岁暮腊，埋圆石于宅隅，杂以桃弧七枚，则无鬼疫。”这是关于埋石镇宅巫术的较早记载。运用的是“制煞法”。

我国民间以石头为镇物、灵物的习俗十分悠久，有一种极为浓烈的崇石

情结。这种崇石情结源于古人对石头特性的认识。前引杨泉《物理论》：“土精为石。石，气之核也。气之生石，犹人筋络之生爪牙也。”《春秋说题词》：“石，阴中之辅，阳中之阴，阴精补阳，故山合石。”按五行学说，土属中性，而石为土之精气，具有阴中之阳，阳中之阴，阴阳平衡的特点，因此，不论是阳气不足或是阴气有偏，均可用石来加以调节。这是民俗以石头镇宅的理论依据。

石头是中性的，其用在于调节阴阳，使之平衡适中。但与镇石相配合的其它物品，则具有攻击性。桃为驱邪的神木，百鬼畏避；弓矢为远距离射杀性武器，鬼神更不敢靠近；四为金之数，七为火之象，金火之功也在于镇杀邪魅。综合起来，就是一种极有威力的制煞之法。

汉以后，民间以石镇宅，多取化生之法。敦煌遗文伯三五九四《阴阳书·用石镇宅法》载有三条埋石镇宅之法。其文云：

1. “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

家中不断发生疾病、人物走失、钱财虚耗等事，显然是阳气不足，阴气过盛，阴阳失调。石为阴阳之精，正好可以调节。“九”为金之数，既有驱邪之力，又是财之象征。“鬼门”为东北艮方，艮属土，土生金。埋石九十于此，即可以调阴阳、旺土气、生金财，达到人财两旺的效果。

2. “人居宅以来，数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辰地大吉。”

这是要解决经营不利、钱财虚耗的问题。首先，以石调节阴阳；“八”为木之数。镇于辰地最有讲究。按后天八卦，巽卦居东南辰地，属木，主市买，“为近利市三倍”。（《说卦传》）因此，埋石八十于辰地，是通过调阴阳、亲比巽木而生财的方法来改变“市买不利”、钱财不聚的状况。

3. “居宅以来，数遭□□（灾祸）、口舌、年年不饱（饱），以石六十斤，镇大门下，大吉利。”

这是要解决家庭内部失和、灾祸频繁以及经济状况不佳的问题。化解方法是“以石六十斤，镇大门下”。此法甚得易理。石以调阴阳，此为基础。“六”为水之成数，象征水。“镇大门下”，我国民居之大门，由于北半球的地理特点，大多开在南方或东南方。南方为离卦，属火。这样，“成数水”在离火之上，即坎水在离火之上，正好构成“水火既济”之卦。在“既济”之时，阴爻均居阴位，阳爻均居阳位，阴阳和谐有应，表示事物的发展已经达到和谐、完美、成功的地步。所以孔子说：“既济亨，小者亨。”即在这时候，大者亨已不待言，即使是小者也都亨，无所不亨，故曰既济。这是六十

四卦中最完美的一卦。“埋石六十斤于大门之下”，就能达至“既济”之境界，使家庭和睦、温饱富足，当然是最巧妙、最艺术的解决办法了。

时至今日，大陆及港台地区所出版风水建筑方面的著作，解决商住风水建筑中存在的各种凶煞，基本都用化煞之法。2003年元月，赴港一游，听人说了两件化解风水凶煞的实例，极有代表性，谨转述如下。

一是香港中环的中银大厦，其中形如尖刀的一面，正好劈向港督府。这种凶煞，风水术称为“刀煞”，犯此煞者容易受伤或有血光之灾。而且此“刀”如此巨大，力量端的了得！港督府在请风水师踏堪之后，让人在府中种上数棵柳树（可能是三或八棵，取木之数）。这是取柳树之婆婆柔曲，以克化中银大厦之刚。

二是香港“三A”保险公司，自成立之后业绩一直不见好，遂请一风水师考察公司风水地理，图谋改变公司的经营状况。风水师经考察发现，公司办公大楼所在地，旁边山地是一片坟地，阴邪之气甚重，元阳受压，故经营难旺。他让公司在原办公大楼外围玻璃幕墙之外，再加建一圈水泥外墙，外墙上所有窗户全部设计成棺材形状。据说经此改造之后，公司业务增长即日新月异。

这一风水改造实例，所运用的也是化煞法。其化煞之原理在于：凶煞为阴宅、阴气；阴宅之中有棺材，棺材谐音通“官财”；将公司大楼的窗户全部设计改造为棺材形状，则阴宅坟场之棺材，全部变成生我、护我之“官财”。即我与煞同，则煞必变害为佑、为利。

这些风水化煞法，若从唯物主义角度看，确实是难以理解的，但它却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至今应用不绝，并且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灵验”的！如果我们不是故意“视而不见”，如果我们仍然承认“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就有必要变换一下思维方式，认真地去研究这些曾经被我们视为“荒诞不经”的问题。

第三章

协乎五纪辨乎五方的择吉民俗

民俗是一种约定成俗的行为模式。

中国的民俗，自春秋战国（甚至更早）以来就形成了先择吉而后施行的行为模式。不管是农牧工商大事，还是婚丧嫁娶俗务，都要先选择吉祥日时而后施行。即如汉王充《论衡·讥日篇》所说：“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触犯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不仅汉代，推之整个封建时代，乃至近代、现代，都是如此。即便是到了现在，我们从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不惜用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巨款去购买一个吉祥号码（电话或汽车）的狂热，从 90 年代各地青年男女因为赶在同一个“四个双”或“五个双”的吉祥日子结婚而导致不少城市中挡以上饭店无席可订的不正常盛况^①，整个社会对选择吉日操办婚丧嫁娶、修造动土、开业入宅等人生大事的热衷，使我们依然感到：择吉办事之炽热世风，依旧未变。

可以说，择吉是中国民俗中的民俗，是至今依然活跃着的民俗，也是中国民俗最有特色、最典型、最本质的行为模式。

^①1990 年 11 月 23 日《北京日报》及 1991 年 3 月 13 日《生活报》，载结婚大潮狂卷北京、大庆城的盛况，据记者调查，两地青年男女都是冲 1990 年 10 月 14 日和 1991 年 2 月 10 日“五个双”的大吉之日而结婚的。

一、顺天行事，择吉由生

(一) 择吉之定义与特征

从广义上说，一切追求吉祥、选择吉祥及避免凶祸的信息和行为，都可称为择吉。包括八卦、太乙、六壬、奇门遁甲、禽星、丛辰、建除、堪舆、风角、占星、星命、测字、相术、孤虚，以及各种民间方术在内的所有数术，都可统称为择吉术。它们都是通过一定的方法给人们提供关于吉凶的信息的。社会生活中一切有关趋吉避凶的民俗事象，如各种禁忌和巫术等等，也属于择吉。择吉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

狭义上的择吉，是指以干支历法为基础，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年、月、日、时所值吉凶神煞进行推算，综合参考，选择吉日吉时吉方，确定趋避的一种方法。《三国演义》第十六回：“即便送女到寿春，另居别馆，然后择吉成亲。”就是选择吉日娶亲。所以民间直接称之为“择日”、“择日子”、“看日子”、“捡日子”。古代又称为“选择”、“涓吉”、“諏吉”。本章所讨论的，就是这一层面的择吉。

干吗要择吉？当然是为了趋吉避凶。为了避免“病死灾患”，大则建房婚娶，小则做鸡窝，筑猪圈，事先都要推推甲子，算算阴阳，一定要选到一个吉祥顺遂的日子或是时辰，才会心安理得地去做。以为如此就能顺遂通达，免除凶祸。这表明择吉较之其它民俗事象，具有更直接的功利特征。它的所有事象或讲究，都无一例外地直接标明是吉或是凶，是宜或是忌；明白无误地向世人表明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吉避凶。而其名称本身，就是这一民俗特征的形象反映。

择吉是十分神秘的。一方面，择吉是一种民俗，是一种历代相沿而成的风俗、习尚，流传极其广远。另一方面，择吉又是一种数术，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理论、方法和语法系统。民俗与数术相结合，形成一种亦俗亦术的复合性特征。这是择吉最重要的特征。但择吉与其它方术又有不同。我们先看一个故事。

《国语·晋语》载：重耳是晋国的公子，被赶出晋国达十九年之久，秦穆公准备以兵力帮助重耳回国夺取政权，但不知时机是否成熟。为预测吉凶，董因给重耳占了一卦，得“泰”卦。董因根据卦象说：“是谓天地配”。泰卦是坤（地）在上，乾（天）在下，有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通万物生之象，正乃得国得民的大好时机，吉。于是，秦穆公欣然出兵，重耳果然获得

政权，称晋文公。

卜筮的目的，在于判断吉凶，指导行事。古人在操办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不知道所办事情将会有何结果而犹豫疑惑时，就求诸卜筮，以便获得吉凶祸福的价值启示。不论哪一种形式的卜筮，最终都是给人一种价值判断，告诉人们应不应该做，能不能够做，做了吉还是凶。但它不告诉你何时去做从何方去做最为有利。而择吉，就是给人解决这一问题的。当人们决定要干某件事情的时候，择吉术就给人提供一个能够帮助他获取成功的吉日良辰和吉祥方位。就像秦穆公在得知出兵帮助重耳回国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之后，如果他需要，择吉术就可以告诉他：何时出兵最吉，走何门（方）最利。

择吉作为一种数术，同其它数术一样，均源出于易，是易之支流。但择吉与其它数术还有不同，即流派众多，泾渭杂陈。战国时期择吉术还刚形成，就已有建除家、五行家、结阳家、秀阳家、吉实家和十二月吉凶体系等诸多流派。到后来，由于世人的热衷，发展更甚，以至于“六十甲子术家逾百；二十四山神煞盈千”。

择吉流派的“百家争鸣”，确实使社会上呈现出择吉民俗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却造成了理论混杂，莫衷一是，无所归依的混乱状况，最终影响了择吉民俗的正常发展。汉武帝曾请各派择吉名师断某日可否娶妇？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不吉，太一家则说大吉。各家各执一辞，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得武帝发话：“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事见《史记·武帝本纪》）才解决了这场争端。

由于流派众多，使许多神煞同位异名，或名异而实一，吉凶相违。如同为月厌所冲之辰，堪舆家称之为厌对，其日忌嫁娶，视为不吉。丛辰家以其冲破月厌而名之曰六仪，说月厌主暧昧阴私，那么月厌之冲必然是威仪正直之神，故为大吉。再如浮天空亡，又称之为头白空亡，再名之曰八山空亡。一个坐煞向煞，又名之曰翎毛禁向，再名之曰八山刀砧。而术士们也厌其重复，则于八山刀砧加上三合月，于头白空亡加上八卦山，后来又相互错伪，通书把它们不加区别地统统载列，就变成了几个不同的神煞。《协纪辨方书》为之痛斥：“夫神煞一也，而名号旁见侧出，感人耳目，深可厌恶！”（《协纪辨方书》卷三十六“神煞同位异名”）致使王充、荀悦等有识之士斥之为理之所无，弃而弗道。这是择吉术（民俗）遭受世人唾弃的主要原因，也是择吉民俗研究首先需要批判和剔除的糟粕。当然，这也是最为复杂繁难的问题。

(二) 易学与择吉，形同兄弟实为母子

择吉民俗的渊源十分久远。如果择吉就是择日，则远古时期以占卜择日即是。如果像古人那样把原始历法视为择吉，则历法的形成之日，就是择吉的诞生之时。当然，若从严格意义的择吉术说，则产生于战国时期。

择吉术的终极表现形式，战国时叫做“日书”，这时的择吉术与历书是互为独立的，各为一体。汉代以后，择吉术开始与历书相结合，称为“具注历”。此后，二者的结合从内容到形式，日渐完备。其名称一般是以皇帝的年号相称，称为“某某历”，如“会天历”、“洪武历”等。清代由于避弘历讳，改称“时宪书”，老百姓则谓之“通书”或“皇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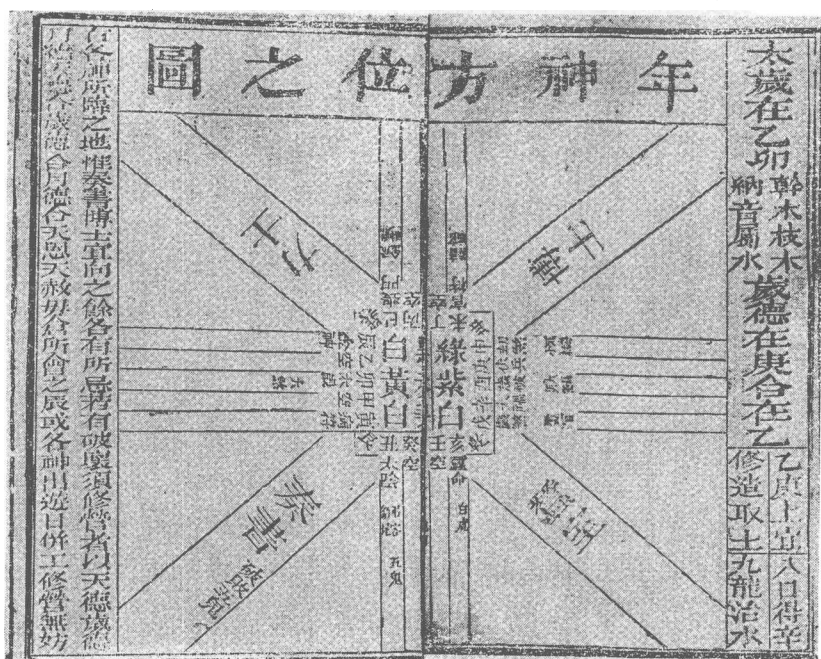


图 3-1 乾隆六十年历书·年历 (采自《中国天文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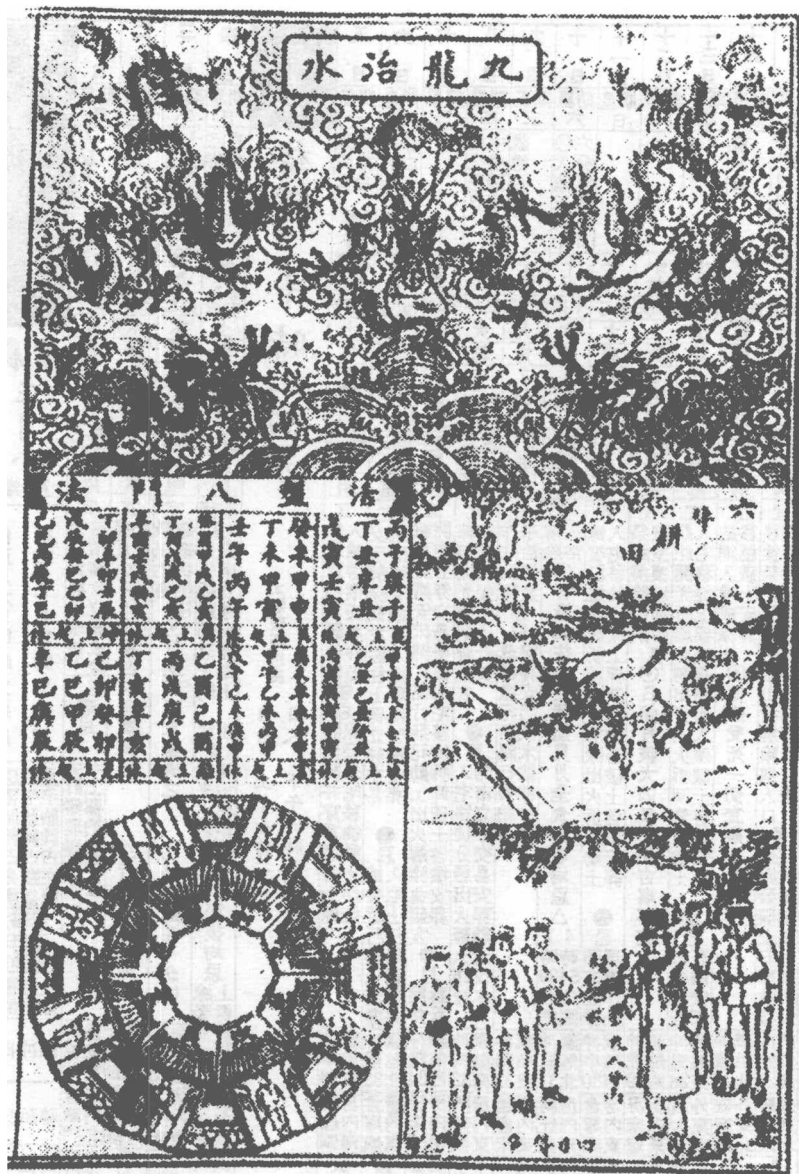


图 3-3 近代历书扉页·九龙治水 (采自《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

图 3-4 香港版 1990 年 (庚午) 通书内容及格式

易学与择吉的关系，形同兄弟，实为母子。就是说，从择吉术的最初形态看，择吉与易学宛如一卵所生的同胞兄弟；从择吉术的最后形成看，则易学与择吉为母子关系，易学为母，择吉为子。

最初，古人把历法本身看作择吉术，看作是把握“天意”，求取吉祥的“阴阳秘法”。择吉术的初原状态就是历法。

解放前在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盗掘出土的楚帛书，通常又叫楚缙书或楚绢书（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此帛书长 38.7 厘米，宽 47 厘米。

楚帛书的写作年代大致是在战国中晚期，由内层甲篇、乙篇及外层丙篇三篇文字组成。基本性质属于数术，尤与选择相类。

据李零《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①介绍，内层乙篇主要讲四时的产生。说是在远古之时，包戏氏娶妻生下四个儿子，是为“四神”。当时“未有日月”，靠“四神”分守四方，互相换位，用步行来推算时间，以表示四时。此后经过“千有百岁”，日月终于产生，但天还是不宁，地依然不平，炎帝命祝融率领“四神”奠定“三天”、“四极”，恢复宇宙和谐，从此才有了由日月运行表示的“四时”。其后“共工夸步十日四时”，又确定了一日之内的“四时”划分，即宵、朝、昼、夕。

太阳系诞生至今已有一百亿年的时间，地球带着它的卫星始终围绕太阳旋转。包戏氏之时不可能没有日月。为什么说当时“未有日月”，其后经过“千有百岁”，才“日月允生”呢？合理的解释是：当农耕刚成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时候，原始初民由于不知寒暑及四时更迭之规律，致使耕稼失时，生产生活无序，灾难迭出，倍受尴尬。经过千百年漫长的艰苦观测和探索，才逐步把握了由日月决定的四时更替规律，使日月能给人民带来福祉。这时，人们才真正发出了“日月允生”的由衷欢呼。

内层甲篇主要讲顺令和知岁的重要性。

丙篇是指外层四周按十二月排列的十二段文字。它用一套特殊的月名表示十二神所处的辰位，并叙述各月的宜忌，与古代择日书极其相似。古人将它与反映历法如何产生以及依时行事如何重要的甲乙两篇放在一起，表明古人将历法的产生看作是择吉术的源头，并且把历日本身当作是择吉术。如《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开篇就说：“夫历日者是阴阳秘法。”（《敦煌掇瑣》）

这就说明，在来源上，择吉术与易学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上古先哲对天文星象长期观察的结果。当然，与择吉术相比，易学的产生要复杂得多。《周易·系辞传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①李零《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就是说，以包牺氏为代表的先哲们，通过对天地日月星辰、鸟兽虫鱼动植物等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长期观察和准确把握，最后创造了八卦易学体系。这个体系“广大悉备”，上“明于天之道”，下“察于民之故”，囊括了天道、人道与地道，因而“与天地准，故能弥伦天地之道”，成为帮助圣人贤士“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周易·系辞传上》）的根本大法，也成为后来包括择吉术在内的所有传统数术所宗法的理论之本。

择吉术据以运作的平台是天文历法，据以判断吉或凶的理论基础，是阴阳学说。而阴阳学说之渊藪，非《周易》莫属。

《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周易》一书，将阴阳作为说明宇宙万物运动变化和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基本范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周易·系辞传上》），使易学成为阐释宇宙生命规律的科学哲学。

同时，《周易》一书还包含了五行学说。其表征，一是帛书本《易传》中明确提到五行，具有以五行解《易》的明显倾向；二是通行本《易传》中的八卦属性及其方位，都包含了五行观念。如《说卦传》以“乾为金”、“巽为木”、“坎为水”、“离为火”，明言这四卦的五行属性。其余“坤为地”、“艮为山”、“震为决躁，为蕃鲜”、“兑为毁折，为刚卤”，则或显或隐地表明了坤、艮为土，巽为木、兑为金的五行属性。司马迁明确指出，《易》蕴含阴阳五行之理。《太史公自述》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记·太史公自述》卷一百三十）

由此，《周易》一书成为我国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渊藪，最终成为一切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数术的母体。诚如清代学者所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八，子部十八术数类一）因此我们认为，从择吉术的最初形态即历法看，它与易学的产生具有共同之处，宛如一卵所生的同胞兄弟；从择吉术的终极形式即实质看，则源出于易，易实为择吉之母。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各章节还会提到。

二、理论驳杂，易学为宗

择吉从形成之日起，就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其后由于社会需求的旺盛，以致形成“六十甲子术家逾百，二十四山神煞盈千”的繁盛状况。由此造成派系众多、理论驳杂的局面。

然不论择吉派系如何众多，理论如何驳杂，均不外阴阳之理，无出易学之右。当然，根据择吉理论与易学远近亲疏的不同关系，可以将它们区别为三个层次：一是直接援引利用，作为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易理对原有理论加以发展完善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三是根据易理新创的理论体系。兹分述如下。

（一）援易入术，作为择吉理论基础

乾隆年间，社会上择吉术泛滥，坊间私自刻印历书、通书不计其数。这些私印历书、通书，不仅错漏百出而且荒谬绝伦。有鉴于此，乾隆皇帝接受大臣的建议，命当时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重新修订历书，修纂一部既纠正过去历书对纪年、月、日、节令的错误，又辨析充斥其间的荒谬择吉理论和术语的通书。由著名天文学家梅毂成主持编修。书成后取“敬天之纪，敬地之方”之义，名为《协纪辨方书》，送乾隆皇帝审定颁发天下。

《协纪辨方书》共三十六卷，是迄今为止我国最详备的择吉专著。开首两卷曰“本原”，所述全为择吉基本理论。并且开卷即表明所以作“本原”之因：“朱子曰：‘本图书，原卦画。’阴阳家者流，其亦衷诸此也。作本原。”

即认为易学本于河图洛书，源于八卦。后世阴阳家及诸多术数，也都以此为根本。因而“本原”直接将易学的有关内容作为择吉术的理论基础加以引述，计有：河图、洛书、先天八卦次序、先天八卦方位、后天八卦次序、后天八卦方位、先天卦配河图之象、后天卦配河图之象、先天卦配洛书之数、后天卦配洛书之数、十二月辟卦、纳甲、纳音、八卦纳甲三合、小游年变卦、大游年变卦等。

清代另外几部比较重要的择吉专著，如康熙时御命大学士李光地等编纂的《星历考原》、姚承與《择吉会要》、张祖同《取吉述正》等书，都以很大篇幅引述易学有关理论，或是将之作为创立“神煞”判断吉凶的依据。姚承與更是明白无误地指出，选择“缘于易数”。这就说明，择吉术确实就是“易

①详见《择吉会要·神煞论》卷一，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刻本。

之支派也”。

《协纪·本原》所述，除纳音纳甲外，一看即知其为易学易理，故不需赘言。纳音纳甲实际上也是易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是在汉代以后才出现，故略作阐述。

1. 纳音

纳音是汉代流行的易学术语。它将十二地支、十二月、十二方位和八风，以卦爻配纳十二律，一律含五音，十二律共纳六十音，故称纳音。六十甲子纳音在数术学中的应用极其广泛，尤其是择吉具注历，每日干支之下所注五行，即为纳音五行。在造葬择日中十分重要的年克山家、月克山家等神煞，即起自纳音。

六十甲子纳音歌诀：

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炉中火，
戊辰己巳大林木，庚午辛未路旁土，
壬申癸酉剑锋金，甲戌乙亥山头火，
丙子丁丑涧下水，戊寅己卯城头土，
庚辰辛巳白蜡金，壬午癸未杨柳木，
甲申乙酉井泉水，丙戌丁亥屋上土，
戊子己丑霹雳火，庚寅辛卯松柏木，
壬辰癸巳长流水，甲午乙未砂石金，
丙申丁酉山下火，戊戌己亥平地木，
庚子辛丑壁上土，壬寅癸卯金箔金，
甲辰乙巳覆灯火，丙午丁未天河水，
戊申己酉大驿土，庚戌辛亥钗钏金，
壬子癸丑桑柘木，甲寅乙卯大溪水，
丙辰丁巳沙中土，戊午己未天上火，
庚申辛酉石榴木，壬戌癸亥大海水。

纳音五行之次序，以金、火、木、水、土为序，与《洪范》、《月令》诸书均不同^①（《洪范》五行之序：水、火、木、金、土；《月令》五行之序：木、火、土、金、水。）稽考其义，实系宗法易象，由先、后天八卦而来。

先天八卦方位，乾兑居首属金，次为离属火，又次震巽属木，复次坎属水，终于艮坤属土。其所以始于金而终于土，为乾始坤成之义。金取于天之刚，土取于地之柔，火附丽于天，水附着于地，而木以生气居于其中。这是纳音五行次序本于先天卦位之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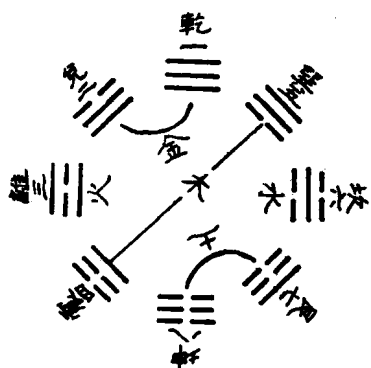


图 3-5 纳音五行应先天图

后天八卦方位。也是以乾居首而逆转。首起乾兑之金，旺于西方；次转而为离火，旺于南方；又转而为震巽木，旺于东方；再转为坎水，旺于北方；而土旺于四季，故最后以艮坤居终。这是纳音五行次序本于后天卦位之由来。

以上两者为易象。

《星历考原》认为，纳音五行次序与河图五行之数也相符。它的运算变换方法是：取大衍之数五十，用四十九，减去两千两支先天数的合数，余数满十者不取，个位剩一六为水，剩二七为火，剩三八为木，剩四九为金，剩五十为土，其所生五行就是纳音。如甲数九子数九，乙八丑八，合数为三十四，用四十九减，余十五，十不用，余五，属土；土生金，故甲子乙丑属金。丙寅数七，丁卯六，合数二十六，用四十九减，余二十三，十位不用，余三，三属木；木生火，故丙寅丁卯属火。其余依此计算即得。（干支配先



图 3-6 纳音五行应后天图

天之数：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己亥四。）易卦以揲蓍起卦之法，是用余策确定阴阳奇偶，纳音用余数确定五行，二者义理正相一致。各取所生五行以为纳音，则与河图相同。这是易数。

再从义理上看。《蠡海集》言纳音五行之法：“甲娶乙妻，隔八生子，子生孙而后行，继代其位。”以上图参看。甲子属金，乙丑也属金，这是“同位娶妻”；乙丑相隔八位至壬申又为金，是“隔八生子”；壬申娶同位癸酉为妻，癸酉也属金，也是“同位娶妻”；癸酉相隔八位至庚辰又为金，是“子生孙”，再娶同位辛巳为金妻之后，传于戊子己丑火，称为“继代其位”。其中甲子乙丑为金上元，壬申癸酉为金中元，庚辰辛巳为金下元。三元既周，则传于戊子己丑为火上元，丙申丁酉为火中元，甲辰乙巳为火下元。其余各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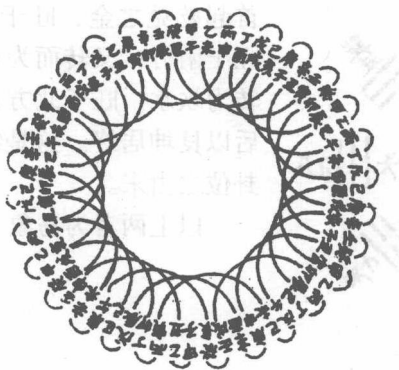


图 3-7 纳音五行隔八相生图

仿此。一行经三元之后传于次行，犹如春有孟仲季三月而后传于夏。由甲子至丁丑而五行之三元一周，犹如易之三画为小成；由甲午至丁亥而五行之三元又一周，犹如易之六画为大成。其取义与易理完全相应。

由此可知，纳音五行与易象、易数、易理，均相吻合。无怪汉代将纳音作为易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2. 纳甲

纳甲是汉代产生的易学术语，始创者为京房。其法将八卦与干支、五行、方位等相配合，十干甲为首，十二支子为初，而甲为阳统阴，故统称为纳甲。

纳甲法由汉京房创立之后，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及三国虞翻等加以发挥，或据以说易，或据以说丹。《星历考原》对此法最为推崇，以为“诸术之中，惟纳甲为近理，今火珠林卜卦，即其法也。”所以甚得后世卜筮家所宗，将之运用于占卜预测，择日选方亦每用其法。如破败五鬼、阴府太岁、浮天空亡系由岁干取纳甲卦变，贪狼、巨门、武曲、文曲、独火系由岁支取纳甲卦变，地囊则为四时三合卦之纳甲。

为什么说在诸术数之中，惟纳甲最为近理，而被火珠林据为预测吉凶的根本大法呢？我们以为，最重要的，是纳甲以逆为序安排，体现了易逆数的规律。《周易·说卦传》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著名易学家刘大均先生这样解释“顺”、“逆”：“以数推算过去顺，知未来时逆，所以《周易》（推算来事）是逆数。”^①易卦的次序，也是自下之初爻

^①刘大均、林忠军《易传全译》，第124页，巴蜀书社2001年。

逆数而上。《蠡海集》说：“纳之为言，受也，容六甲于八卦中也。易者，逆也，数皆以逆而推之。”（《协纪辨方书》郑一“纳甲”引）就是说，所谓纳甲，就是容受干支六甲于八卦之中，并且是根据易逆数的规律，以逆为序安排的。

纳甲法先将八卦和天干区分为阴阳两组。八卦阳组为乾震坎艮，阴组为坤巽离兑，天干阳组为甲丙戊庚壬，阴组为乙丁己辛癸。然后阳卦纳阳干，阴卦纳阴干。乾卦纳甲壬，坤卦纳乙癸，这是乾坤包括始终之义。其余六卦，按照“易逆数”的原则，自下而上逆取。震巽阴阳起于下，故震纳庚，巽纳辛。坎离阴阳交于中，故坎纳戊，离纳己。艮兑阴阳极于上，故艮纳丙，兑纳丁。不论易卦还是天干，都是逆取。这是八卦纳十天干之序。

以八卦纳十二支，方法也是将八卦与十二支分为阴阳两组，阳卦纳阳支，阴卦纳阴支。纳时依卦画顺次，由下而上逆数，再以阳顺阴逆之序排列。乾卦纳子寅辰午申戌；震为长子，得继父体，故与乾卦同纳子寅辰午申戌；坎卦退一位纳寅辰午申戌子；艮卦再退一位纳辰午申戌子寅，均为顺行。这是阳四卦所纳。坤卦纳未巳卯丑亥酉，巽卦纳丑亥酉未巳卯，离卦纳卯丑亥酉未巳，兑卦纳巳卯丑亥酉未，均为逆行，这是阴四卦所纳。坤卦不起于丑而起于未，是依据后天八卦方位和洛书之数。后天卦位，坤居西南，应未月之气；洛书九宫之数，偶数2起于西南坤宫。故坤卦起于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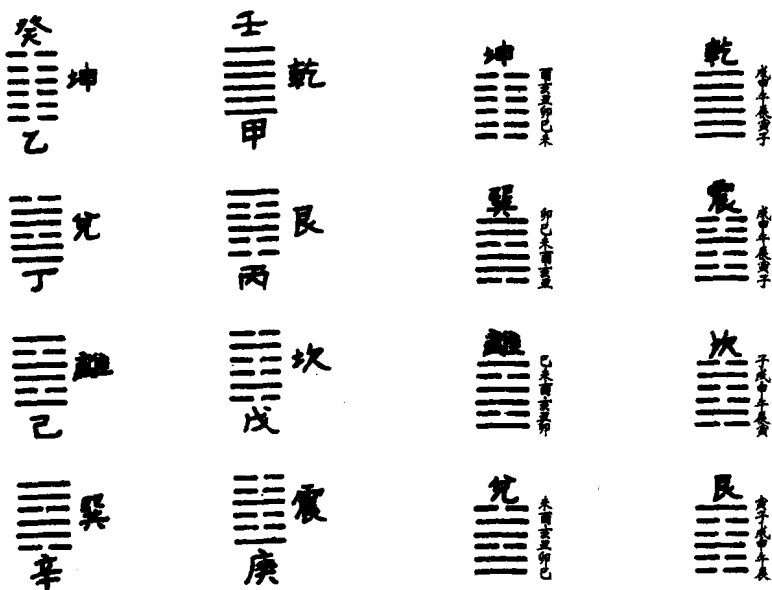


图 3-8 纳甲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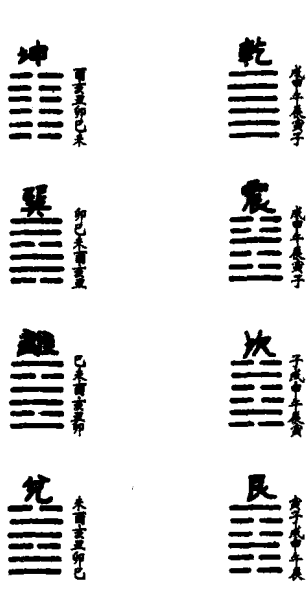


图 3-9 纳甲纳十二支图

由此可见，纳甲不仅合于易象、易数，更是深得易逆数之理，因而神于鉴往知来，为火珠林所宗法，为《考原》所推崇。

（二）依据易理，完善原有择吉理论

择吉理论与易学关系的第二层面，是依据易理来发展完善原有择吉理论，主要有干支学说、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这是择吉术（包括其它数术）的基础性理论。

1. 干支学说

干支是天干、地支的简称，原本是古人记录年、月、日的符号。后来与阴阳五行、卦爻等理论相结合，互为补充，构成一套说明宇宙万物及人类社会包括人体生命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符号系统。易学对干支学说的发展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分阴分阳，与乾坤易理相应。《周易·系辞传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两仪就是阴阳。“两仪生四象。”四象就是少阴少阳和老阴老阳。易卦有阴爻（--）、阳爻（—），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乾为阳，为天，为父；坤为阴，为地，为母。乾父统震、坎、艮三子，合为四阳卦；坤母统巽、离、兑三女，合为四阴卦。

天干，亦称十干，十天干，当它与十二支对称时，又称“十母”。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根据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分为阴阳两大类。《取吉述正》：“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地支，亦称十二支、十二地支，当它与十天干对称时，又称“十二子”，别称十二辰、岁阴。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根据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也分为阴阳两大类。子寅辰午申戌为阳，丑卯巳未酉亥为阴。与易理正相吻合。

其二，与四时五行阴阳易理相配合，构成一套说明宇宙万物及人类社会包括人体生命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符号系统。

干支的原始意义指树干和树枝。蔡邕《独断》说：“干，乾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天干、地支则是古代用以表示年、月、日、时次序的符号。其后与阴阳学说相结合，成为表示阴阳之气在一年中盛衰变化的符号。《史记》、《汉书》、《说文解字》都是在这一层面上解释干支含义的。

因此，天干地支的实质性含义，就是指万物的生、长、化、收、藏，体

表 1 天干三家注释

天干	《史记·律书》	《汉书·律历志》	《说文解字》
甲	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	出甲于甲	东方之孟阳气萌动
乙	言万物生轧轧	奋轧于乙	春草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
丙	言阳道著明	明炳于丙	位南方，万物成，炳然，阴气初起，阳气将亏
丁	言万物之丁壮	大盛于丁	夏时万物皆丁实
戊		丰茂于戊	中宫也，象六甲五龙相拘绞也
己		理纪于己	中宫也
庚	言阴气庚万物	敛更于庚	位西方，象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
辛	言万物之辛生	悉新于辛	秋时万物成而熟
壬	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	怀任于壬	位北方也，阴极阳生，象人怀妊之形
癸	揆也，言万物可揆度	陈揆于癸	冬时，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

现事物的产生、发展、壮大、消弱、灭亡和更生的整个过程，反映时间即阴阳之气周期性发展变化的现象。

天干、地支还表示空间方位和五行属性。《难易寻源》说：“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这是天干的方位与五行属性。

《协纪辨方书》说：“地支，则寅卯辰属木，配东方也；巳午未属火，配南方也；申酉戌属金，配西方也；亥子丑属水，配北方也。而土寄旺于辰戌丑未之间，配四季也。”（《协纪辨方书》卷一“干支五行”）这是地支的方位与五行属性。

“易以道阴阳”，《周易》把阴阳作为说明宇宙万物运动变化和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基本范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十二月辟卦，即十二消息卦，又称十二辟卦、十二君卦、十二月主卦。这是由乾坤两卦相互推移而形成的十二卦，为众卦的基础，全易的根本。依阴阳消息的次序排列为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与十二月、十二辰是相对应的。

从复至乾，阳爻逐渐增加，从下往上增长，阴爻逐渐减少，表示阳气逐渐增强，阴气逐渐减弱，为阳长阴消的过程。从姤卦到坤卦，阴爻逐渐增加，从下往上增长，阳爻逐渐减少，表示阴气逐渐增强，阳气逐渐减弱，为阴长

表2 地支三家注释

地支	《史记·律书》	《汉书·律历志》	《说文解字》
子	滋也，言万物 滋于下	孽萌于子	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 为称
丑	纽也，言阳气在上未 降，万物厄纽未敢出	纽牙于丑	纽也，十二月万物 动用物，像手之形
寅	言万物始生，蟺然也	引达于寅	骸也，正月阳气动，去黄泉欲 上出，阴尚强也
卯	茂也，言万物茂也	冒萌于卯	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像 开门之形
辰	言万物之娠也	振美于辰	震出，三月阳气动，雷电振， 民农时也，物皆生
巳	言阳气之已尽	已盛于巳	巳也，四月阳气已出，阳气已 藏，万物见，成文章
午	阴阳交，故曰午	鄂布于午	悟也，五月阴气悟逆阳，冒地 而出也
未	言万物皆成， 有滋味也	昧暖于未	昧也，六月滋味也，象木重枝 叶也
申	言阴用事申贼万物	申坚于申	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
酉	万物之老也	留执于酉	就也，八月黍成可为爵酒
戌	言万物灭尽	毕入于戌	灭也，九月阳气微，万物毕 成，阳下入地也
亥	该也，言阳气藏于下也	该闾于亥	亥也，十月微阳起接盛阴

阳消的过程。

十二卦共七十二爻，又象征二十四节气（一卦含内外两卦）和七十二候的变化，总起来反映宇宙万物阴阳消长以及人的生命生、长、老、死的过程。易卦表示方位，有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两个模式。其中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天干和地支所蕴含的时间、空间和五行属性，与后天八卦完全相合。因此，后人以后天八卦与十天干十二地支相配合，构成二十四方位。构成一套说明宇宙万物发生发展的时间、空间以及五行属性的图式，应用极其广泛。

八卦用四隅而不用四正卦，是因为四正卦正当地支子午卯酉之位，所以不用卦而用支，实际上用支就是用卦。子午卯酉与四正卦，不论是时间、方位，还是五行属性，都是一致的。天干不用戊己，是因为戊己为中央土，无

定位，故不取。合四维、八干、十二支，共为二十四山。以二十四山分属八卦，则一卦管三山。即戌乾亥属乾居西北，子癸属坎居北，丑艮寅属艮居东北，甲卯乙属震居正东，辰巽巳属巽居东南，丙午丁属离居正南，未坤申属坤居西南，庚酉辛属兑居正西，称为八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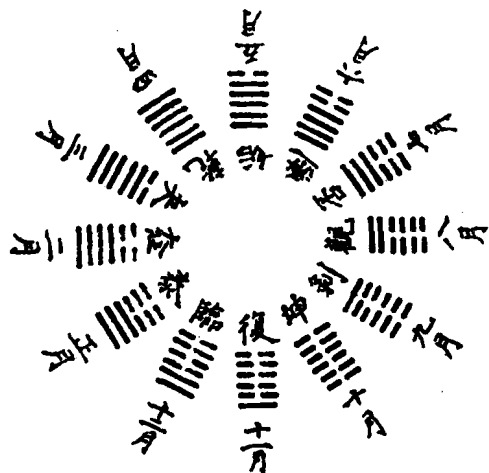


图 3-10 十二月辟卦



图 3-11 二十四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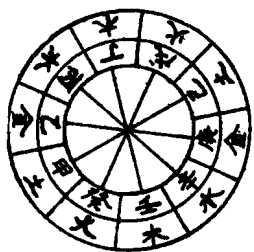


图 3-12 五合

其三，天干地支的五合、六合、三合，均源于易理，本于图数。我们先介绍基本概念，然后再作分析。

天干五合。又称天干化合。十干两两相合，共为五组。甲己合化土，乙庚合化金，丙辛合化水，丁壬合化木，戊癸合化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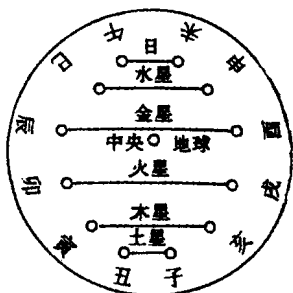


图 3-13 六合

地支六合。十二支两两相合，共得六组。即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

地支三合。亦称地支三合局、三合成局、三合化局、三合局。由十二地支的生旺墓相合组成水、火、木、金局。即申子辰合水局，巳酉丑合金局，亥卯未合木局，寅午戌合火局。《淮南子》中还有午戌寅合土局之说。

择吉术或阴阳数术中“合”的观念，源于《周易》“保和”思想。《周易·乾·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这是说，在乾道或乾元的变化过程中，万物各有各的性命和存在价值，各有各的位置，各得其正。乾元与坤元（阴气与阳气）必须保持交合的状态，才能达到“太和”的对立统一状态，获得顺利、贞固的结果。

《系辞传下》说：“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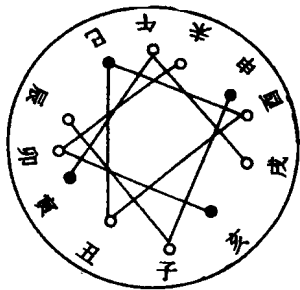


图 3-14 三合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把阴阳交合（合德）看成是事物存在、发展和通达神明境界的关键。

由此可见，“保合太和”思想不仅是在《周易》中最早出现，并且是《周易》最为推崇的最高理想境界。在《周易》中，凡相交相合者吉，如“泰卦”、“既济卦”，都是天地相交，二气相通，故吉；凡相背相离者凶，如“否卦”、“未济卦”，都是天地不交，二气相背，万物不通，故不吉。择吉术和其它数术以合为吉，并发展形成天干五合、地支六合、三合诸理论，显然是对《周易》“保合”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此外，天干五合，都是阴与阳合，与易理同，并且还河图之数相合。河图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分居北、南、东、西、中五方，实即一与六合、二与七合、三与八合、四与九合、五与十合。以十干次序相对照，一为甲，六为己，故甲与己合；二为乙，七为庚，故乙与庚合；三为丙，八为辛，故丙与辛合；四为丁，九为壬，故丁与壬合；五为戊，十为癸，故戊与癸合。

地支六合，也都是阴与阳相合，与易理同，同时还体现了日与月的和合。《星历考原》说：“六合者，以月建与月将为相合也。”（《协纪辨方书》卷一“六合”引）月建就是斗建，是以斗柄所指表示十二个月的变化。月将就是太阳。《协纪》说：“日者，月之将也，故曰月将。”（《协纪辨方书》卷一“六合”）古人从月本无光，因受太阳光才发光这一角度，把太阳视为月之将。又把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区分为“十二次”，亥曰娵訾，戌曰降娄，酉曰大梁，申曰实沈，未曰鹑首，午曰鹑火，巳曰鹑尾，辰曰寿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纪，子曰玄枵。正月斗建寅，月将在亥，故寅与亥合。二月斗建卯，月将在戌，故卯与戌合。月建依次左旋，月将循序右转，顺逆相值，共有六会，故称六合。

三合的情况有所不同。五合、六合是阴阳和合，三合则是把五行的发展过程分为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十二个阶段，各取生、旺、墓以为合局。生即生产，旺即有成，收即收藏。有生有成又有收，万物得始又得终，自然周备。一物而有始有成有终，必然是阴阳和合，这就与“乾元资始”，“坤元资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的易道相通相合了。又《三命通会》说：天地之间，“两则化，一阴一阳之谓也。三则化，三生万物之谓也。”（《三命通会》卷三“论支元三合”）《周易》曰，“太极生两仪”，两而含三。又以天、地、人为三才（又称三材），《系辞传上》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

也。”生旺墓三合成局，正与《周易》一气含三及“三才”之道相合。

其四，地支刑冲损害，是易理的具体应用及深层体现。

我们先看地支相刑。

地支相刑，亦称三刑，是地支之间彼此伤残、刑戮的意思。是择吉术和其它阴阳数术十分重要的基础理论，共有四种情况。一是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称为“无恩之刑”；二是未刑丑，丑刑戌，戌刑未，称为“恃势之刑”；三是卯刑子，子刑卯，称为“无礼之刑”。此外还有辰、午、酉、亥自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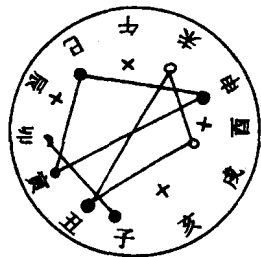


图 3-15 地支三刑

这几组地支互相间为什么会存在彼此伤残或自残的情况呢？解释者不少，其中储泳《祛疑说》和翼氏《风角》所述与易理相合。储氏以“极数说”解。他说，子卯相刑，由卯顺数至子，由子逆数至卯，都是十数；寅巳申相刑，由寅逆至巳，由巳逆至申，都是十数；丑戌未相刑，由丑顺至戌，由戌顺至未，也都是十数。“皇极中天，以十为杀数。积数至十，则悉空其数。天道恶盈，满则覆也。”（《协纪辨方书》卷三“岁刑”引）翼氏《风角》所言，更合易理：“金刚火强，各守其方。木落归根，水流趋末。”（《协纪辨方书》卷三“岁刑”引）意思是说，金火刚强，所以金刑金方，火刑火方，刚强者必定自戕。而金至强于酉，火至强于午，所以不但戕害本方，连自体也遭受伤害。水木柔弱，则会被生我者与我所生者伤害。如水生木而刑木，木生于水而刑水。生我之门，死我之户，这便是孟子所谓“死于安乐”之意。《周易·丰·彖传》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阴与阳互相依存，各以对方为生存条件，任何一方力量的过盛过强，都会表现为“亢”，“亢”则有悔，就会影响到统一体的平衡，甚至物体自身也会受到严重伤害。这是对《周易》物极必反阴阳学说的发展与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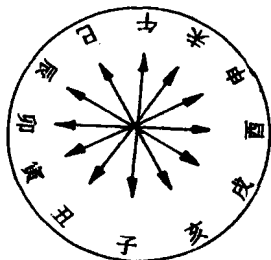


图 3-16 地支相冲

地支相冲，亦称地支六冲、地支对冲。指十二地支的对冲与斗争，共有六组。子午相冲，丑未相冲，寅申相冲，卯酉相冲，辰戌相冲，巳亥相冲。这组概念，从方位来说，都是相反的；从五行来说，除了丑未辰戌，都是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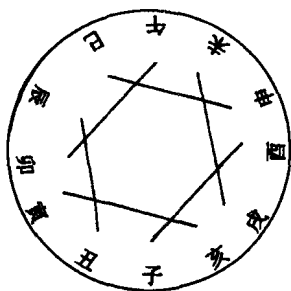


图 3-17 地支六破

克；就阴阳而言，都是阳克阴，阴克阳。阴阳不能配合，所以就冲了起来。《周易寻源》说：“地支相冲，斗也。……对立斗争者冲，互不相能，两两破碎。”《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与阳必须“合德”才能“刚柔有体”；天与地必须相交感才能“化生万物”。现在阴与阳不合不交，还相冲相克，当然有悖天道，所以不吉。这是对《周易》“阴阳合德”思想的应用。

地支相破，亦称地支六破。是地支之间互相破坏、散移。十二支两两相破，共得六组。子酉破，午卯破，巳申破，寅亥破，丑辰破，未戌破。《周易寻源》说：“地支相破，散也，移也。”这六组地支为什么会有相互破坏和散移的关系呢？按阴阳易理，阳最根本的特征是刚健，主动，为顺为前为进；阴最根本的特征是柔顺，主静，为逆为后为退。而在“六破”中，子寅辰午申戌六阳支，所配均为后三位；丑卯巳未酉亥六阴支，所配则均为前三位。阳欲前欲进而所配为后，阴欲后欲退而所配为前，与阴阳之本性不合，对其所要发挥的作用有所移散，故不吉。

地支相害，亦称地支六害、地支相穿。指十二地支彼此妨害、忤穿的关系，所以害又叫“穿”。十二地支两两相害，也有六组。子未相害，丑午相害，寅巳相害，卯辰相害，申亥相害，酉戌相害。

子与丑合，而未来冲丑，故未为子之害；午来冲子，故午为丑之害。寅与亥合，而已来冲亥，故巳为寅之害；申来冲寅，故申为亥之害。其余仿此。观其所取，凡我之所亲合而别方来冲克，即为我之害。阴阳合则相亲，为吉，冲当然有害，为凶。与地支六合图参看，其理更明。这也是《周易》阴阳合和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2. 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不是《周易》首创，而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对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观察，把宇宙间的万物万象，归结为阴与阳两大类，而建立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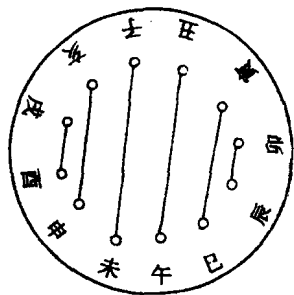


图 3-18 地支相害

一种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或宇宙模式论。但在《易经》中已有阴阳观念，至《易传》，则积此前阴阳学说之大成，以阴阳解《易》，将“阴阳”提升为“范围天地”、“曲成万物”的最高范畴，称之为“道”或“易道”，使之成为说明宇宙万物运动变化和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基本范畴。

《易传》所包含的阴阳思想是十分丰富的。

《易传》按卦爻模型，把宇宙万物分为阳与阴两大类。《周易·系辞传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疏曰：“两仪为两体客仪也。”意思是说，阴阳是从太极之中产生出来的互体。如果说太极是宇宙的本原，那么阴阳就是宇宙的最基本构成。宇宙一切事物都可以分为阴阳，每一事物也可分为阴阳。阴与阳代表了宇宙世界互相联系，同时又互相矛盾对立的万事万物。“阳”代表奇数、光明、正向、运动、白色、刚强、外在、正数、俯下、实际、左边、德生、开放、雄性等等一系列的事物。“阴”代表偶数、阴暗、反向、安静、黑色、柔和、内在、负数、仰上、空虚、右边、刑杀、关闭、雌性等等一系列的事物。不论宇宙万物如何复杂，都可以归结为阴或阳两大类。

阴阳相推，变动不居的思想。这是《易传》揭示的宇宙生命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意谓阴阳二气（或二爻）的运动变化可以“效天下之动”、“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系辞传上》说：“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月的运行，寒暑的变化，以及风雨、雷霆等宇宙一切自然现象都是由阴阳对立面的摩荡、消长造成的。

原始反终、反复其道的思想。《易传》指出，阴阳相推，具有“原始反终”、“反复其道”的特性。《系辞传上》：“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这是说，由事物开始可以返回到事物终结，因而它可以知晓死的学说。事物或阴阳的运动变化“一阖一辟”、“往来不穷”，具有反复的特性。“反复”的周期有多种。有七日周期。《周易·复·彖传》：“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有七月周期，此即所谓“五月一阴生，十一月一阳生”之说。还有一卦六爻小周期，以及六十四卦大周期，等等。

阴阳互根与转化的思想。《易传》“太极生两仪”所揭示的一分为二原理，表明宇宙生命起源于“一”，这个“一”可以层层两分以至于无穷。这一思想在明代张介宾《类经》中有十分明确的表述：“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以阳生，阳以阴长。”（张介宾《类经》卷一）意思是说，阴与阳互相纠缠着，它们互以对方为自己生存发展的条件。阴仰阳俯，背阴抱阳，履晦载明，阴生阳成或阳生阴成，互为胚胎，若即若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男中有女性激素，女中有男性激素，反其逆行，冲气以为和。

这在《老子》中也有表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这就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的规律。

阴与阳的互根互存是绝对的，但阴阳双方又始终处于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事物阴阳两方面可以互相转化，阴可以转化为阳，阳可以转化为阴。《周易·丰卦·彖传》：“日中则昃，月盈则虚，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即所谓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这种阴阳转化的观念，又称为“阴消阳息”。即当阴阳的消长达到一定程度时，可引起质的变化，实现转化。《春秋感精符》则谓之曰“阴厌阳移”。书中说：“阴厌阳移……极阴反阳，极阳反阴。”所说也是阴阳矛盾转化中的物极必反原理。所以，在择吉术中，凡至“极”的事物多为不吉，一般都回避不用。

以阳为德阴为刑，尊阳抑阴的思想。《周易》一方面强调只有阴阳合德、天地相配才能化生万物，另一方面又以阳为德，阴为慝，认为阳好阴不好。《周易·系辞传下》：“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就是说，阳卦与阴卦的德行是不同的。阳卦一君统二民，二民共事一君，是君子之道。阴卦二君统一民，一民事二君，是小人之道。在《易经》中，凡阳卦居内而为主者治，如泰卦、益卦；凡阴卦居内而为主者乱，如否卦、损卦。总之，在易卦之中，尊阳抑阴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在一卦之中，若阴为臣道，以能顺阳为善；若阴为君道，以能应阳为美。

这一思想，后来发展成以阳为德、以阴为刑的思想。《黄帝四经》说：“极阴以杀，极阳以生……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刑德皇皇，日月相望……是有晦有明，有阴有阳。”《淮南子·天文训》说：“日为德，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即以阴、秋冬为刑杀，以阳、春夏为德生，以日为德，以月为刑，由此形成了“抑阴扶阳”的基本法则。这是古代先哲从月亮明晦的自然现象中领悟到的道理，也是古人择吉选日的重要法则。

《周易》阳主动、阴主静的基本观念，后来发展为“阴腐阳焦”思想。马王堆西汉帛书《黄帝四经》说：“在阴不腐，在阳不焦。”《吕氏春秋》中有一句名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这就是说，阴是静的，但过于静止就会产生腐烂。阴又是水，水太静止不流动就会腐败。只有流水才能不腐，运动才能不滞。阳就是动，运动又是升华。阳又是火，火的升华运动过甚过旺就会烧焦。所以，文火不焦。因此，择日选时力避极端，力求中庸、平衡、和谐。

3.五行学说

同阴阳学说一样，五行学说也不是《周易》首创，而是我国先哲用以描述宇宙生命属性规律的另一组符号系统。但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中，已数次提到“五行”一词，通行本《易传》则明确提到了八卦的五行属性。更为重要的是，五行的实质或本义，就是阴阳。这一点，古人早已言明。如：

孙星衍在《尚书·洪范》疏中引郑康成说：“行者，顺天行气也。”又引《白虎通·五行篇》说：“言行者，欲言为顺天行气之义也。”

《春秋繁露·五行篇》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

周敦颐《太极图说》明言五行是阴阳化生的结果：“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二气交感，化生万物。”

张介宾《类经图翼》认为五行为阴阳之质：“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

以上各家所说表明，五行的实质就是阴阳；是阴阳二气分合变化产生的结果；是阴阳表现出来的人们可以感受得到的“质”即实体。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五行是阴阳的物质存在形式，阴阳是五行的运动方式。

战国以后有关五行的各种观念，与阴阳思想的联系密不可分，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周易》阴阳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易学易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可以从以下三点来看。

其一，五行生克观念合于河图洛书。

五行相生，即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与河图顺行之序相合。河图一六居北为水，二七居南为火，三八居东为木，四九居西为金，五十居中为土。按顺时针方向左旋，表示五行相生之序。

将河图一、三、七、九奇数和二、四、六、八偶数分别相连，构成一个旋涡结构，表示阴阳二气呈旋涡形消长循环发展的规律。

五行相克，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与洛书逆行之序相合。

洛书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数居中。一九三七奇数居北南东西四正，二四六八偶数分居四隅。按逆时针方向右转，表示五行相克之序。将洛书各数依次相连，构成两个“S”字形，表示阴阳二气升降往复周期发展的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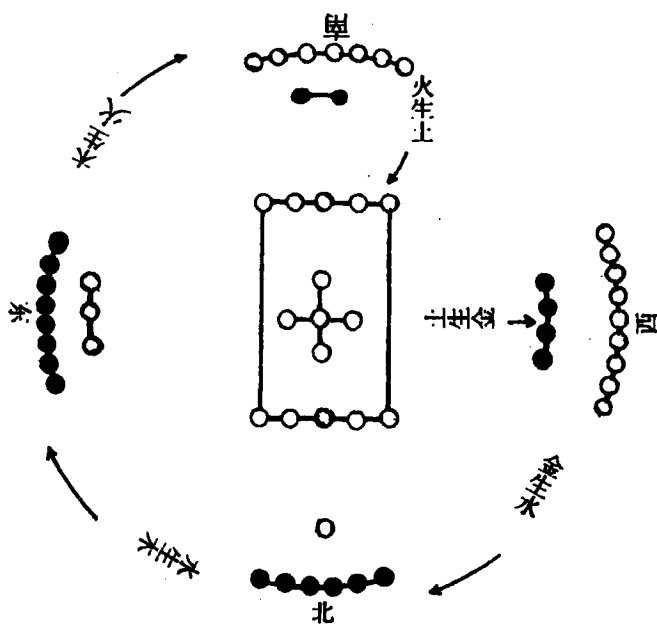


图 3-19 河图配五行相生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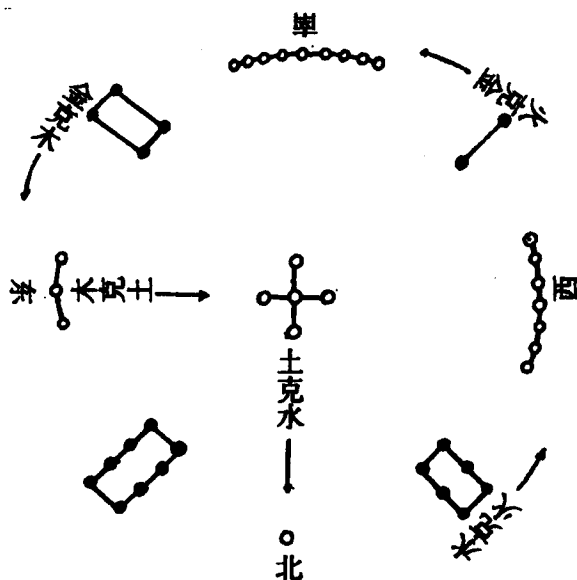


图 3-20 洛书配五行相克之序

古人以河洛与八卦相配以说明八卦源于河洛，已经成为共识。张其成《易图探秘》一书研究认为，易学体系包括三级符号系统，其中八卦图为第一级符号系统，河图洛书为第二级符号系统，太极图为第三级符号系统。“各级符号系统主要揭示了阴阳二气互根互纠、互长互消、互动互进的基本规律。”^①就是说，河图洛书即易，五行生克与河洛相合，故五行生克亦与易合，可视为阴阳易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其实这很简单。“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中就包含着相生相克的各种现象，易卦与河图洛书都是对天地自然的摹写，自然包含有相生相克的思想。如《易传》“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所反映的就是“相合”、“相生”的观念。咸卦，艮土在下，兑金在上，《彖传》曰：“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也蕴含着相生的观念。革卦，离火在下，兑水在上，《彖传》曰：“革，水火相息。”水与火“相息”、“相灭”，那就是“相克”的思想了。

其二，五行的旺相休囚死和寄生十二宫，反映的是阴阳二气四时发展变化的周期规律。

五行的旺相休囚死指五行在四时中旺衰变化的五种状况。其基本规律是：当令者旺，我（以当令者为我）生者相，生我者休，克我者囚，我克者死。以木为例。春天木当令，故木旺；火为木（我）所生，故火相；水是生木之母，今木已旺盛，故水休；金是克木者，今木势强盛，故金囚；土是木所克者，而木势强盛，故土死。五行在四季中的旺相休囚死情况如下：

【木】春旺 冬相 夏休 四季囚 秋死

【火】夏旺 春相 四季休 秋囚 冬死

【土】四季旺 夏相 秋休 冬囚 春死

【金】秋旺 四季相 冬休 春囚 夏死

【水】冬旺 秋相 春休 夏囚 四季死

五行寄生十二宫又叫五行生旺死墓，或五行生旺。指五行在十二个月中从长生、壮大到死亡的过程，表示事物新陈代谢的规律。据《三命会通》，十二宫名称依次为：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

^①张其成《易图探秘》第四章《太极统一模型图》，中国书店1999年，第249页。

表 3 五行寄生十二宫（阳干顺行，阴干逆行）

	甲木	丙火	戊土	庚金	壬水	乙木	丁火	己土	辛金	癸水
长生	亥	寅	寅	巳	申	午	酉	酉	子	卯
沐浴	子	卯	卯	午	酉	巳	申	申	亥	寅
冠带	丑	辰	辰	未	戌	辰	未	未	戌	丑
临官	寅	巳	巳	申	亥	卯	午	午	酉	子
帝旺	卯	午	午	酉	子	寅	巳	巳	申	亥
衰	辰	未	未	戌	丑	丑	辰	辰	未	戌
病	巳	申	申	亥	寅	子	卯	卯	午	酉
死	午	酉	酉	子	卯	亥	寅	寅	巳	申
墓	未	戌	戌	丑	辰	戌	丑	丑	辰	未
绝	申	亥	亥	寅	巳	酉	子	子	卯	午
胎	酉	子	子	卯	午	申	亥	亥	寅	巳
养	戌	丑	丑	辰	未	未	戌	戌	丑	辰

观察五行旺相休囚死和寄生十二宫的具体内容，实质就是阴阳二气在四时十二月中生、长、盛、衰、死发展变化的周期规律，与《周易》的十二月辟卦有异曲同工之妙。勿需赘述。

其三，五行的乘侮与承治关系，是阴阳二气在其发展进程中，因自身盛衰的变化而导致相互间关系的变化；五行的制与化关系，是世人利用阴阳制衡转化的规律，对事物因自身盛衰变化而发生失衡状态而进行扶补救助的一种方法。

五行乘侮是五行中因偏盛偏衰而产生的一种关系。乘指五行中某行对被克之行克制太过，从而引起异常相克反应，或是被克者过弱而导致克制增强。侮是指五行中的某一行过于强盛，对原来克我的一行形成反克之势，即所谓“金能克木，木坚金缺；木能克土，土重木折”。

五行承治是五行互相承受、治用，以达到中和的意思。《难易寻源》说：“抑强扶弱，损多益寡，泄有余，补不足，制太过，化不及，致中和之要诀耳。”意思是说，五行过强过盛而遇克泄，不但不为凶，反而可使之达到中和之美。如金旺得火，而成器皿；火旺得水，而成既济；水旺得土，而成池沼；土旺得木，疏通生物；木旺得金，方成栋梁。五行过旺，叫做“亢害”，承治就是予之适当的克或泄，这是避免事物走向极端，使之达到中和的重要手段。

以上两者说的都是过盛不好，过衰也不好；过盛而遇适当克泄，反而可

达中和之美。这与《周易》所说的“物极必反”，以及“得中”、“守中”观念，与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是相一致的。

五行制与化主要是五行中三“行”之间的生克关系。

《类经图翼》说：“母之败也，子必救之。如水之太过，火受伤矣，火之子土，出而制焉。火之太过，金受伤矣，金之子水，出而制焉。金之太过，木受伤矣，木之子火，出而制焉。木之太过，土受伤矣，土之子金，出而制焉。土之太过，水受伤矣，水之子木，出而制焉。盖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

《星平会海》说：“得用以制其克者，其凶可免。得恩以化其克者，反凶为吉。虽定于生克，而吉凶之变实迁于制化矣。”

这就是说，五行的吉凶虽然产生于生或克，但其最后状况，却可通过制化手段加以改变。这是择吉术用以制煞、化煞的基本原理，十分重要。

宇宙万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平衡系统，自身具有巨大的平衡机制。五行的制与化，是古人对自然界中存在的平衡机制的发现和利用。《周易》首先发现并利用了这一规律。《系辞传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明确提到了“化”和“裁”。《序卦传》说：“震者动也，物不可终动，止之故受以艮。”震是动的，动到必须止的时候为止，这就是“化”；“止之”就是“裁”，也可以称为“制”。化与裁（或制）就是人为推动事物向人们所期望的目标变化的一种方法。后世的五行制化之法，即为易道之用。

“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万物都离不开阴阳易道。择吉术与众多阴阳数学所共遵的干支学说、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因与易学易理相结合而得以丰富、发展和完善，它们与易学易理密不可分，实际上已经成为易学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根据易理，新创择吉理论体系

择吉术除了直接利用易学易理和依据易理发展完善干支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外，还根据阴阳易理，新创造了不少择吉理论体系，如建除法、九星术、六曜法、秀阳法、吉阳法、孤虚法、星命法、禽星法，等等。这里选择其中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建除法和九星术作些分析介绍。

1. 建除法

建除，全称建除十二直，又称建除十二客，依次为建、除、满、平、定、

执、破、危、成、收、开、闭。

以建除断吉凶，由来甚久。战国时期已形成建除家。《史记·日者列传》中列有建除家。其后传承不绝，具注历之下每日必注建除，地位十分重要。民间广泛流传的“董公选择法”，其实就是依据建除十二直择日。《协纪辨方书》说：“夫止以建除论吉凶，未甚彰显著明也。此建则彼除，十二辰自然轮转耳。迨夫参以万事，错以二气五行，然后吉凶生焉。特其吉凶之大小剂量，则生于建除。”（《协纪辨方书》卷四“建除十二神”）这是说，若单以建除决定日时的吉凶，还不够全面，但日时吉凶之大或小，则是由建除决定的。可见建除在择吉术中的地位，确实十分重要。

建除法与易学易理的联系，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来源与安排看，建除源于星象与阴阳的运动，与易卦同。

建除十二直的安排和破军星有关。破军星即摇光星，是北斗七星斗柄柄头的星。在正月节即立春那天初昏指寅，叫做建寅；二月节即惊蛰那天初昏指卯，叫做建卯，依次顺行。到了翌年正月节初昏又复指寅的方向。因而正月节后最初的寅日的十二直为建，翌日即卯日为除，再翌日即辰日为满，巳日为平，午为定，其余类推。

由于十二直与十二支的数目一样，为避免二者重复，就以每月节气那天的十二直，重复其前日的十二直。这样过了十二个节气即一年后，十二直正好迟了十二次，十二支又和十二直一致，正月寅日的十二直仍复为建。这是十二直的安排方法。

由此可知，建除法的产生，源于古人对星象的观察；建除的安排，则反映了日月运行阴阳变动的规律。易卦源于以伏羲氏为首的先哲们的仰观俯察，揭示的是阴阳变易的规律。二者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其二，建除十二直之命名，源于易理，与易理同。

关于建除十二直取名之因由，《协纪辨方书》作如下解释：建为一月之主，所以从建起义。建之后为除，除旧布新之意，为一月之相气。由一而生二，二而生三，三为数之极，所以继之为满。满则必溢，溢则平，故满后为平。平则定，建前五位为三合，合也是定，故平后为定。定则可执，故继之以执。执是守成之意，事物无成则不毁，所以继之以破。又，由建至此为七，对七为冲，事物受冲则破。事物破毁之后，即心知其危，心知其危而小心谨慎，肯定能够成就大事。此即《孟子》所说：“危故达。”事既办成，必有收获。所以继破之后为危、为成、为收。由建至收，其数为十。十为极数，但数无终极之理，所以为之“开”。这“开”是一种生气，气初萌芽，不加保护即无助于事物之滋长。故最后受之以闭。（《协纪辨方书》卷四“建除十二神”）

建除十二直据易以取名，理由十分明显。譬如：“三生万物”，为极数，故十二直的第三位为满；《周易·坎》曰：“坎不盈，祗既平。”流溢则不盈，达到平，故满后为平；《周易·革·彖传》：“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十干第六位为己，十二辰的第七位为破，二者取义是相同的；最突出的是第十一位“开”，完全取法于《易》既济、未济之安排：“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开之后为闭。但闭并不意味着事物发展的终结，而是为了保护刚刚萌生的幼芽，以利其更好地成长和新一轮发展。所以《协纪》说：“唯其能闭，故复能建，与易同也。”（《协纪辨方书》卷四“建除十二神”）

2. 九星术

九星术又称九宫算。它是把洛书方阵的各数加上各种颜色名称，按一定规律分配在年、月、日之下，参考以五行生克，用以判断年月日时方位和人事吉凶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唐代创始后，成为择吉具注历书的必备内容。主要是用来表示方位吉凶，有年九星、月九星、日九星和时九星的不同。

与建除法一样，九星术也是依据易学易理而创造的。

首先，九星术完全源于洛书，将洛书的九个数字都用颜色来表示，即为：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称为“九星”。以紫白为吉，九紫尤佳。余五色为凶。把它们和五行相配，则得：

一白 二黑 三碧 四绿 五黄 六白 七赤 八白 九紫
 水 土 木 木 土 金 金 土 火
 称为一白水星、二黑土星、三碧木星……等等。

根据洛书的排列，得到下面的洛书九星图：

四绿	九紫	二黑
三碧	五黄	七赤
八白	一白	六白

图 3-21 洛书九星图

由于九星与洛书的联系，使之与八卦九宫也发生了对应关系。这可用下图表示：

洛书是太极易学的第二级符号系统，就是易学。九星术源出于洛书，合于易卦，亦可视为源出于《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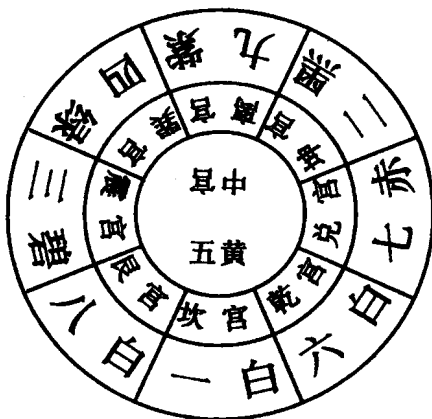


图 3-22 九星与八卦九宫对应图

其次，九星术的布局方法，与阴阳易理相符合。

九星有配年、配月、配日与配时的不同，布局方法均依阴阳易理。九星配年歌诀：“上元甲子起坎白，中元四绿下七赤，飞白挨次入中宫，九星顺数年皆逆。”即上元甲子年以一白水星入中宫，顺排九星，次年则以九紫火星入中宫，亦顺布九星；再次年以八白土星入中宫，亦顺布九星。这便是“九星顺数年皆逆”。

九星配月歌诀：“孟年正二黑，仲年正八白，季年正五黄，星顺月皆逆。”即寅巳申亥四孟年正月以二黑土星入中宫，顺布九星；子卯午酉四仲年正月以八白土星入中宫，亦顺布九星；丑辰未戌四季年正月以五黄土星入中宫，亦顺布九星。月则与年同，都是逆数。

洛书是用图数来揭示宇宙万物即阴阳二气运动变化的一种模式，年九星和月九星的布局法，主要是反映阴阳运动变化较大的周期节律。

日九星布局法所体现的阴阳易理，较前二者更为直接。九星配日方法具体应用了阳顺阴逆的基本规律。

冬至一阳生，此后阳气不断滋长壮大，故九星布局用阳遁。方法是，取最靠近冬至的甲子日，以一白水星入中宫，次日以二黑土星入中宫，再次日以三碧木星入中宫，随后为四绿木星、五黄土星……九星顺行。

夏至一阴生，此后阴气不断滋长壮大，故九星布局用阴遁。取最靠近夏至的甲子日，以九紫火星入中宫，次日以八白土星入中宫，再次日以七赤金星入中宫，随后为六白土星、五黄土星、四绿木星……九星逆行。此即《烟

波钓叟赋》所概括的“二至还乡一九宫”。

时九星的布局最为复杂，而其基本原则也是阳顺阴逆。

三、神煞怪异，不违易理

在择吉术中，日时与方位之吉凶，定于神煞；阴阳五行及易学之理，亦集中于神煞。故言择吉，不可不及神煞。择吉之神煞累百逾千，或吉或凶，或正或伪，泾渭杂陈。择吉术深奥繁难，全在神煞；择吉术为世人所误解，仍在于神煞。

择吉神煞，由来甚久。战国时已有建除、吉阳、秀阳、五行等多家。至汉代，则五行、建除、丛辰、太一、堪舆、历家、图宅诸家并起。延及后世，乃至“百家争鸣”，莫可胜数。各家所创设的神煞，更是累千钜万，难以胪列。清乾隆时修撰《四库全书》，曾命著名天文学家梅毂成等编辑《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将当时流行于世的择吉神煞，广为搜集，“择其近理而雅训者，加之解释，正其舛误。”做了一番正本清源的艰苦工作。

据《协纪辨方书》、《择吉会要》及《取吉述正》等书所整理的成果，择吉神煞可归结为四大类，即年神类神煞，月神类神煞，日神类神煞和时神类神煞。数量极其庞大。根据择吉神煞与易学易理关系的亲疏远近，可以区分为几个不同层次。

（一）直接源自易卦易理的择吉神煞

在择吉术中，有很多神煞是直接从阴阳易理产生的。

其中年神类神煞：

从岁干取纳甲卦变产生者，有破败五鬼、阴府太岁、浮天空亡；

从岁支取纳甲卦变产生者，有贪狼、巨门、武曲、文曲、独火；

从岁纳音产生者，有年克山家。

月神类神煞：

从十二月卦而得者，有单阴、纯阴、孤阳、纯阳；

从月纳音产生者，有月克山家；

由八节九宫而来者，有三奇；

随四序而得者，有天赦、母仓、四相、王日、官日、守日、相日、民日、

四击、四忌、四穷、四耗、四废、五虚、八风；

随四时三合纳甲而取者，有地囊；

随月建行纳甲而取者，有阳德、阴德、天马、兵禁；

.....

以上这些神煞，因其系直接取自易学易理，故不赘述。

(二) 根据阴阳易理而创造的择吉神煞

根据阴阳易理而创造的神煞，是择吉术神煞的主体。其中又可区别为几个不同方面。

1. 根据阳为德阴为刑理念而创造的神煞。

如岁德、岁德合。岁德，甲丙戊庚壬五阳年以自位为德，乙丁己辛癸五阴年以合干为德。岁德合，即岁德五合之干。此二德乃取义于易道，即阳一阴二，阳为德，阴为刑，阳为善，阴为恶。所以阳之为德，在于不化乎阴；而阴之为德，则在于弃其本位而从乎阳。所以五阳干当位自得，五阴干则取其合干，以从阳为德。因此二神最得阴阳易理之道，故最为吉祥。

《周易》一书，一方面承认“阴阳合德”不可相无，另一方面又强调阳淑阴慝，阳好阴不好，把崇高的、善良的、正确的，都归诸阳，把卑微的、丑恶的、错误的，都归诸阴，采取扶阳抑阴的态度。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崇阳抑阴、阳尊阴卑、以阴从阳的观念。择吉术遵从其旨，其由阳尊阴卑、以阴从阳观念而产生的神煞，除了岁德合，还有岁干合、月德合、岁支德、解神等。

临日依阳顺阴逆观念取义。其日，月建为阳则取建前三日，月建为阴则取建后三日，《协纪》评曰：“阳顺而前，阴逆而后，是为阴阳得位，其义尤吉。”（《协纪辨方书》卷六“临日”）也可以归属这一类。

2. 根据三合、五合、六合以及阴阳和合理论创造的神煞。

三合是包括择吉术在内的所有阴阳数术学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理论。它取十二支五行发展之生、旺、墓以成合局，反映事物发展中新陈代谢的规律，可以说是最好地体现了易学“阴阳和合”、贵和之观念。而且在方位上，三合正好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故《协纪》盛赞十二辰之三合：“固天地之道所由及于人之端欤。三方既立，五行以之终，以之始，四序以之生，以之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理之自然，至粗而至精，至近而至远，至微而

至钜，至庸而至神，其唯三合之义欤！”（《协纪辨方书》卷六“三合”）

故在择吉术中，由三合之义而生的神煞很多。其中，从岁支三合产生者，有岁马、岁刑、三合前方、三合后方、劫煞、灾煞、岁煞、伏兵、大祸、坐煞、向煞、天官符、大煞、黄幡、豹尾、灸退。由月建三合而取者，有天道、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月空、三合、五富、临日、驿马、劫煞、灾煞、月煞、大时、游祸、天吏、九空、月刑、五墓、九坎、土符。

由五合而得者，有五合、五离等。

由六合而得者，有六合、月害等。

前述岁德、岁德合、岁支德，也符合五合义理。三者均从五合取义，而五合实源出河图。河图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其两数之差均为五。甲与己、乙与庚、丙与辛、丁与壬、戊与癸，两干之隔亦为五，故甲与己合，乙与庚合，丙与辛合，丁与壬合，戊与癸合。由此可知，岁德、岁德合、岁支德，既得阴阳之道，又合河图易理，故此吉祥。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根据阴阳合和理论而创造的神煞，主要有阴阳大会、阴阳小会、行狼、了戾、孤辰、岁薄、逐阵、阴阳交破、阴阳击冲、阳破阴冲、阴位、三阴、阳错、阴错、阴阳俱错等。

3. 根据阴阳“得位”、“得中”理论而创造的神煞。

《周易·系辞传下》说：“二与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十分重视阴阳的“得位”、“得中”、“得时”、“得正”。

根据这一观念创造的择吉神煞主要有：阴将、阳将、阴阳俱将、阴阳不将等。其中阴阳不将最具代表性。

阴阳不将是堪舆家的吉日。其法，以月厌及其所对之辰为标准，凡厌前干支相配合者为阳将，厌后干支自相配者为阴将，厌后干配厌前支者为阴阳俱将，厌前干配厌后支者即为阴阳不将。前三者或纯阳无阴，或纯阴无阳，或阴阳乖舛，故不吉祥。阴阳不将则干在前，支在后，干支“得位”，阴阳和合，所以吉祥，凡事可用，尤宜嫁娶。

4. 根据阴阳过极则不吉理论而创造的神煞。

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泰极而否。在《易》中，凡属过中而极者，多为不吉。如《乾》之上九“亢龙有悔”；《坤》之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比》之上六“比之无首，凶”；《泰》之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噬

噬》之上六“何校灭耳，凶”，等等，都是以“过”、“极”而由吉转变为凶。

择吉术中根据阴阳过极则不吉而创造的神煞为数不少，主要有：三刑（即子刑卯、丑刑戌、寅刑巳、卯刑子、巳刑申、未刑丑、申刑寅、戌刑未、辰、午、酉、亥为自刑）、岁刑、月刑、日刑、上朔日、死符、大煞等。譬如：

上朔日：“恶其阴阳与德俱尽也。”（《协纪辨方书》卷六“上朔”）

死符，居岁前五位，《易》曰，“天数五，地数五”，数至五而极，故为死符。

所以择吉取用，临官吉于帝旺，因为临官为方盛，而帝旺则太过了，紧接着就是衰、病、死、墓、绝。帝旺以其过旺，被称为大煞，不吉。

5. 根据阴阳四时发展变化之序与理而创造的神煞。

依据这一原理而创造的择吉神煞数量也不少。主要有：

天赦、母仓、四相、时德、王日、官日、守日、相日、民日、四击、四忌、四穷、四耗、四废、五虚、八风、五墓、建除十二神，等等。这是月神。

四离、四绝、气往亡等，这是日神。

日建、日合、日马、日破、日害、日刑、青龙、明堂、天刑、朱雀、金匮、宝光、白虎、玉堂、天牢、元武、司命、勾陈等，这是时神。

以上所有神煞，均依阴阳四时发展变化之序与义理而得。譬如：

四离，取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各前一日；

四绝，取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前一日；气往亡，取立春后七日，惊蛰后十四日，清明后二十一日；立夏后八日，芒种后十六日，小暑后二十四日；立秋后九日，白露后十八日，寒露后二十七日；立冬后十日，大雪后二十日，小雪后三十日。

6. 根据五行生克之理而创造的神煞。

主要有：宝日、义日、制日、专日、伐日、八专、触水龙等。

《淮南子·天文训》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以制击杀，胜而无报。以专从事而有功。以义行理，立名而不堕。以宝畜养，万物蕃昌。以困举事，破灭死亡。”《淮南》之困日，后世改称伐日。

(三) 源非阴阳易理而实相通的择吉神煞

在择吉术中，有一类神煞，从表面上看，与阴阳易理的联系似乎不太直接，甚至全无联系。但若仔细稽考，与阴阳易理仍然是相符合的，只是由于流传时间过久，其真实本义已被淡忘罢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杨公忌日与百事忌（又称百忌日）。

杨公忌日在历书中是固定的，依次是：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二十九、八月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共十三日。出行及其它行事忌杨公忌日，自汉以来已有其俗。

杨公忌日有无道理？《协纪》认为“邪说诬民，莫此为甚”，故将其置于“辩伪”辟之，弃而弗取。天文学史及灾害预报学家张巨湘先生对此曾作过深入研究，认为杨公忌日是黑道凶日的另一种天文表述，指回归月中南北两个下降段，这期间由于月回归转折导致地球极低频谱的变化，人体易于出现共振性兴奋（表现为烦躁和抑制），容易导致事故发生。^①

由此可见，杨公忌日依然是日月运动、阴阳变化规律的反映，世人信从它，忌为百事，用《周易》的话来说，就是“法象天地”，乞求吉祥。

百事忌日等亦与易理易道相符合。^②

(四) 纷纷神煞，归于易理

择吉神煞虽说纷纷杂杂，名称怪异，然终不出阴阳易学之理。若与阴阳易理不合，甚至乖舛违逆，则可像《协纪辨方书》和《诚吉述正》一样，定其为“伪神”、“劣煞”（多为历代庸师所捏造），辩之辟之，弃而不用可矣。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已经看到，择吉术的所谓神煞，不过是天地自然日月五星阴阳四时运行变化的规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神煞就是这些规律或关系的代名词，并不是真的有叫做某某的神或煞存在。再举几例说明之。

例一，阴府太岁，《协纪》说：“按阴府太岁，乃本年之化气克山家之化气，开山忌岁月日時克坐山，故名之曰太岁，示不可犯耳，非另有阴府之太岁在某山也。”即把年干的化气克坐山化气这样一种关系叫做“阴府太岁”，

①详见本书第九章相关部分。

②详见本书第九章。

以示不可触犯之意，并不是真有一个叫做阴府的太岁在某山之上。

例二，太岁。上古以岁星（木星）纪年。由于岁星由西而东右行于天，与地支的方位秩序正好相反，使用起来不方便，所以天文家假设一个假岁星，让它与真岁星背道而驰，以便纪年。这个假星就叫太岁。岁星十二年行一周天，一年行经一次（十二次之一），因而太岁就成为岁星运行规律及其方位的象征，被人看作是“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总成岁功”的一位大神，统领诸神，是人君的象征。并不是真有一位叫做“太岁”的神灵。但当太岁因象征因岁星而具有尊意之后，它所对冲的方向就不吉利了。因冲而破，所以与太岁对冲的方位叫做岁破。破即耗散，所以又叫大耗。《协纪》说：“若夫岁破之义，亦言其方为岁所破，而非有岁破之神破太岁也，故又名之曰大耗也。”（《协纪辨方书》卷三“岁破”）即岁破大耗也不是真有其神。

例三，月建。贾公颜疏《周礼·占梦》说：“建，谓斗柄所建，谓之阳建，故左旋于天。”^①正月初昏斗柄指寅，叫建寅。以后一月一位，顺行十二辰。因此，月建实际上是古人用斗柄确定节令和方位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说真有一个神煞叫月建。

其余纷纷神煞，莫不如此。

因此，择吉神煞是天地自然日月五星运行（通过阴阳五行体现）的规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其实质，则是阴阳之运动与变化，是易学所揭示的天地宇宙之理。《协纪》说：择吉神煞之所以有吉凶，“皆本年月日神所喜所忌之阴阳五行以为断，或以三合五合言，或以六合六冲言，或从纳音纳甲言，或以卦位方位言，或以旺相休囚言，千变万化，要皆不离乎此。”（《协纪辨方书》卷六“九神总论”）

四、择吉方法众多，无出阴阳

择吉之法，极为繁杂。习其术者，每谓选择为诸数术之最难者。因为其它各方术多为单一，唯选择之学，必得易学、奇门、六壬、堪舆、子平、阴阳五行诸术均了然于心，然后才能运用自如。尽管如此，其基本要旨，仍不外乎阴阳五行之理，不违易道。

^①《周礼注疏》卷二十五，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7页。

（一）总纲：天星、地理与年命三全齐美

择吉选方以造葬为大端，而造葬选择之法首推造命。所谓造命法，亦称子平法，系以干支历法为基础，运用子平排四柱八字的方法取格局财官、禄马贵人，以四柱配合补扶龙山主命，并选择值吉星避凶神的课格。意即根据龙山所属五行，以四柱补扶之，将可以夺神功改天命，所以称其法为“造命”。相传此法为唐时杨筠松所创。

郭璞《葬经》说：“天光下临，地德上载，藏神合朔，神迎鬼避。”这十六个字基本上包含了造命法体与用两大方面。

所谓藏神，指收藏地中元神。方法是，选择四柱八字，使干支纯粹，成格成局，以扶补龙气，由此则地脉旺盛而上腾于坟、宅之中。这就是“藏神”和“地德上载”了。这是造命之体。

所谓合朔，指取初一日太阳太阴合照之义，举一以该百。方法是，取三奇三德金水紫白贵人禄马到山到向，自然可获吉庆。这就是“合朔”和“天光下临”了。这是造命之用。

但是，假如犯动凶煞，仍会招祸。所以，必先于年月之内推求山向吉神相迎，一切岁破、三煞、阴府等凶煞尽行退避不相干犯，才为全吉。这就是“神迎鬼避”了。这也是体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体用兼备为上，否则，宁可舍用取体。

《选择宗镜》所说更详：“造命之法，一看来龙宜何局以补之。二看山向何煞宜避，何煞可制，以何法制之，取何吉星照之。三看主人本命宜何如以扶之。三者得而后举事，吉无不利矣。”（《协纪辨方书》卷三十三引）《再有一点，那就是修吉方则择吉方旺相之月而扶持之，此如培植善事；修凶方则择凶方休囚之月而克制之，有如收降盗贼，一定要我强彼弱对方才能为我所用。这便是选择造命的基本法则。

以上两家所言，即为择吉选方之总纲。《选择宗镜》明言必须同时关照到天星、来龙山向与主命三个方面，才能得吉获佑，显然就是追求天、地、人三者之周备合一。《葬经》虽未提到“人”，但“天光”与“地德”的合德，神与鬼的迎与避，都必须由选择者推四柱八字（一般而言，选日子推八字，必须考虑与主命不冲不克，相生相旺），才能求得，则“人”便已包含其中了。因此，择吉所追求的，正是《周易·乾·文言》所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二) 制煞、化煞要法

择吉神煞，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力量大小不同，吉凶相异，在一日当中，往往是吉凶神煞同时存在。懂得取舍和权变原则非常重要。

关于择吉用日的取舍原则，《协纪辨方书》说：“凡吉足胜凶，从宜不从忌；凡吉凶相抵，德喜之事仍忌。若吉不足胜凶，则从忌不从宜。”（《协纪辨方书》卷十“宜忌”）就是说，在一天之内，神煞总是有吉有凶。从数量上看，如果吉神多则吉，凶神多则凶；吉则从宜，凶则从忌。从力量大小强弱看，如果吉神力量强大，足以战胜凶神，则此日为吉，可以从宜；相反，如果凶神的力量压倒了吉神，则此日为凶，从忌不从宜；如果吉神与凶神，二者在数量、力量上均相当，那嫁娶、开市立券、动土兴造、上官赴任之类的“德喜之事”仍需避忌，余可不论。并非一遇凶煞，不论轻重主次都一概回避。

对于众多神煞，不仅要懂得如何取舍及权变，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制煞与化煞之法。下面对这两种方法略作介绍分析。

1. 制煞之法

所谓制煞，就是制服克我之煞。总原则是：“大煞避之，中煞制之，小煞纷纷，不必拘忌。”取吉星照之即可。《选择宗镜》说：“坐三煞向太岁，此不能制者也，不可犯也。三煞在方在向及阴府在山，此可制而不易制者也，不可轻也。其余纷纷神煞，中煞制之，小煞不必制，有吉星同到，自能压伏。”（《协纪辨方书》卷三十四“制煞要法”引）因为太岁是神煞中最大最尊者，只能坐而不能向。

制煞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曰干犯干制。如阴府太岁、天金神，均可以干制干；

二曰支犯支制。如地官符之类，择其死月死日修之即可；

三曰三合犯三合制。如三煞、打头火、天官符之类，以三合局克之即可；

四曰纳音犯纳音制。如年克山家、地金神之类，以四柱纳音制之即可；

五曰坐宫犯者坐宫制。如病符、小耗及年家之不飞者，以年月日吉星照之即可；

六曰飞宫犯者飞宫制。如月家打头火，以月家一白或壬癸水德制之即是。

制之之法，即根据凶煞的五行，以其相克者制之。煞属金，以火制之；属木，以金制之；属火，以水制之；属土，以木制之；属水，则以土制之。所谓“金往克木，火复其仇；火既消金，水雪其耻”，即此之意。制煞之关键

在于月令。即一定要在凶煞衰月，制神旺月才可，切不可用煞之生旺。

2. 化煞之法

打个比方，使用制煞之法，好像是以力服人。如果力不能胜，反而大张其焰；即使能够降伏，也只是不敢为祸。因此，制煞不如化煞为高。化煞犹如以德服人，使凶顽格心，浪子回头，不但不敢为祸，相反还可以致福。故古人云：“制煞何如化煞高。”

化煞之法，大略有三种。

一是用煞之食神子孙局，将煞转化为生我之恩。如煞属木，用火局，使木生火以生土，则其贪生忘克，反为恩中之恩。

二是用煞之比肩同类局，将煞转化为我的比辅之神。如煞属水，用水局，则同类相亲，一化而为比辅之神。

三是将煞转化为我的禄马贵人。如煞在寅，用甲日，年月日时四甲更妙。甲禄在寅，煞即转为我之禄；甲命用之，又为生命之禄；甲山甲向用之，并为山向之禄。

将煞转化为马者，如煞在亥，用酉日，或巳丑日，年月日时合巳酉丑局更妙。巳酉丑马在亥，煞即一变而为我之马；巳酉丑命用之，又为生命之马；巳酉丑山向用之，并为山向之马。将煞转化为贵人者，如煞在申，用乙日或巳日，年月日时合四乙四巳更妙。乙巳贵人在申，煞即一变而为我之贵；乙巳命用之，又为生命之贵；乙巳山向用之，并为山向之贵。

如此之类，反作吉论。

总而言之，不论是制煞，还是化煞，都是巧妙应用阴阳易理，使凶神化为吉曜。而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祈求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五、择吉之旨，协纪辨方

《周易》是讲变易的书，变主要就是时之变，因此，讲变就必然讲时。“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而时与空始终处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因此，《周易》中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标准和规定，一切都“唯时所变”，一切都依变化而定。正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亦即程颐《易传》所说的：“《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程颢、程颐《程氏遗文·补遗》“周易程子传序”）

天为阳，地为阴；乾为阳，坤为阴。天动地随，乾动坤随；天以时行，

地亦以时行。所以《周易·坤·文言》总结说：“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坤道即人道，因为人生存于天地万物之间，也必须顺从天地运行之规律。所以《周易·系辞传下》说：“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并且把那些充分认识自然规律，能够顺应自然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由的人称为“大人”。《周易·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他们由于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使之能够审时度势，由必然王国进入到了自由王国。这当是《周易》所追求和向往的最高境界。

择吉神煞以一定的天文运动为背景，是天地自然和阴阳五行运行的规律以及它们相互间各种关系的反映；神煞的吉凶，是依据它们顺应还是违背天地自然的运动规律及阴阳之道来决定的，顺天为吉，逆天为凶。因此，择吉术根据神煞择日选方，实际上就是根据天地自然的客观规律及阴阳易道来办事；择吉术是一门尊崇自然、顺从自然之序，讲究人类的行为与自然平衡和谐的数术学，是一门以敬天顺时为宗旨安排各项人事活动的行为理论系统。^①

择吉术的宗旨在于敬天顺时，按天时安排人事。《协纪辨方书·序》云：

“天以日月行四时，人奉天而时。若向明而治，向晦而息，后王君公所以奉若天道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群黎百姓所以奉若天道也。否则不能晨夜，不夙则暮，诗人讥焉。人人所知也。然则举大事，动大众，协乎五纪，辨乎五方，以顺天地之性，岂无分寸节解以推极其至精至微之理者欤！其支离蒙昧拘牵谬悠之说，乃术士之过而非可因噎而废食者也。”

《尚书·洪范》言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所指就是时间。由此，《协纪》所说就是：天通过日与月的运行而形成了春夏秋冬四时，人崇奉天道敬顺其时。黎明而治理天下，晦黑而休息，这是王公大臣们所奉的天道。日出而下地劳作，日入而上床歇息，这是黎民百姓所奉的天道。否则，时序就会颠倒。这是人所共知的。凡是大兴土木、大发徭役、征调军队之类兴师动众的大事，必须考察时间与方位这两大要素，以顺应天地之性。这里边包含着极其深奥的道理。至于其中的虚妄不实之说，都是无知术士的捏造。

择吉术反映的是一种阴阳之道、天地之道和自然之序。择日选方的根本在于顺天、敬天，在于把握时空机遇，它与《周易》“藏器于身，待时

^①参见刘道超《择吉民俗之特征与性质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3期。

而动；”“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择吉办事，由于顺应了天地之道与阴阳之道，故而容易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达到成功的彼岸。反之，事情的进展就不会那么顺利，甚至会出现挫折、失败乃至殃祸。但这仅仅是一种逻辑结果，择吉并无绝对的吉凶。即如《协纪辩方书》卷三所说：

“凡以血气心知之性，必合诸虚灵不昧之天，而后天下之理得使足已。而不问，则未事而先失也。选择之义亦犹夫是。天地神祇之所向则顺之，所忌则避之。既奉若于宫廷以彰昭事之忱，又申布于闾左以协休嘉之气。凡以敬天云尔。如曰若是则福，不若是则祸，则术士之曲说而非其本原也。”

就是说，人类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员，应该使自己的行为合乎天地之大理，即所谓“合诸虚灵不昧之天”。按照择吉术择日选方，其实质就是崇敬自然，按照天地自然的规律办事，“天地神祇之所向则顺之，所忌则避之”，否则，将会“未事而先失”。但既然神煞只是某种规律或关系的反映，按择吉原则择日办事，就不应有绝对的吉或凶。其实质不过是“敬天”，即崇敬天地造化之序。如果说择吉而行事则能获福，不择吉而犯禁就会招祸，那就是术士的歪曲夸大而非择吉术的本原了。

但是，由于择吉术体现的是一种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因而不能不对人产生影响。所以《协纪》序又说：“虽然，敬不敬之间，吉凶祸福随之矣。”就是说，尊崇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获得理想的结果。反之，如果不尊崇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招致凶祸。当然，这两种作用只表示一种趋势，一种逻辑性的长效影响，而不是一做某件事马上将会如何如何。譬如人们过量砍伐山林，破坏植被，滥捕滥杀，短期内，非但看不到什么“报应”，相反还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时间一长，水土流失，水旱不时，气候反常，水源枯竭，土地沙化，渔业资源消失等等由于生态平衡遭受破坏而导致的恶果就会一一显露出来。相反，如果我们注意保护山林，培养植被，“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有计划有节制地开采捕猎，其短期效益似不及前者大，但却可以获得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大自然生生不息，取之不竭。因此，从总体而言，择吉术体现的主要是一种长时效的作用。

先哲创设八卦易学的目的或根本愿望是指导民用。《周易·系辞传上》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所以六十四卦，都是先探讨天之道，后言民之故，然后指出君子当如何如何。一切都是为了治国安民的实践，为了百姓日用。并且将这种“推而行之”、“举而

措之”的实践活动，谓之“事业”。

如果我们承认择吉是易学之“支派”，承认择吉是中国百姓应用最为广泛、最为经常的行为指南，我们就应当承认，择吉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将八卦易理及其所蕴含中国文化精神“推而行之”、“举而措之”最为主要的途径之一。因此，我们在努力从事易学研究伟大事业的时候，亦应对择吉术或择吉民俗的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将之纳入易学研究的范畴之中。

第四章

依时而作的生产民俗

《周易·系辞传下》说：“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一段话讲了易卦与制器及众多发明的关系，以为古人创作制造的器物都根据卦象卦义得来。这种说法，当然是颠倒了本与末的关系。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任何一项发明创造，任何一种物质文明的创建，都是在一定思想文化的影响或指导下进行的。易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必然对物质文明的创建和发展发生或显或隐的影响。

事实上，我国丰富多彩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民俗，从发生、发展，到最终形成不同于其他文化系统的物质民俗特色，都离不开易学思想的影响，或是与易学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然，这种影响如同春雨润物，使人不易察觉。

一、动静不失其时的农耕民俗

1. 二十四节气授时指掌活法

《周易·豫·彖传》：“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

《周易》认为，凡经邦治国行师赏罚一切人事，都应该顺天而行。农业耕作，当然更不能例外。农作物因时而生，而荣，而收，而藏，受到“天”的严格制约。农事活动必须“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不失其时”，才能使“其道光明”。（《周易·艮·彖传》）因此，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顺应天时对农事活动的重要。《吕氏春秋·士客论·宙时篇》将之总结为：“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民间则用质朴直观的谚语表达这一认识。如：“人误天一时，天误人一年。”意思是说，若耕种失时，将一年没有好收成。“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耜（农具），不如待时。”（《齐民要术》卷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史记》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

因此之故，古人十分重视观象制历。就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看，至晚到《尚书·尧典》追述的时期，已有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只不过当时是用日中、日永、宵中和日短四个词来表示罢了。战国末年，《吕氏春秋·十二月纪》载有立春、日夜分（即春分）、立夏、日长至（即夏至）、立秋、日夜分（即秋分）、立冬、日短至（即冬至）八节。到汉初《淮南子·天文训》，就有了与现今完全一致的二十四节气名称及次序。在此前后，古代农书都以相当篇幅来讨论农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以指导农事活动。元代王桢，在前人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将与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相应的各种农事活动（包括农业生产、农副产品的加工制作等）汇集一处，制成一图，称“授时指掌活法之图”（载王桢《农书》）对农事活动的指导十分具体、直观。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历法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极其巨大。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就是依据二十四节气来安排各种农事活动的。因此，为了使二十四节气及相关农事活动的有关知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各地民众创作了不少时令节气诗。敦煌遗文伯二六二四《卢相公咏廿四气诗》与斯三八八〇《咏二十四气诗》，将二十四节气及相关农事活动逐一描述，十分生动。20世纪80年代，国家组织全国县市搜集编纂“三套集成”（即谚语集成、歌谣集成、故事集成），各地都搜集了大量的时令谚语。由这些调查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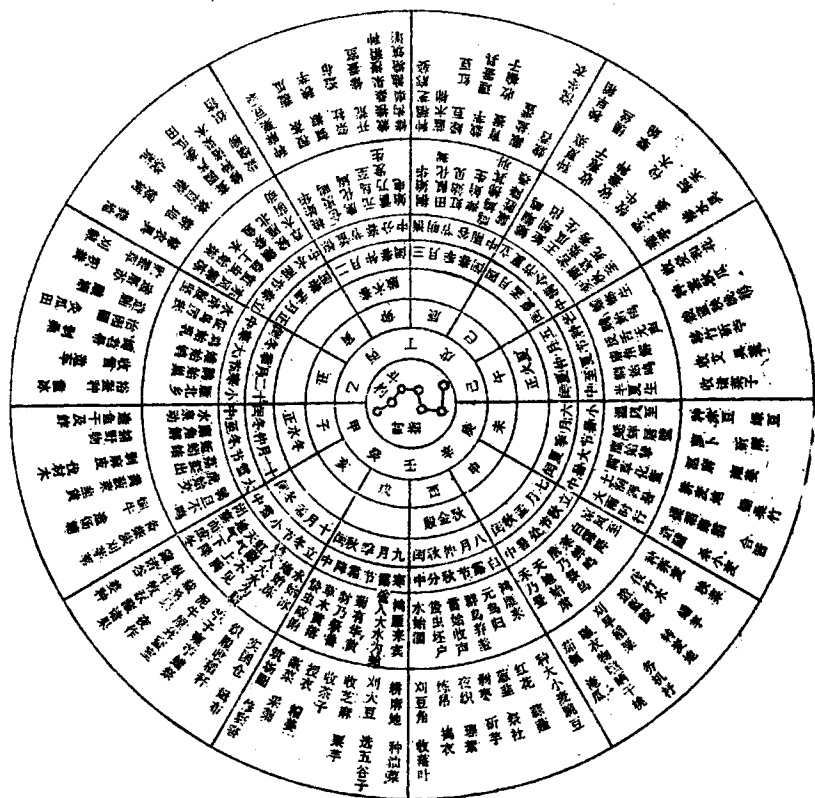


图 4-1 授时指掌活法图

得知，各地民众将二十四节气与当地特点相结合，创作了大量具体生动的节气谚语。如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关播种期的谚语有：

“寒露到霜降，种麦日夜忙”；

“秋分早，霜降迟，只有寒露正当时”；

“立冬不交股（分蘖），不如土里捂”。

——这是种麦的。

“清明高粱谷雨谷，立夏芝麻小满黍”；

“清明后，谷雨前，高粱苗儿要露尖”

——这是种高粱谷子的。

“清明早，小满迟，谷雨种花正当时”；

“清明玉米谷雨花，谷子播种到立夏”；

“谷雨前，好种棉”。

——这是种棉花的。

有关收获期的谚语有：

“麦到芒种谷到秋，过了霜降刨甘薯”；

“麦到芒种谷到秋，过了天社用镰钩”；

“谷雨麦怀胎，立夏麦胚黄，芒种见麦茬”；

“白露不秀，寒露不收（谷子）”；

“芒种不出头，不如拔了饲老牛（棉花）”……

这些形象而生动的节气谚语，农民们在歌之、咏之、传之的过程中，掌握了必要的天文历法知识，然后依时而耕，依时而种，依时而收，依时而藏，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民俗画卷。《周易》“天之所助者顺也”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真实最具体的实践。

2. 芒神与鞭春牛之俗

《礼记·月令》称：“孟春之月，其神句芒。”《吕氏春秋·孟春》云：“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太皞即伏羲帝，传说他以木德得天下，死后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而句芒，则为少皞氏之裔子重，辅佐木德之帝，死后为木官之神。

这位芒神，就是春天之神，称为句芒。在《山海经》中，他的形象是“鸟身人面乘两龙”，但在民间，则是一位吹横笛的牧童——笛声表示春之将至，所牧之牛表示农事将忙。



图 4-2 芒神图（采自《天地人鬼神图鉴》）

立春之后，民间有鞭春牛及张贴万象回春（春牛）图之习。刘侗《帝京景物略》载：“立春候，府县官吏具公服礼句芒，各以彩杖鞭牛者三，劝农也。”其实，民以食为天，只要收成能够归自己，何用当官的来劝！所以届时各地民间都有祭春牛的活动。他们用桑柘木为胎骨，制作春牛形象和句芒神像，其尺寸形状颜色均符合自然节气数字，以及阴阳甲子规律，如寅申巳亥年芒神为老人像、辰丑未年芒神为童子像，而春牛的形象则具有预测当年农业丰歉的性质。清代凤翔一带百姓，立春后纷纷在窗旁贴上万象回春图。

左有天官与象，天官赐福，象为吉祥，亦代表“万象”。其辞曰：“新君登了位，天下太平年；到处五谷丰，白象人人知。谢天唱大戏，拱手念阿弥。”据说只要念了这几个字，便可得到佛的保佑。

右有芒神与牛，表示春天来了，农事兴旺。其辞曰：“今日打了春，年成保十分；庄稼收的好，买卖发黄金。升官升一品，富贵万万年。”此后，便开始了一年一度依时而耕、依时而种、依时而耘、依时而收，“时行则行，时止则止”的农事活动。

二、合乎天时、不妨农事的田狩古俗

中国以农业为本，渔猎田狩一直是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这一方面是为了平衡和完善饮食结构，解决肉食的来源，同时也是祭祀和接待宾客的需要。

远在三代之时，帝王就有四时田狩之礼俗。据《周礼》记载，帝王四时田狩，各有名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猕，冬曰狩。《礼记·王制》说：天子诸侯若没有战争或丧亡等大事，每年要举行三次较大规模的田狩活动，谓之“一岁三田”。田狩的目的，一是用于祭祀宗庙神祇，二是为了招待宾客，第三是改善和充实庖厨，君王自己享用。国无大事而不田狩叫“不敬”，田狩不以礼则是“暴殄天物”。这段记载，反映了周代帝王四时田猎的基本情况。

“一岁三田”，据孔疏解释，是因为夏天正是万物长养之时，田猎将有所伤害，同时夏禹以仁义让得天下，不欲触其名，故夏季不田。所谓“无事”，是说无征伐及丧凶之事，否则就是不敬天地祖宗和怠慢宾客。“田不以礼曰暴殄天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田猎不可无所顾忌地滥杀，即不可“合围”、“掩群”，斩尽杀绝；春猎不要屠杀初生的幼兽及倾覆鸟兽之巢，即《礼记》所说：“君王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麋卵；”（曲礼下）“不麝不卵，不杀胎，不斫夭，不覆巢。”（王制）二是田猎必须在农隙之时进行，不

可妨碍农事。《左传》隐公五年：“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如果无故不举，或是妨碍农事，都是违礼逾制，就会受到时论的谴责。南朝沈约《均圣论》说：“春蒐免其怀孕，夏苗取其害谷。”这是说，春夏二时属阳，万物滋长繁茂，不宜伤害妨碍之，所以春天只猎取不孕者，夏天则择其有害于谷物者。



图 4-3 万象回春 (春牛) 图(采自《天地人鬼神图鉴》)

秋冬二季则不同。其时属阴，万物成熟，正当收杀。故《左传》隐公五年注称：“獮，杀也，以杀为名，顺秋气也。”与冬狩一样，都是“取之无所择也”。（《周礼·夏官·大司马》注）但都不能“合围”、“掩群”，不能赶尽杀绝。

上古帝王四时田猎的礼俗，充分体现了阴阳易理“顺时”、“重生”的宗旨。后世我国各族田猎，也都继承了这一精神，依循四时之序与阴阳之理。

《说郛》卷五《使辽录》载契丹习俗：正月钓鱼海上，于冰底钓大鱼。二月三月放鹞在海东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六七月于阴凉处避暑，八九月打虎豹。“自正月至岁终，如南人越时耕种也。”

1988和1989年，我到广西大瑶山搞民俗调查时了解到，瑶族一直保留着依时狩猎的习俗。平时从事农业生产，等到秋收已毕，才收拾猎具，三五结伴，进山打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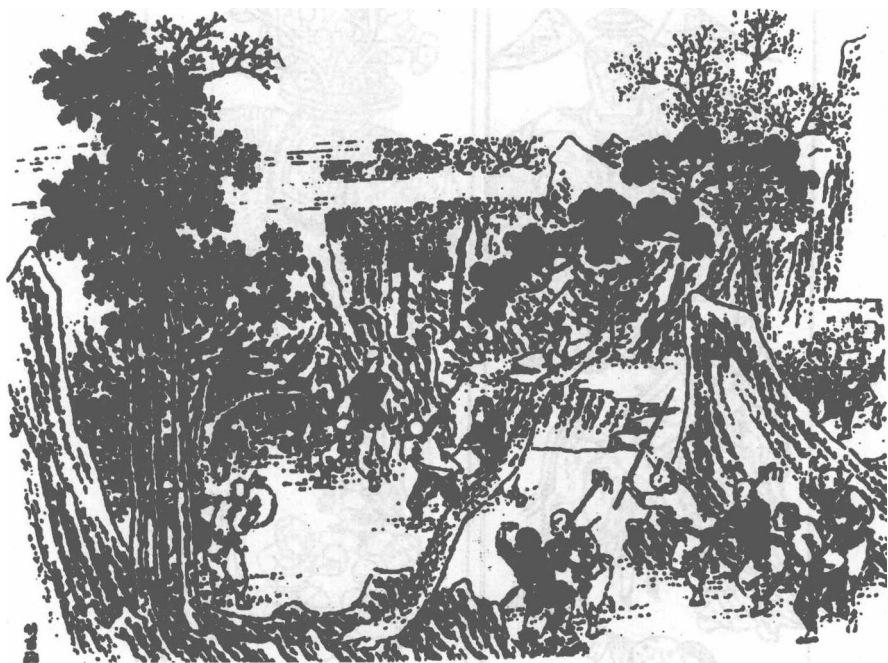


图4-4 猎虎图(采自《三教九流大观》)

三、顺乎天时、尽乎物理的伐木民俗

《孟子》说：“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淮南子》说：“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淮南子·主术训》）根据天时和树木的物理特性以砍伐木材，是我国延续已久的习俗。

《周礼·地官·士训》说：“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山南为阳，山北为阴，冬天斩长于山南之木，夏天斩长于山北之木。这是根据阴阳义理顺应天道来砍伐木材，并不考虑木材的坚硬程度和虫蛀情况，但同时强调，要根据需要和时令来砍伐木材，即“以时入”、“时斩材”。

《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孟夏之月，“无伐大树”；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春夏为阳，主生，树木生长正盛，故禁砍伐；至秋冬草木黄落，这才根据需要适当砍伐。其关于木材砍伐的规定，则既考虑了天地阴阳之理，又顺应了木材的物理特性。

《齐民要术》卷五“伐木”说：“凡伐木，四月七月则不虫而坚韧。榆莢下桑椹落，亦其时也。然则凡木有子实者，候其子实将熟，皆其时也。”注：非时者虫而且脆也。即伐不当时，木材容易生虫而且发脆易断。

《农桑辑要》卷六“伐木”引《四时类要》：“十二月斩伐竹木不蛀。”卷七“岁用杂事”引《四时类要》：“四月……此月伐木不蛀。”

1988至1989年间，我到广西大瑶山调查，瑶民也告诉我，木材，尤其是竹子，如果不按照一定时间去砍伐，就容易生虫。具体时间，一般是每年农历的四月和十一、十二月。问其何故？则说不知。其实，瑶民所说与《农桑辑要》的记载正好一致。

看来，《周易》所说“天之所助者，顺也”，确实是对先民大量生产和生活实践进行归纳总结之后，才提炼出来的金玉之言。人生长于天地间，只有顺应天地之道，“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动静不失其时”，才能物尽其性，人获其用，“其道光明”，无所不利。

四、善用事物生克特性的种植习俗

《周易·系辞传上》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万物非阴即阳，均有五行之性。物与物之间，或因性质相同而相生相长，或因性质相反而相制相克，此必然之理。民间经过长期观察和实践，巧妙利用物与物之间相生或相克制的特性，形成了许多生产习俗。比如：

果木嫁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到宋代，在果木嫁接方面已经形成了十分成熟的技术经验。张世南《游宦纪闻》和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了多种果木、花卉的嫁接方法。其中果木有柑橘、桃、李、杨梅、枣、梨、杏、栗子、荔枝、棉橙、柿等；花卉有梅、蔷薇、紫薇、柳树、木樨、菊花、海棠等。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记载了他在北京（今河北大名）一座寺院的梨园看到的将梨树与枣树嫁接的方法：先把棠梨木种在枣树旁边，继取品质较好的梨条，接于梨木上，长好后，于枣木大枝上凿一窍，将接活后的梨条移栽其中，经一二年生长接合，即砍去枣木其余枝条，如此结出的枣子，“甘而美”。

张世南记载的嫁接法更丰富。其中浙江永嘉朱栾（最好的一种柑子）的嫁接方法是：先取朱栾核洗净，下肥于土中，一年之后长成，名曰“柑淡”，根系十分繁茂。次年移植，使果树的间距更为疏阔。又一年，树干大可盈握，到春天之时，则取柑之佳品，或是橘之美者，嫁接于木身，则全部变成佳品了。（《游宦纪闻》卷五）还说果木嫁接的基本要领，是要在嫁接时，将头与本身，皮对皮，骨对骨，用麻皮紧缠，上用宽箬叶覆盖。如果萌出的新芽稍见长大，即可撤去箬叶。运用这种方法，没有不成活的。（《游宦纪闻》卷六）

洪适《盘洲文集》卷六《观园人接花》诗极赞宋人果木嫁接技术之妙：

植杖看园吏，挥斤接果栽。

夺胎移造化，类我借根荄。

一似雀为蛤，能令桃作梅。

天工待人力，信手便春来。

如果说果木嫁接，是利用事物相近相通的特性，收取相生相成以改变或提升果木品质的话，那么，用蚁防虫害，就是利用事物相反相克的特性，以收取除弊兴利的功效了。

宋人庄绰《鸡肋编》卷下载，宋代的广南地区由于地少人多，乡民大多种植柑橘以谋生，果实常为小虫所害。有一种蚂蚁，可食其虫。凡柑树有蚁，则虫不能为害。于是有人专门收集这种蚂蚁，卖给种柑园户。这种方法，现

在已经发展成一套生物防治技术。

民间在米缸里放些大蒜以防虫，在性热的柑橘中放些性凉的绿豆以延长储存时间，用艾草驱逐蚊蝇，用茶枯洗头，用角皂洗衣物，“杨桃枝去粘，阶芥子入豆酱不生虫，牛乳去油衣粘”，（龙明子《葆光录》卷一）“肥皂淹铁索，过时可断；葶荠淹铜，过夜即烂……以艾叶投燕巢，不复来……驼粪烟可杀蚊虫壁风；槐树生虫，擂鼓于下则尽落。”（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七“食用制法”）凡此种种，都是民众对事物相克特性的杰出发现和应用，处处都洋溢着易的思想智慧。

旧时爪哇民间有一种习俗，可称之为“作爱丰产法”。每当水稻、小麦或棉花等农作物扬花吐蕊，在夜幕降临之后，农家夫妇便相携来到田间，带着对未来丰收的憧憬，欢欣作爱。他们以为，如此便能感染农作物，使之丰产。我国民间则有夫妻一同点种芝麻的习俗，以为如此则子实而产丰。这种习俗在中国还不少见。譬如，傈僳族、彝族民众，在稻子扬花时，禁在其旁洗衣、剥麻，以为会使其花受惊而导致减产。这些是交感巫术观念作用的结果，认为同类事物可以相感相生，与《周易》天下万物“感而遂通”观念颇有相通之处。

现代研究发现，和谐的家庭，花卉易于开放；播放音乐，有利于动植物生长。如此，夫妻在庄稼地里作爱及一同点种诸习俗，是否真的有益于农作物的增收？是否真的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我想，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将是十分有趣的。

五、巧用事物生克特性的渔猎习俗

利用事物之间或生或克的不同特性，产生了许多渔猎生产习俗。

据朱弁《曲洧旧闻》卷三记载，早在宋代，河南地区的溱水、洧水流域，当地百姓就有煮泽蓼以“醉鱼”的习俗。每到冬天，潭水枯少，百姓即采集泽蓼，捣碎后用火煮开，然后撒入深潭中，鱼食后晕旋如死，浮上水面，便可随意拾取。但需及时，时间一久，鱼便会苏醒复活。这种活动称为“醉鱼”。

泽蓼即水蓼，又称虞蓼，或蓼哥。《本草》说其无毒，但对鱼却有极好的麻醉效果。记得小时候，家乡父老仍不时采集蓼哥煮水以“闹鱼”。每当其时，小孩子们即尾随前往，在潭边巡看，幸有被“闹”得晕头转向的鱼漂撞

到跟前，便可以扎扎实实地高兴一两天。看来这种习俗的流布还颇广远。

利用动物自身的习性以捕猎之，不论东西南北，所在均有。

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四记载说，松花江畔的猎鹿者，常以一种河鸟的胫骨作管，以鹿心上的脂膜作簧，吹作鹿声，能够发出大鹿小鹿的不同叫声，和牝鹿发情时的鸣声。公鹿们往往闻声群集。这时，猎鹿者即以弓箭射杀之。猎获十分丰厚。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三载有各种捕虫鸟之法。一是竹鸡之性好斗，遇其俦必斗。捕猎者即打扫落叶以为城，将媒子置于其中，自己则操网隐身于后。媒鸟啼鸣后，公竹鸡闻声，一定循声飞至，并且是闭目冲入城中，欲与媒鸟决斗。捕猎者即将网撒起，可怜的竹鸡，很少能脱出罗网。二是麝鹿之性，怕人见其行迹，不论远近都习惯于走同一条路。村民利用其习性，在其惯行之路路上，结绳为环，鹿足一踏，则倒悬于树枝上，村民即可生获之。三是江南蜂蛹好吃，但其穴难寻。当地人即以长纸带粘在肉末上，土蜂见之，必衔而入穴。捕之者乃尾随而至，用火熏其穴，即可轻取蜂蛹，美食一顿。

鸬鹚习性好斗，一般都是一只雄鸟占据一座山头，一遇其俦，必定拼死打斗。并且在靠近之时，都是步行奔袭。我们家乡的捕猎者，利用鸬鹚这一习性，预先布好机关套子，以媒子鸣叫逗引，鸬鹚闻声必定前来打斗，即中套被擒，变成捕猎者的盘中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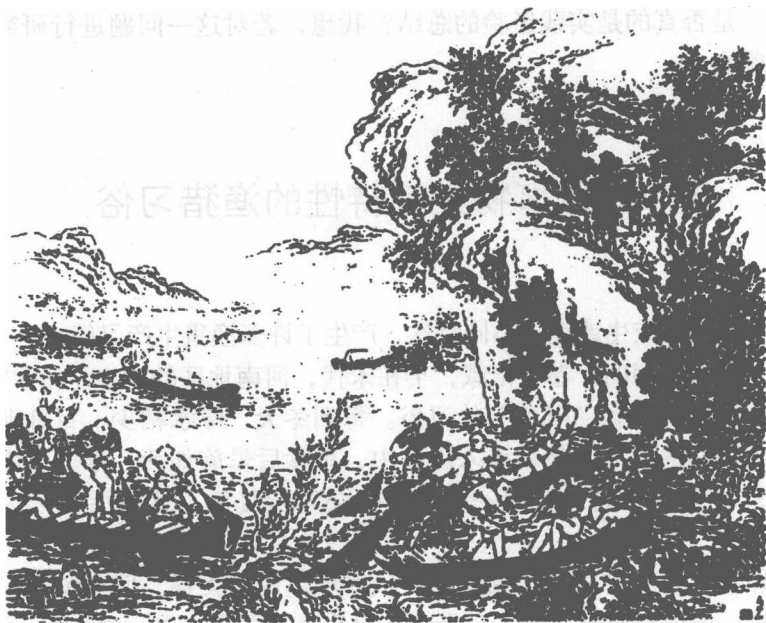


图 4-5 起网捕鱼（采自《三教九流大观》）

洪迈为之感叹：“虫鸟之智，自谓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如今，所有这些习俗都已成为历史，但当时，它们却是各地民众对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长期观察之后善加利用的结果，是人类智慧的显现。

《周易·系辞传上》说：“以是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百姓明于动物之性，捕之食之，“以前民用”，也是对易的精神的一种发挥吧。

六、以母仓为吉的种植择日习俗

我国民间有择日办事的习惯。种植牧养，事关一岁丰歉，一家饥寒，尤其重大，更是守之惟谨。

据《协纪辨方书》载，适宜于栽种、牧养的吉日有：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天赦、母仓、天愿、月恩、四相、时德、民日、开日、五富等日。

上述吉日，最受百姓推崇的是母仓。很多地区农民都有祭祀母仓的习俗。如黑龙江省绥化地区望奎县，在每年农历三月祭祀“母仓”。每至其月，各地农民选择时宪书之母仓日为农家开犁之吉日。是日，套犁杖至田间，一人执纸于犁前焚烧，放爆竹三个，焚香三枝，先埋熟鸡蛋数枚于陇内，以犁趟出，众人分而食之，谓之“祭犁”。^①一些地区则把母仓具体化为“仓神”（即主管仓库之神），岁时祭奠，以为可以使人由贫变富。

《协纪》引《天宝历》说：“母仓者，五行当旺所生者为母仓。如遇土王后，则以巳午为之。其日宜养育群畜，栽植种蒔。”（《协纪辨方书》卷五“母仓”）即春亥子，夏寅卯，秋辰戌丑未，冬申酉，土王后巳午。

“母仓”何以最宜“养育群畜，栽植种蒔”？以易理释之。春属木，喜水来生，故以亥子为母仓。其余仿此。不用干而用支，是因为支为地，为坤，“厚德载物”，万物所从生，既有母道，又有藏道。所以称之为母仓。

从生克义理看。木为亥子水所生，木成则水休；而母老则待养于子，故以仓为名。又，木生于水，木之所以能旺于春，是由于水来生，因此，木旺是因水而得养的，故以母为名。

再进一层。五行之理，我克者为财，而克我之由生者也是我之财。以母仓之日种蒔、牧养、纳财，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则以财物藏于生我之方，

^① 《望奎县志》，民国八年（1919年）铅印本。

可使财富有源，如江河流水永不匮乏；二则包含着对生我之方则宜致养之意，即报本返始，知恩图报；三则财物可以养人、富人，而多藏则克我之所由生，转而成为我之害，非所以为养了。《周易·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九三”作为天子的外臣诸侯，当其处于富有盛大之时，能将其所有朝献于天子，与天下分享，是正当的，可取的，故可获吉祥；而小人做不到这一点则凶。



图 4-6 母仓

由此可见，“母仓”以当旺所生者为吉，体现了《周易》“随时行止”的思想，“天助顺者”的思想，以及报本返始、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含义确实十分深刻。无怪乎《协纪》感叹：“母仓之义大矣哉！”

其余牧养种莳的德吉之日，也均以顺天时为宗旨，以阴阳易理为归依。再举四相、时德为例。

所谓四相，指四时旺相之辰。春木旺，生丙丁；夏火旺，生戊己；秋金旺，生壬癸；冬水旺盛，生甲乙。即以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日为四相日。

所谓时德，又称四时天德，为四序之德神，与四相同义。春木旺生火取午，夏火旺生土取辰，秋金旺生水取子，冬水旺生木取寅，即春午、夏辰、秋子、冬寅为时德日。

四相取天干，时德取地支。两者都是以当旺者所生为吉，此已见其顺时敬天之意。而且四相取天干则余庚辛二干不用，时德取地支则余申酉二支不用，均为秋令金辰。金主刑杀则弃而不取，正体现了“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之道任德不任刑”的易理宗旨，体现了在易学思想影响之下而产生的提倡仁政、德政的文化价值取向。当然，也体现了以择吉载道的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般精神。



图 4-7 四相

七、忌九焦九坎的种蒔禁忌习俗

在民间择日习俗中，有关种植、牧养方面的禁忌，战国时期的《日书》已有不少。后经历代传承，各种民间禁忌，不胜枚举。据《协纪辨方书》所列，主要有：月建、土府、月破、平日、死神、劫煞、灾煞、月煞、月刑、月厌、地火、大时、天吏、死气、四废、五虚、五墓、九焦、土符、地囊、乙日、土王用事后等。

综合分析这些禁忌之日，主要在于与四时之序相佐，与天道相逆。

如九坎，又称九焦。其在各月的安排，正月在辰，逆行四季辰丑戌未；五月在卯，逆行四仲卯子酉午；九月在寅，逆行四孟寅亥申巳。《协纪》引《广圣历》说：“九焦者，月中杀神也。其日忌炉冶铸造、种植、修筑园圃。”（《协纪辨方书》卷五“九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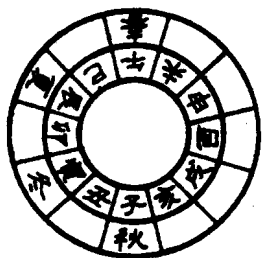


图 4-8 时德

为什么称九坎为“月中杀神”，必避之而后吉？原因在于它们与四时及天地之道相逆。如正、二、三、四月为岁首，居东方之位，当取孟辰以生万物，九坎则以四季辰收杀万物，这是与岁首“生”之特性相逆；五、六、七、八月为岁中，当用四仲辰成熟万物，但岁首已不与其生，至岁中岂能有所成就呢；九、十、十一、十二月为岁之终，万物收藏之时，九坎却以四孟辰欲“生”万物，这怎能有所长养呢？《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九坎与天地生长收藏之道相违逆，万物自然无所成就。所以忌种蒔、牧养。

再从五行三合之理看。寅午戌火月逆行辰卯寅（木），亥卯未木月逆行丑子亥（水），申子辰水月逆行戌酉申（金），巳酉丑金月逆行未午巳（火）。火逆于木则火成燎原，木逆于水则木多沉溺，水逆于金则水多搏击，金逆于火则金多烁销。所反映的，正是“五行胜复”物极则反的道理。《素问·五运行大论》：“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有胜之气，其必来复也。”不论是太过还是不及，



图 4-9 九坎九焦

都不好。水太过称为“溺”，火太过称为“焦”，故以“九坎”（八卦坎为水，险也）、“九焦”命之。所以民间不仅忌于其日种蒔、牧养，而且还忌铸造、苫盖、渡水等事。

再如五虚。通书以春巳酉丑，夏申子辰，秋亥卯未，冬寅午戌为五虚日，其日忌开仓库、营种蒔、出财货、施债负。

观五虚日之所取，实即五行的四时逢绝之辰。如春木旺，巳酉丑金绝；夏火旺，申子辰水绝；秋金旺，亥卯未木绝；冬水旺，寅午戌火绝。盖物绝则损朽，朽则虚，所以叫做“虚”，其日忌种蒔及经营等事。其义旨，也是以顺天（时）为吉，逆天（时）为凶。

总之，以上所述种蒔、牧养所宜所忌吉凶日，均以易理为归依，都是以顺天为吉，逆天为凶，以得时适中为吉，以失时过极为凶。可以说，民间种蒔及牧养吉凶日，就是将《周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最高理念付诸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限于篇幅，其余不再一一剖析。

十多年前，我在广西各地农村进行民俗调查，发现了好几种在清代抄录保存的择吉通书，载有不少关于种蒔及牧养的吉凶日。如开耕田吉日、浸谷种吉日、插田种禾吉日、吃新禾吉日、建新仓库吉日、纳六畜吉日等。其中大多仅注干支日，无所属年或月。而干支日离开了具体的四时年月，即难判断其吉或凶。故只能视为民间农耕生产用日俗信。但其所载“六合吉日”（实为五合）、“五离凶日”则亦与易理相合。

如其言六合（五合）吉日：“甲寅乙卯天地合，丙寅丁卯日月合，戊寅己卯人民合，庚寅辛卯金石合，壬寅癸卯江河合，大吉。”

五离凶日：“庚申辛酉金石离，甲申乙酉天地离，丙申丁酉日月离，戊申己酉人民离，壬申癸酉江河离，种蒔、娶妇忌用。”（各民间抄本所言“某某离”不同，但干支都一样。）

对于五合吉日与五离凶日，如如果仅仅以甲子旬不及戌亥解释，未尽其义。我们认为，实际上五合吉日就是寅卯，五离凶日就是申酉。

以四时而言，寅卯为春为和会之气，故为五合；申酉为秋为肃杀之气，故为五离。《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男女构精，化生万物”，万物之性，必须合才能相生相成，离则相乖无所成。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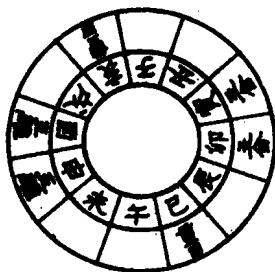


图 4-10 五合五离

民间以寅卯为五合为吉，其日宜种蒔及其它德吉之事；以申酉为五离为凶，其日忌种蒔及嫁娶、经营等事。与易理是相符合的。

八、生产经营中忌讳女性的习俗

我国民间在生产经营中忌讳女性的习俗不少，各地均有。兹举数例如下。

妇女不能从男子使用的犁、耙、锄、扁担、刀、枪等工具上跨过的禁忌，很多民族都流行。譬如说，女人不得跨过扁担。民间认为，扁担有神，就在扁担中，叫做“扁担大人”。所以平时扁担不能乱放、乱插，更不许女人跨过扁担。女人有意或无意跨过了扁担，不但用扁担的人要大骂她，连家里人也会齐声训斥她。据说被女人跨过的扁担再去挑物，用者的肩上要生毒疮；而跨扁担的女人，也要生阴毒。因此，在江浙一带，女人若无意中跨了扁担，得赶快回家烧糖茶来将扁担洗净，还要作一番深刻的检讨，要说：“扁担大人息怒，小女子不小心冒渎了神灵，罪该万死。小女子已经追悔不及，今用糖茶水净过了神体，请扁担大人宽恕小女子一次。”说罢，把扁担亲手交给用扁担的人，还要说自己许多不是。一般而言，用扁担的人会向女子提出一个月限包期，即在一个月內如用扁担者肩上生疮生毒或生病，一切费用与误工费要由该女子承担。

狩猎忌女人。一般而言，打猎是男子汉的事，这最能体现男子汉的刚勇气概，也能给物质生活带来一些改善。你要体现男子汉的英勇气概，尽管体现好了，但很多地区都有对女子的禁忌。如台湾高山族，猎具不许女人触摸；凡家有丧事或妇女正值产孕月事，禁忌出猎；狩猎期间（时间可能长达两三个月），禁忌与妻子同房。在我国南部地区，汉族和不少民族出门打猎都忌讳碰见女人，若不幸碰见，即以为“晦气”，往往打马回头；打回的猎物，忌讳妇女摸兽头。

吉林省东丰县的养鹿人，在鹿圈里干活时，不准说笑喧哗。人们互相配合劳动，只能依靠手势、眼神和暗号。妇女们不准靠近鹿圈，哪怕远远地眺望，也会受到训斥，说妇女是祸水，看鹿犯忌讳，不吉利。

沿海渔民以出海打渔为生。妇女忌登渔船，否则会冲犯安在船尾的神堂。京族男子在拿鱼篮出去捕鱼时忌见女人，抬网出海后下第一网时也忌见女人。

王充《论衡·四讳》记载说：世俗对妇女生小孩十分忌讳，认为在这时与她接触是不吉利的。所以，凡是要做吉利的事情，或是准备入山林狩猎伐薪，

外出远行做事，都不和她往来，产妇家里人也非常忌讳和厌恶她。在坟墓旁、道路边临时搭个小棚让她居住，过了一个月才能让她回来。在小孩满月之前，如果有人突然碰见她，也是不吉利的。

这种习俗后世一直延续，史书中记载很多。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收录了浙江地区和鄂伦春族等地这一习俗。记得二十多年前，外祖母对我说过，她生二姨时，家里有很多雇用的工人，为了不使“血光”（产血）冲犯了他们，外祖母下到最低层的猪圈里去分娩。（外祖母家依河边坡地而建，高三层，最底层作猪圈，不住人。外祖母2002年去世，享年95岁）

如果一个男人被女人用月经带抽打，那将是最令人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

传统社会在很多场合，不仅忌讳妇女，连同她们的经血、产血，都被视为晦气、不吉利。这表明，传统民俗中存在一个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人们赞美生命，歌颂生命，热爱生命，期盼生命，崇拜女性、女阴。另一方面，又对与女性、女阴及孕育生命紧密相连的经血和产血等极其恐慌，忌讳，避之唯恐不及。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直接导源于人们对女性生理现象及产育现象的缺乏了解，此外，与《周易》以阳为德、以阴为慝观念的影响也是有关系的。

《周易》一书，一方面承认“阴阳合德”不可相无，“天地交感”是万物化生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又说“天尊地卑”，贵贱相异，以阳为德，以阴为慝，阳好阴不好，把崇高的、善良的、正确的，都归诸阳；把卑微的、丑恶的、错误的，都归诸阴，具有扶阳抑阴的价值取向。后世儒家进一步继承、发扬这一思想。《礼记·内则》说：“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至于子生，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夫斋，则不入侧室之门。”这是说，生子则有产血，月经来潮则有经血，视为忌讳，故妻不敢见夫。《说文解字》说，妇女在经期，不得参与祭祀之事。（释“姪”）这一思想，在以男性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宗法制社会之下，终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这样一来，就使原来基于对女性生理现象和生育现象的不解而产生的种种俗忌，因为找到了“理论依据”而益发理直气壮。

这种习俗也有例外。《敦煌掇琐》有载：

“妇人月水下裁衣，煞夫”；

“妇人产不满百日，不得为夫裁衣、洗衣，大凶。”

妇女月经来潮，尤其是刚分娩之后，身体极其虚弱，不宜下水、见风。这种禁忌，当是十分少见、难得的对妇女的保护。

第五章 取之有道的百工商贸理财民俗

一、三百六十行财源似水

谈及中国传统商业百工，民间总是习惯于称之为“三十六行”、“七十二行”或“三百六十行”，都是三十六或三十六的倍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是至今仍在流行的习惯语。

染坊司 染坊司务手段好，
五颜六色染来俏。一入缸中白
布无，任凭如何难再漂。落缸
更忌元色缸，一无还覆没商
量。（竹枝词 孙兰荪图）



图 5-1 染布



做雨伞 宁波雨伞最出名，纸坚骨劲做得精。不怕倾盆来大雨，撑起只管街上淋。近来雨伞销场细，只因洋伞抢生意。譬诸小童儿与纨绔子，一太贫穷一美丽。（竹枝词 孙兰荪图）

图 5-2 做伞



成衣匠 十余年前成衣匠，手业行中称兄长，宁绸杭缎偷料多，得尺则尺丈则丈。而今算术盛流通，开方乘方人人都精工。更兼时式衣裳短且窄，可况缝纫机器发现 20 世纪中。（竹枝词 孙兰荪图）

图 5-3 成衣



图 5-4 缝穷婆
(采自《三教九流大观》
(戴敦邦图))

不仅工商行业，在中国历史上，凡说及较大数量的时候，也总是爱说三十六或是三十六的倍数。如：孙悟空有七十二变；《水浒传》有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二者合成一百单八将；道教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民间传说中岳嵩山七十二峰，太室、少室各三十六；汉高祖刘邦身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这两个成数，广泛见于我国传统宗教、哲学、历史、文学、民俗等各个领域，是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这种现象实在是太过普遍了，不能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一些人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古人随意列举的约数，是一种泛称，别无深意。闻一多先生为此曾费了一番功夫，认为这一表象的文化内涵其实是五行观念的变体：上天有青赤黄白黑五帝，各掌七十二日，于是七十二因五帝掌管的原因，便具有了神秘的含义而为世人所喜用。^①陈江风研究指出，中国文化中保留三十六与七十二连用的习惯，“来自上古时期的十月历纪历习惯。”^②

这一认识缘自我国学者的一次偶然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刘尧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陈久金和南京大学天文系卢央，同入凉山地区考察，偶然发现了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线索，继而展开深入研究，确证川、滇、黔彝族地区从古代直到现在，确实存在和行用过十月太阳历。

这种历法把一年分为五季，三十个节气，每季两个月，72天；每月三个节气，36天；一年十个月，360天，其余为过年日。历法是很简单，但它对十个月的区别和称呼却十分有趣：彝族先民将一年十个月分别配以公母，称为一月水公，二月火母，三月木公，四月金母，五月土公，六月水母，七月火公，八月木母，九月金公，十月土母。^③

学者们的眼睛顿时为之一亮，神秘的河图之数终于得解了：天一与地六为水，天二与地七为火，天三与地八为木，天四与地九为金，天五与地十为土，原来根源于此！

学者们继而发现，我国汉族地区上古之时也存在过十月历，至少在局部地区是如此。尽管由于历代王朝“改正朔，易服饰”，使之最终被十二月历取代。然而，这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真实，却通过百姓广泛的语言传承沉淀下来，使三十六、七十二等神秘数字久传不辍。只是这些数字后面的历法本意，后人已难知原委了。

神奇的河图之数，是否确实源出上古十月历，仍须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①《七十二》，《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上海开明书店、三联书店1984年重印。

②陈江风《古俗遗风》第7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

③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五卷，1986年第2期。

但对民间称商业百工为三十六行、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却可自成一说。况且我国民间自古就有以“水”喻财之观念。

《清稗类钞·农商类·三十六》说：“三十六行者，种种职业也。就其分工而约计之，曰三十六行。倍之，则为七十二行；十之，则为三百六十行。皆就成数而言。”

文中所说“成数”，既可理解为“约数”（如上文之“约计”），亦可理解为水之成数。若以上古十月历和民间以“水”喻财之习惯看，将“成数”理解为水之成数，应该是可信的。

《葬经》论风水，开篇即称：“得水为上，藏风次之。”《阳宅十书》专辟一章论水，其《放水歌》曰：“若论门庭先论水，家道兴隆从此起。”所以我国民间论风水吉凶，一直有“山主人丁水主财”之说。《敦煌掇琐》载有“水流从大门出，令人贫”之俗忌。而很久以来，“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一对，一直是经商之家使用最广的春联。正旦清晨，不少地区有外出汲水回家之习，并且以早、以第一为佳，以为新年“得财”之兆。其俗所在有之。由此可见，以水喻财，确实是中国民俗的一大特征。

并且财货与水，二者特性相通。工商百业之所求，莫非财货；财货之本，贵在流动；流动之物，莫过于水。而水之特性，可流可聚。流则可通可变可求，聚则可积可富可贵。所以中国民间即以水喻财。水之成数六，自然就被用作工商百业的象征数。经商之目的，在于求财。成之又成，有如百川归海，正是一切经营者所企盼的。因而即以三十六及其倍数七十二、三百六十喻工商百业，并且约定成俗，沿袭不改。

二、度量衡器生于天道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工商百业交易买卖，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我国很早就创制了用作交易标准的度量衡器。

传说在黄帝之时，已设立了衡、量、度、亩、数，称为“五量”。少昊时又“同度量，调律吕”。其后在舜、禹时又有改进。到西周时期，政府设立了管理度量衡的官员内宰和大行人。前者颁行度量衡制度，后者兼管国家统一标准器。地方上设质人管理度量衡，“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周礼·地官》。）并且在“阴阳齐，日夜分”的春分和秋分两次检查校正度量衡器。

《淮南子·天文训》说：“古之为度量轻重，生乎天道。”就是说，作为工商百业交易标准的度量衡器，是根据天地自然阴阳易道而创制的。

《淮南子·天文训》和《汉书·律历志》详细介绍了我国度量衡器创制的依据和具体标准。

度，用以度量长短。有分、寸、尺、丈、引五种度量单位，称为“五度”。度量单位“本起黄钟之长”。即取大小均匀中等的黑黍一粒作为一分，（九十粒长九十分，正好是黄钟之长）按十进制，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量，即衡量物品多少的量器，分为龠、合、升、斗、斛五个级量，称为“五量”。量器“本起于黄钟之龠”。即以一个标准黄钟律管所容 1200 粒中等黑黍作为一龠，然后按十进制，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

衡，又称权，俗称“秤”。分为铢、两、斤、钧、石五个级量，“本起黄钟之重。”进制较前二者复杂，但更能体现度量衡“生乎天道”的实质。以一个标准黄钟律管所容 1200 粒中等黑黍（即一龠）的重量为十二铢，因为衡有左右两侧，故以两个黄钟律管所容之重量为一两，合二十四铢，象征二十四气。天有四时，地有四方，故以十六两为一斤，这是取象天地。一斤共得三百八十四铢，与易卦之爻数相合，象征阴阳二气之变动。三十斤为一钧，为一个月三十日之象。一钧合四百八十两，为六十甲子行八节之象；合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铢，象易卦“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周易·系辞传下》）。四钧为一石，为四时之象；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为十二月之象。

古人把“黄钟之律”作为制定度量衡器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利用能够发出恒定波长的长度为九寸的黄钟律管来确定度量衡。这与后世的科学定制，大体上是一致的。此举不仅是取法于天地自然，其所以定制之“道”与“教”亦寓于其中。譬如，衡器中的“钧”，是平均的意思。“阳施其气，阴化其物”，意谓万物都能获得天地阴阳不偏不颇的公平施惠而有所成就，也包含着工商百业的经营者的都应该不欺不诈公平经营的寓义。后来民间在具体应用衡器的时候，又进一步体现或发展了这一寓义。

旧时所用老秤，十六两为一斤，在秤杆上设有十六个刻度，每个刻度代表一两，每一两都用一颗星来表示。秤杆上的前七颗星是代表北斗星，紧接着的六颗星代表南斗星，所余三星，分别代表福、禄、寿三星。如果商人给顾客称量货物少给一两，就是缺“福”；少给二两，表示既缺“福”还缺“禄”；如果少给三两，则“福”、“禄”、“寿”俱缺。

再一个是秤杆上“定盘星”的设置。所谓定盘星，指秤杆提绳与福星之间的一颗大星。当秤砣挂在这一位置，秤盘又无任何东西时，提起提绳，则两边重量相等，秤杆平衡。这颗大星就叫“定盘星”。

如果说福禄寿三星的设置是表示诚实经营，童稚无欺，定盘星的设置则被赋予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寓义。它们共同表现了古人对天的敬崇、“法效”，以及由天道象征的商业秩序、商业道德的自我约束和尊重，同时也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

三、开市经营求合“天愿”

中国人办事，习惯于先择吉日而后办理。择吉的目的，不外乎避免凶祸，祈求吉祥平安，而其最终愿望，则是升官发财。因此，像开市经营等本身就是为了求财求富的事情，更是非吉莫举了。

按我国民间经商习惯，一般像开张、签订交易合同、进出货物，以及外出经商，等等，都是一定要选吉祥日子的。据《协纪辨方书》记载，这类事情最适合的吉日，有天愿、民日、满日、成日、开日、五富、三合、五合、六合、母仓、四相、月恩、时德、收日、天仓等。通过对这些吉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经商求财求富的宗旨。

上述吉日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天愿为代表，旨在追求顺应天时。二是三合五合六合，旨在求“合”。三是五富，表现了欲取先予的经商意识，

意境最高。

《神煞起例》言天愿所值日：正月乙亥，二月甲戌，三月乙酉，四月丙申，五月丁未，六月戊午，七月己巳，八月庚辰，九月辛卯，十月壬寅，十一月癸丑，十二月甲子。

考查天愿所值日之干支，十二支辰都是十二月中太阳所在之躔度，十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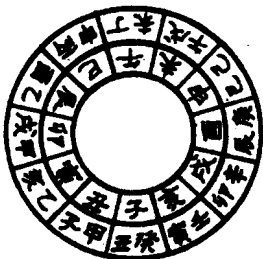


图 5-5 天愿

干都是四时当旺令星。如春三月为甲乙，甲乙属木，木旺于春；夏三月为丙丁午，丙丁午属火，火旺于夏；秋三月为己庚辛，己属土，庚辛属金，而金旺于秋，土生金；冬三月为壬癸甲，壬癸属水，水旺于冬。唯独甲

不是当旺令星，实际上甲子日的取义最深。丑与寅同处艮宫，在后天八卦配八节图中，艮宫配立春，正是终万物、始万物之处所。

当丑月之时，木已“甲”于地中，而太阳这时

处于子位。因此，丑月虽为一岁之终，而实为万物之始，枢纽阴阳，也可视为当旺之星。《周易·艮·彖传》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也是说艮具有“止”的意义，同时也有“行”和“动”的意思。

《协纪》评天愿：“太阳，日也，天之所以生物者也。令星，时也，天之所以成岁者也。太阳右旋，令星左旋，五气顺布，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之愿也。天愿之义大矣哉！”（《协纪辨方书》卷五“天愿”）所以民间开市、立券交易、出货纳财，多乐于选择其日。于此可见我国民间经商求财，首重顺应天时，顺天而动。这也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之易道，和“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古训在商俗中的体现。

母仓、四相、时德，上文已作介绍，此不赘。月恩、天仓、民日、收日、成日等日，取义亦类同天愿，举一以三返可矣，亦不赘。

三合、五合、六合，基本内容在第二章已经介绍。三合是取五行在四时发展过程中的生、旺、墓构成合局；五合是天干之合，与河图数相合；六合是太阳与月建相合。都是阴阳相合，天地相配。《周易》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都是说阴与阳、天与地必须相感相合，事物才能发展，达到“太和”之境。《周易》“贵和”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极大。民间常说：“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夫妇同心，其利断金”（《周易·系辞传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天时不如地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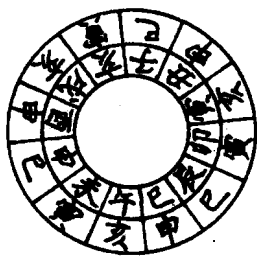


图 5-6 五富

地利不如人和”，等等，就是《周易》“贵和”思想深入民心的反映。民间经商求财办事，以三合、五合、六合之日为吉，就是对《周易》“贵和”思想的具体实践。

“五富”吉日最具深义。《协纪辨方书》引《总要历》：“五富者，富盛之神也。其日宜兴举运动，估市经求。”五富之日，正月起亥，顺行四孟。

考查五富所值日，实为三合长生之六合。如寅午戌火（月），火长生于寅，寅与亥合；亥卯未为木，木长生于亥，亥与寅合；申子辰为水，水长生于申，申与巳合；巳酉丑为金，金长生于巳，巳与申合。这是以生我之神，居于合地，则其有益于我者必多，所以谓之“五富”，称之“富盛之神”。另有一说认为，五富是三合父母之长生。即寅午戌火以木为父母，木长生于亥；亥卯未木以水为父母，水长生于申；申子辰水以金为父母，金长生于巳；巳酉丑金以土为父母，土长生于寅。既然生我之神获得长生，则我作为其子孙，当然能得好处，所以称之为“五富”。

经商营百工，求的是自己富裕，这里却以“生我之神”、“合我之神”得吉为吉，并且是最吉的“富盛之神”。这是什么道理呢？

《周易·系辞传上》：“生生之谓易”。这是说，阳生阴，阴生阳，阳又生阴，阴又生阳，阴阳生生往来无穷，才是“易”、“易道”。

又说：“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这是说，乾与坤各有不同的特点与功能。乾资主万物之初始，坤化育成万物。乾以平直资主，坤以简约顺从。易是易于资主，简是易于顺从。平直资主则有亲附，简易顺从则有效功。有亲附则可以长久，有效功则可以广大。可长久的才是贤人的德性，可广大的才是贤人的事业。

也可以反过来理解这段话：要把一件事情做得长久、广大，就要像乾一样刚健进取，敢为天下始；像坤一样善于遵从规律，顺和易从。这样才能使人乐于亲附、跟从，才能最终获得成效，并使之长久、广大。

这一思想，老子《道德经》表现得更为清楚：“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道德经》三十六章）这便是后世民间常说的“欲取先予”，“欲擒故纵”。

用于经商，类同于现在商界常说的“双赢”。你想赚钱，好！那你首先要让你的合作伙伴赚到钱，让你的顾客满意、获利。

这使我想起数年前看到的一篇报道。美国某地常举办玉米种植竞赛，有一个人连年蝉联第一，令人十分羡慕，别人向他请教有关经验或诀窍。这个人的回答极富哲理，他说：你想要获得最好的玉米，首先要管好别人的玉米地。问者大惑。其人继而解释：你的玉米地不是在与世隔绝的真空，而是与别人的玉米地相连相邻的；不首先治好别人的玉米地，使之无病虫害诸侵扰，你怎能获得好收成呢？问者豁然。

由此可知，我国民间商俗，讲求顺从天时与经营之道，推崇和气生财，提倡诚信、欲取先予、双赢，不仅合乎易道、天道，即便对于现在的商业经营活动，也仍然没有过时，具有借鉴作用。

四、庸俗之中有易道的求财理财习俗

荣华富贵，人之所共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像中国百姓那样，言必称“恭喜发财”，居必供“福禄寿”三星，问必道“发了没有？”如此痴迷执着，则世间少有。所以，由古迄今，社会上积淀了众多有关求财理财的民间俗信。东西南北中，各具风采。粗眼看去，似乎庸俗不堪，然略事分析，却也寓合易理易道，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民俗之一般特征。

我们还是先举例，然后再作分析。

《敦煌掇琐》载：

立春日，取富家地中土涂灶，令人富贵；

满日取三家水作酒，令人家富，吉；

满日取三家井水祀灶，令人大富，润宿种，大利；

辛巳、甲寅日取钱三枚著床□下，将眠，勿令人□，钱财至，利；

正月一日买一牯牛，万倍；

巳午日不出财，此绝本日，不利；

天遂日内财，不出三年大富；庚子日是大吉；

午卯日内财大吉利；

丙子日不得与人钱及出粟与人，令人家贫不利；

癸丑日偿债，使人终身不负人债，吉；

常如壬戌日还债，终身大吉，不负他人债，利；

癸亥日还债，令人终身负他人债，凶。

“百忌日”是我国民间流传极其久远广泛的俗信。战国时期的秦简《日书》中已有部分内容，其后历两千余年，虽代有发展变异，始终传承不辍。《协纪辨方书》载其忌：

“甲不开仓，乙不栽种，丙不修灶，丁不剃头，戊不受田，己不破券，庚不经络，辛不合酱，壬不决水，癸不词讼；

子不问卜，丑不冠带，寅不祭祀，卯不穿井，辰不哭泣，巳不远行，午不苦盖，未不服药，申不安床，酉不会客，戌不乞狗，亥不嫁娶。”（《协纪方书》卷三十五“百忌日”）

其中有关经营理财者三条：甲不开仓，戊不受田，己不破券。结合《敦煌掇琐》有关内容，略作分析。

上述内容，可区分为三个方面。一曰开源，二曰节流，三曰出纳财货，偿还借贷。

《敦煌掇琐》所引前五条，属于“开源”。其中又可分为两类。正月一日买母牛以生子，为劳动致富；余四条带有巫术色彩。

“正月一日买一牝牛，万倍。”“牝”即母牛。敦煌遗文伯二六六一写本作“正月一日买牝牛万倍。”说是大年初一买母牛饲养，通过母牛生子而求发展，可获利万倍。此俗汉魏时即有。《说苑·政理》云：“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卖之而买狗。”《齐民要术》卷六引陶朱公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牝。”孙氏注云：“牛马猪羊驴五畜之牝。”这种致富方法，民间至今信从，而且依然行之有效，只是科技含量更高了。

“立春日取富家地中土涂灶”、“满日取三家水作酒、祀灶”、“辛巳甲寅日取钱三枚著床下”即可致富之法，显然属于巫术。取富家地中之土涂灶可以令人富，其基础是交感巫术观念：该土既然已使富家富有，也可使这一家富有。这种观念与《周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观念在理论上有亲缘关系。取三家水作酒或祀灶，取钱三枚置床下，都用了“三”数，则除了巫术观念之外，还与易理有关。易有天道、地道、人道，号称“三才”；“太极生两仪”，“两仪”中蕴含着“三”。《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国民俗崇“三”、重“三”，当与此有关。

敦煌文书伯二六六一写本还载有：“壬辰日，取牛马骨在庭烧之，令人家富。”这种巫术行为基于象征观念，认为同类的事物可以相生而导致发展。但其选择壬辰日，则是依据阴阳易理。《说文》释壬：位处北方，阴极阳生，“象人裹妊之形。”辰于十二支为龙。所以《说文》接着又说：“故《易》曰：

龙战于野。战者，接也。”即两龙交接之意。交接实为生命之始，所以壬辰日意指交接受孕之吉日。于此日在庭前烧牛马骨，当可使牛马成群，六畜兴旺，故云“令人家富”。

“甲不开仓”属于“节流”。类似俗忌还有：

月建日，忌开仓库出货财。《协纪辨方书》引《神枢经》：“小时者，月建也。其日忌结婚亲，开仓库。”（《协纪辨方书》卷四“建”）

元旦日，忌有所开销破费，忌给人财物，甚至不得扫地倒垃圾，恐财气外流。

为什么有此俗忌？试析之。甲为十干之首，建为十二辰之首，元旦则为一年、一季、一月之首，俗称“三元”。人们忌于其日用财，认为如此会使一年不能积蓄，实际上反映了我国民间的理财观，即崇尚节简、慎于用财的理财观念。因为这些日子象征着开始。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身之计在于勤。”又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计划一世穷。”一个人在月建初转之时即大手大脚地破费，肯定是“不会计划”，不善理财持家。李商隐《咏史》诗云：“历览前贤与国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勤劳节俭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在《周易》中已有提倡。《周易·节·彖传》：“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是说，天地阴阳之气互相节制，四时变化才能形成，所以圣人应当以制度节制社会，不损伤财物，不妨碍民众。国家应该节用，个人更要节用，道理是一致的。但若过于节制也不好。《周易·节》上六说：“苦节，贞凶，悔亡。”就是说，节是应该的，是对的。孔子就说：“节用而爱人。”帝舜曾称赞大禹之德：“克俭于家。”但过中的节，节过了头，就变成“苦节”，成为凶了。所以民间崇尚节俭，同时又讥笑过于节俭者为“吝啬鬼”、“守财奴”。唐太宗即批评隋文帝，说他府库余财而不知赈济百姓。

最后是“出纳财货、偿还借贷”部分。其中可以区别为两种情况。一是不出财与纳财，二是出财与偿还债务。

前者说巳午、丙子日不可出财，而庚子、午卯、天遂日纳财则吉。这当是说，巳午属火，为夏，经商做生意，图的就是红红火火，出财即为“泄”，故忌于其日出财；午卯日纳财吉，午属火为旺，卯属木为相，木又生火，旺相之时有财进，当然吉祥；至于丙子日不可出财，庚子日纳财则吉，理与“甲不开仓”同。子为十二辰之首，干支初转即有破费，至少是理财不谨，故有此忌。子日出财不吉，进财自然吉祥，象征着日后财运亨通。“天遂日”所指不明，留以存疑。

后者说癸丑、壬戌日还债吉，可终身不负他人债；癸亥日还债凶，并且

会使人终身负债。从这三天的干支含义看。癸为天干之末，表示一轮已毕；丑为地支之初，但又不是第一，表示此人善于理财、会过日子、守信用：事情一有好转，便及时还债。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李义山《杂纂》称有钱不还债为“痴顽”。（《说郛》卷五引）

壬戌是六十甲子的倒数第二日，再过一日便是花甲重开，日新月异，于其日还债，表明其人善于理财持家，故吉。

至于癸亥，为六十甲子之终，古人谓之“穷日”，兵家忌于其日出兵。《后汉书·邓禹传》：“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邓）禹因得更理兵勒众。”“晦”为一月之终，与癸亥的道理相同，民间也有很多忌讳，如不得于其日裁衣、行房事之类。百官在这一天，也要休息，不治事。《新唐书·宋申锡传》：“时二月晦，群司皆休。”拖到癸亥“穷日”才去还债，至少说明其人不善理财持家，不会经营，终身受穷负债，看来并不是耸人听闻之虚词。民间忌于除夕之日还债，道理与此相同。

以上这些看似粗俗不堪的民间俗信俗忌，其实蕴含着丰富的阴阳易理和生活哲理。

五、利市仙官

民间传说，利市仙官是一位使人发财的吉神。在我国北方，每届新年，必将利市仙官的画像，贴在门上，以求吉利，商人更是一定如此。

近代民间供奉的财神像，大多绘有利市仙官相配，不知起源于何时。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谓，宋嘉禾善绘利市仙官，骨骼态度，他人莫及。（夏文彦《图绘宝鉴》，《丛书集成初编·艺术类》）则至迟至宋元间民间已流行。不仅如此，民间还同时祭祀“利市仙婆”，大概也是土地奶奶之属。

与此相应，我国民间自宋元以来，流行“利市”一语。《辍耕录》卷八：“利市之说，到处皆然。”如人数众多的客家人、粤人，红包称为“利市”；给人红包，叫做“给利市”；向人讨红包，叫做“讨利市”；打喷嚏谓有人议论，必“吓”之，曰：“大吉利市。”《周易·说卦传》有曰：“巽为木，为风……为近利市三倍。”民间言必称“利市”，或许即源于此。



图 5-7 利市仙官

第六章

人天和谐的风水民俗

一、神秘的太极星象村

自从告别了穴居野处的时代，房宅就成了人类遮风避雨安身立命的处所。千万年以来，我国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从如何选择宅基地到房屋建设，从室内布置到屋外环境等一系列有关营建居室的丰富经验。此后到两汉魏晋时期，便形成了比较成熟而独特的择宅建宅理论，即风水理论。

何谓风水？郭璞《葬经》说：“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风水学又称青乌术、相宅、相地、堪舆术及易理堪舆学，“堪天道，舆地道”，是天地环境学。我国传统民居建筑风俗，就是在传统风水思想指导之下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天道质人事、以人事观天道等思维观念的立体反映。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就是在寻找与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国传统思维即易理思维渗透于中国民居建筑风俗的各个方面。从城镇村宅的选址到具体的单体设计；从皇宫到普通民居；从皇家陵墓到普通民众的坟墓，从园林亭台楼阁到鸡窝茅茨，从整体结构到数字和色彩的运用，无一不渗透着这种精神。

在这里，我们以浙江武义县西南，距县城 20 公里的俞源村的布局与建筑为例，领略易学易理对中国民间选址及建筑风俗的深刻影响。

浙江武义县俞源村，保留有许多宋、元、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最为奇特的是，其布局是按天体星象“天罡引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环绕”来排列的。

直到现在，人们只要站在俞源村的村口，极目环视，就可看见村落四周环山，三面峻岭出入的外景，南面是一个弯曲峡谷，一条小溪穿村流过，至村口陡呈“S”型穿田中央而过。

若登上村前南面的一座小山顶，俯视村口，村前一个巨型太极图造型就会赫然呈现在你的眼前。再从村口向村落望去，山脚下那一幢幢白墙灰瓦的古老建筑历历在目，民俗所说“山环水抱必有气”的景象，一定会让你久久凝视而不能释怀！

俞源村始建于南宋，以俞姓得村名，现有 700 多农户 2000 多人。据当地《俞姓宗谱》记载，俞源村的太极星象布局系精通天文地理、熟稔军事的明代开国谋臣刘伯温设计并指挥建造。俞源村有代表性的 28 幢古建筑，即对应二十八星宿分布，村四周有 11 座山头，加上村口巨型太极图（双鱼宫），形成天体黄道十二宫；七星塘（七口水塘）、七星井呈北斗星状分布，俞氏宗祠正好位于天罡北斗的“斗”内。据说，俞源古村落的布局与 1974 年河北宣化辽代砖墓出土的古代星象图是一致的。

一条小溪由北而南缓缓穿行于村落之中，一幢幢房屋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千百年的岁月使得村中的楼、堂、厅、院等建筑斑驳沧桑。但无情的岁月并没有把木质的房梁、窗门、雕刻、壁画等消蚀，其浓重的太极文化仍能让人十分强烈地感受到。村中石头铺成的巷道、梁柱、墙壁、门窗、生活用品，处处都有形态不一的太极图。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教授考证，俞源村现存明清古建筑多达 395 幢。古建筑内或木雕、或石刻、或砖雕太极图、动物花草、人物神话故事，做工精细，风格各异，形态万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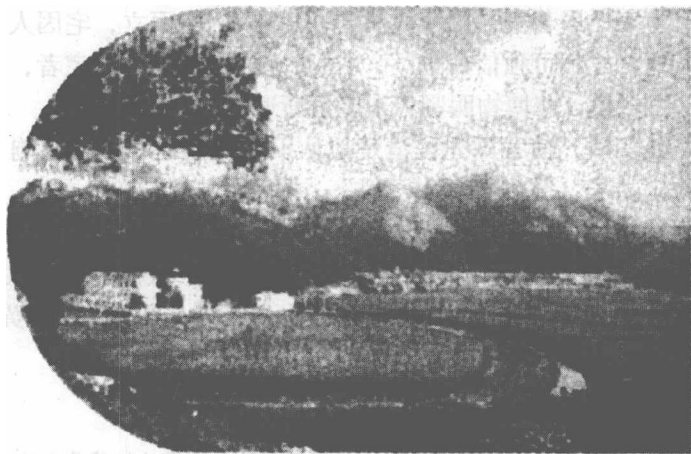


图 6-1 浙江武义县俞源村村口太极图

（采自《奥秘》2000 年第 7 期）

古人仰观、俯察、远取、近取，最终创建了包括太极在内的易学体系，^①目的就是要指导民用。《周易·系辞传上》说：“以是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毫无疑问，俞源村就是一个根据易学风水之理选址并仿易学太极体系而创建的典型村落。

俞源村系根据易学太极布局固然可以确定无疑，而当其建造太极河之后，数百年间从未发生过一次洪灾，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而且，村中古建筑的木雕、石雕、砖雕，从无白蚁之害，亦无蜘蛛、无苍蝇蚊虫，甚至没有鸟雀过夜，这又是为什么？“声远堂”檐口桁条上的8条木雕鲤鱼，为何每年都会随季节而变色？村口参天古树为何如此茂密？明、清两朝俞源村出过尚书、抚台、知县、进士、举人多达260余人，与此地的“太极气场”有无内在联系？……

凡此种种，确实值得我们努力去探究易学风水对传统民居的影响，以及其中蕴含的种种奥秘。

二、择吉处而居，力求人天和谐

传统风水术把居室看作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释名》说：“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道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黄帝宅经》说：“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博物明贤者未能悟斯道也。”

长期的居住实践，使我国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居住地对人的影响。民俗谓之“山青水秀出才子，穷山恶水出刁民”，或简称之“人杰地灵”。《玄女青囊海角经》则总结说：“福厚之地，人多富寿；秀颖之地，人多轻清；湿下之地，人多重浊；高亢之地，人多狂躁；散乱之地，人多游荡；尖恶之地，人多杀伤；顽浊之地，人多执拗；平夷之地，人多忠信。”故《黄帝宅经》说：“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

^①张其成认为，易学体系包括阴阳卦爻、河图洛书和太极图三级符号系统，其中太极图是图像符号，河图洛书是数字符号，阴阳卦爻是线条符号。张其成《易图探秘》，中国书店1999年版，第235页。



图 6-2 《书经图说·太保相宅图》

我国先民“择吉处而营之”的历史源远流长。相传周人的祖先公刘带领族人寻寻觅觅，辗转来到周原。在这里，他时而上高坡，时而下低岗，观察水源之远近、风向，以及土地之肥瘠，又用圭来测量日影，把握方位，最后才决定在这里建宅立业。这便是一次著名的“择吉处而营之”的具体实践。又《尚书·召诰序》云：“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孝经·丧亲》云：“卜其宅兆而厝之。”前者是相阳宅，后者是相阴宅。

归纳而言，我国民间在易学堪舆学影响或指导下择吉处而居的民俗实践，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整体把握

易理堪舆学把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以人为中心，包括天地万物。《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系辞传上》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间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要素。易理堪輿学就是要宏观地把握协调各子系统之间关系的优化结构，寻求最佳组合，因而十分注重居住环境的整体性。

《黄帝宅经》主张“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肤，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如斯，是事严雅，乃为上吉。”清代姚延銓在《阳宅集成》中也十分强调整体功能性，书中说：

“阳宅应顺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
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
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
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

整体原则是我国传统风水学的总原则，其它原则都从属于整体原则。以整体原则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传统民居风水的基本点。

我国风水村落的大致意象，可用下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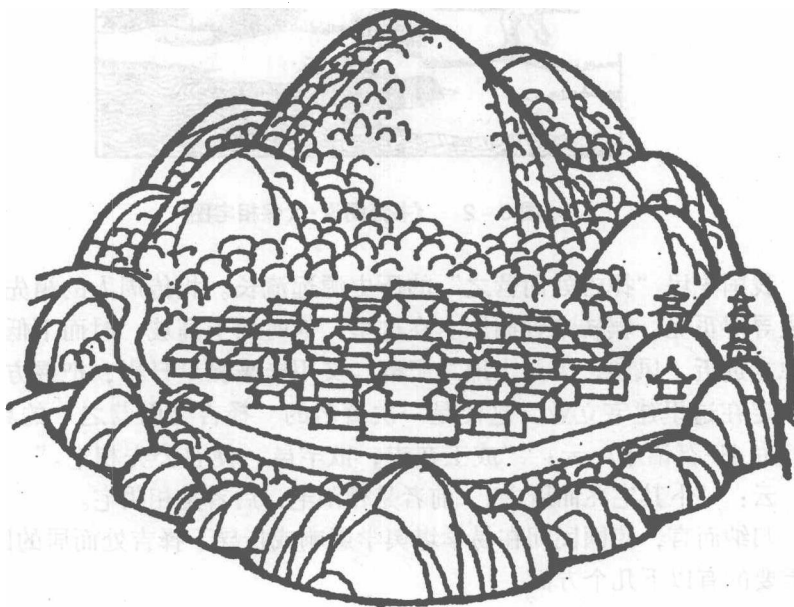


图 6-3 风水村落的景观特点与文化意象

(采自《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

2. 依山傍水，山环水绕

依山傍水是我国传统风水术选择宅基地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山体是大地的骨架，水域是万物生机的源泉，没有水，人就不能生存。人类生存的本能，促使其在近水的地方建立宅基地。考古发现的原始部落几乎都在河边台地，这是与当时的狩猎和捕捞、采摘经济相适应的。

我国先民在依山傍水而居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发现山环水抱者更为理想。总结出了“山环水抱必有气”、“山环水抱必有大发者”、“河右为吉，河左为凶”等择址经验。认为山环水抱的地方最能藏风聚气，最有利于人类的生息繁衍，进而把藏风聚气作为择址的最高标准。因为气具有“乘风则散，界水则止”的特点，因此，选择宅基地以“得水为上，藏风次之”。（郭璞《葬经》。）

我国先民凭着肉眼凡身的直觉、体察和感悟，觉察到宇宙天地创造生灵、颐养万物有一种神秘力量，并将之称为“气”（古时写作“炁”）。《老子》将“气”的性质和运行规律（即其“理”）称为“道”。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名曰大。”（《道德经》二十五章）这种气被古人视为万物之源，即元气。气充盈于天地之间，万物均由气构成。《易经》说：“其细无内，其大无外，充盈天地。”

气“聚则成形，散则化气。”有“形”之物与无形之“气”是事物的两种表现形式，二者可以互相转化。

我国古人所说的气的本质，相当于现代物理学中的超微粒子、场和波。

千百年来，古人根据气的性质和运动规律，即气的存在之象与存在之理，总结出一套实际勘察操作的实用理论。我国古代宅居的选址，环境的优选，生态景观的塑造等，都必须遵循“气”的聚结和运动规律。

中国风水学认为，“山环水抱必有气”，这是长期对山及水的观察、分析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概括性结论。“山环”，即环形山，指三面群山环绕，特别是西北面，一定要有山，奥中有旷，南面则要敞开，其中水草动植物丰茂的地方。在现在看来，“山环”恰似现代物理学中应用的抛物面聚焦天线，故能较好地接收来自天地宇宙的能量，相当于一个自然的蓄能器，所以山环之处必定冬暖夏凉，充满勃勃生机，古人谓之“生气”，水草等动植物丰茂，当然也利于人类休养生息。所以盆地总要比高原富庶，因为前更者利于吸收宇宙能量。在自然界中，植物的叶片总是呈现出勺形，花朵则多呈喇叭形。它们就像一个个微型的环形山，和微型微波接收天线。

这种由环形山围抱的住宅地，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护卫严谨的安全环境。并将之形象地称之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阳宅十书·宅外形第一》曾盛赞：“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洿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这种选址模式在古代社会中有



图 6-4 魏塘祠的小环境
(采自《莆田浮山东阳陈氏族谱》)

突出表现。

中国传统风水择址，不仅要求山要环，水也要“抱”，要“曲”。认为“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气为水之母，水为气之子，气行则水随，水止则气蓄。”气蓄需要水止，二者有因果关系。这就是说，水流到拐弯处，近乎水止的地方，气就有所储蓄。

因此，曲水比直水好。如果在曲水三面环绕缠护之处建设村镇，更为吉祥，谓之“金城环抱”。因此，古往今来，我国城镇乡村大多力求建于曲水环绕之处。

在民间传统择居实践中，曲水还有讲究，即以“河右为吉，河左为凶”。这是说，从顺着水流的方向看，河水从北向南，再向东向北绕行，即在河水的右则形成的河弯为吉祥，若河水从北向南，再向西向北绕行，即在河水的左则形成的河弯为凶，不宜居住。这是因为，前者水流的方向形成顺时针运动态势，与天体运动方向相谐，利于人体，故吉；后者则反之，不利于人体，故凶。

现代物理化学证实，水能吸气聚气，能够聚集宇宙能量。这便是中国传统风水学“气界水则止”的理论依据。容积热的规律是容积越大，吸收宇宙能量就越大。所以水面越大，聚气就越厚。现代科学证实，水面越大，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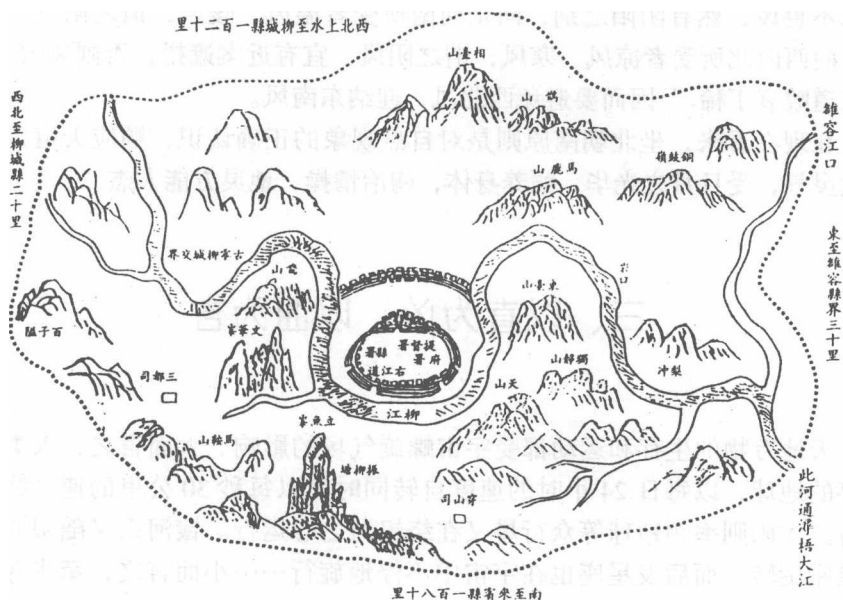


图 6-5 清·乾隆二十九年《马平县志》柳州地形图

的“负离子”就越多，能促进人的大脑健康。所以中国民间风水谚语说：“大荡大江收气厚，涓流点滴不关风。若得乱流如织锦，不分元运也亨通。”这是很有科学道理的。

3. 坐北朝南

我国传统民居的朝向习惯于取坐北朝南，或坐西北朝东南的坐向。

我国处于地球北半球，欧亚大陆东部，大部分陆地位于北回归线（北纬23度26′）以北。一年四季的阳光都由南方射入。朝南的房屋更便于采取阳光。阳光对人的好处很多。一是可以取暖，冬季时，南房比北房的温度高1至2度。二是参与人体维生素D的合成，小儿常晒太阳可预防佝偻病。三是阳光中的紫外线具有杀菌作用，尤其对经呼吸道传播的疾病有较强的灭菌作用。四是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坐北朝南，不仅是为了采光，还为了避风。中国的地势决定了其气候为季风型。冬天有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夏天有太平洋的凉风，一年四季风向变换不定。甲骨卜辞有测风的记载。《史记·律书》说：“不周风居西北，十月也。广莫风居北方；十一月也。条风居东北，正月也。明庶风居东方，二月也。”（《史记·律书》卷二十五）

我国古代将风分为阴风和阳风。清末何光廷在《地理指正》中说：“平阳原不畏风，然有阴阳之别，向东向南所受者温风、暖风，谓之阳风，则无妨。向西向北所受者凉风、寒风，谓之阴风，宜有近案遮拦，否则风吹骨寒，主家道败衰丁稀。”因而要避免西北风，迎纳东南风。

在现在看来，坐北朝南原则是对自然现象的正确认识，顺应天道，得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光华，颐养身体，陶冶情操，地灵方能人杰。

三、以直为凶，以曲为吉

天地万物的生存和运动都受宇宙螺旋气场的影响。大而言之，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以每日24小时的速度自转同时又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绕太阳运行。太阳则率领地球等众行星又在绕银河之心运行。银河系又随银心绕后发星座旋转。而后发星座也在宇宙中不停地旋行……小而言之，牵牛花、葡萄、丝瓜等攀缘植物，均顺时针左旋向上攀爬；蜗牛、田螺、海螺的贝壳，均呈顺时针左旋增长发育；牛羊之角，从根部向上呈螺旋式扭曲，双角对称，

旋向相反，而成对生长，呈大旋弯中的螺旋式；人类的指纹，呈螺旋形和半螺旋形（即俗话说的斗和箕），人的头发旋窝呈螺旋形；构成人类及动物的遗传密码 DNA，亦呈双螺旋形……。

南方特产芒果，其成熟之过程，按照先南、次东、三西、末北的次序进行，呈“S”形状，向世人揭示了这一神秘的宇宙规律。由此可见，宇宙螺旋气场，是宇宙万事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大无外，其细无内。我国古老的河图，反映的是宇宙气旋的“S”形旋臂，洛书反映的是气在大地上运行的“8”字形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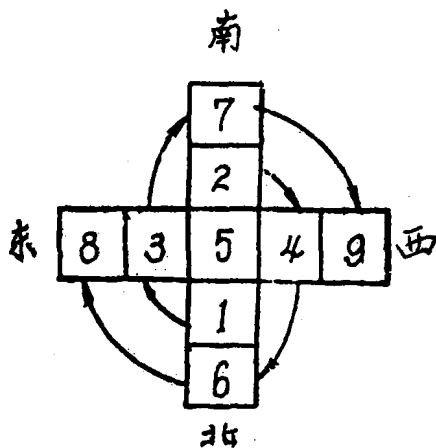


图 6-6 河图气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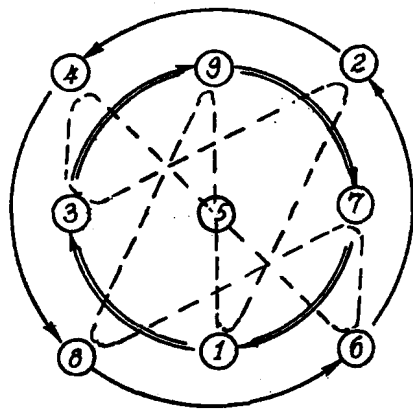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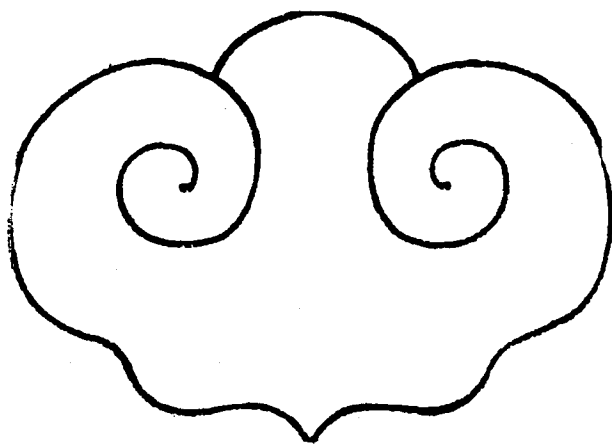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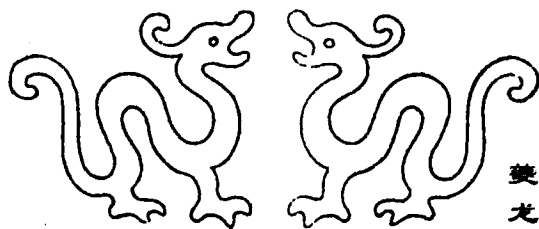
图 6-7 洛书阴阳气旋

古人在长期的择居实践中，由曲水聚气进一步总结出了“吉气走曲，煞气走直”、“曲则有情”、“直为冲煞，曲则生吉”的居住规律。在建筑实践中，尽力回避由直水和直路带来的冲、煞等不良气场，避免两个以上的门直冲相对。民俗有“门对窗，人遭殃；窗对门，必伤人”；以及“大口吃小口”等说法。说是两家门正冲，双方不吉，尤以门小者不利。门还不宜与邻居家的山墙或房脊上的兽头正冲，认为如此必然有祸，一定要设法避免。民间还忌正冲房檐滴水。说是：“房檐滴水滴门帮，一年之内死一双；房檐滴水滴门口，不伤大口伤小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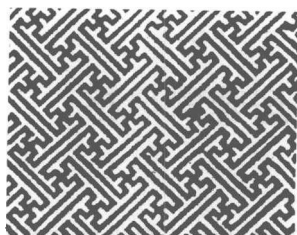
为了回避直冲的煞气，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化煞建筑小品。诸如：门前的走兽（对狮）、华表、牌坊、影壁、屏风、泰山石敢当等等。在“吉气”汇聚的地方，则建亭、台、楼、阁等供人消遣小息。在园林建设中，更是曲径通幽，充满了这种以曲为美、以曲为吉的建筑思想。在中国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充满了对“曲径通幽”、“曲则有情”的赞美。类似西方园林的笔直道

路、花草树木修剪成方方整整的几何形状，在我国传统的园林建设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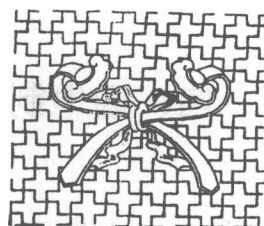
此外，在我国悠久而广阔的民间习俗和吉祥图案中，大量运用的云卷、如意、万字、鱼肠、回文等等，都是对“曲则有情”、“曲则生吉”规律的感知和认同。



套云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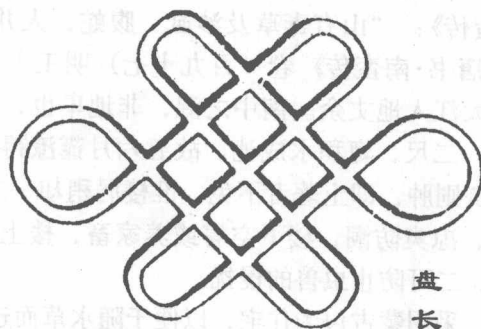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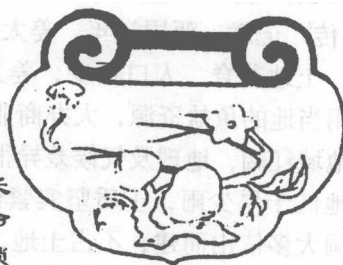
万事福



万事如意



长命锁



盘长

图 6-8 古代反映旋转气场形象的各种图案

以传统风水学思想为指导的民居建筑，选择山环水抱之地（环抱是山川的屈曲），以曲为吉，是对宇宙天地存在和运动规律的感知和体认，是追求与天地万物的谐调、合一。在今天看来，这种认识应该说是正确的。

四、因地制宜形成不同民居建筑风格

因地制宜，就是根据自然环境的客观性，采取适宜于自然的居住方式。《周易·大壮卦》说：“适形而止。”先秦时的姜太公即倡导因地制宜。《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西周初年，姜太公分封到山东营丘地区，这一带大多都是盐碱地，土地贫脊，人口稀少，姜太公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纺织业、手工业，并利用当地的鱼盐资源，大办商业，成效显著。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及气候差异很大，故各地民居建筑形式也大不相同。

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土质坚实紧密又具有粘性，人们就采取穴居式窑洞居住。窑洞大多依山而建，不占土地，节省材料，而且施工简易，造价低廉，防火防寒，冬暖夏凉。人住可以长寿，养鸡也可以多下蛋。

西南地区多雨，湿热潮湿，虫兽很多，人们就采取干阑式竹楼或木楼居住。《旧唐书·南蛮传》：“山有毒草及沙虱、腹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阑。”（《旧唐书·南蛮传》卷一百九十七）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二说：“夫（南地）大江入地丈余。南中之湿，非地卑也，乃境内水脉高，常浮地面，平地略洼一二尺，辄积水成池。故五六月霖潦得暑气搏之，湿热中人。四方至者，非疥则肿，即土著者不免，惟楼居稍却一二。”架空式的竹楼或木楼，空气流通，凉爽防潮，楼下空着或养家畜，楼上住人。这种居室结构，一可通风防潮，二可防止虫兽的侵扰。

草原上的牧民，采用蒙古包为住宅，以便于随水草而迁徙。

贵州山区和大理人民则用山石砌房，连盖房顶也是用片石。

粤东和赣南地区的客家人，则依山势建起围屋，以防“土著”攻击和倭寇骚扰。

这些建筑形式，都是我国人民根据当时当地的不同自然条件而创造的。

我国现存许多民居建筑都是因地制宜的杰作。如西北的窑洞，闽南的客家围屋，北京的四合院，苏州的园林等。湖北武当山是道教名胜，明成祖朱棣当初派三十万人上山修庙，命令不许劈山改建，只许随地势高下砌造墙垣和宝殿。

因地制宜的另一特征，是顺应自然的不同特性，因山就势，创造与自然相和谐并且别有情趣的各类建筑。在中国，一般说来，凡是名山必有古寺。著名的寺院、道观，往往都选择在林木葱郁的山峦峰谷之中。满山青翠之中透出一簇簇红墙青瓦，不仅没有破坏自然气氛，反而为自然环境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杭州的虎跑泉，苏州的灵隐寺，承德避暑山庄周围的外八庙，以及武当山、峨眉山、九华山上的诸多寺观，都是融合在大自然中的建筑创作。

在我国传统的园林建筑中，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创作特点尤其突出。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都是依托自然环境而存在的。于高处筑山建阁，在峰回路转处设亭，于低处凿池，临水为榭，于辟静之处造馆，建筑形式与自然环境相辅相成。其余如叠山、垒石、引水、聚池、架桥、开路、围篱、设门等，无不是因顺自然，是人工建造活动与自然环境具体结合的产物。即便是建筑密度较大的小园林，如苏州的留园、怡园、耦园、沧浪亭、网师园、狮子林、拙政园，以及扬州的个园、何园等，都同样富于自然的情趣和气氛。这些园林，使人们虽然身处人造环境的有限空间之中，却别有天然环境的无限情趣之感。

五、居中为尊，适中为美

我国先民很早就确立了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生存基础的经济生产方式。这种主要仰赖自然条件的生产方式，促使先民注重对天象的观测。长期的仰观俯察，使先民们惊奇地发现：以北极星为核心，北斗七星绕之作规律运动，形成了阴阳寒暑和一年四季的周期变化。这一发现，让先民们创制了历法，同时也让渴求秩序与和谐的先民获得了一个绝妙的启示：北极星就是天的中心；居得其位，众星即拱卫之。由此形成了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至深至巨的北极崇拜和以居中为尊的思想。如《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孔子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卫）之。”（《论语·为政》）

这些观察与认识，经《周易》归纳总结，形成了以“得位”为吉，以“居中”为尊的思想原则。《周易·系辞传下》说：“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二与四、三与五，同为阴爻或阳爻，但其吉凶善恶却截然相反，原因就在于二与五“得位”、“得中”或“居中”。

理论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由《周易》的创制者及众多先哲归

纳总结出来的以得位为吉，以居中为尊的思想，成为后来民居建筑的一大原则。由周代一直到清朝，都是如此。

《尚书·召诰》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这便是周代的营建宗旨。“土中”，或称“地中”，所指即大地之中心。就是说，周人要在“土中”建造“大邑”，以“上配皇天”，使之成为统治下界的中心。

其后的秦汉隋唐宋元，其都城皇宫建设，莫不如此。最突出的是建于明清时期的故宫。有人曾作过测算，从紫禁城的四角作出相交的对角线，这两条对角线与中轴线的交点恰恰位于故宫的中心——太和殿。这是一个“法象天地”、以居中为尊的典型建筑例证：整个北京旧城是一个周天二十八宿——紫微宫——北极帝星诸层次天体模式的人工再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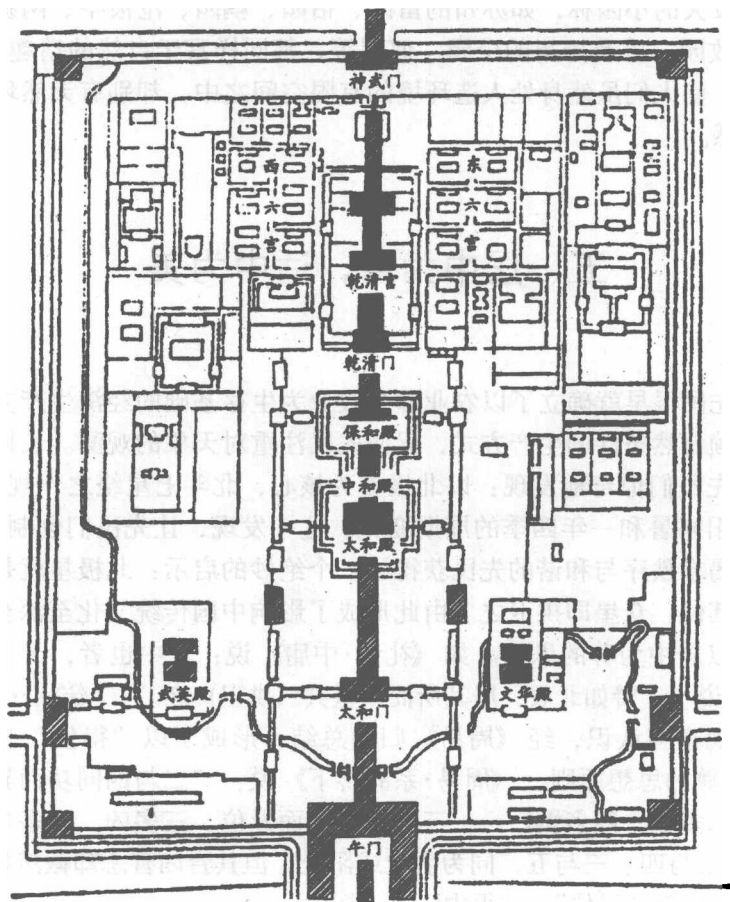


图 6-9 北京故宫平面图（摘自《慧缘风水》）

这种模式对应于封建时代，则北京是全国拱卫的中心，紫禁城是北京的中心，太和殿是紫禁城的中心，在太和殿登极理政的皇帝，乃是中心之中心。北京民居——明清时期建造的四合院，其平面布局也体现出以居中为尊的建筑观念。北京四合院的房子是这样安排的：南边一排，坐南面北，是供男佣居住的，兼堆放杂物，因面北之故，称为“倒坐”，是最卑的；东边、西边为两排厢房，呈对称势态，供一家中的晚辈居住；北边最后一排房屋，称为后房，供女佣居住，亦兼堆放杂物；供家长居住的长房在后房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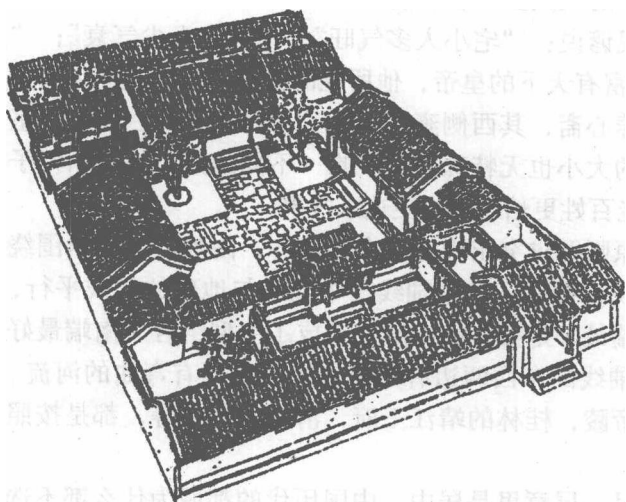


图 6-10 北京四合院 (采自《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

家长居住的长房，是四合院的主体建筑，尺度最大，用材最精，造价最高，地位最显赫。它的位置，就是四合院的中宫。东西两侧的厢房，一般是男孩住东厢，女孩住西厢。因为东方为震卦，主男孩；西方为兑卦，主女孩。皇宫中的安排也是如此，“东宫太子”的称呼即源自这一居住模式。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建筑载道的特征：中国人“法象天地”建造皇宫或民居，运用建筑语言，表达了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男尊女卑、内外有别等伦理原则。

“物极必反”是《周易》一书十分重要的基本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谓之“中庸之道”，极为推崇。孔子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以风水学中，中庸就是适中，就是恰到好处，不偏不倚，不大不小，不高不低，尽可能优化，接近至善至美。《管氏地理指蒙》论穴之语很有代表

性：“欲其高而不危，欲其低而不没，欲其显而不彰扬暴露，欲其静而不幽囚哑噎，欲其奇而不怪，欲其巧而不劣。”一切都要恰到好处。

风水中的适中原则，早在先秦时期就产生了。《吕氏春秋·重己》指出：“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吕氏春秋·孟春纪》）。不论是多阴还是多阳，都不好，阴阳平衡最佳。阴阳平衡就是适中。

传统风水建筑理论主张山脉、水流、朝向都要与穴地协调，房屋的大与小也要协调。房大人少不吉，房小人多也不吉；房小门大不吉，房大门小也不吉。风水民谚说：“宅小人多气旺”，“宅大人少气衰”；“聚则气旺，散则气衰”。连富有天下的皇帝，他所住的卧室，面积也同老百姓的差不多。如北京故宫的养心斋，其西侧雍正皇帝的书房和书房后面的卧室，只有十多平方米，木床的大小也无特殊之处，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床帐子是双层的。这说明皇帝比老百姓更怕气散，更追求气聚。

适中的原则要求突出中心，布局整齐，附加设施紧紧围绕轴心。我国典型的风水景观，都有一条中轴线，中轴线与地球的经线平行，向南北延伸。中轴线的北端最好是横行的山脉，形成丁字型组合。南端最好有宽敞的明堂（平原），中轴线的东西两边有建筑物簇拥，还有弯曲的河流。北京的故宫，明清时期的帝陵，桂林的靖江王府，清代的园林等，都是按照这个原则修建的。

适中的另一层意思是居中。中国历代的都城为什么都不选择在广州、上海、昆明、哈尔滨？就是因为地点太偏。《五经要义》说：“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帝制万国者也。”（《初学记》卷二十四“居处部”引）洛阳之所以成为九朝故都，原因在于它位居天下之中；明成祖迁都北京，是因为北京的地理格局，东临辽左，西依太行，北连朔漠，背扼军都，南控中原，具有利于发展和控制的战略优势，故为六朝古都。南京偏于江南，不适于做为全国的都城。都城居中的原则与现代经济学原则是相一致的。级差地租价就是根据居中的程度而定；银行和商场只有在闹市中心才能获得最大效益。

六、补救不良宅地以求人宅相安

古人在营建村镇，建造住房时，总是精心选择山环水抱、景色优美、土质肥厚、水质清纯、树木繁茂、山无崩缺、水无直射、藏风聚气、无冲无煞的地方。但世上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选择宅基地也是如此。很难找到完全合乎要求的风水宝地。有的地方有来龙，有护砂，却没有界水；有的地方有来龙，有界水，却没有护砂。尤其是发展到后来，人口增长，可供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小，很难找到十全十美的住宅地，当别人已建成在先，后来者更是难以变更。这样，就必须通过后天努力来弥补，用人力营造一个和谐环境。

用人力营造和谐环境，就是按照人们已经认识到的风水原则，努力做到“顺乎天而应乎人”。《易经》革卦彖辞曰：“已日乃孚，革而且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或像《周易·乾·文言》所说的“大人”那样，“与天地合其德”。在营建村镇和民居的民俗实践中，就是改造环境，人工补救，以顺应自然，创造优美和谐的生存条件。其所用方法有如下几种。

1. 开渠引水，或筑塘蓄水。

对于缺水的地方，即以此法补救。如南方一些丘陵地区的村居民，喜欢选择在田垌的尽头建房，而这里又往往没有水，于是便在宅前筑塘蓄水，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符合风水要求的住宅环境。即背靠来龙主脉，左右有护砂，前有明塘，来龙贯气，护砂藏风，明塘得水，这就成了大吉地。还有一些缺水地方，按照七星布局，人工挖掘七星形状的池塘，以造成蓄水聚气的格局。这种做法很普遍，桂林市近郊的大圩镇和阳朔县的木山村，都发现有这样的七星状池塘。

如宅基地前有溪水经过，而来水偏直过于急躁，即筑坎坝以延缓水流而蓄留之。如来水呈“撞城反背”之势，则将河流改道，使之形成环护状。桂林市东有漓江自东北而来，在城东稍稍形成S状；西有桃花江自西北而来，在桂林南面的塔山与漓江汇合，形成一个夹角。“水抱”的形势不够理想。于是，桂林城的建设者即从桂林城的东北部开始，开渠凿湖，将漓江水由东北引向西北、向南，使之与西面的桃花江汇合，然后于桂林城南端的象山处流入漓江，以人工构成水抱之势。现在桂林正在进行的城区大改造，修复两江四湖环城水道，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两江四湖环城水道修复之后，

游人不仅可以看到古人初创桂林城时的地理风貌，还可以坐船环城游览。

2. 培龙补砂。

来龙低平，砂山低缺，即以人工挑土垫高填补，并于其上植树以增加高度，以达到避风，调整温度湿度和降温的目的。如南方一些地区的居民，在房屋后面，人工培筑一个“衣领围子”，其上植树木或竹等，这从风水上说，正是为了藏风聚气，补龙砂之不足。

北京城中这类实例很多。如故宫的护城河是人工挖成的屏障，用河土堆砌成的景山，威镇玄武。北海是金代时蓄水成湖，积土为岛，以白塔为中心，寺庙依山势排列。圆明园堆山导水，修建了一百多处景点，堪称“万园之园”。

3. 修补住宅。

这主要是改变原住宅的大门朝向，改变门窗的大小尺寸，改变住宅内部的布局，以符合风水理论的要求，如八宅风水、五宅风水术等。对于正对大街或大道的住宅，则采用修建照壁的办法加以遮挡，照壁可建在门外，亦可建在门内。其用意一是挡风，二是避煞。

4. 采用风水镇物。

传统风水学上的镇物有许多种，如镇河的宝塔、水口的桥梁、正当路口或街口的“石敢当”和照妖镜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水口的理论与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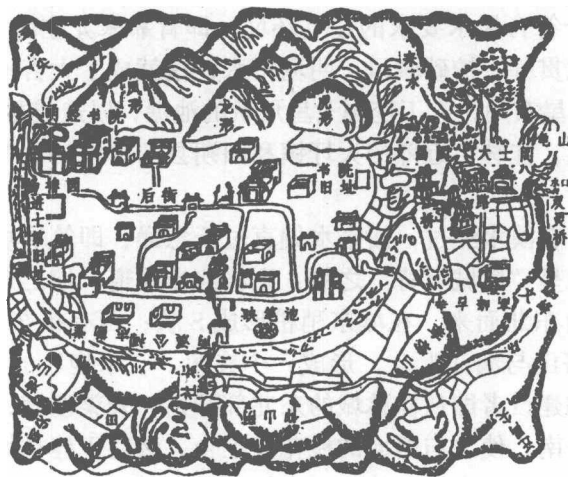


图 6-11 村基“水口园林”的景观意象

(采自徽州《仁里经胡氏支谱》)

所谓水口，系指村镇水流的入口和出口。一般来说，一村流水的入口多从山上或地势高处居高临下流来，一般都能形成开敞之景，只需稍加疏理即可；而水流出口则常与村之入口方向一致，故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风水所称水口即专指出口。缪希雍《葬经翼》说：“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

我国地形地貌的特点是西高东低，河流流向多自西向东，或自西北向东南。因而水口的大致方位也多在一村之东南或南或东方，其中又以东南方为最多，即所谓巽方吉位。

我国传统风水理论认为，水主财富，因而水口不仅具有出入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一村居民生死、贫富和前程的象征，是一村的门户与灵魂。为了留住财气，除了选择好的水口位置外，还必须建筑桥台楼塔等物，以增加锁钥的气势，彻底扼住关口。最常见也最普遍的是以桥为主作“关锁”，辅以树木、亭台、堤、塘等。有较高人文层次地区则以文昌阁、奎星楼、文风塔、祠堂等高大建筑物为主，辅之以庙宇、亭台、堤、桥、树木等。平原地区的水口，则常在去水中央立州（称之曰罗星洲）或土墩，并在其上建阁或庙。有关水口建筑的实例，全国各地所在均有。

我国一些学者对传统风水学中的水口理论及其实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认为在低矮的水口处树立高大建筑，平衡了自然景观的构图，使人获得一种平和感，同时给一村一镇提供了公共活动场所，类似西方村市的中心广场；对自外而来的人而言，具有空间向导的作用。把水口誉为“村落的眼睛”，“神奇的水口”，认为如果没有水口建设，风景将会流于单调、停滞而失去活力，村落就会变成无珠之龙。就我国传统风水学的水口理论与实践而言，水口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给排水，但作用与象征意义又远非给水排水所能比及。^①

中国传统风水中的宝塔，一般是在河水急湍，常常泛滥成灾的地方，建宝塔以镇之。若来龙形势急猛逆折，有不羁之象，则建塔楼以镇之。

石敢当也是一种镇宅之物。常常是在正对大路大街的方向上立石头，上书“泰山石敢当”，以挡邪镇宅。

用照妖镜镇宅，尤其常见，不但各地乡村多有，城市居民住家也每每挂之。古人认为，妖魔鬼怪忌照镜子，因为一照便会现原形，所以照妖镜有避妖驱邪的作用。现在看来，镜子具有反射的作用，光和波沿直线运动，遇到镜子就会被反射或折射。因此，在一些有冲或煞等不良气场的地方，悬挂一面镜子，可以产生一些保护作用。

^①参见何晓昕《风水探源》第二部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种植花草树木调整气场。

中国传统建筑在按照风水思想和周易思想构筑对人体有益的“好气场”时，从“物物皆太极”的观点出发，常常借助于各种媒介，其中植物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建筑在长期的实践中，除了对自然环境的山、水、风、阳光等因素有严格的界定之外，对于植物也总结出许多耐人寻味的运用规律。

植物，在中国传统风水学中每每被看作是一种趋吉避凶的媒介。在南方，几乎每个村子附近，都保留着一小块青葱林木，大多是樟、松、柏、楠等长青树。它们神圣不可侵犯，人们也自觉地去不去动那里的一草一木，因为大家都把它看作是关切全村风水命脉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风水树，水口树。

许多草木被人们赋予吉祥的涵意。桔与“吉”谐音，盆栽柑桔便成为春节时家庭的摆设。小巧的吉祥草终年青翠，泥中水中均易繁衍，象征着吉祥如意，所以叫它瑞草。椿树易长而长寿，有的地方盛行摸椿风俗。在除夕晚上或正月初一早上，让小孩摸椿树后绕着转几圈，渴望快长快大。槐树则被认为代表“禄”。古代朝廷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坐其下，面对三槐者为三公。后民间在庭院种槐，自古视为祥兆。吉祥图常见鹿口或鹤嘴衔灵芝，用作祝寿礼品。梅花的五片花瓣被认为是五个吉祥神，于是有了“梅开五福”图。

尤其受到尊崇的是无患子。这种落叶乔木，五、六月间开白花，结实比枇杷稍大，生青熟黄，其中有一核，坚硬如珠，俗名鬼见愁，佛教称为菩提子，用以串联作念珠，有它“无患”。

葫芦也被认为是能驱邪的植物，常被人们种植在房前屋后。现代物理测试证明，“宝葫芦”形状的器皿能屏蔽各种波的辐射。由此可知，八仙之一的张果老用宝葫芦装酒，是因为葫芦能使酒的味道长久不变。用葫芦装药也是如此。

传统民居建筑，如住宅周围有物体尖角形成冲煞，一般是在窗外或门外对着尖角的方向摆放仙人掌或仙人球等进行阻挡，据说效果不错。

众所周知，植物可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将其摆放在房内既可供氧，亦可用它的枝叶来挡煞避邪。如果有冲煞之形正对着门口，是在刚进门的迎面处摆放相应的植物，这样不但可以阻挡煞气，还能起到招财进宝的作用。

从传统风水的角度看，植物的形态以及所处位置，对住宅的吉凶也有影响，因而民俗也有趋避宜忌的讲究。主要有：

[1] 树干忌立于门、窗前，庭院当中忌种树。因为这会影响门窗的通风纳气效果；庭院中有浓阴之树，会形成阴压阳之势，故避忌。

[2] 行道树、绿篱走向忌冲向房宅。这可能会造成煞气冲向的信息引导，不利于居住。

[3] 忌大树遮门窗。这不利于通风采光。树荫属阴。

[4] 忌大树下建屋。《阳宅十书》有“屋在大树下，灾病常到家”之说。现在看来，常年处于荫阴之地，不利于采光卫生，又易引起雷火。

[5] 其他意象形态不吉的树，忌在门窗视野常见之处。如：痈肿怪树，朽枯空心树，藤缠“缢颈树”，歪头倾斜树等。大概是这些形象怪异的树具有形象上的符咒隐语引导的不吉利的意象，故不宜作宅旁绿化用。

七、既要好住场，又要好肚肠

在中国古代民间的建筑活动中，以“崇效天”（《周易·系辞传上》）为原则，把“天道自然”看作“天地之祖”，认为“顺之则亨，逆之则否”。（《黄帝宅经》）。

与此同时，古代先哲也清楚地认识到，“天道自然”终究能为人所揭示并把握利用。即《老子》所说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天地并列为三，非天地无以见生成，天地非人无以赞化育”，即自然的演化发展，也有“天道必赖于人成”（《管氏地理指蒙》）的一面。而人之参天地、赞化育，又必以同自然天道相谐调与和合一致的行为准则来规范人伦道德原则，亦即“人道”，形成秩序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使人类以其社会性的整体存在，取得主动。

这种精神，就是“天地人和合”。正如《黄帝宅经》所说：“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博物明贤者未能悟斯道也。”就像《周易》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居室和人的关系上，二者也是互相关联，互相扶补的。如《全三国文》说：“宅是外物，方圆由人，有可为之理，犹西施之洁不可为，而西施之服可为也。”（《全三国文》卷五十一）《释名》说：“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道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

中国佛教讲“行善积德”；道教讲“修炼”，讲究炼丹服食以达到天人和合；儒家讲“仁义道德”，推崇“修、齐、治、平”的功夫。中国风水讲究人与宅相扶，就是在好山好水的基础上，注重人的道德修养，讲究“好气场要以德求之”。

中国百姓注重以“好心地”、“好肚肠”来扶补“住场”，甚至认为好住场还不如好肚肠更为重要，这正是正统文化“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观念的反映。而且既不像佛、道二教之离世脱俗，亦不像少数士大夫之空谈性命，中国百姓是在居家日用的实践中，实实在在地与人为善，以和为贵。旧时民间流行这样一首歌谣：

好阴地不如好心地，好住场不如好肚肠，
心地肚肠好，子孙代代昌。
心地肚肠恶，子孙代代殃。^①

平日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老百姓则说“行要好伴，住要好邻”。日常行事，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百姓则说“将心比心”。《易传》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百姓则把日常与人为善的种种好事称为“积阴德”，而且不事声张。即如《琴堂谕俗编·积阴德》所说：“知善之可欲为而力行之，知不善之不可为而不为；不求知，不责报，不以隐显二其心，夫是之谓阴德。”

宋代民间俗谚说：“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鹤林玉露》卷六，丙编）。就是要通过与人为善，广为善事来培植“善根”，通过“好肚肠”来扶补好住场，最终达到人宅相扶相旺。

这是我国古代极可称颂的民间居住民俗，并因此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邻里关系和社会风尚。

八、追求时间与空间完美统一的修造择日习俗

《周易·系辞传上》说：“日月之道，贞明者也。”中国传统风水学，实际上可以称为日月之道、天地之道。它不仅要考虑地理环境的因素，还要考虑日月及星宿即变动的的时间因素。这是一种基于天地人和的思维理念，相

^①应俊《琴堂谕俗编·积阴德》，《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

信“天人感应”，称为“天人合一”，认为人不是孤立于天地之外的生物，而是“人与天地参”的。

天与地、时与空的最佳组合，会使万物呈现出一种勃勃的生机，是万物生态表现出来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叫做“生气”，传统风水就是要寻找这种“生气”，称为“顺乘生气”。

我国传统风水理论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太极即气，一气积而生两仪，一生三而五行具，土得之于气，水得之于气，人得之于气，气感而应，万物莫不如此。

“乘生气”包括最佳空间与最佳时间两方面。

民间寻找最佳空间的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察气”，即观察一定空间的生气。明代蒋平阶《水龙经》认为，识别生气的关键是望水。气为水之母，水为气之止。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与母同情，水与气亦相随逐。充溢于地表之外而有痕迹者为水，行于地中而无形者为气。表与里同用，这便是造化之妙用。所以，若能体察出地中之气趋东趋西的走向，那么，其水来或去的方向就能推知了。行龙必以水相辅，气止之处必有水界。

明代另一位风水大师缪希雍则主张通过山川草木辨识生气。他说：“凡观山体，若见紫气如盖，苍烟若浮，云蒸霭霭，四时弥留不绝，山体无崩蚀，色泽油油，草木繁茂，流泉甘冽，土香并且厚腻，石润并有光泽，如果呈现出这种状况，一定是生气充盈，方兴未艾。相反，如果是云气不腾，色泽暗淡，山体崩摧破裂，石枯土燥，草木凋零，水泉干涸，如果呈现出这种状况，若不是山冈被掘凿断绝，就是生气已改行他方。”（缪希雍著《葬经翼·望气篇》）可见，生气就是万物呈现出来的勃勃生机，就是万物表现出来的最佳状态。

风水理论提倡在有生气的地方修建城镇房屋，就叫做“乘生气”。认为只有得到生气的滋润，植物才会欣欣向荣，人类才会健康长寿。宋代黄妙应在《博山篇》一书中说：“气不和，山不植，不可扞；气未上，山走趋，不可扞；气不爽，脉断续，不可扞；气不行，山垒石，不可扞。”“扞”就是点穴，确定建房地點。

由于太阳出没的变化，季节的变化，会使生气与方位发生变化。不同的月份，生气与死气的方向也不相同。生气为吉，死气为凶。人应取其旺相，消纳控制。《管子·枢言》云：“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则以其气。”《黄帝宅经》认为，正月的生气在子癸方，二月在丑艮方，三月在寅甲方，四月在卯乙方，五月在辰巽方，六月在乙丙方，七月在午丁方，八月在未坤方，九月在申庚方，十月在酉辛方，十一月在戌乾方，十二月在亥壬方。风水罗

盘体现了生气方位观念，风水理气派很讲究这一套。

传统择日民俗的要旨，就在于选择宅地的旺相之时进行修造。具体而言，就是运用“子平”排四柱八字的方法取格局财官，禄马贵人，以四柱配合，补龙扶山相主命，最好又是值吉星避凶星的课格。这是旧时民间较为常用的择日方法。

另有一种择日法，不仅讲究以四柱扶补，还提倡取天星拱照，称为天星造命法。认为“地理非选择不能神其术，选择非天星不能妙其用。”又说：“在天成象，而后在地成形。欲顺天之道，因地之利，尽人以合之者，不揣（当为缘字）其本而求其末可乎！”（姚承輿《择吉会要》卷三《造命诀》）意思是说，要想通过人为努力获取天地之利，必须运用天星造命之法，否则，很可能会导致福未至而祸先到的结果。

“子平”择日术及天星造命的具体方法，这里就不介绍了。欲了解者可参阅有关书籍。（前者的参考文献很多，后者可参阅《择吉会要·造命诀》。）

总之，“顺乘生气”是古人对山环水抱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目的是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条件，以获得最佳生存环境。

第七章

生生不息的婚姻民俗

《易》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水火相射，阴阳相交相合，就是为了“生”万物，定人生之大业。

从广义上说，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生”。各种物质生产和商业活动，是给人类的生存提供生活资料；文学、艺术、哲学等的创作，是给人类的生存提供精神食粮；各种规章制度、法律和组织，是给人类的生存提供社会秩序和安全保证；人类为了自身种的延续而发生的产育、婚配、寿庆、丧葬等方面的种种民俗行为和禁忌，更是最最直接的“生”。而且在中国人看来，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只有家庭的延续，种姓的延续，才有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中国人一切对天的祈望，一切人际的协和，一切与天的适应，一切勉尽的人事，等等，都是为了群体和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传递。所有这一切，最终归于一个意识：生生不息。因此，在孕育、婚姻、寿庆和丧葬等人生礼俗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生命意识，生生不息意识，持续发展意识，是易文化的精神，更是中国民俗文化最本质的精神。

对生命的炽热渴求，对子孙繁衍、家庭幸福的热切期盼，汇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整体意识，同时也造就了繁缛、热烈而又神圣的婚姻礼仪。家庭承担着孕育生命、抚养孩子、稳定社会的重大责任，故“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周易·序卦传》）。于是，人们对多子多孙、夫妻和睦、家庭幸福种种期盼，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人生礼仪交响曲的美妙乐章。

本章以婚姻为代表，叙述其对易文化“生生不息”精神的体现。

一、《周易》的家庭婚姻观念

《周易》一书，“广大悉备”，“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囊括了天道、地道与人道，揭示了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可以帮助人们“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实现其立功、立德和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仅就婚姻家庭观念而言，《周易》一书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而深刻的。这里略作阐述。

1. 以男女结合、阴阳交感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观念

《周易·系辞传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里所说的“男女”，当然不限于人，而是泛指宇宙中一切具有两性差别的事物。就人而言，必须男女结合、交合“构精”，才可能繁衍后代。所以《周易·归妹·彖传》说：“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把少女出嫁，实现男女结合、交感，使人类得以生生相续，代代不穷，看作是天地之大义；把“归妹”即男女婚配的问题，看作是关系到人类的终始的大问题。

2. 一夫一妻制家庭与文明时代几乎同时产生的观念

《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是说，在宇宙物质发展演化的自然序列中，由天地万物的产生直到君臣父子文明社会的形成，其中的关键环节，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出现，即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尊卑等级形成和人类文明社会的到来。这一观点，与近代以来对社会进化和人类婚姻发展过程的考察结果是相一致的，是唯物进化的婚姻史观和社会发展观。

3. 提倡一夫一妻制，以一夫一妻制家庭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以正家平天下的观念

《周易》一书，每以阴阳天地日月乾坤刚柔一类用语，表示夫妇关系，这就是《周易》对一夫一妻制之承认。《周易·革·彖传》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这是说，一男一女才相感应，若二女同

居（即多妻），就会产生矛盾，发生变故，称为“革”。这是《周易》反对多妻制的明显例证。

《序卦传》所说“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就是以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为社会的基础，即所谓“积家而为郡县，积郡县而为天下”。因此之故，“家治而天下定”。

《周易·家人·彖传》曰：“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把“正家”作为社会稳定、天下大定的根本。所以后世儒家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系统论，这便是《礼记·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宏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

4. 夫妻之道应当长久的观念

既然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国家稳定的依托，地位如此重要，则夫妻之道自然应该稳定，应当长久。所以《序卦传》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就是久，夫妇之道应该长久。《周易·归妹·象》也说：“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永终”的意思是说，男女配合结为夫妇，应使生息嗣续，永久其传。君子效法“归妹”卦象，应当永保其终，了解不终的弊病，加以防范，最后使之“永终”。

5. 男尊女卑和男刚女柔的观念

《周易》一书，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明确，并且贯彻始终。《系辞传上》开篇即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阳为天，为乾，为男，为夫；阴为地，为坤，为女，为妻。在天地之道，是天尊地卑；于夫妇之道，便是男尊女卑。

整部易卦，都是尊阳抑阴。在一卦之中，若阴为臣道，以能顺阳为善；若阴为君道，以能应阳为美。其最典型的体现，莫过于坤卦。《周易·坤·彖传》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文言》说：“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坤道即地道、妻道，其最根本的特性就是“顺”，即顺从天道、乾道，包括夫道，如此才能获得“利贞”。

坤卦六爻实际上就是一个坤顺乾、阴顺阳的发展过程。初六“履霜”，阴气开始凝聚；六二“直方大”，已具备了阴柔中正的全部坤德；六三“含章”，含晦不露，却又随时准备为乾效劳而不居功；六四“括囊”，阴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以至于晦藏缄默；六五“黄裳”，坤顺之道日臻完美，居高位却能固守柔顺之德；至上六则发展到极盛的地步，顺转为逆而“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以致天地混杂，乾坤莫辨。整个坤卦告诉人们：坤阴必须始终谨守柔顺之德，必须“承天而时行”。天动地随，乾天以时行；坤地亦以时行；乾天不超前落后，坤地也不超前落后，否则就会导致整个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破坏。

天尊地卑，乾尊坤卑，天动地随，所以男尊女卑，男主女从。而男为阳，为刚，为强；女则为阴，为柔，为弱。男以刚强为美，女以柔弱为良。如果应该柔弱的女子转为刚强，那就违背了这一原则，不可迎娶了。《周易·姤》：“姤，女壮，勿用取女。”意思是说，当阴（女）发展壮大，有可能破坏夫刚妻柔的关系的时候，就不要娶这个女子。《彖传》说：“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这段话是说，一个气质、性格盛过男人的女人，男人不可娶她组织家庭，与之长久生活；然而，从整个宇宙的角度看，阴遇阳，柔遇刚，天地交感，又很好。这反映了《周易》在家庭婚姻方面两个互相矛盾而辩证的观点。一方面认为男尊女卑，女强则不可娶；另一方面又认为柔遇刚，阴遇阳，又有天地交感化生万物的伟大作用，予以肯定。受其影响，后世民间即有“牝鸡司晨，唯家之索”之说。

《周易》认为，天尊地卑，男尊女卑，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原则，任是帝王之女，也是不能违背的。《周易·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是说，帝乙的女儿或妹妹，出嫁后也要屈尊从阳从夫，才能受福，获得“元吉”。

6. 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

男尊女卑的家庭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周易·家人·彖传》：“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这种家庭分工应当是依据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分工，因而是符合实际的。

女主内的主要职责是主“中馈”、理家财。《周易·家人》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主中馈，就是主持一家人的饮食和筹办祭祀。但要求“无攸遂”，什么都听从丈夫的，不能自作主张，才能“贞吉”。这便是《象》所说：“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家庭主妇负责一家的收藏撙节，主持中馈，最高职责是“富家”。因此，要克勤克俭，严于治家，不可嘻嘻哈哈。“妇子嘻嘻，终吝。”（《周易·家人》六三）并且能够实现“富家”的大任。《周易·家人》六四：“富家大吉。”《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就是我国传统社会中女主内，主“中馈”的典型。

在整个封建时代里，家庭模式都是男主外，女主内，连天子也不例外。《礼记·昏义》言：周天子率百官“以听天下之外治”；后率夫人嫔妃“以听天下之内治”；“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

7. 夫妻应该互相尊重沟通交流的观念

《周易》在主张男尊女卑的同时，认为夫妻之间应当多交流。《周易·咸·彖传》：“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咸卦是艮在下，兑在上；艮为山为少男，兑为泽为少女，山泽通气，内外相应，所以说：“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而且男应该“下女”，真心诚意地与女相交感。这又一次表现了《周易》在家庭婚姻关系上的两面性。一方面，强调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之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又主张夫妻应该交流，而且是丈夫要诚心诚意主动与妻子交流。如九五说：“咸其脢，无悔。”就是要克服私心，与自己不愿见或不易见到的人“相感”，可得无悔。

在男女或夫妇相感这一点上，并不存在尊或卑的问题，两者都是以独立的个体平等地参与，共同完成化生万物的伟大使命。《周易·系辞传下》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及“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等，阴与阳，乾与坤，天与地，都是平等地互相交感，孕育万物。因此，《周易》的男尊女卑观念，并不是绝对的。在男尊女卑总原则上，男女还应该互相尊重，共同完成家庭的伟大使命。受其影响，后世民间对“举案齐眉”夫妻恩爱一直赞颂有加。

8. 妻子从一而终的观念

《周易·恒》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彖传》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六五柔中，“恒其德贞”，是以柔顺为德为常；恒其柔顺之德，在妇人则为正，故吉；在丈夫则不为正，故凶。这是因为妇人从一而终，从一个丈夫

一直到死。六五恒其柔顺之德，以顺从为恒，恰似妇人从一而终，所以六五有妇人贞吉之义。明确提出了妇女从一而终的观念。

《周易·蒙》六三也体现了这一观念：“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这是说，六三作为一个女子，本应等待与她正应的上九来求她、娶她，而她却见近旁的九二这个美男子而动心，悦而从之，未能“从一”，保有其身。所以《象》说：“勿用取女，行不顺也。”不要娶她，是因为六三是个行为不顺（正）的女子。

总之，《周易》一书的婚姻观是十分丰富的。在今天看来，其中很多都是正确的，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唯物进化的婚姻发展观念；家庭为社会的基础的观念；夫妻关系应当长久，不可轻易离异的观念；在家庭中夫妻关系平等，应相敬如宾的观念，等等。后来，儒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男女婚姻当以时，以及坚持同姓不婚，提倡优生等观念。

二、赐民良缘的婚姻之神

我国民间对男才女貌、男女般配的结合，常爱用“天造一对，地设一双”来形容，谓之“天作之合”、“天赐良缘”。民间中还广泛流行诸如：“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姻缘天所定，红绳一线牵”、“一日夫妻百世缘，千里有缘一线牵”、“姻缘到，不是媒人贤”，以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等等。

这些为数众多、流行甚广的俗语，集中反映了一个观念：人的婚姻是由上天、由神、由命（即“缘”）决定的。上天的意志，通常是通过各种神灵来体现的。这些主宰人间男女婚配的神祇，因时因地而不同，其中较重要的有：

1. 高媒

“高媒”又作“高媒”，被视为主宰人间婚姻的媒神。传说女娲团土造人，但她造的人不久后都一一死去了。不得已又再造一批。但这样毕竟太过麻烦，于是女娲就把男人和女人配合起来，让她们自己去繁育后代，担负养育婴儿的责任。人类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绵延下来了。女娲也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婚姻女神。

我国古代对高媒的祭祀十分隆重。时间一般是在春暖花开、万物生机盎



图 7-1 汉画像砖·伏羲女娲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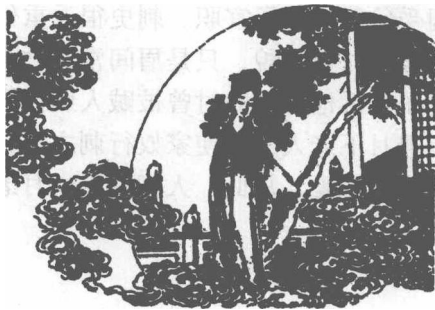
然的仲春二月，地点则是在象征“生旺”的南方。祭礼要用层次最高的“太牢”之礼，而且天子要亲率后妃等前往。《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媒，天子亲往。”（商周之时，曾把其部落祖先简狄和姜源作为高媒，但严格说来，这两位高媒并不能划入婚姻神。）

女娲是女性高媒，还有一位男性高媒，那便是伏羲。传说伏羲创制婚娶之礼，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婚姻之神。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社会地位的提提高，这位后起的男性高媒也占据了至尊至贵的地位。

2. 月光娘娘

月亮，古称“太阴”。

温柔皎洁，是母性与美的象征，曾触发过古人无限的遐思。



嫦娥奔月传说在中国家喻户晓，嫦娥被视作月神，圆月的月亮被视作人间团圆的象征，于是嫦娥便被看作能使夫妻团圆的婚姻神。

图 7-2 嫦娥（采自《中国婚礼》）

据文献记载，我国很早就有“朝日夕月”的祭祀仪式，表现了我国先民对月神的崇拜。月神又叫做月光娘娘、太阴星主、月光菩萨等。有关月亮的传说不胜枚举，最为著名的当数嫦娥奔月。圆圆的月亮被看作人间团圆的象征，嫦娥也因此成为一位能使夫妻团圆的婚姻神。怀春少女常在月下祈祷，能遇上一位如意郎君；热恋中的男女常在月下定情，海誓山盟；分处两地的夫妻则常向月神祈求团圆。我国少数民族的“跳月”、“坐月”习俗，也包含着向月亮女神祈求美好爱情的寓意。

3.月下老人

“月下老人”简称“月老”。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一语，即出自月老的传说。唐李复言《续幽怪录·定婚店》载：

从前有个叫韦固的人，年少未娶。一日天晚经过宋城，遇到一位倚囊而坐，正在月光下翻阅书卷的老翁。韦固甚感奇异，即问其所读何书？老翁答曰：“这是幽冥之书，是关于天下婚约的书。”韦固又问，囊中那一根根的红丝线作何用处？老翁说，那是用来拴夫妻两人的脚的，任凭男女两家有深仇大恨，分处天南地北，只要将这红丝绳系到双方的脚上，最终一定会结成姻缘，而且无法改变。老翁还告诉韦固，他将来的妻子是离这儿不远的一位卖菜陈大妈的女儿。韦固按老人指点来到菜场，只见一位卖菜的老妪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女孩，女孩长得十分难看。韦固心想，我怎能娶这么难看的女孩为妻呢？但老人又说过，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如何是好呢？思来想去，别无良法。情急之下，让一家奴将其刺杀。家奴领命而去，在女孩额头上刺了一刀，不及细看，就急着逃走，没料到只刺伤了女孩眉心的皮肤。

十四年后，韦固因受父荫，得了官职。刺史很看重他，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刺史的女儿长得花容月貌，只是眉间常常贴着一个花钿。韦固觉得奇怪，便问她缘故。妻子告诉他自己幼时曾被贼人刺伤眉心的事。韦固听罢惊讶不已。就将自己夜遇月下老人，指使家奴行刺之事，一一说了出来。二人认为缘分前定，于是更加恩爱。从此，人们就将“月老”看作主管婚姻之神来加以膜拜。

4.牛郎织女

在中国，“牛郎织女”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

相传，织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聪明俊俏，多才多艺，在天上编织美丽的云彩。牛郎是人间受兄嫂虐待的牧童。织女见牛郎忠厚勤劳，便下凡和他成了亲。从此两人男耕女织，相亲相爱，并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王母



图 7-3 月下老人 (采自《中国婚礼》)

娘娘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把织女捉回天庭。牛郎将两个孩子一边一个放在箩筐里，挑起担子，赶上天去。王母娘娘见了，拔下头上簪子，在空中一划，牛郎与织女中间马上出现了一条波涛滚滚的大河。从此以后，夫妻两人只能隔河相望，相对哭泣。后来玉帝动了恻隐之心，让他们每年七月七日夜相会一次。这一天，各地的喜鹊成群结队飞来，用身体连成一座鹊桥，让牛郎与织女“鹊桥相会”。

于是，银河两边的牛郎织女星，就成为了忠贞爱情与灵巧智慧的象征。在每年的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的美好夜晚，人们纷纷供陈瓜果、香烛，礼拜双星，希望从牛郎和织女那里乞得灵巧、智慧，以及美满婚姻。牛郎织女也因此成为象征爱情忠贞、婚姻美满的天神。过去很多地方都有织女庙，苏州太仓的织女庙最为著名，青年男女到织女庙祈求爱情甜蜜，婚姻美满。

5. 氤氲大使

民间信仰的婚姻神中有一位叫氤氲大使。宋人陶穀《清异录》载有一事：

有一个叫朱起的青年，暗地里爱上一个叫宠之的女子，但两人相爱却障碍重重，朱起因而郁郁寡欢，神情恍惚。一天他送别来访的朋友，一直送到郊外，回来时在路上遇到一个青巾道袍、挑着个药篮的道长。道长对他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终于走近他身旁，对他说道：“郎君幸得遇我贫道，否则

危矣！”朱起闻言，不禁吃了一惊，即刻下马作揖，问个分明。那人说：“你有心事，请跟我直说，我可以给你解难。”朱起即将他与宠之之事告诉了道长。那道长叹道：“世上的男女姻缘，都由繾綣司总揽，那儿的长官叫氤氲大使。有缘分的男女，要下了鸳鸯牒才会成功。我把你的事跟他说去。”分手时，青巾道长从篮子里取出一把扇子，对朱起说：“这把戏扇子叫坤灵扇，你去探望宠之时，只要以扇遮面，人家就看不见你了。自此以后，你们七日可得一见，十五年而止。”朱起回去以后，试用道长教他的方法，果然应验。从此与宠之相会，来去无阻。十五年后，宠之病逝。



图 7-4 清代画家吴友如画织女图（采自《中国婚礼》）

“氤氲”一语，源出《周易·系辞传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本指天地阴阳之气的聚合，其后升格神化为主管人间男女婚姻的“氤氲大使”，为世人所崇拜。上述故事流传之后，人们对“氤氲大使”的膜拜就更虔诚了。氤氲大使似乎比月老更近人情：月老红线一系，即不容更改，氤氲大使却还让人说情，显得更富同情心。

6. 和合二仙

在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人举行婚礼时，喜堂正面的墙上一定要悬挂和合二仙的画像。二仙形象是两个胖乎乎的男孩，蓬头笑面，一个手持荷花，一个捧着圆盒。

苏州人认定，和合二仙就是枫桥寒山寺的寒山、拾得二僧。民间传说，他俩原居北方僻远乡村，虽为异姓，却亲如兄弟。后来，寒山与拾得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子，却互不知晓，待到临近婚期才真相大白。善良的寒山便弃家

出走，来到苏州枫桥镇，削发为僧，结庵修行。拾得知其良苦用心，也舍下恋人，到处寻找寒山。后来听说寒山在苏州枫桥，便也到了枫桥镇。他折了一枝盛开的荷花前去会面。寒山见拾得到来，也兴奋不已，连手里捧着的盛饭斋盒也来不及放下，就迎了上去。二人相见，不禁大喜，相向而舞。拾得也入佛门当了和尚。直到现在，寒山寺里还保存着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他俩的画像和名字。老百姓称之为“荷盒二仙”。“荷盒”实为“和合”之谐



图 7-5 和合二仙（采自《中国婚礼》）

音，苏州人将他们视为夫妻和合之神，作为婚礼时膜拜的对象。结婚时，一定要拜天地与和合。拜天地以示庄重，拜和合以求夫妻感情笃厚，和谐好合。

除此之外，我国民间还有奉花神、海神、潮神等为婚姻之神者。至于举行婚娶大礼时敬奉的天公、地母、喜神以及床公床婆之类，那就更多了。

中国百姓为什么要相信和崇拜这些婚姻之神？民间广为流传的、其中都蕴含“姻缘天定”之意的众多俗语，又说明了什么？论者多以祈求夫妻和美、家庭幸福和“宿命论”解释。窃以为不然。

我们认为，中国百姓崇信婚姻之神，认为“姻缘天定”，婚姻以“天作”、“天赐”和“天造地设”为美，实际上表明了中国百姓在处理婚配这一人生最

为重大的问题上，力求“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吉凶”，“必崇效天”的思维宗旨，追求“人谋”与“鬼谋”的合一。就是说，人间男女的结合婚配，人为的努力必须同时又是“天作”、“天赐”、“天造”、“地设”，符合“天意”，才是好的、美的和成功的。这在本质上是易学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观的体现。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意识里，“神”既指天神、神灵，如《周礼·春官·大司乐》所说：“以祀天神”；同时也指天地阴阳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玄妙与奇异，此即《周易·系辞传下》所说：“阴阳不测之谓神”。中国人在崇敬天神的时候，对它所体现出来的运动规律，同样也是崇敬和依顺的，这便是《墨子·天志上》所说：“当天意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则必得罚。因而不能简单地视为宿命论。这一点，与后面介绍的“六礼”之制与“合八字”婚俗结合考察，更为清楚。

三、应时以会男女的择偶民俗

《周易·系辞传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归妹·彖传》说：“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男女必须结合、交配，才能孕育生命；女归男，男娶女，使人类得以繁衍不绝，是天地之大义。很多民族在其繁衍发展的进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让青年男女聚会，自由结交，甚至交媾、婚配的习俗。

周代设有媒氏一职，“掌万民之判”。“判”即半；即将各得一半的青年男女合成夫妇。媒氏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年仲春二月，聚会国内适龄青年男女和已婚而鳏寡之男女。在这时候，人们可以尽情交往，“野合”、私奔也不加禁止，不以违礼论。若无丧祸等重大变故而不服从命令，不参与，还要受罚。^①

为什么要选择仲春二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因为这时阴阳交和，春暖花开，玄燕回归，万物生机勃勃，人受天时影响，也是春情荡漾，因而是男女婚配的最佳时机。所以郑玄《注》以“顺天时也”解释。这是民俗事象“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又一例证。

^①《周礼·地官·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诗经》之小序曾多次说到这种男女间的自由交往。如《野有蔓草·序》：“思遇时也。君子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有狐·序》：“刺时也。卫之男女失时，丧其妃耦焉。古者国有凶荒，则杀礼而多昏，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管子·小匡》所说与此略同。《诗经》中《溱洧》、《桑中》、《东门之枌》等都是这种男女和合场面的写实。上古文献中所谓“齐社”、“燕祖”、“云梦”、“桑林”、“桑间濮上”，也都是这一习俗的反映。秦汉时期到处可见的野合画像砖，就是这一习俗的“写生图”。周时二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国家行为，就是因为民俗难以禁绝，与其堵之，不如导之的“随俗”举措。

已故周予同先生指出：“儒家的根本思想，乃是生发于‘生殖崇拜’观念的。而崇拜生殖的观念，正是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结构之一。事实上，只有理解儒家和传统礼教文化这种崇拜生殖的精神，方能理解中国人所以重多子，以多子多孙为福，并且人口如此众多的原因。”^①

与汉族仲春二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相似的习俗，国内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如壮族的三月三歌圩，苗族的“游方”（即赶坡会）、“走寨”，侗族的花炮节、“多耶”与“月耶”（都是唱侗歌，前者是在本寨唱，后者是村寨间的侗歌比赛），仫佬族的走坡节，毛难族的庙节和赶六圩，京族的哈



图 7-6 汉画像砖·野合图（采自《中国古代性文化》）

^①转引自何新《诸神的起源》，第 140 页，三联书店 1986 年。

节（“哈”在京语中是唱歌的意思，哈节即歌节），彝族的祭公节，水族的端节、卯节等，都是给青年男女提供互相接触、选择情侣的机会，时间也多半是在令人春情荡漾的春天，一样是“奔者不禁”。

四、谋求“人谋”与“鬼谋”合一的婚娶六礼

古人认为，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关系到家族生生不息的大事，为诸礼之本，所以必须“敬慎重正”（《礼记·昏义》）。男女婚配，绝不仅仅是基于生理需求的简单结合，更意味着孕育新的生命，哺养、教育儿童，赡养老人等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责任。家庭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所以“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如何使家庭稳定，夫妇之道久远呢？我国先民可谓费尽心思。传说是女娲或伏羲最早创造了婚姻之礼。但我国直到西周以前，婚礼仍是比较简略的。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其中就有婚礼，但还不完备。到了战国或更晚一点，学者们把各地的流风美俗，汇集一处，载于《礼记》、《仪礼》，形成了完备的婚姻“六礼”仪式，影响此后中国社会数千年，作用十分巨大。

“六礼”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是婚姻礼仪的六个环节。

纳采，俗称“提亲”，一般是男家父母派媒氏向相中的女家提出议婚动意。古时“六礼”除了纳征，礼品都少不了雁。后世江南习俗，是男家托媒人带了写有“遵求”、“遵允”等字样的两副帖子到女家去提亲。倘女家将“遵求”帖留下，而将“遵允”帖送回，即表明女家已同意议婚。

问名，古时是询问女子及其生母的名氏，后世则直接是询问女子的生辰八字，所以民间将“问名”叫做“请八字贴”。

纳吉，男家请得女子名氏及生辰八字后，请阴阳师占卜测算，须无关防克害；或是将之放在神案上，三天内家中无碗碎甑破等不吉利事，即将喜讯报告女家，婚事可成，否则告吹。这时男家带去的礼品，俗称“下小定”。

纳征，即定亲。“征”是“成”的意思。经过占卜或算命，得吉兆，双方都同意缔结这门亲事，男家即择吉日向女家下聘礼。后世称为“下聘”、“下定”或“下大定”。

请期，即男家确定结婚日期后，敬告女家。为表示不敢自专，故谦称为“请期”。后世称为“送日子”。因为婚姻为人生第一大事，关系重大，所以一

般都要请算命先生根据两人八字来择取，一点都不能马虎。

亲迎，即男家将新娘迎娶进家。这是婚礼的高潮，要举行拜堂成亲喝合卺酒等一系列隆重仪式。

在以上六步婚礼进行曲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人物往来其间，即媒妁。旧时，“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礼记·曲礼上》）若欲婚配，必本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古人为什么要设计出如此繁缛的婚姻礼仪，还要弄出一个令青年男女十分讨厌的媒婆来呢？其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一基于人类生理需求的男女结合，通过这些繁缛的仪式和三媒六证，变得隆重并且神圣，使当事人认识到婚姻的严肃性，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使家庭稳定，夫妇之道长久，社会稳定。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考察。



图 7-7 媒婆提亲（《金瓶梅·王婆子贫嘴说风情》绣像）

第一，关于婚礼用雁的问题。《礼记·昏义》注引《白虎通义》曰：“雁，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节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大雁是候鸟，依时序之变而飞南或北；同时，大雁又有择偶的习性，一经择定，终身不变，具有忠贞的品格。因此，古人议婚以雁为礼，表达了男女双方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愿望，对女子而言，则又多了一层“从一而终”的寓意。这就是古“六礼”中除了“纳征”都用雁的原因。

后来大雁减少，活雁难得，民间或以面为雁代替，或是以茶为礼。古人认为茶树以籽下种，一经下种，就不可更移，移植即不能存活（其实茶树是可以移植的），象征爱情的坚贞不移，“从一而终”。所以原先的“纳征”礼，亦改称“茶礼”。

第二，既注重“人谋”，更注重“鬼谋”，追求“人谋”与“鬼谋”合一。陈澧《礼记集说·昏义》注云：

“夫采择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以纳采，而次之以问名，此资人谋以达之也。谋既达矣，则宜贵鬼谋以决之，故又次之以纳吉焉。人谋鬼谋皆协从矣，然后纳币以征之，请日以期之。故其序如此。”

旧式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般都是男女双方的父母（其中又以男方为主），经过考察了解，看中某一位对象之后，再请媒人前往议婚，“纳采”、“问名”。陈氏称之为“人谋”。接下来的“纳吉”则为“鬼谋”。实际上其后的“请期”，也是“鬼谋”。因为“纳吉”是请算命先生测算男女八字，俗称“合八字”；或是将女方年庚八字放在神案上，都是诉诸于神；“请期”，则是以男女八字为根据，选择大吉大利之日。古时是以龟筮占卜，后世改用择吉之法。这也是诉之于神。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讨论过，择吉术的实质，就是根据天地自然以及阴阳运动所反映的规律办事。《易传》云：“阴阳不测之谓神。”天地自然奇异玄妙的运动变化，就是“神”，而其本质，依然是天。因此，古人设“六礼”，追求“人谋鬼谋皆协从”，就是追求人与天的合一，即天人合一。通过人与天的合一，达到夫妇之道的长久。

第三，三媒六证，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公证”。古时喜用“三媒六证”形容婚姻之郑重。《元曲选》载武汉臣《生金阁》二：“我大茶小礼，三媒六证，亲自娶了个夫人。”“三媒”，并不是说请了三个媒人，而是说媒人在男女双方商议婚姻的过程中，两边反复奔跑。“六证”，就是婚姻过程的“六礼”仪式。男女议婚，依“六礼”之序进行，消息必然传播于世，形成社会认知。一旦到了“纳征”阶段，即便尚未举行婚礼，也形成了“婚姻之实”，不论男或女，都是很难更改的。若是举行了“亲迎”之仪，亲朋前来庆贺，又祭拜了天地、祖先，那就不但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公证”，并且是“神

鉴”也一并有了的。这样，对婚姻当事人，就构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劲的道德的、社会的，乃至神的舆论压力，促使他们承担起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善待配偶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促使婚姻当事人尤其是男子，婚后不可乱伦，不可“红杏出墙”有婚外性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不论男或女，谁还敢轻易提出离异，轻易背叛家庭呢！家庭因此就可以稳定，夫妇之道就可以长长久久了。

第四，营造男女“同尊卑”相对平等的家庭氛围。在整个封建时代里，男尊女卑是最基本的社会特征。但就家庭而言，绝对的男尊女卑，并不利于夫妻和睦、家庭稳定。“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传下》曰：“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只有当阴与阳，或男与女，都以相对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感、“合德”的时候，才能更好地化生万物。所以《周易·咸》就提倡“止而说，男下女”，男的应该尊重女的，主动与之进行交流。

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婚姻礼仪，都包含有强调男女同尊卑的内容。《礼记·昏义》就说，新郎将新娘迎进门后，随之便是：“共牢而食，合卺而酹，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共牢”，是夫妇同吃一牲；“合卺”，最初是将一瓠分为两半即两瓢，夫妻各执一半以饮。后来变成饮交杯酒。陈澧注曰：“合卺有合体之义，共牢有同尊卑之义。体合则尊卑同，同尊卑则相亲而不相离矣。”

“合卺”之礼，古今相沿，至今仍颇受欢迎。古人创设此礼，表面上是表示男女结合，开始夫妻生活；更重要的，是要表示男女双方都是平等的，二者合为一体，组成家庭，同尊卑，共命运，相亲相爱而不相离，共同承担起家庭的社会责任。这表明，古人认识到，在家庭里，夫妻之间一定要相对平等，尊卑相同，才能相亲相爱，最后达到家庭稳定“不相离”的目的。这同《周易》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夫妻恩爱，“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始终为世人所称道。简单地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都是男尊女卑，至少是不全面的。

旧时代中国家庭关系稳定，夫妇之道长久的社会实际，当然有经济生产、意识形态即教育等诸方面的原因，但婚姻“六礼”仪式所发挥的作用无疑也是十分重大的。无怪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热情洋溢地赞美：“在我们自己，一方有月下老人的暗中牵线，一方有祖宗的监视，一方还有鬼神来作证，这样把确立个人关系的婚姻弄成了一件热热闹闹的社会举动，更把这和生物基础十分接近的俗事，转变成了好像和天国相通的神迹。为了这双亲

①陈澧《礼记集说》，第3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抚育，我们不能不敬服人类在文化上所费的一番苦心了。”^①这段话如果再加上句，即“社会的公证”，将更完美。

五、“合八字”以定婚姻之习俗

《周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无论世间万事万物多么纷繁复杂，均为太极所生之两仪；按其气，为阴阳二气；按其质，则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大类。阴阳五行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同时也是万事万物生存发展、兴旺衰败的根本原因。世间万事万物的兴旺与衰败，都是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结果。人也不例外，人也有阴阳，也有金、木、水、火、土之别，所以也遵循着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规律。

按《周易》阴阳观，男为阳，女为阴，男女都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命。因此，男女婚配实际上可以看作是阴阳五行的组合。阴阳五行有相生相合相比，亦有相克相妨相冲相害。有的夫妻相亲相爱，白头偕老；有的夫妻情深似海，中途却遇丧偶之痛；有的夫妻先集后散，劳燕分飞；有的夫妻早晚打斗，形如仇敌；有的富有，有的贫穷……一样的夫妻，却有百样结果，促使古人考虑：这是否就是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在男女婚姻上造成的结果呢？汉代民间就有“男女早死者，夫贼妻，妻贼夫”之说。（《论衡·偶会篇》）

我国民间为了获得婚姻的美满，家庭的幸福，努力将“人谋”与“鬼谋”相结合，追求天人合一。唐宋以前，民间在纳采、问名之后，一般是用易卦或巫筮占测婚姻的吉凶。吉则合，凶则罢。到唐代，李虚中首创以人的生年月日所值干支推论人的生死祸福。韩愈《李虚中墓志》云：李虚中“最深五行术，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到宋代，连同人的生时也一并参用，形成了“四柱”即“八字算命术”。熊伯龙《无何集》引《五杂俎》云：“自宋而后，并其时合参之，谓之‘八字’。八字之说出，言命者愈入愈深，愚者信之，虽智者亦多惑。”于是，先前以易卦及巫筮占测男女合婚吉凶、请期，一变而为“合八字”，并迅速汇为习俗，广为遵循，少有例外。

^①费孝通《生育制度》，第7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言云南婚娶的择配标准：“（甲）门第相当；（乙）财产相当；（丙）宗教相同；（丁）家庭无劣声者；（戊）男女八字不冲克。”并指出，五条之中，“以末一条最为要紧。”又言宁夏婚俗：“婚礼，媒妁既通，必取男子年庚对合，无忌刻为定。”南京婚俗：“男家欲迎娶，先将男女八字送星家取吉，必使无冲犯，无刑克之良辰，以全红柬，上记新人沐浴宜何时，水倾何方，新人上轿何时，合卺何时，避忌何人。谓之送日子。”^①

在某种意义上，唐宋以后我国民间男女婚配，与其说是定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勿宁说是定于男女年庚八字。这一时期，民间以年庚八字男女定婚姻，大致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按双方的“五行年命”推断婚配之可否，即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判断婚姻能否成立。民间认为，两水、两火、两土、男金女水、男土女金、男土女火等年命相生相成，俱大吉昌；而两金、两木、男金女木、男金女火、男木女金、男木女水、男木女土、男水女土、男水女火、男火女金等则相克相妨相害，若勉强结婚，必罹灾殃。这里的五行年命，是根据纳音五行决定的。

第二种，是合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均衡五行。这方面的讲究最为复杂。《三命通会》论女命八字，以成“纯”、“清”、“贵”、“和”以及“福寿两备”、“安静守分”等格局为佳；以“浊”、“滥”、“媚”、“淫”、“旺夫克子”、“旺子伤夫”、“伤夫克子”等格局为凶。有的命书则推崇男女年柱相生相合，认为年柱为“根”，只要年柱生合，或“天合地生”、“地合天生”，就不怕年命相克、属相相刑及柱中其它凶煞。还要考虑男女八字五行的均衡伍配，如女的八字伤官多，要配男的比劫多的。还要考虑男女八字对双方父母及媒氏的妨害，等等。

第三种，是以十二生肖配合判断，属相冲害及不和者不能婚配。民间流传甚广的“男女属相配婚”歌云：

“从来白马怕青牛，羊鼠相逢一旦休。

蛇见猛虎如刀断，猪遇猿猴不到头。

龙逢兔儿云端去，金鸡见犬泪交流。”^②

即以马与牛，羊与蛇，鼠与蛇，蛇与虎，兔与龙，鸡与狗，猪与猴诸属相相克，不宜婚配。其它属相则无妨，尤其是蛇与猴、兔与狗组合被认为大吉大利，可使人“福寿双全”、“万贯家财足北斗”。

^①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

^②引自《增补万全玉匣记》。

这三种判断男女婚配吉凶的方法，姑不论其有无科学性及所含科学性之程度如何，仅就前二种方法而言，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与阴阳易理相符合。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周易》是阴阳学说的理论渊藪，阴阳五行学说实质上是易学易理的发展和完善。《周易·咸·彖传》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周易·归妹·彖传》说：“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化生”的前提是“阴阳合德”。（《周易·系辞传下》）如果阴与阳、天与地不合，相冲相克，则不但不能化生万物，自身也会受到伤害。男女婚配也是阴阳交感，若两者的阴阳五行属性不是相合相生，而是相冲相克，即便能孕育生命，其生命力以及所构成的共同体的持久能力，也是大受影响的。因此，旧时以五行年命及生辰八字推论男女婚配之可否，与阴阳易理是相符合的，并且还颇富辩证法之意味。如《李虚中命书》卷上言“甲人”所以为“本家贵人”，是因为“有戊有庚有丑有未是也。”因为“甲阳木，戊阳土，庚



图 7-8 八字帖

女方将待嫁姑娘八字写在纸上，即为“八字帖”，由媒人传递给男方。此八字帖比较考究，八字由铜皮制成，装订在裹有红布的硬纸板上，四角和中间还缀有饰物。（采自《中国婚礼》）

阳金，皆喜土位，而未得土之正位；丑者，土之安静之地，”故为“大贵”。

第二，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夫妻和谐、家庭幸福、多子多孙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譬如：

民间认为，两金、两木、木金、木土以及水火年命的男女不宜婚配，否则将难免“日日时时相打斗”、“相争又去打妻头”、“自徒相打”、“多相打”和“水火相煎”的结局。——这是对夫妻和谐、家庭和睦、生活安定的期盼。

金木水火土五种年命交替相配，共得二十五项不同的婚姻组合形式，其中“全无男女”、“生得男女是虚花”、“生得男女多病死”者三项；“子孙满堂”、“人财两旺”、“家财男女万般有”、“宅内荣华生贵子”之类者十一项。两项相加得一十四项，超过了半数。——这是对多子多孙、子孙满堂、家族人丁兴旺的期盼。

在五行年命的二十五种婚姻组合中，言及“贫”、“富”者共有二十项之多！两木、金木、木金、木水、木土、水土、水火、土木之男女之所以不宜结为夫妻，是因为他们的结合将会导致“田宅破败”、“家财耗散”、“一生贫穷”的恶果。木火、金土等年命的男女婚配之所以被认为大吉大利，则是因为他们不但能“常有资财”、“堆金积玉”，而且能“永葆寿命久长”。——这是对贫穷的畏惧和对生活富裕、长命富贵的热切渴望。

还有一些年命的男女若婚配，会导致“遗书嫁别郎”、“夫死妻孤”、“孤寡独自贫愁哭”；或是导致“官讼灾殃”、“遭逢官讼”。

凡此种种，可知旧时我国民众几乎把不同五行年命或生辰八字组合的婚配，看作是日后贫富寿夭等的决定性因素。无怪其信仰如此执着，连新人沐浴后的脏水，都不敢乱倒，一定要选好方向后再泼了。

而这种执着的信仰，众多的婚配禁忌，正是中国民众力图以后天扶补先天的积极努力。先天的八字不可更改，人们期望通过后天理想的婚姻组合以获得美满生活，实现人生理想，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生生不息的追求！不可简单地斥为迷信。

六、寓祝吉祥多子、平安富贵的婚礼用物与仪式

男女联姻，“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人生“大事”。同时，它又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给青年男女以种种神秘的憧憬和期待，是一件让人激动的“喜事”。因此，举办婚礼叫做“办喜事”；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叫做“大喜之日”；赴婚宴叫做“吃喜酒”。结婚的前夕或当天，人们会在新房里张灯结彩，新房的门窗上以及箱柜盆桶上，统统都要贴上纸剪的大红“喜”字。人们往往还要将花草、鸳鸯、祥云、飞鸟等图案与“喜”字组合，使之带有更为丰富的吉祥寓意。

喜堂上，“喜幛”张挂，上面写着“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天成佳偶”、“龙凤呈祥”、“天赐良缘”等祝福吉庆语，满堂喜庆。喜堂和洞房门口等处，“喜对”高贴，大书“洞房双双映红烛，华堂日日暖春风”、“枝头梅绽春来早，堂前榴开福占先”等祝颂之联，一屋生辉。

旧时聘礼和嫁妆中常有一组礼品，包括兔毫毛笔两支、金锭或银锭一只、如意一枚，寄寓着“必（笔）定（锭）如意”的良好祝愿。后来有人干脆将



图 7-9 纸剪“喜”字（采自《中国婚礼》）。

这几样东西做成金银或铜质的模型：金锭上交错着一只如意和一支毛笔。

嫁妆中，一只油漆得色彩斑斓、油光铮亮的马桶，在很多地区也是不可少的，叫做“子孙马桶”或“子孙桶”、“百子桶”。这是供新妇以后分娩孩子用的。因此，子孙桶中往往还要放五只染成红色的鸡蛋。蛋为鸡子，“蛋”与“诞”同音，放蛋在桶内，今后也就会“诞子”于桶了。蛋必取五枚，是取“五子登科”、“三男二女”之意。子孙桶带到男家之后，要请一小男童先在里边撒一泡尿，以为日后生男之兆。

旧时迎娶新娘多用花轿。花轿一般是租借。租用的花轿要在前一天下午抬到新郎家，停放在大厅上，然后在轿身上插上许多红烛。晚间，百烛齐燃，这叫做“亮轿”。目的在于驱除轿内的妖邪之气。花轿到了女家，女家还会请一位老妇，手执镜子或灯火，在轿内照耀一通，这叫做“照轿”，或叫“搜轿”。这也是为了祛除不祥。

新娘花轿在迎亲队伍的前呼后拥之下，吹吹打打来到了新郎家门口时，



图 7-10 迎亲净桶 (采自《中国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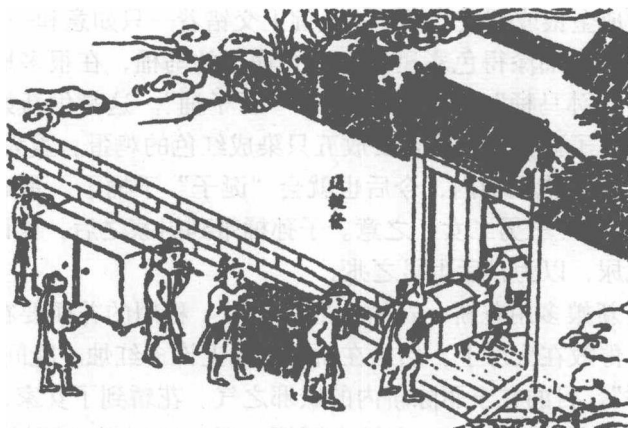


图 7-11-1 清代婚娶图之送妆奁

事先安排好的人，要向花轿抛撒谷子、豆子以及铡断的稻草等物，叫做“撒谷豆”。这一习俗汉时已有，载于高承《事物纪原》，意在驱逐围聚在家门口的青牛、青羊、乌鸡三个煞神，以免新人冲犯，损伤了家中尊长日后没子孙。

新娘进门前，当然少不了燃放鞭炮。那辟辟拍拍的爆炸声，是要将可能尾随新娘而来的鬼魅妖邪驱赶走，而那高高蹦起的鞭炮，又具有“高升”的吉祥寓意，充满喜庆气氛。

新娘要进门了。她先要跨过娘家人预先备好的马鞍，手里还得拿着个苹果，意味着日后生活“平平安安”。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录》记载，这是从北朝沿袭下来的老传统了。门口摆放着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有的地方旁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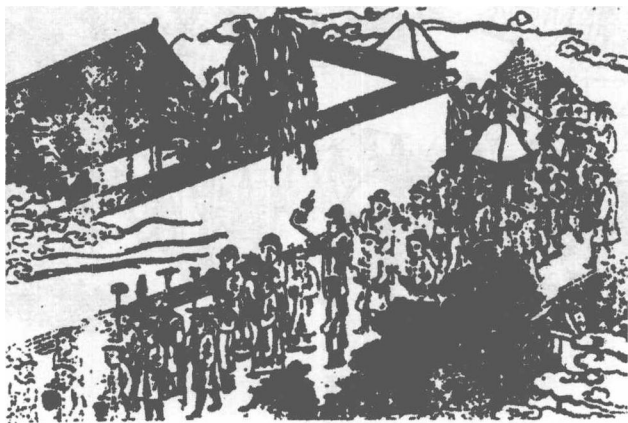


图 7-11-2 清代婚娶图之迎新人

还站着一人，手里拿着一把盐。新娘从炭火上跨过去时，他就往火里撒盐，让火苗“呼”地燃起。新娘子得小心跨过。不过万一烧着一点也没关系，因为这正是生活“红红火火”的象征，烧着了，说明马上要“红火”了。

接着是拜堂。新夫妻一拜天地，这是要天地作证，以示庄重；（有些地区还要拜和合，期望夫妻感情笃厚，和谐好合）二拜高堂父母，这是要孝顺父母，继承宗嗣；最后是夫妻互拜，表示要同尊卑，互敬互爱。

拜堂之后，男女两家要各拿红绿绸布，挽成同心结，红男绿女，夫妻各执一端，以此表示“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之意。

在由喜堂通往洞房的过道上，苏杭等地的习俗，地上要铺棕织的麻袋，由几个儿童递相传接，新夫妇足不沾地行走其上，寓意“传宗接代（袋）”。白居易有诗云：“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说的也是这种习俗。可知此俗唐时已有。

夫妻二人挽着同心结，相依进入洞房，男为阳居左，女为阴居右，坐于床沿，这叫“坐床”。洞房里，花烛高照，锦簇辉煌。正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这时，任是“丑媳妇”，也得“见家婆”了。蒙在新娘头上的那块既为辟邪，也为遮羞的红盖头，要在众人的瞩目下掀去。有的地方是由新郎用秤杆挑，这是希望婚姻“秤心如意”。有的地方是由婆婆或一“全福”妇女用红甘蔗挑，这是祝愿新婚夫妇婚后生活甜甜蜜蜜，家道兴旺节节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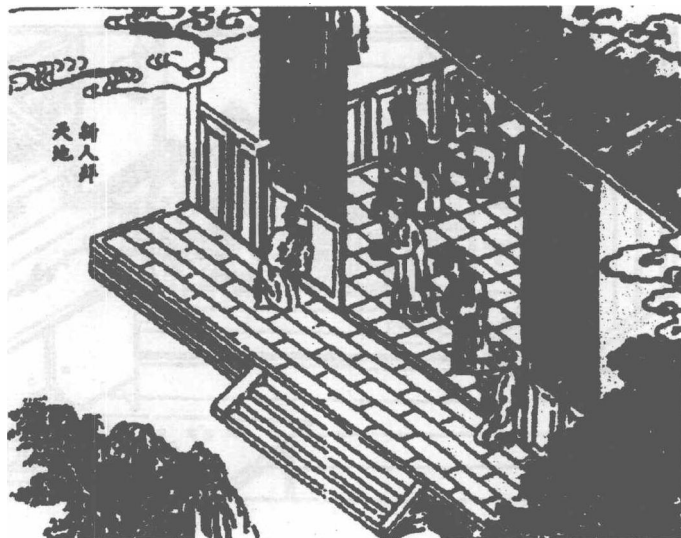


图 7-11-3 清代婚娶图之拜天地

新床之上，散放着枣子、栗子、花生、瓜子、糖果等物。或是将上述诸物放在盘子里，请一“全福人”向新婚夫妇和床上抛撒，边撒还要边唱“撒帐歌”。祝愿新夫妇“早生子”、“早立子”，并且还要有男有女“花”着生，生活甜甜蜜蜜。

接下来的“合卺”，更是婚礼少不了的重要节目。在周代，卺是用葫芦一类的瓠瓜一剖为二做成的盛器。婚礼中，新婚夫妇各执一半，用挽成同心结的红绿丝线扣住它们的底部，将它们联结起来，新婚夫妇用卺中酒轮换对饮。瓠瓜味苦，用瓠瓜盛酒，意味着夫妇今后要同甘共苦；瓠瓜又是制作乐器的材料，以瓠为饮器，还寓有夫妻琴瑟和好的意思。宋以后，合卺礼演变成了饮交杯酒的习俗。现在，饮交杯酒又衍化出了新郎新娘互喂圆子等甜食的习俗。祝愿夫妇同甘共苦、白头偕老、永志不变的情怀始终不变。

古人认为，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与人的生命属性是相连的。三国时曹操即有“割发代首”的故事。所以头发被用作表达坚贞爱情的象征。古时结婚，有“结发”之礼。新婚之夜，男左女右共髻束发。用以表达新婚夫妇坚贞不渝的爱情。“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曹植《曹子建集》卷六《种葛篇》）。结发之后，就表示两人从此结为一体，永不分离，夫妻之道长长久久。所以“结发”就有了原配夫妇的含义。后世不少地区依然保持此俗。

喝了“合卺”酒，中原及北方地区，人们还要给新夫妇吃饺子或面食，



图 7-11-4 清代婚娶图之合卺

称为“子孙饽饽”。但这饺子或面食最多仅煮五六成熟，吃时旁人发问：“生不生？”新夫妇尤其是新娘，一定要答：“生！”这项仪式求的是“生”，即生孩子。

我国的婚礼习俗，看起来像是一场戏，但却是最为真实的人生戏剧。所有参与的人都是全情出演，都是真情投入。所有的礼品用物都是真情寄托，人生渴望。全无一点游戏的味道。中国民众对早生、多生、多子多孙的追求，对夫妻和谐、家庭幸福、长命富贵的期盼，《周易》“生生不息”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真实、最直接、淋漓尽致的展现。“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生生之谓易”。《周易》中极其深睿的哲学精神，在婚礼中变成了一个子孙桶、一根根红甘蔗、一只只生猪蹄、一把把花生，以及马鞍、苹果、秤杆、红烛、莲芯、桂圆、石榴、枣、栗、半生饺子……用品用物千姿百态，表现仪式各具风采，而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美好生活，生生不息！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生殖民俗既是《周易》“生生不息”精神产生的根源，同时又是其赖以生长、繁茂的沃土。

最后谈谈新妇至门撒谷豆及稻草之俗，是应用了阴阳易理的化煞之法。明·周祈《名义考》载：

“京师娶妇之家，置草于门，以俵方尺幂其上，人多未知其故。昔汉京房之女适翼奉子，奉择日迎之，房以其日三煞在门。三煞者，青羊、青牛、



图 7-11-5 清代婚娶图之鼓乐待客

(图 7-11-1~图 7-11-5 采自《中国婚礼》)

乌鸡之神，新妇犯之，损尊长及无子。奉俚新妇至门，以谷豆与草襌之。京师迎新妇置草者，犹踵此也。”

据其所载，三煞羊牛鸡，于十二辰为未丑酉。但旧时通书所言三煞，一般都是连续的。太岁在寅，则三煞在未申酉。未申酉为羊、猴、鸡。其中猴少见，牛常伴，且与未相冲，故取丑牛以代申猴。这是三煞神之由来。三煞牛羊鸡，喜食青草谷豆。京房以其所喜饲之，变害为利，转凶为吉，就是阴阳易理“化煞法”的应用。

七、以顺天优生为宗旨的房事禁忌

中国可说是讲究性知识和性卫生最古老的国家。据纬书记载，远在 2500 多年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曾写过《闺房记》一书，惜已久佚。以此可知我国民间对性卫生知识的探索由来甚古。

传说在黄帝时期出了一位性爱女神，名叫“素女”，她经常与黄帝讨论男女交合之事。据文献记载，素女原来是黄帝手下的一个音乐之神，弹得一手好琴，后来一变而为擅长于男女交合之道的性爱之神。到战国至两汉之间，出现了一部以《素女经》命名的性爱之书，魏晋六朝时期开始在民间流传，隋唐之间尤其盛行。《隋书·经籍志》即著录有《素女秘道经》一卷并《玄女经》，及《素女方》一卷等书。据敦煌写卷记载，敦煌唐人有夫妇同看《素女经》的习惯，可知此书对民间性生活习俗的影响极大。

《素女经》中有关性爱性卫生方面的知识十分丰富，我们这里仅就影响民间较大的性禁忌作些阐述。

《素女经》认为夫妻交合的目的，是为了生育“贤良而老寿”的子女，即优生，提出要“避九殃”：

“黄帝曰：人之始生，本在于胎合阴阳也。夫合阴阳之时，必避九殃。九殃者，日中之子，生则欧逆，一也；夜半之子，天地闭塞，不暗则聋盲，二也；日蚀之子，体感毁伤，三也；雷电之子，天怒兴威，必易服狂，四也；月蚀之子，与母俱凶，五也；虹蝗之子，若作不祥，六也；冬夏日至之子，生害父母，七也；弦望之子，必为乱兵风盲，八也；醉饱之子，必为病癰疽，痔有疮，九也。”

经中所言夫妻交合应当避免的“九殃”，可以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由日月运行而导致的四时阴阳异常变化及异常天象的时候，包括前八项；第二

类是人体在不正常的时候，即第九项。在这两种情况下夫妇若交合，所孕育的子女就会有缺陷，甚至伤及父母自身。

其中的第一类情况，实际上就是要求夫妇交合应当顺应天地自然，顺应阴阳易道，“法象天地”，非时勿交。其实也就是《周易》所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在求子习俗上的具体应用。譬如：

1. “日中之子，生则欧逆。”“日中”即午时，午为“阳极”、“阴生”之时，故不宜交媾；而且人类早已形成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节律，在“日中”之时交媾，与习俗不合。无怪乎孔子在得知幸予“昼寝”，即大白天与妻子交媾之后，大为恼怒，谓之“朽木不可雕也”。

2. “夜半之子，天地闭塞，不暗则聋盲。”“夜半”即子时，从阴阳角度看，这时阴阳正在交替，晦暗不明，天地未通，夫妇若交媾生子，也不利。

3. “日蚀之子，体戚毁伤。”日为阳，并且是人可以感知的最大的阳。古人认为，“日蚀”是阳受阴侵而有伤损；男为阳，与日一气所感，身体也受伤损，当然不宜交媾。

4. “雷电之子，天怒兴威，必易服狂。”古人将雷鸣闪电看作是“天怒”，阴阳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这时夫妻交媾所生之子，易有癫狂之疾。《礼记·月令》有载：仲春二月，“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这是说，夫妇这时如不加禁忌而行房，将来所生子女形体会会有缺损，父母也会有凶灾。

5. “月蚀之子，与母俱凶。”古人把月亮看作是天下最大的“阴”，是母性的象征；“月蚀”是阴受侵而伤损，妇为阴，与月一气所感，也同受伤损，故不宜交媾孕育。

6. “虹蜺之子，若作不祥。”“虹蜺”即虹，古时称为“虹霓”或“虹蜺”。古人认为虹有雌雄之别，色鲜盛者为雄，色暗淡者为雌；雄曰虹，雌曰霓。同为阴阳之精。《春秋元命包》：“虹霓者，阴阳之精。”即阴阳二气相交而为虹霓。《淮南子·说山训》也说：“天二气交则成虹。”民间则以虹为龙，认为虹出现是“龙吃水”。不论是“阴阳之精”，还是“龙”，都是神物；当神在交媾化生万物时，凡人当然应该崇敬、畏惧。而且虹出现的时间一般都是白天。因此，夫妇若在这时交媾孕子，免不了要有“不祥”了。

7. “冬夏日至之子，生害父母。”按阴阳学说，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都是阴阳二气极盛或极弱之时，极不平衡。阳盛伤阴，阴盛伤阳，夫妇感其气，若在这时交媾，那就要“生害父母”了。

8. “弦望之子，必为乱兵风盲。”“弦”即上弦和下弦。每月农历初七、

初八为上弦，二十二、二十三为下弦。这时，月仅半圆，其形如弦，故谓之弦。十五月圆为望。王充《论衡·四讳》：“犹八日，月中分谓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谓之望。”古人认为，月为阴性和母性的象征，“半”（弦）即为体不备；“圆”（望）则是阴盛，与日争明，于阴阳之理均为不美，所以不宜交媾孕子。连同“朔”、“晦”都不好。《齐东野语》卷十九说：“凡妇人阴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于内。晦者阴灭，望者争明，故人君尤慎之。”即禁忌在月中及月终行房。据笔者所知，我国民间至今仍有不少人恪守这一古训。

由此可知，以上“八殃”，源于阴阳易理及天人感应观念。从今天的观点看，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外在环境，对人的情绪无疑会有影响而不利受孕优生，其它方面对受孕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但古人为了追求优生而力求顺应自然，“法象天地”，其精神则是不可否认的。

“醉饱之子，必为病癰疽，痔有疮”为第二类。“醉”即酒醉；“饱”为进食过饱。人在酒醉之后，精子也会因酒精中毒而醉，这时行房而孕生的子女，俗称“礼拜儿”，生下来就是不正常的，走路有如醉汉。进食过饱，房事时腹部受压迫，对身心均有影响，因而不利优生。此外，民间还认为，人在过度劳累，如长途跋涉及剧烈劳动之后，也不宜行房事。这些都是民间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有道理的。

总的来说，古人为了优生及保护父母自身，夫妻性生活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美。前“八殃”，可视为“顺天时”；第九殃为“重人和”。“地利”方面，古人有不可于神庙前后及灶前交媾的禁忌，曾经作过灶的地方也不行。《敦煌掇琐》九零就说：“故灶处安床，令人子孙不利。”在“人和”方面，除了注意夫妻的身体状况之外，还特别重视妻子的态度。清石成金《传家宝》三集卷之四《种子心法第十七》引前人云：“妇人和乐则有子。”这是说，在女子心情平和、愉悦的时候，易于受孕、优生。如何才能让女子身心愉悦呢？功夫当然在于平时，丈夫要尊重妻子，相敬如宾，即《周易·咸》所说：“止而悦，男下女。”总之，古人的夫妻性生活，就是要努力做到“天人合一”。

八、纳妾典妻以求多子之种种婚俗

“天地之大德曰生。”夫妇之大德亦在于“生”。就旧中国而言，则不仅要“生”，更求“多生”。因为“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神圣使命，要求多生；“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经济现实要求多生；家族人多则势众、势强，人少则受欺辱的社会现实，也要求人们多生。于是，为了多生，为了多子多福，产生了种种婚俗。

1. 纳妾制。

由于国人对多子多福的热切渴求，使我国的婚姻制度，由周至清末（包括民国）的数千年间，虽然在礼法上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却始终与多妾制相伴随。陈顾远先生称之为“多妾制中之一夫一妻制”。^①当然，这多妾制与多妻制是不同的。因为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丈夫是齐平的，而妾则是“贱妾”，是卑贱的。在我国，妻可与夫“齐”，妾称妻为“女君”；而妾则为“接”，是“以贱见接幸也。”（《释名》）《汇苑》说：“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为伉丽也。”周秦时期，有终身不能有二嫡的规定。后来法制稍宽，妻死可以扶妾为正，称为“填房”或“接脚夫人”，与“元配”的地位是不能相比的。

妻与妾的地位是绝不相同的。此缘自我国的宗法社会，一方面为胤嗣兴旺可以多娶，另一方面为嫡庶之别，又不得“多妻”，于是有此礼制。此外，还有对家庭稳定及王位继承方面的考虑。《周易·革·彖传》：“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这是说，一男一女才相感应，二女同事一夫（地位无别），就会产生矛盾和变故。《左传》桓公十八年也说：“并后（妾加后）、匹嫡（庶加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

我国社会之多妾首推帝王。《礼记·昏义》说：“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实际上是累百钜千，甚至逾万！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社会上凡有权有势之家，莫不以纳美妾、多纳妾为尚。《韩非子》载有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故事：有一对魏国的夫妇在神前祈祷，妻子祝愿道：“求神保佑我无故获得一百束布。”丈夫感到诧异，问道：“你怎么只求那么少呢？”妻子答：“超过一百，你就要用来买妾了！”（《韩非子·内储说下》）

桓宽《盐铁论》说西汉社会之多妾：“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

^①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书店1984年5月。

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后来虽然在纳妾的年龄及数量上有所规定。如明朝规定庶民四十岁以上无子，允许娶一妾；诸王高官蓄妾，也要到三十以上无子才行。晋朝曾颁布过置妾数量的法令：诸王可置妾八人，郡公侯六人，第一、第二品官令可置四妾，第三、第四品有三妾，第五、第六品有二妾，第七、第八品有一妾。（《魏书·临淮王传》）但世之所尚，一纸法令如何禁止得住！到了清代，奉行放任主义，士庶纳妾，尤其泛滥无度。《红楼梦》中的那些老爷、少爷们，见了年轻漂亮、聪明伶俐的女子，便口水欲滴，想纳之为妾，全无数数。社会上，才十七八岁便有妾者有之；乃至钟鸣漏尽、白发盈头，一旦多收了几担谷米，便欲置侧室者更比比皆是。



图 7-12 大妇小妾享食图，魏晋砖画

（采自《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

旧时男子纳妾，除了生物本能之外，最根本的，就是为了广胤嗣，多生子女，壮大家族势力。无子之妻劝夫娶妾是女性淑德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妈就曾对我说，外公的两个妾，都是外婆亲自挑选的）妻子一旦没有儿子，晚年无依，连遗产也保不住，而妾若生子，在名份上属于主妻，所以旧时妇女若婚后多年无子，多半同意丈夫纳妾。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遂使纳妾之习，一直大行于世。

2. 典妻

这是最为典型的仅为繁衍后代而形成的婚俗。典期的长短及典金的多少由双方商议决定。其中可以区别为两种情况。一是家境富足的人家，婚后数年无子嗣，（或仅无男孩）找一贫困人家而又富于子嗣者，把妻子典当给他，

等生育孩子（尤其是男孩）后，留下孩子，归还妇人。

另一种，是农村中经济特别贫困的男子，娶不起媳妇，甚至连童养媳也买不起，就两三个人共娶一妻，这叫“夥妻”，或是限时间典租他人之妻，以此获得性的满足及生育子嗣。

典妻之俗自宋元之际流行于世，历代官府虽设有禁止之条，却始终无法阻止，因为中国社会对“有子”、“生生”的追求和“无后”的恐怖实在是太强烈了。因此还颇为流行。《清律辑注》就说：“今之贫民将妻女典雇与人服役者甚多。”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极不人道的婚姻形态。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对此有令人心酸的描绘。

3. “七出”

我国之传统，视夫妻为一体，谓之“天作之合”，并以妻子“从一而终”为理想，提倡“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但又不采取绝对的禁止离婚的态度。在律上有“义绝”之条，于礼上则有“七出”之目。“义绝”是因为夫妻赖以共存的共同体破裂，恩已尽，义已绝，故必须离异；^①“七出”则主要是因为妻子不能履行“广胤嗣”的职责或造成妨碍。

“七出”是旧时代丈夫遗弃妻子的七项理由：无子、淫迭、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无子”就是“无后”、绝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然得“出”之；“淫迭”就是淫乱，这会搞乱宗族，混乱血脉，当然也在“出”之列；“不事舅姑”，不顺父母，逆天背德，天诛地灭，更不能容；“口舌”，搬弄是非，会造成家族的离心离德，影响对子女的教育与团结，也得“出”之；“盗窃”是私蓄财货，与家族共财共爨之义不合；“妒忌”是不容丈夫纳妾，直接影响家族子嗣的壮大；身有“恶疾”则影响或不能生育子嗣。

所以，“七出”虽然是旧时代强加给妇女的不平等条约，其主要目的，则是为了“上事宗庙，下继后嗣”，多生优育，多子多福。

^①《唐律疏义》载“义绝”五条：“殴妻之祖父母，及杀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姐妹；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姐妹自相杀；妻殴詈夫之祖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姐妹；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妻欲害夫者。”

4. 同姓不婚

我国自周代开始，实行“同姓不婚”的制度，规定“取妻不取同姓”（《礼记·曲礼上》）。若为同姓同宗，“虽百世而昏姻不通”（《礼记·大传》）。买妾也同样，“不知其姓则卜之”。此后，历代遵循，唐朝还以之入律，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唐律疏议》）。买妾也是如此。虽然我国的姓氏自战国秦汉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或以氏为姓，或因功赐姓，义子袭姓，胡从汉姓，避仇改姓，同姓已非同祖、同宗，无须如此严格。但古代这一婚姻禁令，主要是出于对优生多育的考虑，则是可以肯定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晋语》也说：“同姓不婚，惧不殖也。”族内婚、近亲结婚，会造成“其生不蕃”或“不殖”的结果，影响优生优育，这已为现代科学所证明。这当是古人对人类长期繁衍实践的经验总结。

这一婚姻禁忌，直到现在，我国一些农村大宗族依然恪守遵行，凡同宗男女，出了“五服”也不能恋爱结婚，由此酿成了一些婚姻悲剧。

九、延续生命乐章的冥婚习俗

活着的人要“生”，也能够“生”。追求一世、二世以至万世，生生不息，这好理解。死了的人也要“生”，也追求子嗣不绝，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古人认为，一个人若是无子而死，就会变成“厉鬼”，其中帝王无后称“泰厉”，诸侯无后称“公厉”，大夫无后称“族厉”，^①危害社会。《左传》昭公七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因此，中国人不仅自己竭力追求人丁兴旺，香火不绝，对于那些已婚及未婚，未曾生育即死亡的男女青年，也要努力让他们续成婚配，生育子嗣，香火有继。由此产生了种种离奇婚俗。

1. 冥婚

男女双方生前已有婚约，在结婚之前一方死亡，另一方追殉，两家迎柩合葬；或是男女双方生前未有婚约，死后经双方父母作主，将二者遗骨合葬

^①（《礼记·祭法》陈澧注：“泰厉，古王之无后者；公厉，古诸侯之无后者；族厉，古大夫之无后者。”（见《礼记集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5页）

一处，举行合葬礼仪，都属于冥婚。这种活人为死人完婚的婚俗在周代即十分流行，以至于官府下令禁止。《周礼·媒氏》说：“禁迁葬与嫁殇者。”郑玄注：“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礼相接，死而合之。”指的就是这两种婚俗。周以后的数千年间，此俗一直流行不绝，直至今日，民间仍有行之者，谓之“成阴亲”，或“阴配”。在三国时，曹操即曾为其早亡的儿子曹冲择甄氏亡女举行冥婚，与之合葬。（《三国志》卷二十）

2. 嫁殇婚

男女已经订婚，未及迎娶而男方已死，女家仍将女儿嫁给死去的未婚夫，叫做“嫁殇婚”。



图 7-13 宋代有夫妻交欢图形的墓罐
(采自《中国古代性文化》)

古人认为，女子一经男子聘定，就是男家的人了。即使男子未娶而死，女子也要嫁过去。到宋代理学兴起之后，高唱“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女子出嫁亡夫，在夫家终身守志的情形尤其普遍。这种婚仪，一般是在女子过门时，抱灵牌举行成亲仪式。《红色娘子军》电影中，琼花的一位战友，参军前就是一个嫁殇之女子，而且每天要陪着象征亡夫的木偶睡觉。

3. 娶殇婚

活着的男子与死去的未婚妻举行的婚仪，叫做“娶殇婚”。

与嫁殇不同，男子在“娶殇”之后，一般还可以另行娶妻。这种婚俗，至今仍时有发生。一些地区的父母，在女儿未婚夭折之后，找一男青年，商定给他一笔嫁妆，让他在举行婚礼时先将亡女的灵牌或遗照“娶”过去，然后再去迎娶新娘。男子既可获得一笔不菲的嫁妆，又不影响婚姻之实，故每有乐行其事者。

这些婚俗，在今天看来，颇有几分荒唐。之所以从未绝迹，论者认为，是因为它可给双方家长以某种心理安慰，或是给两家带来政治经济的某些利益。^①我觉得，冥婚之俗至今绵延不绝，根源在于中国人以有子为有福，有子即有靠，有子即香火有继的人生价值观念。中国古人的人生追求，就在于“生”、“多生”，在于人丁兴旺，香火不绝，生生不息。农耕樵牧，读书经商，求升官，求发财，全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家族兴旺。最最惧怕的，就是断子绝孙，香火断绝！未婚而亡，无子而夭，香火无继，在古人看来，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为了弥补他们的不幸，活着的人，应该为他们“续香火”。于是，古人即给这些不幸者过继子嗣，让他们香火有继；给他们择偶“冥婚”，自己生育。反正父母的心意已尽，亡者的“家”已成，便有了（在阴间）生活的依靠和“生”的希望。至于他们能否生育，那就看他们的“本事”和“造化”了。

这是由中国民众炽烈的追求“生生不息”的人生价值观念而衍生的一种民俗事象。

①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冥婚”：“这种婚姻显然荒唐，但在中国古代，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民众之中，这一婚姻旧俗从未绝迹。因为它可给双方家长以某种心理安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刘发岑《婚姻通史》“冥婚”：“冥婚，就是亡男亡女的结婚。姻亲许定之后，婚姻当事人便死了。为了两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便决定用结婚仪式，将亡死的一男一女定为夫妻，冥婚就这样地被发明出来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第八章

张弛有度的岁时民俗

《周易·系辞传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孔子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人们在经过一段紧张而沉闷的艰苦劳作之后，有一个节庆活动来加以调节，以缓解长时间的紧张与苦闷，使之张弛有度，是十分必要的。平时疏于往来的亲友及各种社会关系，也因此得以汇聚交往。在节庆活动中，人们尽情释放，尽情欢乐，庆贺已经获得的丰收，又播下新的生活期望。“天地节而四时成。”（《周易·节·彖传》）人们的身心因“节”而得到有效调节，社会亦在此张弛有度的节律中“往来不穷”，“生生不息”。这便是众多的民俗节日之所以产生并长期传承的主要原因。

一、三阳交泰与正旦习俗

百节年为首。在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众多节日中，最隆重、最富于民族特色的节日莫过于新年了。《礼记·杂记下》记载：子贡参加年终蜡祭回来，孔子问他：“感觉如何？”子贡说：“所有人全都像发了狂一样，那份快乐简直无法形容！”孔子说：“百日之蜡，一日之泽，就不是你所知的了。张而不弛，文武都不能。弛而不张，文武都不会去做。一张一弛，这才是文武之道。”

“蜡”为周时年终大祭之名，秦时称“腊”，相当于后来人们所说的“过年”。

过年习俗基于我国农耕生产的节律。《说文》称：“年，谷熟也。”五谷

大熟则为“有年”。谷子一熟即为一年。但“年”的名称出现却较晚。据《尔雅》记载，尧舜时称年曰“载”，夏代称年为“岁”，商代改“岁”称“祀”，周代才称之为“年”。年俗的定型更晚。周秦以前奉“改正朔，易服色”为国策，历法随代而易，加上国家分裂，年节始终未能定型。直到汉武帝太初改行夏历，国家统一，这才使周秦以前即已存在的各种节俗得以定型，一年一度的年节风俗活动也就因此而沿袭下来。

正月为一年之始，于十二月辟卦配“泰卦”。《礼记·月令》“孟春”郑注曰：“孟春者，日月会于觜，而斗建寅之辰也。正月，三阳之月；泰，三阳之卦，故以配之。”泰卦乾在下，坤在上。乾天在下，表明天气下降；坤地在上，表明地气上升。表示天与地、阴与阳相交，万物因而发育成长，顺遂和畅，这便是“泰”、“通”。《周易·泰·象》说：“天地交泰，后以财（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意思是说，天子或诸侯，应当体会天地通泰之象，裁制天地之道，使之成为对人民生活有用的东西。

所以，我国年节风俗活动在汉代定型下来后，两千多年间虽有发展变异，但其辞旧迎新、辟凶祈祥的宗旨及主要内容基本没变。而其所以辞旧迎新、辟凶祈祥诸习俗，大多不离阴阳易理。今以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有关内容为基础略加剖析，兼及后世之发展变异。

1. 爆竹驱恶鬼。

《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

正月初一日，为一岁之元，一季之元，一月之元，故称“三元”。《神异经》旧题为汉东方朔撰，晋张华注。说，西方山中有一怪物，叫做“山臊”，常在除夕之夜出来活动，冒犯了它就会使人得病，所以人们都不敢睡觉，团坐守岁，以免受害。当雄鸡高唱，预示新年到来的时候，人们便开始了迎接新年的活动。首先是在庭前焚烧竹筒，用以辟除山臊恶鬼。《神异经》^①说：“以竹著火中，火林烨有声，而山臊惊惮。”这是说，竹子遇热膨胀，破裂时发出哔哔啪啪的响声，能吓跑山臊恶鬼。

在古人看来，天为最大的阳；雷是天帝施罚行威的工具。《周易》以震为雷，为长男，为阳。《三余赘笔》说：“雷出天之阳气”，所以称为“雷公”。《山海经》中记载的雷神形象，或为龙身而人头，或为牛形，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山海经·大荒东经》）雷能代天行罚，是阳气和正义的象征，爆竹之声与雷

^①旧题为汉东方朔撰，晋张华注。

声相似，本质属于阴邪的山臊恶鬼当然要惧怕，闻声而逃。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有一则爆竹的灯谜：“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当然，这说的是唐宋以后发明



图8-1 雷神（采自《天地人鬼神图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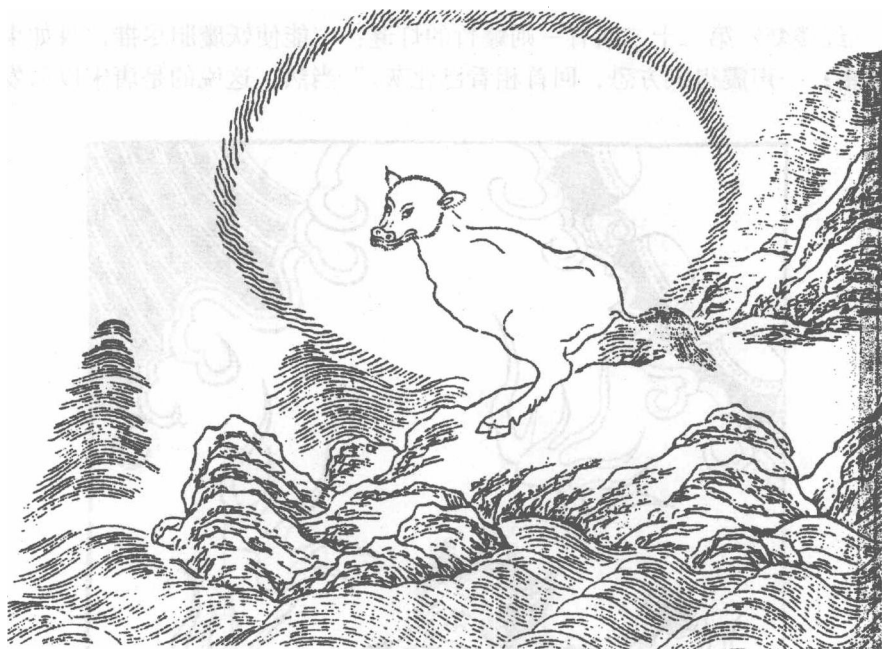


图8-2 夔 (采自《山海经》)

的纸制火药鞭炮，驱邪威力更大。但这时的“爆竹”，也由原来的惊鬼魅变为娱人了。那五花八门、争奇斗艳的各种花炮，把世人辞旧迎新的喜庆心情尽情传送。

2. 挂桃符。

《荆楚岁时记》：“(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

古人认为，人的疾病与死亡都是由恶鬼邪魅引起的，俗有“无鬼不生病，无鬼不死人”之说。值此旧去新来的重要时刻，防止恶鬼进家，驱逐邪魅，迎纳百祥，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元旦在门上悬挂桃板，叫做“仙木”或“桃符”，目的是为了驱鬼辟邪。王安石《元旦》诗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以桃符驱鬼之俗，源于神荼、郁垒缚鬼喂虎的传说，以及桃树这一东方神木本身所具有的神力。桃符代表神荼、郁垒两位门神。到唐宋以后，门神增加了钟馗、秦叔宝和尉迟恭。五代以后，还出现了贴对联的习俗，更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3. 拜年，辟邪求安康。

《荆楚岁时记》：“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飴。下五辛盘。进数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凡饮酒次第，从小起。”

这便是后人所熟悉的“拜年”。拜年以尊卑为秩，先尊后卑，以示敬老。饮酒从幼小起，是说喝酒时，由年纪最小的先举杯，敬奉长者；待一齐举杯后又由年纪最小者先喝，以示庆贺（又长了一岁）。拜年之后的各项行事，全都是辟邪求安康的行为，于阴阳易理之应用尤多。

椒柏酒。即椒酒和柏酒。用花椒浸制者，称椒酒。用柏叶浸制者，为柏酒。花椒为辛辣之物，可以辟除阴邪之气。柏为长青之树，象征长寿。《四民月令》说：“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轻能老。柏是仙药。”（《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引）《本草纲目》称：“柏性后凋而耐久，稟坚凝之质，乃多寿之木，辟邪。”（《本草纲目》卷三十四，木部）故元日共饮椒柏酒，在于利用二物阳精之物性，辟邪祈长寿。

桃汤。取桃树叶、枝、茎三者煮水，叫做桃汤。桃有东方神木之称，古人认为桃能驱鬼。《四民月令》说：“桃者，五行之精，厌服邪气，制百鬼也。”（《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引）这是借其力以驱逐鬼魅邪气。

屠苏酒。一种泡制药酒。陈延之《小品方》说是神医华佗所传之方。用赤术、桂心、防风、菝葜、蜀椒、桔梗、大黄、乌头及赤小豆诸物，放在小袋中，于除夕之夜浸入井中，元旦取出，加酒煮沸即成。饮之，可“辟疫病一切不正之气。”李时珍说：“苏虫鬼，鬼名，此药屠割鬼爽，故名。”（《本草纲目》卷二十五，谷部）（一说为草庵名）

胶牙飴。用麦芽或谷芽等熬粘的软糖。飴，古糖字。

五辛盘。指包含五种辣味的菜。《本草纲目》：“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意，谓之五辛盘。杜甫诗所谓‘春日春盘细生菜’是矣。”（《本草纲目》卷二十六，菜部）一说五辛指葱、薤、韭、蒜、兴蕖（阿魏）。总之，辛即辛辣，食用五辛生菜，可以驱除阴郁之气。《荆楚岁时记》：“五辛所以发五藏之气，《庄子》所谓‘春日饮酒茹葱，以通五藏也。’”

数于散。出于晋·葛洪《炼化篇》。其方，用柏子仁、麻仁、细辛、干姜、附子等物，粉碎为散，取干净井水服食。

却鬼丸。亦出葛洪《炼化篇》。其方，用武都、雄黄、丹散二两，蜡和为丸，如弹丸大小，正月元旦日，男左女右分别佩戴。

关于却鬼丸的由来，有一个传说：江夏刘次卿于正月元旦日到市中游玩，见一书生入市，众鬼皆避之唯恐不及。刘问书生：“你有什么法术令众鬼如此害怕呢？”书生回答：“我不懂什么法术。只是出门之时，家父用一个红色的袋子装上一些药丸，系在我手臂上，以辟除恶气！”于是刘即向书生借用其药。凡所至之处，众鬼也都惊避之。由此世人仿效，遂成习俗。

姑不论有无其事，敷于散及却鬼丸所用诸物，均有驱阴邪、祛毒除瘀积之药效，这在《本草纲目》诸医书均有明载。

《炼化篇》又说：“正月旦，吞鸡子、赤豆七枚，辟瘟气。”（《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引）《肘后方》说：“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引）鸡蛋为阴阳未分之物，后世间常用为小孩祛风。方法是，鸡蛋煮熟后，取蛋白，内包一银戒指或银币，纱布包裹，趁热在小孩脑门上来回滚擦。豆色赤，有辟邪之功；七之数，是《周易》一书揭示的阴阳运行的重要节律，具有十分神奇的功效。《张仲景方》载：“岁有恶气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鸡子、白麻子，酒吞之。”这是说，如果有人被恶气伤害昏迷，可用以上方法抢救。可见，鸡蛋、赤豆，及七之数，确有辟邪除恶之功效，值得研究。

南北朝之后，舞龙舞狮成为年俗中必不可少的活动，极大地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给缺少文化娱乐生活的民众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而其本意，也在于辟邪求吉。龙为东方神物，为阳，为乾，是中华民族崇拜的灵物，是吉祥与生命的象征。人们祭龙舞龙，是为了“娱龙”，以借其神力驱除不祥，并带来雨水与丰收。狮子不是我国自产，民间舞狮祭狮，最初也是为了辟邪求吉。《洛阳伽蓝记》中即有“辟邪狮子，引导其前”的描写。后世民间在门前用石狮辟邪，应用最为普遍。而（石）狮子之可以辟邪，一则在于古人的灵石崇拜，二则在于狮子具有老虎一般的威猛与神勇。



图8-3 宋代岁朝图。表现了主人送往迎来，儿童燃放花炮，一派节日气氛(采自《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

二、北辰崇拜与上元灯节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是夕，千灯竞放，游人如织，锣鼓喧天，火树银花，因而又叫做“灯节”。在辉煌的灯火之中，人们舞龙舞狮，驱凶纳祥，祈祝丰稔平安，尽情欢乐。在享受了彻底的“一弛”之后，又重新投入一年的艰苦劳作。

灯节因何而成？始于何时？归结起来，民间有三种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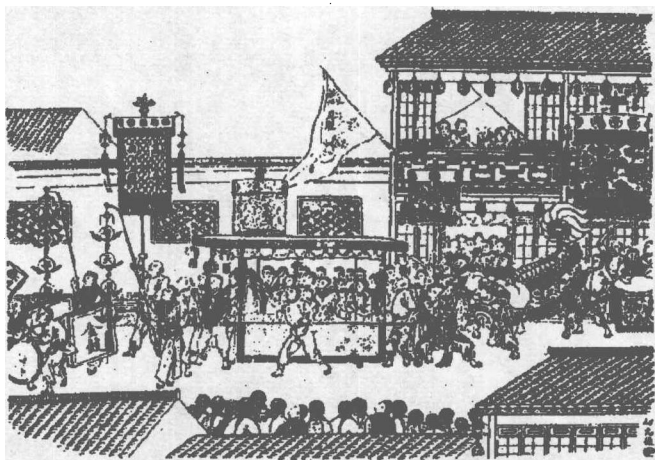


图 8-4 清版元宵灯会图（采自《三教九流大观》）

其一，元宵节与汉初诛灭诸吕有关。公元前 180 年吕太后去世，诸吕谋反。相传正月十五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发兵诛灭诸吕，立刘恒为汉文帝。为纪念这个“升平”的日子，每逢正月十五，汉文帝便令民间放灯，以后逐渐形成元宵节。

其二，灯节起于西汉，与汉武帝相关。传说汉武帝久病不愈，请来上郡的一位巫师与神通话，太一神说武帝病即日将好，希望相会在甘泉宫。没几日，武帝果然痊愈，便于甘泉宫建了一个太一神的祠坛，于正月十五用灯火祭祀，通宵达旦。其后民俗相继，遂成灯节。

其三，灯节始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元 58 - 75 年）。传说汉明帝刘庄为倡导佛教，在每年正月的上元之夜燃灯表佛，并令士族、百姓家家挂灯，由此

相沿成俗。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上元灯节是综合发展的结果。具体而言，是魏晋以来蚕神、紫姑、鬼鸟、占阴阳、偷戏、打簇、登高等民俗事象综合发展，隋时炀帝又加上佛教燃灯的行事，搬演百戏，由此形成后来的灯节。^①

我们认为，以上诸说与元宵灯节的起源与发展都有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祭祀太一神与灯节的关系。《史记·乐书》载：“汉家常以正月上元祭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至明而终。”这是说，正月十五点灯夜祭太一神是汉代的制度，承秦而来。而所谓“太一”，《史记·天官书》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是北极星的代称。从《史记》记载看，放灯祭祀太一就是祭祀北极星，是中国古代北极星崇拜的具体体现。

《周易·系辞传上》：“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春秋繁露·郊义》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在众多的天之象中，古人通过长期观测发现，所有星斗，似乎都在围绕北极星作规律运动，形成一个尊卑有序的宇宙世界。北极星是整个天体的最高主宰。《尚书·舜典》就说：“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孔子说得更好：“（为政）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极星在古人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在汉以前，北极星是在冬至郊天大祭时统一祭祀，没有单独的祭仪。武帝首开其例后，因与星体崇拜传统相吻合，因而得以汇为民俗。

此外，从灯节的发展也能看出灯节与祭星之间的关系。汉代于上元日燃灯一日。唐代在元夕的前后各加一日，即十四、十五、十六日张灯三天。北宋放灯增至五夜，即十四至十八。明代朱元璋定都南京，决定放灯十日，从正月八日到十七日，是我国最长的灯节。正月初八是祭“顺星”的日子，是日诸星下界，人们燃灯一百零八盏而祭之。用灯祭祀其实就是对星辰的模拟。宋代词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就是以星喻灯。灯、星互代，放灯即有与诸星交感，娱悦诸星、迎来诸星，求得太平与丰收的文化含义。从饮食习俗看，民间有“上灯元宵落灯面”的食俗。元宵因形圆，被后世视为团圆的象征。其实它的文化隐义仍是以食拟星：粒粒元宵恰似点点繁星，以此呼应十五祭星（北极太一）的主题。南宋周必大用“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描述正月十五夜锅中热气腾腾的元宵，就是以星来借代元宵。^①

^①王秋桂《元宵节补考》，《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社会民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版。

由此可见，古人元宵节上灯、食元宵等民俗事象，都蕴含着祭星、拟星的主题，人们期望通过这些民俗活动，获得“天父”的保佑，并与之形成交感“互渗”（通过象征律），获取“生生”的最大力量。

三、“见龙在田”与二月中和节俗

中国古代二月有一个传承十分久远而广泛的重要节日，叫做“中和节”，又称“龙头节”。北方地区农谚曰：“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燕京岁时记》说：“二月二，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

龙头节这天，天尚未亮，家家户户用灶中草木灰或谷糠等物，由水缸处起撒出大门，一直到附近井沿或河边止，叫做“领苍龙出，引青龙入”；备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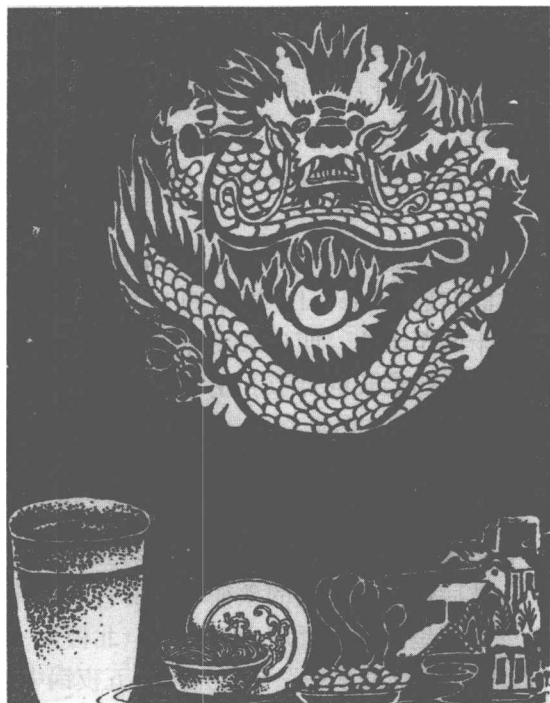


图 8-5 二月二，龙抬头（采自《禁忌与中国文化》）。

①参阅陈江风《古俗遗风·元宵话灯节》，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各种饮食：吃水饺，叫做“吃龙耳”；吃春饼，叫做“食龙鳞”；食面条，叫做“吃龙须”；妇女要停止针线活，以免伤害龙目。^①——这完全是一个敬龙、祭龙、娱龙、祈龙的民俗活动。

这一民俗源于古代的天体崇拜。古人“观象授时”，通过观察日月五星在黄道上的不同位置来判断季节，指导农事。《尚书·尧典》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即以鸟、火、虚、昴等星宿为标准，来确定或调整一岁四时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的仲月，并测知一个太阳年是三百六十六天，用加闰月的方法来调整太阳历与太阴历之间的时差。

古人还常用昏旦时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星宿来定季节。古人将黄道区分为二十八宿，并将它们形象地想象为四种动物，东方为苍龙、南方为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各有七宿，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每当二月初昏，东方苍龙七宿中的角宿便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角宿是龙头的象征，而代表苍龙龙体的其余六宿——亢（龙颈）、氐（龙胸）、房（龙腹）、心（龙心）、尾、箕（龙尾），此时仍隐没在地平线之下。民间将崭露头角的苍龙形象地称为“龙抬头”。史载颛顼帝之时曾“以龙纪历”，其实就是以东方苍龙七宿的出没来确定季节。《周易》乾卦以龙取象，“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其背后，就是这种以东方苍龙七宿确定季节的历史实际。

其中“九二，见龙在田”所反映的，就是二月初角宿已出潜离隐，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的天文现象。时已来，运已转，这位有大德的神龙已经出世，其恩惠必将泽及天下，天下人都高兴见到它，故曰“利见大人”。这是卦象。从时令上看，（二月）“龙抬头”带来了春的信息，意味着气温变暖，雨水增多，新一轮农事活动即将开始。^②农耕最重要的就是雨水，而龙为司雨之神。在龙神初现并开始活动的时候，以礼敬祭，将其接回家中，并以象征性的饮食与之“互渗”，保佑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便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因此，二月二中和节，民间依时敬祭，是以礼确认与龙的“亲缘关系”并将之引请回家以获福佑的一种礼俗。

① 《辑安县志·岁时民俗》、《铁岭县志·岁时民俗》，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4月版。

② 二月仲春建卯，于十二月辟卦配大壮卦。《礼记·月令》“仲春”郑注曰：“仲春者，日月会于降娄而斗建卯之辰也。二月，四阳之月；大壮，四阳之卦，故以配之。”

四、三月“出火”与寒食禁火习俗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但上古之时并无清明日活动的记载，相反，清明前的寒食节，却十分受人重视。东汉以前，许多地区在寒食节期间，不能用火做饭，必须坚持一个月的冷食，以致造成疾病及死亡。

《后汉书·周举传》载：“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

周举到任后，作书祭祀介子推，展开一次极有声势的改革运动。三国时期，曹操以寒食为陋俗，曾明令禁止。但流风余韵，一直未绝。

南北朝时期，寒食节一般为三天。《荆楚岁时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即以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五日为寒食节，是时禁火三日，吃事先做好的饧糖大麦粥之类的食物。

世人大多认为寒食节起源于介子推的故事。说是春秋时期介子推跟随晋公子重耳到处流亡，在重耳最困难的时候，介子推曾有割股啖君的壮举。但当重耳复国做了国君，封赏功臣，介子推却因自谦未能受封。他伤感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于是携老母隐居山中。晋文公知道后，急欲召回介子推，介子推执意不从。晋文公即命人放火烧山，想迫使介子推自己走出来。不料介子推矢志不移，结果被烧死在绵山上。晋文公闻之大恸，便把介子推隐居的绵山封给他，改名为介山，并把烧山之日当作悼念介子推的节日，通令民间禁止生火，自己也带头吃寒食。传说这就是寒食节的来历。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动人的传说。寒食节起源于“禁火”风俗。

禁火风俗由来久远。《周礼·秋官·司氏烜》载：仲春二月，每当玄鸟飞回之时，时俗便“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这是说，周时春分的禁火风俗，是为了季春三月的“出火”。

《周礼·夏官·司燿》又载：“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

对于《周礼》所说“出火”、“内火”，过去多以焚烧炊烟之火解释，这是不合古代本义的。陈江风研究认为，这是“根据大火星的昏见与昏伏的运动规律举行的宗教仪式。”^①

^①陈江风《古俗遗风·高辛与火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原来，“出火”及“内火”之“火”，均指火星，即东方苍龙七宿的心宿，又称为辰星、房星。心宿中央最明亮的红色大星，称为“大火”，或称荧惑星。《诗·豳风》“七月流火”的“火”，即指此星。《左传》襄公九年：“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陶唐氏和高辛氏的“火纪”，以及颛顼氏的“龙纪”，其实都是以苍龙七宿尤其是大火星的隐现规律为依据的上古历法。苍龙七宿由出现到隐没的节律：二月抬头（角），三月出火（龙心），四月出尾（龙尾），五月升至最高点，以后逐渐下降，至秋分，完全隐没于地平线下。许慎《说文》将这一规律归纳为“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因此，当苍龙抬头于东方，“见龙在田”，预示着一个新的农事周期到来的时候，人们为了表示对天和神龙的礼敬，要举行特定的欢迎仪式，以求取一年的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这便是所谓的“出火”；而当大火西沉，即将隐没之际，又举行“内火”仪式为之送行，以感谢上天及神龙一年的赐予。

那为什么要禁火呢？这源于古人的阴阳易理观念，认为龙为水神、司农神，水火相克，龙神怕火。在神龙沉渊之时，火不能克之；当其刚离开水而“现于田”之后，就不胜火克了，尤其是由无数人家的炊烟之火、烧荒耕种之火与制陶烧窑之火，众火汇聚，何以能堪！为使神龙不受伤害，顺利升空，并且愉悦地履行司雨降雨的职责，保障谷物丰收，所以甘愿不举火，服食一个月的冷食，期望用这种虔诚的举动，换取神龙的怜悯与赐福，由此形成了禁火与寒食风俗。

五、“飞龙在天”与端午节俗

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是我国夏季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五月之地支为“午”，“午”与“五”同音，所以端午又称端五、重午或重五。午与五均属阳，故又称“端阳”。因其时古人有以兰草汤沐浴的习俗，所以又叫“浴兰节”。

端午节的民俗活动十分丰富。据《荆楚岁时记》载，在端午节期间，人们到野外踏青，做斗百草游戏，采艾草扎成人形，挂在门上，以禳除毒气；举行划船比赛；采集各种各样的草药；用五色丝织品系在手臂上，叫做“辟兵”，以使人不染瘟疫；在夏至节这一天吃粽子，等等。

端午节究竟因何而起？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归纳而言，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流行久远的传统观点，认为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和宗懔《荆楚岁时记》均持此说。唐朝诗人文秀说：“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二是闻一多先生的意见，认为端午节俗主要源于吴越民族的龙图腾崇拜与祭祀活动，以五采线系臂辟邪习俗，是上古文身风俗的遗迹。三是认为端午节起源于“恶日”。四是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夏至。至于广大老百姓，几乎是一致信从第一说，因为它表达了中国百姓对屈原高风亮节的敬仰，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

从端午节的活动内容看，可以分为两大类。划龙船、吃角黍等是祭龙、敬龙、娱龙；踏青、斗草兼及娱人；扎艾人、系五色丝、采草药等为辟邪除疫。前者喜庆，后者阴郁，两者反差极大。我们从阴阳易理角度进行考察，以解释这一矛盾现象。

首先，从端午节的时间上看。天文学家陈久金先生认为：“将五月五日



图 8-6 端午点雄黄 (采自《禁忌与中国文化》)

定为端午节，只是秦汉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并非固定为初五日，而是定在夏至。”^①这一观点是可信的。《荆楚岁时记》就说：“夏至节日食粽。”说明以吃粽子为特征之一的端阳与夏至原本是相通的。另外，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一文，用大量史实证明，最初的端阳并不拘于“初五”这一日，从五月一日到五月十五，以至十七十八日，都有活动。因为夏至是中气，一般出现在五月中旬前后，所以龙舟竞赛不在初五，而是在夏至前后。^②

那么，端午与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古人以东方苍龙七宿定时，自秋分以后至正月的黄昏，东方苍龙处于一年的潜伏期，称为“潜龙”（潜龙勿用）；二月春分，龙头（角宿）升出东方地平线，称为“龙抬头”、“见龙在田”；至四月黄昏，从地平线升上了天，称为“或跃在渊”；五月夏至，苍龙位于正南子午线一端的上空，称为“飞龙在天”；六月以后开始向西方下沉，称为“亢龙有悔”；至秋分时节，苍龙没入西方地平线下，称为“群龙无首”，或“秋分潜渊”。

在《易》卦，“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一个极好的卦象。它说明，“九五”位高德也高，他刚健正中纯粹，已入圣人之境界，他的德行和智慧，将使天下之人大获其利。从天象上看，它表明阳气自下而上，至此已经盛至于天；神龙由潜而见而惕而跃，此时已经飞上中天。《夏小正》说：“五月初昏大火中。”这“大火”就是苍龙的肝脏；“大火中”就是苍龙位于中天。因此，这是一个神圣的位置，神圣的时刻，一个令人激动、值得庆贺的时刻！在举行过认亲祭礼（二月节）之后，神龙的神威日益显著。现在，神龙已升至中天，势力最为强盛，而且自“抬头”之后，已经为世人的春耕春种播下了一场又一场的及时雨，并且今后还得劳驾它一如继往地赐福于民，自然应当犒赏它、敬贺它、祝福它。因而到了这一天，人们便要举行各种活动，如祭祀、赛龙舟、走旱船、吃粽子，等等。这显然是为了奖龙、娱龙、贿龙之目的而进行的。

其次，从阴阳易理看。五月阳气极，阴气生，古人所谓“五月一阴生”。《礼记·月令》“仲夏”，郑注曰：“仲夏者，日月会于鹑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夏至，一阴始生。”《周易》以“姤”卦配五月，卦辞曰：“女壮，勿用取女。”姤卦是一阴之卦。一阴始生，接着将是二阴生，三阴生，以至四阴，意味着阴盛阳衰。而阳为德，为明，主生；阴为刑，为慝，主死。阴不好，阴盛更不好，所以“女壮”则不能取。《淮南子·天文训》说：“夏日至则阴乘

①陈久金《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②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载《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社会民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阳，是以万物就而死；冬至则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生。”

再从气候上看。农历五月气候炎热，暑气熏蒸，各种有毒的病菌、毒虫、蛇蝎最为活跃，人最容易为时疫所中，染上各种疾病，所以五月有“恶月”之古称，时忌最多。《太平御览》二二引东汉董勋《问礼俗》：“五月俗称恶月，俗多六斋放生。”甚至五月所生孩子也被认为不好，尤其是五月初五所生者，民间有“不举”之俗。如南朝宋的王镇恶于五月初五出生，父母虽不忍杀，祖父王猛却给他取名叫“镇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见《宋书·王镇恶传》）

阴邪气长，毒物嚣张，人们当然要想办法加以抵御。于是便产生了悬艾草菖蒲（后来有挂艾虎之习）、喝雄黄酒、系五色丝、贴赤灵符、采草药等民俗活动。这些活动，显然不是为了祭祀或愉悦神龙，而是为了防病和驱除瘟疫。就端午习俗的发展过程看，唐朝以前，端午习俗活动以防病除瘟疫为主；唐朝以后，竞渡等娱乐活动才逐渐兴盛。

六、以火纪历与祀灶习俗

民以食为天，炊以灶为主，故而民间对灶神的供奉极为普遍。

老百姓认为，灶神是玉皇大帝派到各家各户视察善恶的使者，在每年腊月二十三（一说二十四）日上天，向玉皇述职，汇报人间善恶，到除夕夜再回来上班。灶神与世人每日行为善恶以及死后能否进天堂联系在一起，于是灶神夫妇便成为“人间司命主，天上耳目神”。所以，每当其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贴上一张灶王爷的神像，两旁再贴一幅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贡品少不了胶牙糖、鱼、肉、蔬果、美酒之类，有些人还要给灶王爷的坐骑供上一些草料，以便让灶王爷高高兴兴、醉醺醺地回禀玉帝，缄口不言人之短处。

这个香火极盛的灶王爷，究竟是何许人？民间传说很多。一说灶神名叫苏吉利，其妻名叫王博颊，这两个人后世也称为雉公雉母，或灶王爷、灶王奶奶。（许慎《五经异义》）一说灶神姓隗，有时又自称姓张。（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河南民间则传说，灶王奶奶是玉帝小女，与人间烧火帮灶的穷小伙私订终身，后来几经周折，寻死觅活，争得王母娘娘同情，于

是，玉帝才封这位小伙做了灶王爷。这个灶王爷是个“穷烧火”的。还有一个传说，灶王爷是一位美男子，他娶了郭丁香之后，还与王海棠勾搭成奸。这个灶王爷是个淫夫形象……



图 8-7 灶王爷灶王奶（采自《禁忌与中国文化》）

古书记载又有不同。《礼记·礼器》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月令》说：“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灶。”仲夏与季夏之月亦相同，即夏季三月之祀均为灶。《淮南子·时则训》说：“祝融吴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淮南子·时则训》“其祀灶”高诱注）《淮南子》及《事物原会》等书还以炎帝和黄帝为灶神。如后者说：“黄帝作灶，死为灶神。”

古书记载为我们正确理解灶神的起源，提供了线索。据上古典籍记载，颛顼与唐尧之时，都曾设立专门观测大火星以定冬、夏的官职，叫做“火正”。《尚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可知那时确实是以大火星初昏南中确定夏至的日期。《左传》昭公三年载：“火中寒暑乃退。”杜注曰：“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这是说，大火季夏昏中为暑尽寒兴之兆，这时要祭大火星（即祭灶）；季冬旦中，为寒尽暑临之兆，这时也要祭祀大火（祭灶）。这一记载透露出上古曾实行过一年两季历法（古称“以火

为纪”)的痕迹。

《史记·历书》载：“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对这句话的理解，自东汉起就有分歧。天文学家陈久金先生研究认为：“此处的司天和司地，并不是说重观测天象，黎观看地候，而是重、黎二官均是观测天象以定季节的火正，只是分工不同。南正重负责春夏黄昏观测大火星的方位以定季节。由于春夏阳气盛，故春夏观测称司天；由于秋冬阴气盛，故秋冬观测称司地。这就解决了《礼记·月令》载季夏祀灶神祝融重而汉人又说季冬祀灶神祝融黎的矛盾。十月历有冬夏两个新年，都为上古祭祀火正的祭日，只是腊日祭祀的是火正黎，豕腊日祭祀的是南正重。”^①



图8-8 进天堂·灶王府君牌位

(采自《天地人鬼神图鉴》)。

古人的记载与今人的研究，使我们终于弄清楚，原本掌管火星观测的天文人员，由于观测大火星以定季节、序历法，因而称为“火正”；后人因时间久远对“火”产生错误理解，使火正祝融成为烟火之神，产生了美丽的神话，又由火神再转而成为灶神，形成一条清晰的原型置换线索。^②

①陈久金《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②参见陈江凤《古俗遗风·火正与灶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看到，围绕东方苍龙七宿的出现与隐没的周期节律，形成了一组祭龙、敬龙、娱龙、媚龙的系列性民俗活动：

二月仲春，经过漫长隐伏期的神龙在东方露出头角，“见龙在田”，人们毕恭毕敬地将它祭引回家。这是“龙头节”。

三月季春，神龙缓缓上升，春耕已经开始，正是“春雨贵于油”的关键时刻，所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自愿禁火冷食，以祈求神龙赐与风调雨顺。这是寒食节。

四月孟夏，神龙从地平线升上了天，它“或跃”或“在渊”，神力更大。

五月仲夏（夏至），“飞龙在天”，神龙已经高高升至南天之上，威风凛凛，威力无比，人们兴高采烈地敬贺、犒赏，敬请它继续赐福。这是端午节。

六月季夏，“亢龙有悔”，神龙盛极而衰，逐渐下沉，气候开始转为凉爽，人们依然在躬腰日备礼祭奠它，为它送行。这是上古时期季夏的祭灶之俗（常在立秋之日）。^①

季冬十二月，神龙“潜渊”已经多时，寒气将退，春天将临，人们再次祭奠（即祭灶），敬祈神龙早早降临。

这一系列的民俗活动，说明苍龙七宿尤其是其中的大火星，在上古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代表了时序，反映了天的意志，所以人们虔诚地崇拜它、祭祀它、迎奉它。上古时期苍龙七宿的崇高地位，绝不亚于后来的北斗七宿。但上述一年两次祭灶的习俗，是以一年两季两个岁首的历法为基础的。当这种历法被一年四季一个岁首的历法取代以后，苍龙七宿的至尊地位也随之让位于北斗七宿，一年两次祭灶也相应变成一年一次祭灶，最后定型为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的祭祀活动。人们对它的原始初意，则因时代久远而淡忘了。

最后谈谈“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问题。

我国民间素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俗信。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民俗实际，拜月的主角历来都是妇女，而祭灶的主角则是男性。中秋节男子可以赏月、玩月、咏月，但一般都不去祭拜。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送灶，却是大老爷们的事情。宋人范成大《祭灶诗》云：“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来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鳞，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宋诗钞·石湖诗钞》）即此之谓。

“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道理何在呢？想必是因为月神为女性，并且是漂亮的仙女，嫦娥奔月就是这种传说的一个嬗变形态；而灶神则是男性，并

^①参见陈久金《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且是个美貌而淫荡的男子。如果男子拜月、女子祭灶，就会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嫌，甚至会因为抵挡不住诱惑而发生违礼之事。这是因封建礼教而形成的俗信。

七、“五阴剥阳”与九九重阳

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重阳节。因日月逢九，两九相重，而九为阳数，两阳相重，故有“重九”、“重阳”之称。在这一天，民间有登高、饮菊花酒、佩茱萸、食饵糕的习俗。现在一些地方，将重阳定为“敬老节”、“老人节”。

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已有“重阳”之名，如屈原《远游》诗曰：“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并有登高之举。《事物纪原》载：“齐景公始为登高。”重阳作为一个节俗，至晚在西汉已经形成。《西京杂记》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楔登高。”汉高祖的宠妃戚夫人有一侍儿名贾佩兰，在宫中时，每年遇九月九日，便“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花）酒。”此后魏晋以至隋唐，尤为世人所重。《荆楚岁时记》按语引隋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南朝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关于重阳节的由来，传说颇多。其中最流行的是吴均《续齐谐记》记载的一个故事：东汉时汝南人桓景，随方士费长房学道术，游学多年。一天，费长房告诫桓景说：九月九日这一天，你家会有大灾，你赶紧回家，做一些绛色袋子，内装茱萸，让全家大小系在手臂上，登高饮菊花酒，便可免除灾祸。桓景听罢，匆忙赶回，遵照师傅吩咐，带全家登高。傍晚回家一看，家中的鸡、狗、猪、牛、羊全部暴死。费长房闻讯说：这是家畜代你全家受了祸。根据这一传说，重阳登高之俗，是为了消灾避祸。

魏文帝曹丕则以重阳为美俗。他在给太傅钟繇的书信上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①

实际上，重阳节不论从时间还是从节日活动内容看，都不是祝吉的节日，虽不至于像五月五日那样被视为“恶月”、“恶日”，起码也不能称为“嘉节”。何以见得？

从卦象上看。《周易》十二月辟卦以剥卦配九月。剥卦，坤下艮上，五

^① 《与钟繇九日送菊书》，《全三国文》卷七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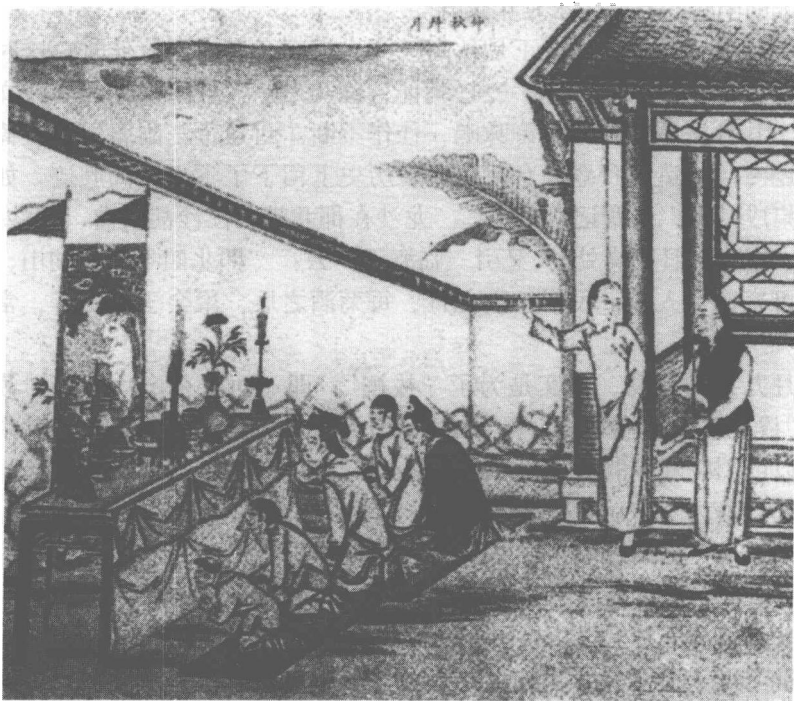


图8-9 中秋拜月图（采自《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

阴消剥一阳，阳处在被阴剥落的时候，故称为“剥”。卦辞曰：“剥，不利有攸往。”因为阴气自五月下生，这时已达到盛极的程度，阳气衰弱，为众阴所剥，群小得势，君子势弱，所以不利有所往。君子处在这种时候，应当“尚消息盈虚”，不可轻举妄动。

从时令上看。九月为季秋，重阳之时已接近霜降，温暖、凉爽的宜人天气已经过去，寒冷的冬天即将到来。这是一个由凉转寒、阳气将被彻底剥尽的节令。人的身体会因此受到日益严峻的考验。

再从数字看。《周易》以一、三、五、七、九为阳数，二、四、六、八、十为阴数。九为最大的阳数，亦称“极数”，所以九被称为“老阳”。而阳极必变。因此，由易理考察，九是由盛转衰、由盈转亏的不吉利的数字。尤其是九月之“九”，本来就已经十分衰弱，再“重”之，弱而又弱，就更不得了了。时令既然已经衰弊，就应当有所救助。由此，产生了重阳节各种民俗行为。

重阳节的节俗，主要有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等活动，稽考其本源，

都是为了助阳辟阴邪、祈求延年长寿。

先看登高。九月初，正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深秋佳时。这时登高远眺，极目千里，饮酒赋诗，一抒胸怀，确实是一大佳事。无怪历代文人墨客，每于其日携酒登高，赋诗咏唱，佳作不断。封建帝王附庸风雅，倚仗其财势，还专门修造九日登高台，因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登高胜迹。如《古今图书集成》引《豫章记》记载：“龙沙在郡北带，江沙甚洁白，高峻而陂，有龙形，俗为九日登高处。”又引《临海记》云：“郡北四十里有湖山，形甚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聚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

九月九日的登高，其实是为了“拔楔”，即《西京杂记》所说“拔楔登高”。“拔楔”，就是拔除不祥。《续齐谐记》所述虽不可尽信，但其中所蕴含登高以助阳辟邪魅的信息，却是真实的。因为低为阴，高为阳；平地为阴，山岭为阳；静为阴，动为阳。九月是“阴剥阳”，阴盛阳衰。此时登高，既有运动之阳，又得高山之阳，就可以扶助九月阳气之不足。这正是《西京杂记》所说为“拔楔”而“登高”的意思。

这一点，与三月上巳拔楔习俗一对比，更加清楚。三月为季春，《周易》十二月辟卦配夬卦。夬卦为乾下兑上，即五阳爻在下，一阴爻在上，为阳盛阴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象。三月是阳气旺盛之时，故此时民间拔楔是临水。《陔余丛考》卷二十七引《韩诗》：“郑国之俗，三月上巳采兰水上，拔除不祥。”又引《后汉书》：“上巳，官民皆东流水上拔除宿垢。”三月上巳日，于水滨拔除，由来已久。平地为阴，水为阴性之物，三月阳气旺盛，到河边以阴性的水拔除不祥，正好可收阴阳平衡之效。九月阳气大衰，当然不能再临水消泄，而一定要到阳气旺盛的高山去拔除不祥。至于后世三月三日的登高之举，那已经是偏离了上巳节俗的本来意蕴，并很可能是模仿重九登高而来的。

饮菊花酒与插茱萸。此二者是重阳节的必备之物，尤其是一些骚人墨客，简直到了无酒无菊不重阳、不插茱萸不过节的地步。古往今来，文人们登高赏秋，饮酒品菊，插茱萸，抒胸意，留下了无数的名篇佳作。但就像登高是为了拔除不祥一样，古人饮菊花酒和插茱萸的本意，也是为了驱除灾厄。《西京杂记》就说：“俗于九月九日以赤囊盛吴茱萸以系臂，登高山饮菊酒，谓可以免灾厄也。”《续齐谐记》故事的意旨也在于此。

菊花，现代中药学将其归入“辛凉解表药”类。性味辛、甘、苦，微寒；有消暑、降热、驱风、祛湿、明目、去翳等功效。制成菊花酒或饮料饮用，可使人延年益寿。《本草纲目》说菊花酒，可以“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

消百病。”《神农本草经》更将菊花列为养身上品，谓“服之轻身耐老”。《风俗通义》载有一事：南阳酃县有一个叫甘谷的地方，谷中泉极其甘美，山上长有一大片野菊花，泉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润。山谷中生活着三十多户民家，全都饮用此水。高寿者百二三十，中寿者也百余岁，若是七、八十岁，就算是“大夭”了。由此可知，菊花确实有延年益寿的功效。九月重阳正是菊花盛开的时候，人们一面赏菊，一面饮用菊花酒，既赏心悦目，又能防病



图 8-10 重阳登高图（采自《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

治病，无怪其为世人喜爱，长期传承。

吴茱萸也是一味防病祛病的良药。医圣孙思邈《千金食治》云：“茱萸，味辛苦，大温，无毒……止痛下气，除咳逆，去五脏中寒冷，温中诸冷食不消。”《本草纲目》：“开郁化滞，治吞酸，厥阴痰涎头痛，阴毒腹痛，疝气，白痢，喉舌口疮。”秋季正是容易发生由夏季多食生冷和秋凉引起脘腹疼痛、呕吐、腹泻等毛病的季节，以茱萸驱风、温中、祛寒、止咳、消食、解痉止痛，的确是非常合乎时宜的。

重阳之节俗，想必是某个通晓易理之人，首倡其议，因其合乎易理，应乎天时，合于民心，所以大家响应，人人乐从，于是代代相续，遂成民俗。

八、“冬至一阳生”与冬至节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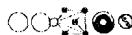
冬至，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中最早确定的一个。据《尚书·尧典》记载，我国在帝尧时期就已经能够确定冬至节。同时冬至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俗。我国许多地方都有过冬至的习俗，并且还十分隆重。《岭表录异》说：“岭表所重之节，腊一、伏二、冬三、年四。”岭南地区节俗尽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冬至大过年”的俗说，至今仍在流传。

事实上，我国以冬至为节之习俗，历史久远并且十分重要。冬至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冬至之后，白天渐长，黑夜渐短。所以古人说：“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周代以十一月为岁首，但一年开始的标志，实际上应该是冬至。因为在冬至这一天，周天子要率领公卿百官，浩浩荡荡地来到南郊的圆丘之上，举行规模最大最隆重的祭天仪式，祈求天帝在新的一年里赐福于天下万民。因此，冬至日的前一夜，便应该是一年的最后一夜。流风所及，直到唐宋时期，仍有人将冬至的前一天晚上称为“冬除”，与除夕相对。《说郛》卷四引《老学庵笔记》：“陈师锡家享仪，谓冬至前一日为冬住（应为除），与除夜之岁为对。盖闽音也。今读《太平广记》三百四十卷有《卢项传》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

据《后汉书》记载，汉代有冬至日“百官绝事，不听政”而放假一天的规定。（《后汉书·志第五》）。魏晋时期，天子于冬至日接受百官及各国使臣称贺，“其仪亚于正旦”。在隋唐宋时期，冬至、元正、寒食是最受重视的三大节日，每至其时，各级官府例放七天假。^①

冬至节重在庆贺，除夕元旦重在辟邪，二者之不同，在于古人的阴阳易理观念。冬至相当于每年阳历十二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日，农历是十一月。《礼记·月令》“仲冬”，郑注曰：“仲冬者，日月会于星纪而斗建子之辰也。冬至，一阳始生；复，一阳之卦，故以配之。”《周易》认为，冬至十一月是阴极转衰、阳气开始生长之时，故以“复卦”配之。复卦，震下坤上，一阳生于下。卦辞曰：“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这是说，自姤卦一阴生起，阴渐长，阳渐消，经过七次变化终成

^①参见王懋《野客丛书》卷十六，《丛书集成初篇·总类》。



复卦。这便是“七日来复”。到了“复”的时候，阳渐进而阴日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所以“亨”，“利有攸往”。

《周易·系辞传上》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系辞传下》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由冬至一阳生，到夏至一阴生，再到冬至一阳生，正好寒暑一周。冬至是以日月为代表的阴阳之气运行周期起始的标志。在阴阳易理，阳为德，为君子，主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淮南子·天文训》说：“冬至则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生。”古人崇阳、厚德、贵生、重君子。冬至日标志着一个阴消阳长、君子势长、德生万物崭新时代的到来，当然可庆可贺，天子要举行规模最大的祭天典礼，老百姓也要用各种民俗活动加以庆贺。蔡邕《独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大学衍义补》卷四十六引）这是古人重冬至节，并于其日举行祭天大礼及其它庆贺活动的根本原因。

阴阳易理以冬至为一年开始的标志，这一点，至今仍为术家所遵循。

九、“亢龙有悔”与“阳月”诸节俗

熟悉中国民俗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岁时节日有很多是在单月单日，如正月初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日。这种情况是因何而成的呢？天文学家陈久金先生认为是由于汉民族的“民族习惯”。他说：“将五月五日定为端午节，只是秦汉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并非固定为初五日，而是定在夏至。……汉朝以后将此节定在五月五日，只是依据民族习惯，喜欢使节日的月序与日序相同。如二月二、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等。”^①

这个观点我基本赞同。接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个“喜欢使节日的月序与日序相同的民族习惯”又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它的思想根源在于阴阳易理，阴阳观念。

《周易》崇阳抑阴，以阳为德、为光明、为仁、为生，以阴为刑、为邪魅、为杀、为死，认为阳好阴不好。同时又认为，物极则反，阳极则反阴，一变而为灾咎。《周易·乾·文言》：“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小象》：“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不仅乾卦，在坤卦、蒙卦、比卦、泰卦以及噬嗑卦等，都有关于亢极而凶的论述。

^①陈久金《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

《周易》六十四卦，“三五同功异位，五多功，三多凶”，是一个基本规律。三与五都是奇数，都是阳位，故曰“同功”；但五是君位，三是臣位，贵贱不同，故曰“异位”；在六十四卦之中，三大多数凶，五大多数有功，这是由于三与五贵贱地位不同的缘故，但三处于下卦之上，是一个将变而多凶的危地，也是其所以“多凶”的重要原因。譬如乾之“九三”，尽管是以阳居阳得正，但由于它处在下卦之上的多凶的危厉之地，所以要“终日乾乾，夕惕若”，才能“无咎”。至于上六或上九，大都是“凶多吉少”。

尽管“变易”、“物极而反”是宇宙万物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本规律，但《周易》对亢极为灾的担忧，对恰到好处地保持事物发展尺度的褒扬，却是一以贯之的。《周易·乾·文言》：“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如果能够正确地把握事物的进退存亡，永远不失其正，那就是圣人了啊！

《周易》这种以极为凶、以亢极为灾厄的观点，被后世数术引为判定事物吉凶的基本依据。如在后世民间应用最广的择吉术中，因极数而被定为凶神的很多。如：

死符，又称小耗，居岁前五辰，《易》曰，“天数五，地数五”，数至五而极（生数之极）。死符位居极数，故有此称。

岁刑。包括子卯、寅巳申、丑戌未三刑。《协纪辨方书》引储泳《祛疑说》曰：“三刑是极数。子卯，一刑也；寅巳申，二刑也；丑戌未，三刑也。自卯顺至子，自子逆至卯，极十数。自寅逆至巳，自巳逆至申，极十数。丑顺至戌，戌顺至未，极十数。皇极中天，以十为杀数。积数至十，则悉空其数。天道恶盈，满则覆也。此三刑之法所由起也。”（《协纪辨方书》卷三“岁刑”）

上朔日。其日忌宴会、嫁娶、远行、上官。《协纪辨方书》按语：“上朔日为不吉者，恶其阴阳与德俱尽也。”（《协纪辨方书》卷六“上朔”）

五行的发展轨迹，是由长生而沐浴、冠带、临官、帝旺，然后是衰、病、死、墓、绝、胎、养。《协纪辨方书》说：“五行之性，临官吉于帝旺。盖临官则方盛，而帝旺则太过矣。故禄命家以临官为禄，而帝旺为刃。选择家亦有岁刃之说。”（《协纪辨方书》卷八“岁禄”）所以，在择吉术中，临官最吉，帝旺则被称为“大煞”或“飞大煞”，以为凶而不用。

由此可知，《周易》“亢龙有悔”、亢极为凶则有灾厄的观念，经众多数术尤其是择吉术的应用普及，使之为广大民众所认同，演变成社会整体意识和“民族习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用这种观念来判断和取舍事物，最后形成

“月序与日序相同”的众多节日。

“亢龙有悔”、亢极为凶，所以，大凡“月序与日序相同”的节日多为不吉。“二月二”是个例外。唯此例外，更可见《周易》以阳亢为不吉的思想宗旨。我们简单分析如下。

正旦，即正月初一日。正月建寅属阳，配泰卦，为三阳之卦，俗称“三阳开泰”。“一”为阳数，且为“生数”。正旦有“三元”之祥。分而言之，两者都很好，不合“二阳”相重，有“亢悔”之兆，故民俗活动在恭贺“新禧”之余，大多为了辟邪除晦。譬如燃爆竹、挂桃符门神，饮桃汤、椒柏酒、屠苏酒，食五辛生菜，服祛鬼丸，敷于散等。后来给小孩的“压岁钱”，原来也是为了“压祟”辟邪。三月三，由上古“上巳节”发展而来。《周礼·春官·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注云：“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祓除”就是祓除不祥，“临水以消灭。”（《荆楚岁时记》按语引）魏以后将上巳定为三月初三日。

五月五日端午节，又称“重阳”、“重五”、“端阳”。月五日亦五，“天数五，地数五”，数至五而极。阳极而阴生，小人道长，其为“恶月”、“恶日”已不待言，故民间忌讳最多。

七月七日，俗称“七夕”。牛郎织女的故事举世皆知，妇女们每于其日“祈巧”、祈求幸福生活，颇有几分浪漫，似乎是个吉祥的节日。其实不然，七月七同样是个不好的节日。古时的七月七，不仅有和端午一样的采药、制药习俗，还有和端午一样的喝菖蒲酒的习俗。

《古今图书集成》引《法天生意》说，“（七月）七日采麻花阴干为末，乌麻油浸，每夜擦上眉毛，脱落者立生”；“芙蓉叶可治肿，干为末醋调一味敷肿上，可消”；“（七月）七日取百合根熟捣，新瓦器盛之，挂于屋内，阴干百日，拔白以此掺之，可生黑发。”《常氏日抄》一书也有很多七月七日采药、制药的记载。如：“（七月）七日采蒺藜子阴干捣末，食后服，治眼失明。”《本草纲目》也将七月七日作为采集某些草药的最佳时期。此外如《外台秘要》、《千金方》、《图经本草》、《韦氏目录》、《淮南子》、《养余月令》等书，以及众多的方志书，都载有很多七月七日采药制药的记载。

七月七日还有像端午节一样午时饮菖蒲酒的习俗。《常氏日录》载：“七夕将午时，酒服菖蒲一二寸，饮酒不醉。”《千金方》也说：“七月七日取菖蒲为末，酒服方寸，饮酒不醉。”

七月七日民间还有沐发防疫的习俗。《浙江志书·开化县》载：“七夕，童男女晨起，以木槿叶春水沐发。”《湖广志书·攸县》：“七月七日，妇女采柏叶、桃枝煎汤沐发。”

这些民俗活动表明，七月七日有与端午相似的节日性质。

九月九日重阳，上文已述，此不赘。

至此，农历之“阳月”仅余十一月（十一日）不成为“恶节”。因为十一月冬至一阳生，阳为德，为生，为君子，象征君子道长，故吉祥可庆贺。而阳气方生，其势正弱小，“重之”，正好可以增长其势，故不视为凶厄。因此，十一月十一日不像其它各阳月一样成为“恶节”，正是阴阳易理观念影响民俗所致。

六个“阴月”中唯有二月二“龙头节”传承最盛。二月二“龙头节”源于对东方苍龙的信仰与崇拜，是一个“佳节”，基本上没有辟邪禳除之类的民俗活动。从阴阳易理上看。二月为阴，二日也是阴。阴而又阴，阴极转阳，是件好事，所以不必辟邪禳除。其余四月四日、六月六日、八月八日、十月十日，以及十二月十二日，都没有形成节日，或是没有成为影响范围较大、传承较久远的节日，原因也在于此。因为从民俗节日形成的根源看，或者是源于远古的信仰与崇拜，如对天地日月、龙及祖先神的崇拜等；再就是源于鬼神观念与恶的观念，而且这部份的数量更多。因为有“凶恶”、“邪魅”，就需要想办法驱避，以后相沿成俗，便形成“节日”。若是无凶无难，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或特殊的历史事件，便不会形成节日。那些被后人称为“良辰佳节”的节日，原本都是些不吉利的“恶月”、“恶日”。当然，构成这些“恶月”、“恶日”的因素十分复杂（如自然节令、鬼神观念等等），但与阴阳易理观念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阴阳易理对我国节日民俗的发生、发展以及最后定型，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第九章

尊重自然、珍惜生命的禁忌民俗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禁忌。一不小心触犯了它们，会使我们倍感尴尬，甚至会引来一些侮辱或危险。所以《礼记·曲礼上》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禁忌是人们为了达到自然、社会、人的圆融和谐即保护自己而编织的文化网络。禁忌的形成十分复杂，很难用几条规律来规范；禁忌的内容极其庞杂，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禁忌具有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积极消极兼而有之，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讨论。这里，我们从阴阳易理角度，对禁忌习俗作一番审视，或许能发现其中蕴含的可以称之为人类生存法则的智慧或理性的光辉。

一、晦日与癸亥日禁忌

我国农历以月亮运行的一个周期为“月”。初一为“朔”，初八与二十三为“弦”，其中初八为上弦，二十三为下弦，十五月圆为“望”，月终为“晦”。在农历月末，完全看不到月光，夜里一片漆黑，使人感到恐怖，因而产生不少禁忌。

《春秋》有晦日不书之制。《春秋》僖公十六年：“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说是那年正月晦日有六只水鸟退着飞过宋国国都。宋襄公对这个不祥之兆感到恐惧。但《春秋》在记载这件事时，只说是正月，没有说晦日。《公羊传》解释说：“何以不（书）日？晦日也。晦则何以不言晦？《春秋》不书晦也。朔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不书。”

兵家晦日忌出兵，否则将出师不利。《左传》成公十六年：“邵至曰：……

郑阵而不整，蛮军而不阵，陈不违晦，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杜预注曰：“晦，月终阴之尽，故兵家忌之。”《史记·匈奴列传》：“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晦日百官休息，不治事。《魏书·尔朱颜伯传》：“……又此年正月晦日，令、仆并不上省。”《新唐书·宋申锡传》：“时二月晦，群司皆休。”洪迈《夷坚志》还记载了宋代四位官吏由于晦日上班做事而被雷霆震死的事情：

绍兴二十一年二月晦日，大庾令连潜，正午在府中治事，众书吏手持文书侍立四周。忽然，一股黑气从庭中进入，整个大厅顿时昏暗下来。紧接着雷霆大震，众吏人全部被击倒在地。连潜十分惊恐，手足颤抖，也仆于案桌底下。后来，众人将其扶起，检视府中，一共被震死四人：两个录事，两个治狱员。

民间朔晦日禁忌也不少。

晦朔日不可裁衣。《敦煌掇瑣》：“晦朔日裁衣，被虎食，大凶。”

晦日夫妇不可同房作爱。《齐东野语》卷十九：“凡妇人阴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于内。晦者阴灭，望者争明，故人君尤慎之。”据笔者所知，民间至今仍有恪守此训者。

河南修武一带有初一、十五不洗衣裳的禁忌习俗。据说如此，则以后红白大事不会遇上刮风下雨的坏天气。否则，婚丧时就会遇雷雨。其它很多少数民族都有朔望日的禁忌民俗。

癸亥为六十甲子之终，民间关于癸亥日的禁忌也不少。比如：

癸亥日忌出兵。《后汉书·邓禹传》：“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邓）禹因得更理兵勒众。”

汉代以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为“反支日”，其日忌上表章。《后汉书·王符传》：“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

旧时民间《通书》以春季的乙亥、夏季的丁亥、秋季的辛亥、冬季的癸亥，合称“四穷日”，其日忌出军征战、建造房屋、娶妇嫁女、拜官上任、纳财开市，以及干其它德喜之事。又以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前一辰为“四绝日”，其日忌出军、远行。

古人还认为，男子到了六十花甲之年，应该禁绝房事。《白虎通义·嫁娶》：“男子六十闭房，何？所以辅衰也，故重性命也。”（《白虎通义》卷九）

《协纪辨方书》是我国最重要的择吉术代表作。据此书十二月“月表”所列，凡癸日、亥日，忌讳最多。如癸巳、癸酉、癸未、癸卯、癸丑，与丁亥、

己亥、辛亥、乙亥等日，有半数以上的时间，只宜祭祀、沐浴、扫除屋宇、修剪手足甲、补垣塞穴之类事情。特别是癸亥日，在十二个月中，“宜祭祀沐浴”者3个月；只能沐浴者4个月；“宜祭祀、沐浴、扫除屋宇”、“宜祭祀、解除、沐浴”、“宜祭祀、沐浴、修饰垣墙、平治道途”者各1个月。在剩下的两个月里，干脆什么事也不能干：“诸事不宜”。由此可见，凡值六甲之末的癸亥日，只能是洗洗澡，扫扫房子，祭拜祖灵，或是干些修桥铺路的积德事，或者是啥也不能干，只好在家里闭门思过的。

古人为什么忌讳晦日与癸亥日？“晦”为一月之末，当晦日之时，夜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会使人产生恐怖感，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月亮属阴，晦日为月之末，为阴之尽。所以杜预注曰：“晦，月终阴之尽，故兵家忌之。”《齐东野语》说：“晦者阴灭，故人君尤慎之。”在《易》，阳为德，为明，为生；阴为刑，为晦，为死。阴慝而极、而尽、而灭，其凶不亦甚乎！所以古人大忌之。连孔子著《春秋》也不书晦日。

至于癸亥日，其理亦然。癸为天干之末，为阳绝之辰；亥为地支之终，为阴绝之辰；癸亥则为六十甲子之尽，阴与阳俱绝，都是不吉利的，所以忌之。《周易》曰：“物不可穷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我们据此可知，反支日之所以忌上表章，是“恶其将尽也。”因为戊亥朔，其日即为支“将尽”；其余申酉朔在二日，午未朔在三日等，也都是“将尽”。“四穷日”之忌，乃在于乙亥为“春木之尽”；丁亥为“夏火之尽”；辛亥为“秋金之尽”；癸亥为“冬水之尽”。“四绝日”之忌，乃因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季之始，则四立之前一辰即为四季之终，故亦不可用。《白虎通义·五行篇》释“男子六十闭房”之因：“法六月阳气衰也。”按易卦，阳气极于四月乾卦，至五月一阴始生，此后阴气渐长，阳气日衰；至六月为二阴遁卦，阴气更强，阳气更衰。男子为阳，六十象六月遁卦，阴盛阳衰，故应“闭房”以辅其衰。不论是否有人以及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但易理如此。

如果我们同意“生生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周易》一书的主导精神，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质；那么，上述对穷尽和阴极（或终极）的种种禁忌习俗，正是对发展的推崇和执着追求，是中国文化“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体现。

二、两分两至禁忌

两分两至，即春分、秋分，夏至与冬至，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中最早确立，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节气。古人用土圭测量日影的方法来确定两分两至的日期。春分、秋分昼夜长短相同，称为“日夜分”；夏至白天最长，称为“日长至”；冬至白天最短，称为“日短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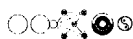
古人以阴阳观察世界，以阴阳论吉凶，两分两至是阴阳运动过程中十分奇特的日子，所以禁忌很多。

《礼记·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发声，……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乃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仲夏之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燥，止声色，毋或进；”仲冬之月，“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所定矣。”

这是说，春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相等，开始打雷，春分前三天，天子命人摇动木铎警告天下百姓：要打雷了，夫妻不得同室行房，若不守禁制，将来生下孩子会性情怪异、肢体不全，并且全家遭祸。《月令》没说秋分的禁忌，实际上是省文，因为春分与秋分都是“日夜分”，二者的禁忌应该是相同的。夏至日不仅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而且是阳极阴生，阳死阴生，阴气与阳气互相斗争，正是万物生死的分界。象征小人得势，君子势消。所以君子应当斋戒敬神，小心谨慎，禁止房事，嫔妃也不得进御待夕。冬至之日，白天最短，阴极阳生，一阳始生于下，万物生机开始萌动，但这时的阳气依然十分弱小，阴气仍很强盛，所以君子仍需稳定身心，不妄生事，禁除色欲，安神养气，以利阳气不断滋长。

《素女经》说：“冬夏日至之子生，害父母。”

唐代医圣孙思邈《千金方》，对性禁忌有更详细的阐述：“天地震动，卒风暴雨，雷电交作，晦朔弦望，月煞日破，大寒大暑，日月薄蚀，神佛生辰，庚申甲子，本命之日，三元八节，五月五日，名山大川，神祠灶庙，僧宇道观，圣贤像前，井灶前后，火光闹烘。以上时地禁忌须慎之，不可交合。犯之者，大则寿夭，小则生病，或若生男，令其丑貌怪相，形体不全，灾疾夭寿。”所言不仅包括两分两至、电闪雷鸣等不好的自然环境，连神佛生辰、庚申甲子、本命之日等等，都要加以禁忌。



这些禁忌，根源在于古人的阴阳观念与生育观念。《周易·系辞传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但“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前提是“合”，是“交感”。《系辞传下》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咸·彖传》：“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在两分两至之时，阴阳乖戾，死生相争，显然有悖“相合”、“相感”的原则，不利“化生”，更不利优生。就现在看来，那些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夫妻的心情确实有不好的影响。

古人有至日休兵、闭关之制。《白虎通》说：“至日所以休兵，不兴事。”因为出兵作战，一定得敌弱我强才能取胜。夏至是“一阴始生”，小人势长，君子势消，于我不利；冬至是“一阳方生”，阳气正弱，也不利出兵作战，而应当休兵蓄势。《周易·复·小象》：“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这里所说的“至日”是冬至。按天地四时之性，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故《月令》于其月“涂阙廷门闾，筑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闭藏也。”虽然一阳已经初生，但仍十分微弱（朱熹《周易本义》称之为“微阳”），应该静养以待其定。“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人类的所有社会事务都应该与天地相应，“待时而动”，所以在冬至之时，军事上应当休兵，政治上应当“不省方”，商旅也要静待不行。否则就是“逆天”了。

民间两至日的禁忌也是不少。《清嘉录》载：“夏至日为交时，……居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据说这些禁忌都害怕会引起老天爷下雨。夏至日最忌有雷。俗谚云：“夏至有雷，六月旱；夏至逢雨，三伏热。”

冬至为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民间有冬至日吃饺子的风俗，俗称“安耳朵”。河南一带忌冬至不吃饺子，认为如此会冻掉耳朵，也于农事不利。俗谚云：“冬至不过冬（指不食饺子），扬场没正风。”浙江一带冬至日要吃赤豆粥或红米饭以驱鬼，忌吃白米饭。这是相当古老的习俗，据说是驱赶神话中共工氏的一个最会作恶事的儿子。冬至日还有忌出嫁女人夜宿娘家之俗，说是如此会克死夫家家长。俗谚有“娘家住个冬，夫家去个公”之训诫。这大约也是因为，冬至日一阳初生，其势甚弱，应当静养勿动，以蓄其势。媳妇跑去娘家过夜，就是削弱或破坏了夫家的阳气，所以忌之。

三、方位禁忌习俗

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在出行和建造房屋上有很多方位方面的禁忌俗制。战国时期，民间流行一种与后世择吉通书类似的《日书》，是当时人据以选择日时的实用手册，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关方位的禁忌不少。仅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所载出行方位禁忌就有：

“以甲子、寅、辰东徙，死。丙子、寅、辰南徙，死。庚子、寅、辰西徙，死。壬子、寅、辰北徙，死。”

《归行》条：“凡春三月己丑不可东，夏三月戊辰不可南，秋三月己未不可西，冬三月戊戌不可北。百中大凶，二百里外必死。”

《归行》条：“毋以辛壬东南行，日之门也。毋以癸甲西南行，月之门也。毋以乙丙西北行，星之门也。毋以丁庚东北行，辰之门也。凡四门之日，行之敷也，以行不吉。”

建造方位禁忌则有：

“春三月，毋起东乡（向）室；夏三月，毋起南乡（向）室；秋三月，毋起西乡（向）室；冬三月，毋起北乡（向）室。有以者大凶，必有死者。”

为何有此禁忌呢？我们先看第一条出行禁忌和建造禁忌。

按阴阳五行学说，春三月属木，旺于东方；夏三月属火，旺于南方；秋三月属金，旺于西方；冬三月属水，旺于北方。干支配五方，甲乙居东，丙丁居南，庚辛居西，壬癸居北，戊己居中。甲子、甲寅、甲辰忌东行，丙子、丙寅、丙辰忌南行，庚子、庚寅、庚辰忌西行，壬子、壬寅、壬辰忌北行，实为忌冲本方或旺方。春三月忌起东向室、夏三月忌起南向室等建造禁忌，也是如此。

出行禁忌的第二条，与后世择吉通书的“岁煞”同。据《协纪辨方书》，岁煞寅午戌月在丑，巳酉丑月在辰，申子辰月在未，亥卯未月在戌。都是根据三合五行之理而取。按三合五行之序，寅巳申亥均为“长生”之位，“生”之前为“养”位。物未成形（即未生），即有所冲动，必受伤损，所以称之为“煞”，忌于其时出行。由此可知，这条禁忌的取义与冬至日一阳初生之时须静养戒动基本相同。

《归行》的第二条出行禁忌要复杂一些。按天干五行方位，辛壬居西北，《日书》以之为“日之门”，后世称为“天门”，与东南（后世称为“地户”）相冲，其日忌向东南行，是忌冲“地户”；癸甲居东北，《日书》以之为“月



图 9-1 五方之神（采自《天地人鬼神图鉴》）

之门”，后世称为“鬼门”，与西南相冲，其日忌向西南行，是忌冲“人门”；乙丙居东南，《日书》以之为“星之门”，后世称为“地户”，与西北相冲，其日忌向西北行，是忌冲“天门”；丁庚居西南，《日书》以之为“辰之门”，后世称为“人门”，与东北相冲，其日忌向东北行，是忌冲“鬼门”。这四门，都是方向相反，五行相克，古人设置此忌，是要顺应天地之性。《周易·豫·彖传》：“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天之所助者，顺也。”（《系辞传上》）以上四者，均不符合“顺以动”的原则，故忌之。

秦简《日书》所载修造方位禁忌，直到现在，民间仍有习从之者。如河南林县一带立门习俗：“春不宜建东门，夏不宜建南门，秋不宜建西门，冬不宜建北门。”否则必有灾祸！^①

^①郑晓江主编《中国辟邪文化大观》，花城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669页。

四、太岁禁忌习俗

大凡对中国社会及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太岁”。《协纪辨方书》引《神枢经》：“太岁，人君之象，率领诸神，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总成岁功。以上元阙逢困敦之岁起建于子，岁徙一位，十二年一周。若国家巡狩省方，出师略地，营造宫阙，开拓封疆，不可向之，黎庶修营宅舍，筑垒墙垣，并须回避。”（《协纪辨方书》卷三“太岁”引）民间以太岁为“年中天子”，其所在方位，绝不敢冲犯，禁忌甚严。



图9-2 太岁（采自《天地人鬼神图鉴》）

我国古代对太岁的信仰与禁忌起源甚早。据记载，至晚到殷末周初即有避太岁的习俗了。《尸子》说，周武王伐纣，大臣鱼辛谏阻道：“岁在北方，不宜北征。”（《尸子》卷下）但武王没理他。《荀子》中也有关于武王伐纣，出兵迎太岁的记载。

汉代社会信之尤笃。《论衡·讥日篇》说：“世俗既信岁月，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触犯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位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文中所说之“岁”，指的就是太岁。当时的《移徙法》说：“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论衡·难岁篇》卷二十四引）抵太岁，即与太岁方向相同，是背向太岁；负太岁，即与太岁方向相冲，因冲而破，故称“岁破”。就是说，假令太岁在子，则天下之人皆不得向南北方向移徙，起宅嫁娶尤须回避。而向东西、或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诸方向移徙则无妨。

唐宋时期，世人对太岁的信崇不下于汉。尤其是动土，凡有大小灾厄，即谓之“犯土”。所以洪迈《容斋随笔》与永享《搜采异闻录》都有如此记载：“今世俗营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谢土司章醮之文。”

到清代，民众对太岁的崇信与禁忌仍不稍减。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四说：“术家有太岁将军之说，动土者必避其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二十七在考证了古代避忌太岁的习俗后说：“按今日建筑房屋，俗避太岁所向，谓犯之则凶。”^①直到今天，港台及各地所出的择吉通书，仍在首页标明当年太岁所在，以示趋避，一般民众也绝不敢轻易冒犯。

世人对太岁的信崇与畏惧，使“太岁头上动土”一语，成为触犯强有力的人会自取祸殃的代名词。《水浒传》一书常有出现。如卷二：“史进喝道：……你也须有耳朵，好大胆，直来太岁头上动土！”可以说，太岁禁忌，是我国社会传承最久、最广泛的俗信之一，并且至今依然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

那么，这太岁究竟是何方神圣，具有如此巨大神力呢？

《周礼·春官·冯相氏》：“掌十有二岁。”郑康成注曰：“岁谓太岁。岁星与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乐说说，岁星与日常应，太岁月建以见。”贾公彦疏曰：“太岁在地，与天上岁星相应而行。岁星为阳右行于天，一岁移一辰。……太岁（为阴）左行于地，一与岁星跳辰年数同。”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岁”即岁星，或木星。

^①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影印本，第320页。

古人认为岁星十二年行一周天，（实为 11.86 年）因将黄道分为十二等分，以岁星所在的部分，作为岁名。这便是岁星纪年法。但岁星运行的方向为自西向东，与将黄道分为十二支的方向顺序正好相反。为避免这种不方便，古人便假设一个与岁星相应的星，作与岁星实际运行相反的方向运动，以这个假设的星每年所在部分来纪年。这个假设的星就叫“太岁”，又称“岁阴”或“太阴”。这种纪年法就叫太岁纪年法。如太岁在寅叫摄提格，在卯叫单阏，等。《淮南子·天文训》：“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太阴在卯，岁名曰单阏。”太岁纪年法与十二辰方向顺序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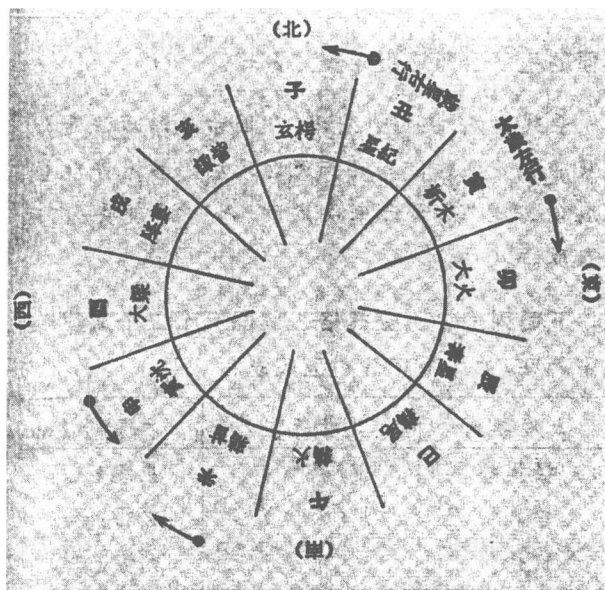


图 9-3 太岁运行图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太岁的三点认识：

1. 太岁是岁星（即木星）的假设星名，岁星为雄，太岁为雌；
2. 太岁向左顺行，岁星向右逆行，约十二年一周天；
3. 太岁与月建即斗建，二者运行的方位次序是相应的。

关于第三点，《淮南子·天文训》说得很清楚：“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这“帝”便是“天帝”，指北极星。又说：“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

“北斗之神有雌雄”、“雄左行，雌右行”，说的就是岁星与太岁。其中岁星（即木星）是实有的，它自西向东即向左逆行，为“雄”；太岁是虚拟的，

它自东向西即向右顺行，为“雌”；二者在运行过程中，分别会合于“子”与“午”。《史记·天官书》：“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执除岁：岁阴在辰，星居亥。大荒骆岁：岁阴在巳，星居戌。……”所以《协纪辨方书》说：“今按岁星右行天，太岁左行于地。岁星岁移一辰，十二年一周，故曰岁星。则历之太岁，即是保章氏所云十有二岁，并非别有太岁。顾太岁者，岁之神；岁星者，岁之星。举太岁以表岁星则可，谓太岁即岁星则不可。”（《协纪辨方书》卷三“太岁”）就是说，历书中的“太岁”只是岁星之“神”，是虚拟的，并非另有一叫做“太岁”的星。

由于太岁为岁星的代表，是“北斗之神”，因而也就拥有了北斗之尊贵与神威。《淮南子·天文训》：“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太阴所居，不可背而可乡（向）。北斗所击，不可与敌。”又说：“太岁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

而北斗为天帝的御车，代表天帝临制四方，是天帝的象征。《史记·天官书》说：“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向）。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如此一来，太岁就由于代表岁星，成为岁星之神，继而成为北斗之神，最后成为天帝的象征，完成了一个由虚变实的发展过程。最终取得了“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总成岁功”的“百神之君”的至尊地位，同时又具有《神枢经》所说的“人君之象”，因而成为天帝与人君的双重象征，成为封建统治秩序与尊严的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上对北极天帝的崇拜以及对人间皇帝的崇拜，因此转化为民俗中对太岁的崇拜与敬畏。

民俗对太岁的崇拜与敬畏，实质上是对北极天帝的崇拜与敬畏，以及对皇帝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秩序的崇拜与敬畏。《协纪辨方书》说：“《神枢经》谓，国家巡狩省方，出师略地，营造宫阙，开拓封疆，不可向之。‘向之’云者，与太岁对则身居岁破之地也。又曰黎庶修造并须回避者，太岁君象，其方固上吉之方，而非下民之所敢用，犹月忌日为中宫五黄，民间须避是日同一义也。”（《协纪辨方书》卷三“太岁”）意思是说，国家军事及营造各种事务，不能与太岁方相向相冲，否则将为太岁（所代表的势）所冲破；黎民百姓也须回避，是因为太岁为君象，老百姓不敢用、不能用，否则就是“冲犯皇上”。这同月忌日为中宫五黄，民间不敢用的道理是一样的。（参见下文“月忌日”条）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一切事情都打上严格的等级烙印，非

其权限而享用之，即为“僭越”、“违礼”，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崇信天人感应的社会，《周易·系辞传上》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在我国古代的占星系统中，岁星与土、火、水、金四星同为天帝之使。《开元占经》引《春秋纬》：“天有五帝，五星为之使。”（《开元占经》卷十八）就岁星而言，主要有两个象征意义。一为“得岁”之象（即五谷丰登）。《淮南子·天文训》：“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二为君主之象。《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岁星人主之象，主仁、主义、主德、主大司农。”凡岁星所在之国，“不可以加兵，可以伐无道之国，伐之必克。”如果其余四星与岁星会聚一处，即“五星会聚”，则“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史记·天官书》）。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先入秦关，占领咸阳，适逢五星会聚于东井，乃得天下之兆。后来他艰苦奋战，虽然屡败屡战，却最终打败项羽，一统天下。

古人设置并信从太岁禁忌，最初的立意应当包含天象与人事两个方面，即太岁既是岁星的象征，又是人君的象征，前者体现天帝的意向，后者体现君主的尊严与封建尊卑秩序。数千年盛行不衰的太岁禁忌，充分反映了古人“法象天地”、“顺以动”、追求“天人合一”价值观念，以及敬畏君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封建尊卑观念。

在实行太岁纪年法的时候，太岁与岁星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雄可以意知雌”。但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历之后，以干支纪年，两者的分歧就日益扩大并且未能弥合，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因为太岁的运行是一岁一次，十二年循行一周天，十分规范。而岁星则是11.8622年运行一周天，每年移动的范围比一个星次稍多一点。积至86年，便多走过一个星次，叫做“超辰”。由于武帝改历之后，历法不再计算超辰现象，从太初元年至今，总计已超出24.35个星次。太岁与岁星的星次已大相径庭。因此，民间谨守太岁禁忌，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即对君主及封建统治尊卑秩序的敬畏。但一般民众几乎完全不知道这一点。这便是荀子所说的：“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荀子·天论》）

无论如何，中国文化谋求“天人合一”的主导精神，《周易》“顺以动”、“与时偕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行为法则，中国民众对帝王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社会尊卑秩序的敬畏，通过太岁信仰和禁忌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体现。这可算是“神道设教”的效果吧。

五、黑道凶日禁忌习俗

我国民间习俗，办事必择吉祥日时。上至皇帝百官，下至黎民百姓，莫不如此。择吉日则必求黄道吉日，同时忌避黑道凶日。《元曲选》无名氏《桃花女》三：“（正旦云）且慢着，今日是黑道日，新人踏着地皮无不立死。”又：“（正旦唱）他拣定这黑道的凶辰，与他换过了黄道的吉日。”

民间所说黄道吉日与黑道凶日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上，不论用什么方法选出来的吉日，都可称为“黄道吉日”；所有凶日都可视为“黑道凶日”。狭义上，则指黄道及黑道诸神所值之日。

黄黑二道共有十二神，与十二辰依次相对应。即：寅青龙、卯明堂、辰天刑、巳朱雀、午金匮、未天德、申白虎、酉玉堂、戌天牢、亥元武、子司命、丑勾陈。黄道黑道各有六神。《协纪辨方书》引《神枢经》：“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皆月内天黄道也。所值之日皆宜兴众务，不避太岁、将军、月刑，一切凶恶自然避之。天刑、朱雀、白虎、天牢、元武、勾陈者，月中黑道也。所理之方，所值之日，皆不可兴土功，营屋舍，移徙，远行，嫁娶，出军。”（《协纪辨方书》卷七“黄道黑道”）即以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六神所值之日为“黄道吉日”，以天刑、朱雀、白虎、天牢、元武、勾陈六神所值之日为“黑道凶日”。

旧时通书又把建除十二神，依其吉凶配为黄道黑道。其诀曰：“建满平收黑，除危定执黄；成开皆可用，破闭不相当。”即以建、满、平、收、破、闭六神所值日为“黑道”，除、危、定、执、成、开六神所值日为“黄道”。旧时民间流行的《董公择日法》，主要就是依据建除十二神择日，因其方便易行，流行甚广。

这个流行广泛并且至今仍在民间发生影响的黄道黑道，其或吉或凶，究竟因何而来？其中蕴含着什么文化信息呢？我们先看古人的有关记载与分析。

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而行，黄道就是想像中的太阳绕地的轨道。有关黄道黑道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洪范》：“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九行者黑道二，出黄道北。”郑玄注《礼记·月令》引《河图帝览嬉》曰：“黄道一、青道二出黄道东，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黑道二出黄道北。”即把日月绕地运行的天黄道，根据五行学说分为东西南北四部分共九段，其中的黑道二居于黄道的北端。后来，术士们以日月运行的十二日（以

及十二时辰)为一个单元,与十二辰相结合,创造了黄道黑道十二神,推算日时之吉或凶,以定趋避。秦简《日书》中未见黄道黑道诸神之名,想必这一套吉凶系统,系汉以后才产生的。

关于黄道黑道十二神,何以吉何以凶,历代试图解说者不少,然多不得要领。《协纪辨方书》综论诸家观点,最后从易理角度解释,颇有几分道理。其大意是说:

综合考察,子午卯酉,为天之四正,洗心退藏,基命宥密必于子,则古人法先王,向明而出治,复有以垂百世之法则必于午。出乎震,说乎兑,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以先天而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必于卯酉。无成而有终,终则有始。观天地之生物必于寅,服中央之色而处下饰,顺承天德。观天地之成物必于未,其余诸辰莫可与之比盛。故以六辰为黄道,其余则称黑道。(《协纪辨方书》卷七“黄道黑道”)

这是从阴阳二气的起始、进退与明暗,日月的升降起落,以及万物的始生与终成等,与易卦相结合进行论述,论证子午卯酉寅未即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黄道六神之所以吉祥。

这一论述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易以道阴阳”,阴阳的本质在于运动、变异,“一阖一辟”,“往来不穷”。能够反映并且符合其运动及变化规律的,就是吉祥,反之就是凶戾。但却有过于笼统、疏阔之感。黑道凶日究竟是阴阳或日月运行的哪个时段?是否真的对人有不良影响?则未能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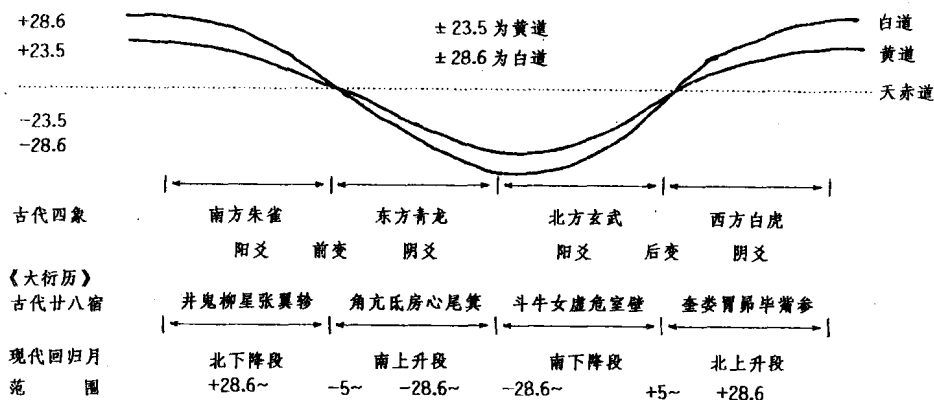
张巨湘先生结合现代天文学研习《周易》,写成《月球影响的探索》一文,^①破译了黑道凶日的奥秘。我们以此文为参考,介绍分析如下。

公元727年,唐一行禅师在他主编的《大衍历》中曾对“黑道二出黄道北”进行解说:“求星行黄道南,各视其星变化入阴阳爻而定之。其前变入阳爻,为之黄道北,入阴爻为其黄道南。后变入阴爻为黄道南,入阳爻为黄道北。”

张先生认为,一行所说的“前变”,就是现代天文学所定的轨道“降交点”;“后变”就是“升交点”。原来古人所定义的黑道二出黄道北,就是专门指降交点前一个象限和升交点前一个象限。经张先生制图和回归月运行轨道对照,正好是回归月北下降段(即前变)和回归月南下降段(即后变)。由此可知:黑道凶日就是指回归月南北两个下降段。由于回归月总是沿着严格的轨道在恒星间往返,古人便把二十八个天区用特征星命名为二十八宿,即古人所说“二十八宿日月舍。”《唐开元占经》说:“月行二十七日有奇,

^①载林渊主编《三百年与三千万年(二)》,(四川省广元电子科技咨询部、现代气功科学研究所、川北气功培训学校)内部理论书刊,1993年8月印刷。

命娄为始，去牛终奎，东交于角五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强。”那时已经测知回归月的周期是 27.3 天，所以它说：“用事又唯用二十七宿。”



注：月回归周期是 18.61 年；在高回归年，月赤纬极值是 ± 28.6 度；中低回归年，月赤纬极值是 ± 18.3 度。图中数值只表示高回归年的一种情况，其他从略。

图 9-4 回归月相与二十八宿对应图

黑道凶日的统计对应事实，张巨湘先生应用了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提供的月相资料。用回归月日序法，归纳统计九百例重大事故（包括飞机失事、火车相撞、海轮失事、火灾事故和重大交通事故等），发现“天文事故周期”集中在每个回归月的北下降段八天和南下降段八天。这两个时段占全年总天数的 58.63%，而事故数却占总事故的 70.79%。统计事实表明，月球回归两个南北下降段正好是“天文事故高峰期”。

当我们把统计结果与中国古代二十八宿之间回归月恒星座联系起来分析时，发现月回归南下降段正是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之所在，而月回归北下降段正是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之所在。再进一步分析这个结果，正好和《大衍历》“阳爻为黄道北”之说完全吻合。二者对照如下：

《大衍历》阳爻：牛女虚危室壁奎娄 鬼柳星张翼轸角亢。

现代天文事故期：斗牛女虚危室壁奎 井鬼柳星张翼轸角亢。

现代天文事故期提前一宿（一天），是由于岁差春分点在二千年中移动了三十度（二宿），在一千年中移动了十五度（一宿）的缘故。

由此可知，我国古代黑道的天文定义是很明确的，有可靠的文献可以证明。而黑道凶日的论断，在古代经典数术书中也已经定出。我们用现代天文

数据和大量的统计事实给以对照，使这一中国古代黑道凶日之谜得到正式破译。

“黑道凶日”影响人类的物理机制在于，月球运动产生了地球磁场，地月系统实际上可以视为一台巨型极低频发电机，月球的回归周期（回归月）有规律地改变其绕转直径，从而调制了地球极低频电磁波的频谱，给人的脑电波活动以特殊影响，支配了频率共振波段的精神活动。其中，月回归转折期（极值）可出现共振性兴奋（表现为烦躁），易导致事故发生；月回归下降段中期，易于引起脑电波抑制性共振（休息型），反应迟钝，也易导致事故发生。

因此，所谓“黑道凶日”，并非毫无根据的迷信，而是月球周期运动对人体影响的科学反映，是古人长期观察总结的科学结晶。中国民众办事必求“黄道吉日”，力避“黑道凶日”，目的当然是为了趋吉避凶，实质上是敬顺天道，顺时而行，求取“天人合一”，是《周易》“顺以动”、“与时偕行”，以及“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哲学精神在民俗活动中的实际体现。这一行为是有天文依据的。

六、杨公忌与月忌日

杨公忌，在我国民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大。《无何集》：“世俗多畏杨公忌，谓不宜出行。”

杨公忌在农历中的日子是固定的，全年共有十三日，依次是：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七月二十九、八月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

杨公忌主要是忌出行，此外起造、嫁娶、安葬等事也忌用，故民间又称“百事忌”。汉无名氏《出行宝镜》附录有一歌诀极言其凶：

神仙留下十三日，举动须防多损失。
一切起造共兴工，不遭火盗必遭凶。
婚姻嫁娶亦非宜，不得到头终不吉。
人生下世遇此日，巴巴漉漉难度日。
安葬若还用此日，后代儿孙去乞食。
上官赴任用此日，是是非非无休息。

“杨公”究竟是何许人？其忌因何而得？晋南地区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

说。说是北宋初年，宋太宗赵光义中了辽国计策，被辽兵围困，杨家将在杨继业率领下前往救驾。一日兵行至两狼山前，杨继业认为此次行兵犯了地名之忌：羊（谐杨）遇狼，并且是两条狼，必然凶多吉少，告诫众子弟小心前行。后来果然遇伏，兵败金沙滩，大郎、二郎、三郎、七郎英勇战死，五郎怕死当了和尚，老将杨继业碰死于李陵碑前。这一天是五月十三日，与杨家将“失散”巧合。“十三”与“失散”谐音，成了杨家将的忌日，所以叫“杨公忌”。先是杨家将的祖籍地代县信从其忌，后来逐渐遍及全省，忌日也由五月十三日，扩展为全年所有月份的十三日。^①

但这仅仅是一个传说而已。

张巨湘先生自破译黑道凶日之后，又对自汉唐以来加进历书中的杨公忌日进行研究，证明它是对黑道凶日的另一种表述，并且相当准确。张先生用现代天文学知识，将杨公忌制天象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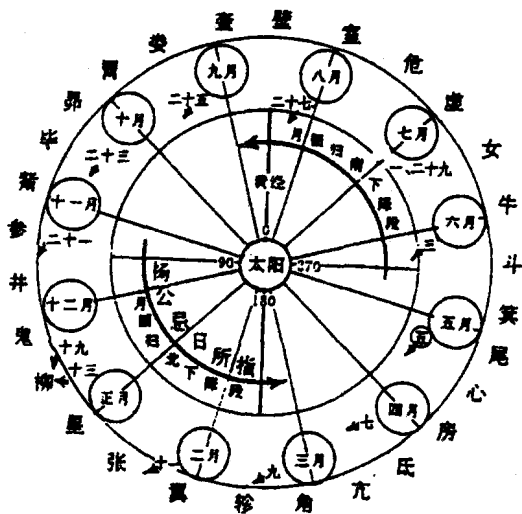


图 9-5 杨公忌天象图

从杨公忌日一年十三天的月相所指方向看，其天文背景，月球北回归点下降段井鬼柳星张翼轸角一段。

张先生统计了 1987 ~ 1992 年六年中杨公忌与黑道凶日的对照情况，列表如下：

^①参见吴宝良、马飞《中国民间禁忌与传说》，学苑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版，第 241 页。

表 4 杨公忌日月宿分布表

	月宿分布(黑道凶日)								合 计	备 注
	井	鬼	柳	星	张	翼	轸	角		
1987年	3	3			4	2	1		13	闰六月
1988年			4	3	1	3	2		13	
1989年			5	3	3	1	1		13	
1990年			5		2	4	2		13	闰六月
1991年				2	7	3	1	1	14	
1992年			1	3	6	2	1		13	
合 计	3	3	15	11	23	15	8	1	79	
占百分比	3.8	3.8	18	13	29	18	10	1.27	100	

这六年的实际统计, 79 个杨公忌日全部重叠在“黑道凶日”中, 尤以柳星张翼轸五宿占 91.14%, 命中率之高惊人。

张先生根据杨公忌日的天文启示, 认为还存在一个反向的“杨公忌日”, 即: 阴历正月廿九、初一、二月廿七、三月廿五、四月廿三、五月廿一、六月十九、七月十三、八月十一、九月初九、十月初七、十一月初五、十二月初三。所对应的月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八宿, 即月球南回归点下降段。^①

由于“杨公忌日”只选取了黑道凶日八天中间的一天, 对黑道凶日的命中率很高, 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 大部分事故日总出现在杨公忌日正负四天之中, 最容易为有实际经验的人所接受, 所以能够在二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遵行。由此可知, 杨公忌日同黑道凶日一样, 都是我国民众敬天顺时, “顺以动”, 谋求天人合一的行为体现。

旧时, 民间以每月(农历)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 凡事必避之。为什么要禁忌这几日呢?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月忌》云: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 凡事必避之, 其说荒诞不经。后见卫道夫云: ‘闻前辈之说, 谓此三日即河图数之中宫五数耳, 五为君象, 故民庶不可用。’此说颇有理。”

按周密所作之图, “河图数”当为“洛书数”。即洛书中宫为五数, 自一开始, 初五、十四、二十三日值中宫, 五为君象, 所以一般臣民不可用, 否则就有僭越“犯上”之嫌。

^①张巨湘《旧历注杨公忌日的破译》。载林渊主编《三百年与三千万年(二)》第十篇第三章第二节, 四川省广元电子科技咨询部、现代气功科学研究所、川北气功培训学校内部理论书刊, 1993年8月印刷。

四 初四、十三、 二十二日	九 初九、十八、 二十七日	二 初二、十一、 二十日
三 初三、十二、 二十一日	五 初五、十四、 二十三日	七 初七、十六、 二十五日
八 初八、十七、 二十六日	一 初一、初十、 十九日	六 初六、十五、 二十四日

图 9-6 洛书配月忌日之图

在封建时代,君王被视为“天子”,为天、为父,民间尊之,畏之,故不敢僭用作为君王之象征的中宫五数。如果说,民间忌避太岁、黑道凶日和杨公忌日是尊崇天地自然之序,那么,忌避中宫五数就是敬畏封建社会的尊卑之序(太岁禁忌也有此意),是一定时代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们都是通过“顺以动”来避免凶祸,获取平安、吉祥。

七、百忌日禁忌及其文化意蕴

明清时期社会上流行的万年书、通书,都载有“百忌日”。具体内容各书所载稍有差异。据《协纪辨方书》,十干禁忌为:“甲不开仓,乙不栽植,丙不修灶,丁不剃头,戊不受田,巳不破券,庚不经络,辛不合酱,壬不决水,癸不词讼。”

十二支禁忌为:“子不问卜,丑不冠带,寅不祭祀,卯不穿井,辰不哭泣,巳不远行,午不苦盖,未不服药,申不安床,酉不会客,戌不乞狗,亥不嫁娶。”

“戌不乞狗”,意义不明。查姚承輿《择吉会要》,作“戌日忌食犬”。“戌”为犬,“戌不食犬”,其义乃通。(南方一些地区念“吃”曰“乞”,

《协纪》所云，或由此来。）

百忌日所忌用事，在我国民间流传极其久远。战国时期已有其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载云：“毋以子卜筮，害于上皇；毋以丑徐（除）门户，害于骄母；毋以寅祭祀、凿井，□以细□；毋以卯沐浴，是谓血明，不可□井池；毋（以）辰葬，必有重丧；毋以巳寿（祷），反受其英（殃）；毋以午出入臣妾、马（牛），是胃（谓）并亡；毋以未（未）斩大木，必有大英（殃）；毋以申出入臣妾、马牛、货材（财），是胃（谓）□□□；毋以酉台（始）寇（冠）带，恐御矢兵，可以渍米为酒，酒美。”又曰：“未不可以澍（树）木，木长，澍（树）者死；戌不可以为床，必以埽（埽）死人。”但无十干忌事。

到汉代，不仅十二支日禁忌，十干禁忌日也出现了，从而形成了比较全面的百忌日。1959年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第六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日书》载十干日忌事：“甲毋治宅，不居必荒；乙毋内财，不保必亡；丙毋直衣，□……；丁毋威□□多作伤；戊毋度海，后必死亡；己毋射侯，还受其央；（庚）……（辛）……壬毋□□必得……”。十二支日忌事：“……（辰）毋治丧……；午毋盖屋，必见火光；未毋饮药，必得之毒；申毋财衣，不烦必亡；酉毋召客，不闹若伤；戌毋内畜，不死必亡；亥毋内妇，不宜姑公。”王充《论衡·辨崇篇》有“辰日不哭，哭有重丧”之文。

到唐代，百忌日就与后世十分接近了。《敦煌掇琐》九〇载十干日忌事：“甲不开藏，乙不纳财，丙不指灰，丁不剃头，戊不度□，己不伐树，申（庚）辛不作酱，壬不归家，癸不买履；”十二支日忌事：“子不问卜，丑不冠带，又不买牛，寅不召客，卯不穿井，辰不哭泣，不远行，巳不取奴，午不盖屋，未不服药，申不裁衣，不远行，酉不会客，戌不祠祀，亥不呼妇。”

明清时期的百忌日，显然是由战国时期的十二支日禁忌发展而来。

百忌日与易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逐条分析如下。

“甲不开仓”与“子不问卜。”甲为十干之首，子为十二支之初。《说文》谓甲：“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从木，戴孚甲之象。”谓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于易相当于一阳之“复卦”（十一月）。《周易·复卦·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这是说，当阳气初生之时，需要静养蓄势，不使初阳受到侵害。财或粮也需要积蓄，甲与子都有朔旦之象，民间在干支初转之时，忌开仓破费，是提倡慎于理财，以蓄积财势，否则终生难有积蓄。民间元旦习俗，至今忌讳用财，以为将会一年不能积蓄，就是此意。通书建日忌开仓库，义理与此相同。子日忌问卜求神，也是要人静待勿动，养势观变，“待时而动”。古人有疑则卜，卜以求吉，必

然是有所动作。子日阳气初生方弱时即有所动作，显然与易理不合，不利发展，故有此忌。

“乙不栽植”与“丑不冠带”。《说文》谓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谓丑：“纽也，十二月万物动用事，象手之形。”于易卦相当于十二月之“临卦”。《周易·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这是说，在临卦二阳之时，阳气渐盛，这时候极易放肆无忌，最需要了解事情将会向反面发展的趋势，树立履薄临深的意识，谨慎从事，才能保证“元亨”。乙日忌栽种，是要人们顺应天道，预作防备，尽可能避免灾害。古人二十而行冠礼。行冠礼之后，该人就获得了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在古代以礼治国的政治体制中，冠礼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礼记·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所以古代圣王极其重视冠礼，在行冠礼之时，要“筮日筮宾”，以示敬重。丑日处于阳长阴消的盛大之时，容易使人得意忘形，对以后的发展即“修齐治平”不利，因此为古人所忌。这是古代“居安思危”、“危故达”思想在民俗中的具体应用。

“丙不修灶”与“午不苦盖”。《说文》：“丙，位南方，万物成，炳然，阴气初起，阳气将亏。”又说：“午，牾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即丙与午，在方位上属南，五行属火，并且都是阳极之火，为阳极阴生之象。于易卦相当于五月一阴之卦。这时，阴阳交争，阳气盛极而衰，意象都不好。《淮南子·天文训》：“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邱上屋。”灶属火，盖房最怕火，阳极则为灾。民间忌于其日修灶、苦盖，是担心会因之引起火灾，而其义理，则在于此。

“丁不剃头”，在易卦系统中，丁与丙午同处离宫，五行亦属火。头为阳，为乾，为天，当丁午之时，阴阳交争，阳极而衰，且“丁”与“疔”谐音，民间忌于其日剃头，一则忌伤损元阳之气，二则担心日后会生疔疮。

“戊不受田”，在易卦系统中，戊己居中宫，五行属土，而中宫为君象，民间不敢于其日受田，其理与月忌日相同。

“己不破券”，“破券”当为“立券”，即立券交易，订立契约。《周易·革》：“革，己日乃孚。”《彖传》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这是说，革卦下体是离火，为中女；上体是兑水，为少女。水火相克，中女与少女不相得，也是相克，所以称为“革”。关于“己”字，解释历来不一，（有人读作巳，有人读作己，或读作已）我从戊己庚辛之“己”。己为十干之第六，由原来的“生数”转变为“成数”，与十二辰之第七，及建除之破同义。做生意最讲和气——和气生财，现在称为“双赢”，最盼望长久——财源不断，而己日为“革”，为变之象，所

以为经商者所忌。

“庚不经络”，在易理系统中，庚属金，为刀兵之象。经络即纺纱织布。纺纱织布最怕火和刀斧，故有此忌。申亦属金，唐时民间有“申日不裁衣”之忌。（《敦煌掇瑣》九〇）

“辛不合酱”，《择吉会要》作“辛日忌酝酿合酱，”包括酿酒，一并禁忌。此忌义理不明，不强为解释，以俟日后或智者。

“壬不决水”，《择吉会要》作“壬日忌开渠决水。”在易理系统中，壬为水，居北方坎宫。《说文》：“壬，位北方也。阴极阳生，故《易》曰：龙战于野。”《周易·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这又是一个阴极阳生，阴阳交接的危险时段。《淮南子·天文训》：“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故不可以凿地穿井。”这是壬日忌开渠决水的义理所在。

“癸不词讼”与“亥不嫁娶”。癸为十干之末，亥为十二支之终；癸处北方坎宫，为阴极阳生之象，亥为十月纯阴之坤卦。词讼是最为强阳之事，“癸”尽管一阳始生，但毕竟势力过弱，并且还是十干之末，故不宜诉讼。至于嫁娶，最讲阴阳和谐，夫妻长久，亥为纯阴之卦，又是地支之终，所以民间忌用。当然，这是仅就癸、亥而言，若是择吉，参详四柱不同组合，又当作别论。

“寅不祭祀”，《说文》：“寅，髌也。正月阳气动，去黄泉，欲上出阴，尚强。”徐锴曰：“髌，斥之，意人阳气锐而出上。”在易卦，寅居东方属木为阳，配正月三阳泰卦，俗称“三阳开泰”。正是阳气生长强盛，万物和遂之象。古人办事用日，以阴阳相区别。《礼记·表记》云：“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出郊为外，城中为内，祭祀在于通神，事理属阴，且为阴中之阴，宜用阴柔之日，故忌用阳气强盛之寅日。

“卯不穿井”，义理不明，亦留待异日。

“辰不哭泣”、“值辰日不哭”，此俗则由来甚久。战国时期的秦简《日书》已有此忌，以后作为“百事忌”的主要内容，一直流传民间，俗信极广。《论衡·辨祟篇》载：“辰日不哭，哭有重丧。”

为什么死亡值辰日丧家不能哭泣，否则将有“重丧”之灾呢？此忌源于阴阳五行学说，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已经识破，但后人多未留意。《颜氏家训·风操》引阴阳书云：“辰为水墓，又为土墓，故不得哭。”这是说，不幸于辰日死的人，已有水、土两墓在那里恭候着，再要哭泣悲伤，就很可能要再死一个人，构成“重丧”之祸。

各地还流传有另一版本“重丧日谣”：“正七逢甲庚，二八乙辛当，五十一丁癸，四十丙壬防，三九六腊月，戊己是重丧。”即正月和七月的甲、庚

日，二月和八月的乙、辛日，五月和十一月的丁、癸日，四月和十月的丙、壬日，三、六、九、十二月的戊、己日，均为重丧日。凡值其日有丧事，必须忌哭，否则将有“重丧”之患。

此说亦出于阴阳五行学说。按正月建寅，与甲为“两木相重”；七月建申，与庚为“两金相重”；二月建卯，与乙“两木相重”；八月建酉，与辛“两金相重”；五月建午，与丙“两火相重”；十一月建子，与壬“两水相重”……，三、六、九、十二月，建辰未戌丑，五行属土，土而又逢戊己土，也是“重”。与“辰日不哭”道理相同，并且很可能是依其“两土相重”之理而再造。

“巳不远行”，巳五行属火，为四月纯阳之乾卦。这时，气候日渐炎热，阳气发展到极致，“亢龙有悔”。旧时民间通书以巳、亥为重日。《协纪辨方书》引《天宝历》曰：“重日者，以阴阳混合于亥，阳起于甲子而顺，阴起于甲戌而逆，至巳亥而同，故曰重日。其日忌为凶事，利为吉事。”（《协纪辨方书》卷五“重日”）前者是担心凶事重犯，后者是希望好事逢双。旧时外出远行凶多吉少，故有此忌。

“未不服药”，未日忌服药，大概是因为“未”有否定的语义。如表示：不曾、没有、不、否，等。《左传》庄公十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史记·武安侯传》：“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民间忌未日服药，是担心治不好病。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

“申不安床”，床为夫妇休养生息之所，最要紧的是平安、稳妥、持久。在易理系统中，申酉居西方，五行属金，金克木。此其一。又，民间通书以申酉日为“五离”，意谓六十甲子至戌亥而绝，申酉则未绝而离；以四时言之，申酉为金秋肃杀之气，与天干相配，共有五日，故曰五离。其日忌结婚、会亲友、立券交易、安床。旧时民间之床，大多为木制，最怕金来克伤，夫妻最忌离异，所以安床忌用申日。

“酉不会客”，会客即宴请亲友，与朋友相聚。交友之道，重在诚信，贵在长久。酉日为“五离”，为金秋肃杀之气，未聚即有“离”之征兆，而且与“五合”（寅卯）相冲，当然不吉。故会客忌用酉日。

“戌不食犬”，戌日何以忌食狗？义理不明显。可能来自二十八宿信仰。古人以二十八宿配为四象，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属金；又以二十八宿配属二十八兽，娄宿为狗，称为“娄金狗”。二十八宿所主各有不同，娄金狗为吉星，其歌曰：“娄星临挂天门庭，家庭添财事事兴。婚姻他日生贤子，世代相逢禄位升。”其日宜嫁娶、祭祀、开门、放水。狗为娄宿之象，十二辰中戌为狗，故戌日忌食狗。

阐释至此，已基本可知，我国民间长期流行的“百忌日”习俗，其信仰渊源，是基于阴阳易道。事理虽然细微，但就像每一滴水都可以反映太阳的七彩光芒一样，百忌日习俗也同样体现出中国民俗的文化本质。就是说，百忌日禁忌，并不会造成绝对的吉凶，百姓信从它们，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顺应天地之道，即阴阳变化之易道的文化精神，求得天人合一，也就是《周易》所说的“顺以动”。尽管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周易·豫·彖传》：“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我们在此再接续一句：百姓以顺动，则万事顺遂而物丰人和。

通过以上不多的几项禁忌习俗析介，我想，已能使我们认识到，尽管古代社会流行的大多数禁忌习俗，“似乎仅只是交感巫术的相似律与接触律这两大原则的特殊应用”，^①没有什么价值，但其中不少禁忌习俗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国百姓生活、处世的价值观念，有一些则揭示了天地日月运动影响人类活动的奥秘，还有一些则是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①弗雷泽《金枝精要》，第22页，刘魁立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后 记

易学与民俗的关系实在是太深太广,太丰富了,区区二十余万字即欲将广袤无垠的民俗万象囊括其中,确实有点勉为其难。好在易学与民俗的主要关系,本书大体已经涉及,有所论列,因而也就稍感心安了。至于民俗中蕴含的生存智慧,本是《周易》大智慧的具体运用与体现,分量极重,但因为同时还涉及到自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人生等各个方面,所以未展开讨论。只好留待日后了。

感谢丛书主编张其成先生与责编赵安民先生的信任,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得以将十多年来对民俗的教学、研究与思考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尤其是在世风浮躁的今天,张其成先生仍能如此认真细致地审阅书稿,对本书提出十分详尽的修改意见,使本书增色不少。这不仅令我十分感动,更让我钦佩不已,要引以为榜样的。

感谢近年来民俗学界和文化学界众多学者所作出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他们辛勤耕耘的基础上,我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部图文并茂的专著。如果说这本书还能对世人有所启迪,完全是站在他们肩膀上的缘故。他们是我未谋面的师长和朋友。

尽管有些俗气,我最后还得再说一句:感谢我的太太练必荣女士。她的身体不太好,多年以来,她承担了几近全部家务工作,使我得以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创作,按计划完成写作。

真诚地欢迎学界同仁对本书的有关观点及问题提出商榷、讨论,乃至批评。我喜欢以文交友。

刘道超

2005年5月23日二稿于桂林